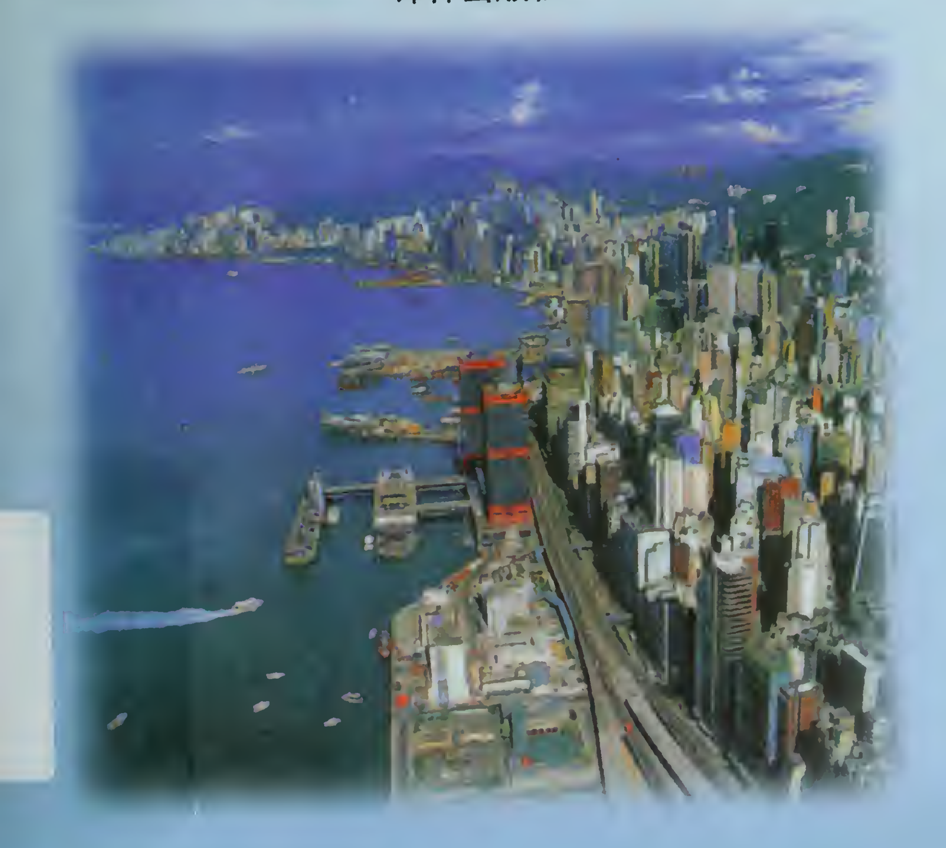
千年风雨话香港

1997

林庆元　李景端　主编

译林出版社







百年风雨话香港

林庆元　李景端　主编



译林出版社

本　书　编　写　人　员

顾问　雷洁琼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戴　逸　中国史学会会长

乔晓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编委会主任　凌　青

副　主　任　柯在铄　郭丰民

主　　　编　林庆元　李景端

编写人员

前　言　李景端

第1—4章　林庆元　王亚华　张燕青

第5、7章　戴显群

第6章　林庆元　王亚华　张燕青　戴显群

第8—11章　徐心希

第12—16章　王坚德

前　言

1997年7月1日，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从这一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被英国强行割占达百年之久的香港，终于又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为了洗雪国耻，为了振兴中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反抗侵略的悲壮之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但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且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更加壮大，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提高，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所有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

香港在被割占的百年沧桑中，在各方面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香港的历史发展中，既留下了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占领者进行掠夺和压迫的污痕，也表现出了香港人民自强不息的智慧和勤劳。在香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香港人民发扬自身的优势，创造了社会稳定、经济腾飞的卓越成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在实现香港回归和实施“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中英双方也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斗争。在这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的日子里，让更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能够系统而又扼要地了解香港从割占到回归的历史进程，从事物互相联系的角度认识香港的昨天和今天，并从“一国两制”丰富的内涵中展望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这对于帮助读者全面认识香港问题，从中激发爱国主义精神，无疑会起到积

极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决定编写这本反映香港回归的普及读物。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史实准确，观点鲜明，材料具体，叙述简练。对百年来香港发生的大事和有影响的事，尽量不漏；对近若干年来香港某些成功的做法，也客观地予以介绍；对港英当局在香港回归过程中设置的障碍，则如实地加以揭露。我们希望通过这本鸟瞰式的普及读物，能在香港回归之际，唤起更多读者对香港的关注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也希望在当前全国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中，提供一本史实与知识并重的深入浅出的爱国主义读物。

本书各位顾问对本书的编写十分关心，特别是林则徐的后裔、原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凌青同志，原首任外交部港澳办公室主任兼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柯在铄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乔晓阳同志等，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多方面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社会文化司的负责同志对全书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谨此向所有关心和帮助本书编写和出版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书是一本普及读物，在编写过程中，曾经参考或引用过一些专家著作的资料，除有的已在注释中说明外，恕不能一一列出。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欠妥之处，衷心期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1997 年 4 月

目　　录

前　　言

割　占　篇

沧 桑 篇

回　归　篇

割占篇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与香港被割占

一、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近代先进思想家冯桂芬发出了这样愤懑的责问：西方何以强？中国何以弱？从林则徐开始，中国先进人士为改变弱国地位和落后状态，一直前仆后继地进行奋斗和探索。

究竟西方何以强？让我们把历史镜头推回到16、17世纪的欧洲。当时随着欧洲城市经济的兴起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人们在摆脱中世纪神学思想的桎梏之后，欧洲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发展，并推动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诞生。16世纪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出版，创立了新的宇宙结构体系——日心说，使欧洲科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伽利略建立了一系列力学的基本原理，为17世纪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发现奠定了基础。16世纪，代数符号体系的建立和对数的发明，特别是解析几何学的建立，对后来工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一些化学元素的发现，对近代工业的发展更有直接的作用。1760年，英国物理学家布莱克建立了比热的概念，这对后来瓦特改进蒸汽机也具有重要意义。

明末清初，这些西方科技一度传入中国，并与传统科学“会通”，形成了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出现了如徐光启、方以智等著名科学家。但明末清初的近世科学曙光，却因清代雍正以后越来越严厉的闭关政策而黯淡下去。

其实所谓“闭关”，是指清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即在

政治、文化和外交上拒绝与各国交往与交流，禁止国内人民与外国人直接接触，排斥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视西方近代科技为“奇技淫巧”。它的特点就是视天朝为世界的中心，自我满足，自我孤立，自甘落后。这种长期形成的僵化观念，阻碍了对世界形势的清醒认识，也排斥了对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成果的吸收。

与此相适应，便是在思想界实行严厉的统制政策。雍正即位后，“文字狱”迭兴，一些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问题而埋在故纸堆中。此外，清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以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学此时如日中天，“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这就从根本上窒息了社会的进步。

就在清王朝逐渐衰落的时候，西方却由于不断的科技发明而使大工业迅猛发展。西方这场以 18 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使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使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迅速发展。举几个例子说明吧！如生铁，从 1793 年的 12.5 万吨增加到 1840 年的 139 万吨，不到半个世纪就增加了 11 倍。又如煤，从 1795 年的 1000 万吨增加到 1836 年的 3000 万吨，40 年间也增加了 3 倍。而这时候，中国没有一吨用机器生产的煤、铁。英国近 1 万公里的铁路，也在鸦片战争前后完成了。到 1835 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 1950 台，机制棉纺织品成为英国轻工业的主要产品，到 1839 年，棉纺织企业达 1819 个。总之，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 45%。

英国的强国地位也反映在军事力量的发展。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装备的火炮只有燧发滑膛炮。清军的轻火器主要是鸟枪和抬枪，也就是滑膛枪。在武器性能方面，英国比中国优越。中国的火炮射程近，命中率不高。英国火炮的优势，是 19 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产物。这说明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导致了军事的落后。

英国的海军更明显地优越于清政府的水师。由于工业革命的

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有少数蒸汽船用于哨探和通讯；战船虽然还是木制的，但船身大、船板厚，最大兵船约 32.5 尺，可容兵员 700 余人。船身包裹铁皮，配以重炮。火轮船长 24 丈，配炮 10 多门，可容二三百人。中国外海兵船主要有赶缯、艍船、哨舰、虎船、沙船等，都是木制帆船，极易腐朽；船身薄，易被击穿，且风帆小，速度慢。英国这时大约有兵船 150 艘，海军人员 11 万多人。兵船载炮多达 70 多门，成了“船坚炮利”的“海上霸主”。

火药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可是到了近代，火药质量却落后于西方。一位外国人的评论曾写道：

“直到今天，中国火药的质量仍然很劣，大炮仍然是如此不良，致使放炮的人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清朝军队的腐败也早已为外人所了解了。外国人写的一篇文章描述：“中国的战舰庞大而笨重，像一堆木材”，“除非在平静的海面上，否则就全无用处”。而广州水师因受贿被腐蚀到了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地步。

这篇文章又指出：“中国的清军虽然在纸上有时显得很庞大，但实际上是徒有其名。士兵世世代代驻在同一城镇，除非被遣出征，平日就宁愿在坐领粮饷的同时做一点和平的副业，或耽溺于那种在中国被认为天赐之福的安逸生活，而不愿去经受战场上的危险。”“兵站、救护、医疗设备又奇缺，给养不足，运输困难”，“中国人的主要武器是弓、火绳枪、剑和矛”。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强国因近代工业的发展，大大地促进军事体制的变革，加速先进军事技术的应用。而清政府无论经济、政治、军事都处于落后状态。政治上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政体，经济上是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牛耕延续了漫长的岁月；而且没有近代工业。中国第一家近代机器工业是在鸦片战争二十几年后才诞生的。鸦片战争时期只有手工业生产的铁，中国的机制钢铁直到 19 世纪末才诞生。

李鸿章说过，中国面临未曾有的大变局，遇到未曾有的强敌。他说这话的时候，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过去二三十年。可悲的是清政府在西方列强挑战面前，关起大门做着天朝大国旧梦，而对世界及世界的变化则拒绝了解，更谈不上知己知彼。有一次，嘉庆皇帝问大臣孙玉庭："英国是否富强？"孙玉庭答："彼国大于西洋海国，故强。但强由于富，富则由于中国。"嘉庆又问为什么？孙玉庭答道："彼国贸易至广东，其货物易换茶叶回国时，转卖于附近西洋各小国，故富，因而能强。西洋海国之需茶叶，亦犹北边外之需大黄。我若禁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岂能强。"君臣自编自演的"以茶制夷"的笑剧，生动地表现了清朝君臣的无知与虚矫心态。这就是为什么当西方强敌驾着战舰用大炮炮轰中国大门的时候，清朝皇帝不得不屈服的历史悲剧。

知己知彼，为兵家之要言。但是，清政府由于长期把自己封闭在中央大国里，不但对世界茫然无知，而且对战争对方的情报也所知极少，只信一些风传和无稽之谈。如定海一役，报称打死了璞鼎查云云，说璞鼎查是现在的头目。又说慈溪一役，打死了头目，英兵为此用白布挂孝。事实上并非挂孝，而是陆军士兵穿的白色号衣。这样的情报竟然作为封疆大臣得到的消息上奏皇帝，打仗自然非败不可了。相反，英侵略者十分注意收集我方情报。如每日都看清政府的京报，从中分析清政府的动态，而打到镇江时，便多方收集长江、黄河的地图。相形之下，清政府的愚昧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

清政府的军队，经历长期和平时期，至鸦片战争前，已不会作战，实际上已经腐朽，不堪一击。当时的大理寺卿金应麟就曾十分气愤地报告皇帝："文员怀印而逃，以投池为故套。武弁弃城而溃，以退守为自全。问敌情则茫乎不知，闻讹言则各自奔散。纪纲不立，号令不行，虽百万之师，终归无用。"

二、英国侵华野心由来已久

随着英国大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逐渐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1825 年开始，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棉纺织工人举行罢工。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迫使它必须不断地向海外扩大殖民地市场，推销商品，否则，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存在与发展。19 世纪初，英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不断扩张它的势力，在印度不断进行战争征服。1819 年英国占领了通往远东的重要基地新加坡，1824 年武装侵略缅甸，1838 年入侵阿富汗。当英国疯狂地在世界各地寻找殖民地市场的时候，当时有近四亿人口而又落后的封建中国，很自然地成为英国攫取的目标。

英国与中国通商，早于 1637 年就开始了。可是，中英贸易关系，对英国资本家来说，并不有利可图。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男耕女织”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具有顽强的抵抗力。农民穿自己纺织的土布，不需要也没有钱买洋布。而英国本土的王牌商品——毛纺织品，因为工业革命的效果还未充分体现出来，不够精美；到中国售货，还得绕好望角，运到中国的航程足足要花半年时间。因此，成本没法子降低，也就很难打垮便宜的中国土布。二是清政府为了防范外人支持国内的反清势力，于 1757 年实行限制中外贸易的所谓“闭关政策”。主要内容有：(1)关闭作为对外贸易港口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只留广州与外国贸易；(2)设立“公行”制度(史称广州十三行)，由“公行”包办进出口贸易，代征和承保外商税收，负责中央政府与外商各类交涉；(3)对出口贸易的种类和数量作严格的限制；(4)限制外商在广州的活动范围。应当说，这些规定中有部分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必要措施。如规定外国商船进入中国港口必须从船上“起出”大炮，货船

必须停泊在规定的地点，出入要经中国官员稽查，征收关税。这些都是属于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 18 世纪七十年代，完成于 19 世纪初叶。这时资本主义制度已在英国取得统治地位。从 1788 年至 1830 年这半世纪内，英国棉纺织品生产增加了 3 倍，生产成本费和工业品的价格降低 80%以上。以棉纺织品为商品的工业资产阶级，高唱自由贸易的口号，走遍全世界，中国成为商品输出的重要对象。英中通商关系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

东印度公司于 17 世纪成立后，长期垄断了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但是，英国对华贸易，必须同时带来大量的白银以换回它所需的中国土产。1751 年，有 4 艘英国商船驶往中国，其中载有价值 119000 镑的现金，而只有价值 10842 镑的货物。1792 年至 1807 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到英国的货物价值约 27157006 镑，而从英国运往广州的货物价值只有 16602388 镑。据 1820 年估计，英商在广州销售商品的净亏损额，在前 23 年中共达 1688103 镑，这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显然十分不利。

怎样改变这种现状呢？英国终于在印度找到了出路。他们在印度找到了鸦片，成为打开中国大门的特殊商品，开发鸦片贸易利益，就成为英国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的一个动因。

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对华扩张的发展，英国力图支配中国的野心也日益强烈。很早以来，英国就想在中国攫取各种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开通商口岸，割占岛屿，侵犯中国领海。一句话，就是要把中国殖民地化。当用外交手段达不到目的时，就采用武力的手段，终于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

在英国发动对华战争中，巴麦尊（1784—1865）和义律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巴麦尊出身英国贵族家庭，剑桥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海陆军军职二十多年，并两次组阁，担任外交大臣、首相。他是两次侵华战争政策的制定者和战争发动者。义律（1801—1875），出身

英国贵族和外交官家庭，他于 1815 年进入海军，服务于海军和外交界多年。1834 年，他成为驻华监督律劳卑的秘书。鸦片战争前夕，即 1836 年，他被任命为英国在华的商务监督，狂热推行侵华的战争政策。1837 年，中国关于禁烟问题的争论正进入决定性阶段，义律凭着他的嗅觉，觉察到“因鸦片问题而发生纠纷的可能性”，于 1837 年 2 月致函外交部。这消息对好战的巴麦尊显然是一个好消息，觉得实行炮舰政策时机已到。11 月 2 日，他向内阁建议“把东印度防区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马他仑爵士调往中国，并尽可能常常派去一艘或数艘兵舰；第一，借以保护英国的利益，并于女王陛下的臣民有正当理由对中国当局控诉时，加强女王陛下在必要情况下所提出的一切抗议的监督力量；第二，帮助监督维持往来广东各海口的商船水手们的秩序”。巴麦尊终于接受了鸦片贩子和英国商人早先提出的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现在剩下的问题只是时机和借口了。

三、英国殖民主义扩张中的香港

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位于广州珠江口之东。这章所说的香港，是指香港岛。而香港地区，则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新界陆地和邻近岛屿。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属于华南文化。在秦朝，它属于南海郡番禺县管辖。现在新界“屯门”，在《新唐书》里就已出现。它是当时广州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设置屯门镇管辖。到明代，中央政府在香港的设防加强了，分属于大鹏千户所和东莞千户所管辖。到清代，香港岛一直是在清朝汛兵的驻守保护之下，并根据清朝法律实行管理。

到鸦片战争前夕，香港地区人口约 1.5 万人。主要是渔民、农民和打石工人。古代中原战乱，不少人民迁居该地。北宋以后，战乱频繁，有更多人迁居香港。现在新界的邓姓、文姓、廖姓、侯姓以

及彭姓都是这时期迁来的。香港人口中一直是中国人占绝对多数。

随着英国对中国进行的殖民主义扩张日益强烈，也随着英国在扩张中对香港地位认识的加深，香港越来越成为英国企图占领的一个重要对象。在英国派出的几次使华代表团的活动中，都曾经提到香港。

1787 年，英国首次派出以卡思卡特中校为首的使华代表团，其中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在广州以外的地方攫取一块居留地。英国政府还把这看成是进一步扩大对华商业的关键。11 月 30 日，英国国务大臣西德尼勋爵向卡思卡特发出这样训令："我们希望在比广州更方便的地方获得一小片土地，或一个与大陆分开的岛屿。"不过，卡斯卡特却在来华途中病死。4 年后，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勋爵为使华代表，再次率领代表团使华。来华前，英国政府给他的指示里除了重申要求割让居留地之外，还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

（一）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为通商口岸；

（二）在北京设立货栈，买卖货物；

（三）将舟山附近一个不设防的岛屿让给英国，以便英人居住和存放货物；

（四）将广州附近"一块类似的地方"让给英国；

（五）英商在澳门、广州之间运载货物免纳过境税。

（六）英商只按清廷公布的税则纳税，不另纳税。

以上这些要求，实际上已粗具领事裁判、扩大通商口岸、租界、割地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胚形。

这批使团人员相当庞大，共由 3 艘船组成。马戛尔尼在柏林神学院曾获硕士学位。他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是一位殖民老手。使团副使是斯当东，他与马戛尔尼关系非常密切。英国派出这样一个使团，可见其对攫取上述要求抱有极大的期望。代表团是以祝贺乾隆皇帝 83 岁寿辰名义来华的。在进贡的礼物中有天文仪器、钟表、车辆、军器、船式等，无非是向清朝皇帝炫

耀西方的近代文明。可是乾隆皇帝只是把这些当做礼物收入皇宫供观赏而已。

乾隆皇帝关心的是觐见的仪式、礼节，要求使臣行三跪九叩礼。而英使却坚持以见英王之礼来见中国皇帝，双方争执不下。这却难倒了中国大臣。大臣们不断地劝说英使行三跪九叩礼。可怎么说马戛尔尼坚不服从。最后，总算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即按照英国礼节，屈一膝，免去吻手礼。9 月 14 日早晨，在万树园大幄次正式觐见，83 岁的乾隆皇帝显得十分高兴。不过，使团中没有人会讲中文，只有副使斯当东的儿子能讲几句。皇帝听了非常高兴，让他到御座前讲几句。皇帝因此高兴得从自己腰带上解下一个荷包亲自赐给英国小孩，还送给使团许多礼物。乾隆皇帝还特地把一只十分珍贵的小箱送给英王，里面装着他以前的皇帝小型画像。这场包含英政府扩张图谋的觐见却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21 日使团离开热河，英国国书也被翻译出来。这时乾隆才知道英国有着不可告人的特权要求，一口加以拒绝。

这一次英国使团并未明确提出香港为其居留地。英国殖民者提出香港问题是 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的时候。1816 年，阿美士德来华。临行前，英国外相罗加事理给他的训令中，要求“取得驻使北京的允许和开通广州以北港口……设法推销英国的制造品”，“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建立在一种安稳、健全和公平的基础上”。这时英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并炫耀“伊国尚有 1000 只、每只可容士兵 400 名”的船炮。嘉庆皇帝完全拒绝英国的要求，阿美士德同样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但他来华时，其座舰及东印度公司的勘测船曾在香港南丫岛海面停泊 3 天。他的副使埃利斯在日记里还写道：“以往大概从来没有这么多欧洲船只聚集在这个港湾中。从岸上看去，整个景象十分热闹。到了夜晚，那么多渔船，每只点着一盏灯，宛如灯火通明的伦敦街道一样”。显然，这岛屿引起了阿美士德的注意。回国后，他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详尽的报告：“从各方面来

看，无论出口入口，香港水陆环绕的地形，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从这开始，英国政府开始注意香港岛。1821 年，清政府禁止贩卖鸦片，英国烟船转移到香港岛及附近洋面活动，香港岛成为英船的汇集地点。

19 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侵占香港的野心进一步暴露。东印度公司代表斯当东直接向下议院鼓吹占领香港。他认为"很多年来，香港是轮船停泊的良港"。他还鼓吹在这里建立一个贸易中心，"以脱离中国的管制"。1834 年 8 月，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第一次建议英国政府使用武力占据香港岛。他说："用一点武力……占据珠江口东面的香港，那是很有用的。"虽然，英国政府直至此时还未正式选择香港作为计划中占领的海岛的目标。但是，香港却事实上成为英国鸦片走私的巢穴和武装侵华的前哨。道光初年，清政府开始驱逐黄埔的鸦片船，英国走私贩便将鸦片转移到虎门口外伶仃洋，设趸船贮藏鸦片，台风季节则移至金星门或香港水域。到 1837 年，停泊在尖沙嘴的鸦片船越来越多。据大鹏营参将、澳门同知先后的报告称，七八月间，停泊在尖沙嘴洋面的鸦片趸船先后达 25 艘。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垂涎香港的原因。

第二章　武力侵华，强占香港

一、鸦片走私

鸦片是罂粟的浆汁制成的膏。罂粟在唐代的文献里就已提到，12 世纪后，中国已懂得提炼成膏作为药用。

鸦片在我国一贯只作为药用，用作吸食是从南洋传入的。据

载，明朝末年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滤去渣滓，再煮，和菸草叶为丸，放在竹管上就火吸食。大约在荷兰占领台湾的时候，就把南洋一带这种吸食方法带到台湾，又从台湾经厦门传播到我国大陆。直到 1729 年，雍正皇帝才颁布第一道禁烟令，对贩烟及开烟馆处以重刑，但没有对吸食者作具体规定。这反映了当时吸食鸦片并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问题的日益严重化，是从外国大量输进这类毒品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除了力图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条件，向中国索取特权之外，就是利用毒品贸易作为手段，而把鸦片作为商品从孟加拉运到中国的建议，是澳森上校提出的，被当时英印副总督惠勒所采纳。1780 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鸦片的贸易。从此，鸦片成为英国对华商品中最大宗的“商品”。1790 年从印度转往中国的鸦片为 4054 箱，从 1800 年到 1826 年，每年的输入量大约在这数字上下浮动。此后，数额逐年猛增。最惊人数字是 1834 年以后，到 1839 年，每年运入中国的至少有 35200 箱，是鸦片战争前的最高数字。三十年代后，尤其是 1834 年以后，鸦片走私猛增，是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取消直接联系的。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构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构，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他们干得非常起劲。这时期，由鸦片贩子组成的私人公司有历史悠久的怡和洋行，著名的查顿和马地臣是这个公司的重要股东；另一个鸦片走私公司叫宝顺洋行，其老板就是与查顿齐名的“铁头老鼠”颠地。此外，伦敦东印度中国协会、曼彻斯特商会均积极从事向中国贩运鸦片。1834 年，贩毒的洋行，仅英国开设的就从 1833 年的 66 个增加到 1837 年的 156 个。这些鸦片走私贩子是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如英国怡和洋行的查顿、马地臣，宝顺洋行的颠地，后来都成为英国议员、爵士。

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运来鸦片，在伶仃洋停泊后，把鸦片卸进鸦片趸船，然后再载着合法的货物前往黄埔港。鸦片商以样品兜

销。买商支付现款,鸦片贩子就给买商一个提单。买商拿到提单,最重要的是去向清朝缉私官吏行贿买通,然后到趸船上提货,放在称作"扒龙""快蟹"武装船鸦片船上,由 50 至 70 个水手驾驶走私船,将鸦片运进广州"窑口"(窝点),再贩卖到全国各地。

鸦片走私之所以越来越猖獗的主要原因,是官吏的受贿。因为无论是断绝鸦片进口,或对内禁止栽种、贩卖和吸食,都必须依靠官吏执行。这又是与清王朝整个体制相联系的。因为这些官吏"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于是视广东各类衙门为肥肉,竞相钻营。一旦任职,就公然受贿,而以鸦片走私为大。如《澳门月报》1837 年 4 月载:"自从禁止鸦片以来,此种贸易在地方官员庇纵之下,在澳门、黄埔两处仍然进行。有些人员监视每箱鸦片的交接,从中收过箱费,而有些人员则远离走私现场,听任禁令不行,私贩猖獗,从而每年收受包庇走私的贿赂"。受贿的不单是衙门中低级官吏,而且有蓝顶的高级官员,甚至红顶的水师提督。总督对鸦片走私,不能说一无所知,因为在他自己的衙门里,录事、秘书、武弁以及其他人员,吸食鸦片是很寻常的事。尤为可惊的是,尽管禁令如此之严,而走私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并且常常是在那些经常进出于停泊处所巡艇眼前干的。马士对清朝官吏受贿有这样一段具体的记载:

"关于美国双桅帆船蔷薇号装载 300 箱鸦片航行东海岸的有趣故事:

"该船到达南澳,就在南澳水师统带的旗舰附近下锚。这位水师统带就立刻登上帆船检查……又宣读一道警告船只不得进行贸易的谕旨。然后,在一个私下的会谈中,真正的交易就开始商量了。这位水师统带直截了当地开口问道:'船上有多少箱?是不是都卖给南澳?'……然后到了真正的要点,拿出钱来付款,于是问题圆满解决。水师统带一离开了船,中国买主就立刻上船……这都是在那艘旗舰的视线以内作出的。"

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与鸦片走私相连的贿赂行为,使南方各省中国官吏的风纪败坏净尽。”可见,尽管皇帝的禁令是严厉的,但封建政治机器却如此腐朽和失灵,致使早期的禁烟失败了。

二、禁烟运动

鸦片走私当然不只是给少数人或某个阶级带来灾难,受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澳门月报》登载一位比较正直的外国人写的文章指出:“鸦片走私长此下去,必然成为戕生、荡产、败德的罪恶根源。吸食鸦片,中国人视为最丑恶的行为,最巨大的灾难,使全国人民遭受痛苦。受害者遍及各阶层,上至皇室,下至最贫困的农民。生于最上层富贵之家的游手好闲人物,造成了一种风气,此行彼效,一家传染一家,很快就成为一种可怕的狂热。这种习气,由上层蔓延到士大夫、文武官员,而至军队和所有贫穷阶层。”

因此,破获走私、吸毒案件时有发生。如1831年北京破获了一起太监张进福等贩卖烟土的案件,在他之前的几个太监都吸食鸦片,他本人吸食鸦片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皇帝眼皮下竟敢犯法,其他人则可想而知。

当时全国鸦片吸食者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有的认为200万人,1838年湖广总督估计约四百万人。又有一位英国医生估算,1834年进口的鸦片,可制成33,200,000两备供吸食的合剂,足以满足12,500,000吸食者的需要。这个统计数字缺点是,它没有指明每人每年吸食的次数,因而无法精确说明吸食的固定数字。《中国文库》又有一个统计,每年从外国输入可吸煎汁33,320,000两,每人365两吸食量,则全国吸食者达9,120,000人。尽管这些估计不很精确,但吸食者之多,是可以想象的。如一位外国学者指出:“自由贸易使得吸毒成瘾像瘟疫一样蔓延全国”。资料表明,那时除西藏未发现吸食案之外,其他省份均有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

者。

鸦片流毒如此之广，造成的祸害是非常严重的。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除了造成倾家荡产、卖妻卖屋之外，还使体质受到残害。一旦上瘾，则骨瘦如柴，俗称“鸦片鬼”。这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商人来说，由于大量的白银购买了鸦片，造成白银外流，导致一般商品经济萎缩。对统治者来说，造成“银涸兵弱”。当时有人讥讽清朝士兵有两枝枪，一是鸟枪，一是烟枪。由此足见对王朝的统治工具军队的战斗力的破坏是多么严重！总之，鸦片烟毒，扼杀了中华民族生机，是病国病民之大害。

面临严重的烟毒，1839 年 3 月 10 日林则徐临危受命奔赴禁烟斗争的前线广州就任钦差大臣，使这场民族自救运动出现新的面目和具有新的意义。林则徐还以廉正、无私、自尊的中华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南下时，不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只有顶马 1 弁，跟丁 6 名，厨丁、小夫共 3 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坐大轿 1 乘，自雇轿夫 12 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 2 辆，轿车 1 辆。所有住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均免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省公费。这种廉正作风，一洗官吏奢华恶俗。这种作风，对禁烟运动的开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事实证明，林则徐的威望，廉正认真作风，不但深得人民支持，而且先声夺人，使烟贩闻风丧胆。邓廷桢原先在广州曾逮捕烟贩多人，贩毒集团竟敢聚众抗拒，有的则张贴诗帖，中伤禁烟运动。后来，林则徐调查清楚的 62 名大烟贩名单中，有些是多年来经营“快蟹”、“扒龙”的人，包括各衙门堂差及军营兵丁在内。林则徐命令迅速缉捕归案。于是，鸦片贩子“无不私探罪名轻重，与新例是否颁行”。大鸦片贩子查顿，匆忙逃至澳门，以观风向。英、美鸦片趸船也纷纷离开伶仃洋，暂避锋芒。

继此之后，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继续高涨。广东、福建、云南、辽宁也认真查禁。天津的琦善，也不得不做样子，捕获烟贩邓然

等，搜出鸦片13万1千5百余两。广州逐渐形成禁烟运动的中心。据当时外国人彼得·巴克估计："城内外有几万人吸毒……但在珠江三角洲和广州湾，几乎每天都有中国人因犯禁被捕。有一次有20几个人上着锁链押进广州。""广州监狱里的烟犯不少于两千人，每天有三四个人因为抽不到大烟而死掉。"广州由于邓廷桢转变了态度，使禁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禁烟，是我国的内政。可是，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涉外的性质。外国烟贩，对于中国政府搜捕本国犯罪分子，同样进行疯狂破坏。1838年12月12日，广州官吏把一名叫何老金的鸦片贩子置于商馆附近，拟加绞刑。外商蔑视我国主权，干涉中国执刑，动手打中国群众，这就引起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还击。万人群众围住商馆，对外商表示抗议。事后，外侨商会竟提出抗议。1839年2月26日，广州官吏再次在商馆执行绞刑。英美法竟下旗以示抗议。从这也可以看出，外国鸦片经营者与国内鸦片贩子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后来林则徐到广州后，把斗争锋芒指向外国贩子的客观原因。

3月18日，林则徐发布命令，要求外国鸦片贩子缴交烟土，并宣布这次禁烟的方针政策，表明林则徐的态度与决心。林则徐严正指出，"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宣告了禁烟运动的正义性。

外侨总商会意识到林则徐的分量，不得不于3月21日讨论林则徐的"谕令"。可是狡猾的外国鸦片贩子以缴交烟土1037箱的手法，想以此蒙骗过关。林则徐从多方面调查，得知当地鸦片存货共达2万箱左右。林则徐见外国贩子缺乏诚意，便采取果断措施，下令传讯大烟贩颠地。颠地，英国商人，在广州经营鸦片20多年，设鸦片行颠地公司，与另一大鸦片贩子查顿齐名。查顿，苏格兰人，1828年与马地臣共组查顿·马地臣公司，以郭士立为译员，向沿海进行贩毒活动，时称"铁头老鼠"。1838年为躲避禁烟风头，潜逃回国。这样，颠地就成为当时留在广州的最大烟贩。义律得讯后，

即掀起战争叫嚣，采取使事件复杂化的步骤。义律于 3 月 22 日发出通知，要求英船挂起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的任何攻击”。这是彻头彻尾贼喊抓贼的强盗逻辑。他对林则徐为加强海防的一些措施，也加以干涉，以挑衅口吻问道：“现在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质询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作战?”这里，义律企图造成仿佛是两个国家代表之间争执的事实，以使禁烟内政变为国际纠纷。接着，义律从澳门到达广州进入商馆，庇护大烟贩颠地，“把颠地安顿在他的公事房里，放在他的亲自保护之下”。

为此，林则徐于 3 月 24 日封锁商馆切断内外联系。3 月 26 日暂停贸易后，林则徐再次要求义律“晓谕各夷人，遵谕将趸船烟土迅速全缴，不但人船买办一切照常……从此各夷人均作正经买卖，乐利无穷”。林则徐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暂时的，可谓仁至义尽，有理有节。可是，义律却借此大造战争的舆论。他在《公告女王陛下臣民》里煞有介事地叫嚷这些措施是什么“越轨暴行”，鸦片贩子在给英国政府请愿书中更是无中生有，大叫：“英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处于“十分可怕的危险中”。

封舱、封馆很快取得了积极效果。3 月 25 日当天即有美商具结。义律却以“坚决的口气和态度”对待林则徐。他要求林发给护照，并威胁说：“如果不发护照”，“不得不被迫认定本国的人员和船只已被强行扣留，就要作相应的行动”。林则徐的回答冷静而坚定：“一定要先缴烟，然后自然会颁给护照。”义律不得不向商人宣布：“本总监督，为了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并代表政府，充分而毫无保留地愿意对缴出鸦片的全体及每一位女王陛下的臣民负责。转交中国政府。”义律企图把缴烟转化为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为发动侵华战争埋下伏笔。

如何处理这批数量庞大的烟土，林则徐是颇费推敲与布置的。当时林则徐接到上谕，决定在虎门海口销毁。林则徐在现场派出了 1 万多名士兵和 12 名可靠官员严密监督，并利用石灰、盐卤和烟

土混合浸化，利用海水冲洗。从 6 月 3 日到 25 日，在中华民族的英雄林则徐主持下，举行了震动中外的销烟壮举。当时应邀来参观的有美国商人 C. W. 金，他是奥利芬特公司的代表，一向未曾进行鸦片走私。另有埃利萨·裨治文，美国最早来华的传教士；还有商船马利逊号船长开逊等。金参观后写下了这样的感想：“当基督教政府种植和经营这种害人毒物的时候，何以异教的君主竟然高尚地鄙视这种出售可以为他的国库带来不少于 2 千万元的收入？”“世界历史上能找到以其正直无私来抵制基督徒的堕落腐化的更好例子吗？”

反对外国烟贩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场反走私的斗争。鸦片是违禁品，从国际法来说，也是各国所反对的。一位外国学者写道：“这些走私贩子使用未被认可的武装船只，并在暴力的威胁下将毒品夹带到中国水域，这不仅违反中国法律，而且触犯国际公法。任何英国或其他国家海军船只也一样，在海上执行警察任务时，发现走私贩子皆可以将其拘捕，如果胆敢反抗，还可以将其击沉，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同时，这些鸦片走私贩子又是推行英国国策的一种有价值的——哪怕是非正规的——工具，是最后的海盗”。这说明中国政府打击国内外鸦片贩子的禁烟运动是正义的、必要的，完全符合国际法，是一场维护本国主权独立的爱国主义运动。可是，英国政府正是为坚持可耻的鸦片走私利益而向中华民族宣战的。正是英国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改变了我国领土香港的历史命运。

三、英国推行炮舰政策，发动侵华战争

经过一场激烈尖锐的缴烟与反缴烟的斗争之后，斗争的焦点逐渐集中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具结”的问题上。林则徐决心要永远根绝鸦片贸易，并使外国人忠实地遵守中国法律。

依照各国法律，凡外侨所在国均有权制定涉外法律，凡外侨违反及触犯所在国法律，均应依法科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也制定了类似条例，并对外国人犯罪加以审判。乾隆年间，广东省办理英夷洪任辉等控案，动即监禁一、二、三年，无敢违抗。如道光 2 年之命犯啡了，6 年之命犯玛挐厄尔，“皆引律例化外有犯，依律拟断之条，处绞立决，夷人无不贴服。”这种法律，体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鉴于外国人在中国走私鸦片之猖獗，林则徐在缴烟之前后，先后向外国商人三令五申，他们必须写保证书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明确指出：“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林则徐这些做法都是根据清朝对外律例的精神提出的。为了突出杜绝鸦片来源，针对外国人鸦片走私，1839 年 5 月 18 日奏请清政府“夷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提出“将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应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案”。这条奏议，目的在于使外国人对禁止鸦片走私具有更明确的印象，更加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而是十分正确的。

英国政府早就决心破坏中国司法主权，攫取领事裁判权，为此大造所谓中国法律苛刻、野蛮等舆论，以便对中国制度实行所谓的“改革”。于是围绕“具结”，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林则徐在缴烟之后，下令恢复贸易，但是必须“具结”。义律采取了对抗的方针，5 月 4 日命令所有英商离粤，进入澳门。5 月 19 日，义律通知所有英船不得进内河。6 月 12 日，英商在澳门集会，表示他们不赞同任何人“违反总监督的严格命令而把英船或英货驶运广州”，以此抵制林则徐“具结”的要求。义律声称，“他必须等候本国的训令”。1839 年 7 月 7 日，发生了林维喜事件。据当时外国报道：“一群上岸的士兵共 30 名，无缘无故地袭击一个住着友好中国人的村子，一位无辜的村民被打死，许多男男女女受了重伤”。

经新安县梁星源验明“顶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伤”，“讯据见证乡邻，佥称系英吉利国船上夷人所殴”，“众供甚为确凿”。3日后，义律至尖沙嘴进行所谓“调查”。他在向巴麦尊的报告中称，他发现“卡拉提克”号和“曼加罗尔”号的一些水手，“很不适当地被允许到香港岸上，所以卷入了一场骚乱”，致使那位村民死亡。可是就是不提出真正凶手的姓名，他还“通过给予死者亲属大约两千元的赔偿费来掩盖这个事件”。

义律拒绝林则徐关于外国商船必须遵守中国法律的要求，与英国政府的侵华政策不谋而合。8月27日，他致函巴麦尊称：“我应该禀报阁下，自澳门墙上贴满了虚假的、侮辱性的涉及我本身的告示，以及中国雇员撤走、各种食物供应断绝之后，我就拒绝接受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官方信函。用这种办法，我一直能够把要求我交出肇事者的直接请求反驳回去”。这样，以领事裁判权为焦点，中英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林维喜事件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这个事件诱发了近200年来中英所存在的矛盾。当林则徐命令英国人离开澳门退至海面船上之后，9月4日，义律、士密挑起了九龙海战，使中英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义律以“乞食”为借口，向九龙水师船发起炮击。我国水师船士兵英勇还击，击败了当时炮火占优势的英国兵船。义律方面参战的还有装备精良的“路易莎”号及巡洋舰“珍珠”号等。清朝水师“打得顽强而且相当准确”。下午5时，武器充足的“威廉要塞”号、“甘米力治”号不得不增援。然而仍无法取胜，不得不仓惶败退。这样，由于义律的挑衅，从外交争端，而发展为武装冲突。关于这次中英第一次海战，参战的英国水兵亚当·艾姆斯利在给他伦敦的哥哥信里，有客观的叙述：

同中国官员进行长时间的会晤后，单桅快船“路易莎”号、“珍珠”号和“窝拉疑”号舰载艇，在离这些船很近的地方抛锚停泊。下午2时，义律上校送信给中国官员，告诉他们说，如果

半小时后没有得到给养，就要击沉他们的船——半小时过去了，没有给养送来。——士密舰长下令他的舰载艇开火……我们向他们开了第一发炮，他们马上用密集的炮火准确地朝我们的方向射击，……他们的炮台于下午 3 时 45 分向英国人开火，他们的炮火稳而准确地对准了单桅快船……那些船立即扬帆追赶“路易莎”号。

在这场战斗中，两名中国士兵牺牲，两名重伤，四名轻伤。英国两名船员重伤，“冈不里奇”号得忘喇士船长受伤。这场流血战斗是义律蓄意制造的，目的在于使中英矛盾激化，并且极力推动英国与中国迎头对抗。

鸦片贩子查顿回到伦敦即与巴麦尊会见，同时于 10 月 26 日写信给巴麦尊提出封锁中国沿海港口，以便提出赔偿，要求开放福州、宁波、上海等港口，此外，还为巴麦尊设计了作战所需的兵力方案。伦敦代理商人约翰·艾贝尔·史密斯还致函巴麦尊，阐述查顿的意见。这些鸦片贩子在推动英国政府对华作战，起了决定性作用。鸦片商人写信给巴麦尊，催促“政府能早日决定政策”。这些商人同样为鸦片走私辩护。他们提出这样荒谬的论点：中国政府纵容百姓贩烟，因而外国人也就不应遵守中国法律。这个论点，后来就成为英国政府对华宣战的理由之一。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给巴麦尊信里，毫不掩饰它的野心，要“以欧洲的原则，为两国新关系的基础”。谁都明白，欧洲原则，实际上就是支配和奴役中国的原则。而且它又说：“施以武力，可以有很大的成绩”。它还露骨地声称：“我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印象，即是：屈服只有使危机加深。我方应当用武力强迫中国方面让步，将贸易置于一个安定的永久的基础之上”。英外交大臣巴麦尊露骨地宣称：“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

九龙战役后，10 月 11 日，英国内阁会议就决定派遣一支舰队

侵华。巴麦尊这个好战的外交大臣秘密通知义律，称：

> 陛下政府现在的想法是：立刻封锁广州与白河或北京诸河……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镇，或任何其它岛屿。凡是能够用作远征军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要永久占有这样地方的。

这个通知已包含了英国政府武力占领中国岛屿的阴谋。虽然未明指香港岛，但义律却在后来"谈判"中根据对香港地位重要性的认识，提出了割占香港的要求。

义律接到密令之后，更是对中国水师加紧挑衅。11 月 2 日，"窝拉疑"号、"华伦"号、"士密"号先后驶入离虎门 30 里外的穿鼻海面，阻挠守法具结的"当郎"号货船入口。11 月 3 日中午，"士密"号首先向中国水师开炮，爆发了穿鼻海战。1 小时左右结束。提督关天培奋勇指挥，打中了"窝拉疑"号船头，英兵有的受伤，有的落海。而中国水师也因力量悬殊，伤亡较大。紧接着，从这天开始，一旬之内，英侵略军连续 6 次向官涌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官涌是九龙尖沙嘴以北的一座山。英军进攻官涌，目的在于占领尖沙嘴。因为尖沙嘴海域群山环抱，浪静风怡，是一个理想的停泊船只之所，且早已成为鸦片贩子的集中巢穴。

官涌 6 次之战，英侵略者的阴谋并未得逞。中国守军在林则徐的指挥下，新建炮台，固垒深沟，据以英勇反击，结果英军逃离了尖沙嘴海域。尽管这样，义律对尖沙嘴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视，对占领香港岛及尖沙嘴的计划也越来越明朗了。

英国内阁虽然早已决定武力侵略中国。但直到 1840 年 4 月 4 日，英女王才把这场不光彩的为维护鸦片贸易侵华战争案提交国会辩论。其国内有些人士如反对派的代表格雷厄姆对战争案提出异议，认为中英关系中断的责任在于英国政府。这个侵华战争提案竟以 9 票微弱多数通过了。于是，巴麦尊高兴地说："这场战争是完

全值得打下去的。”

1840 年 6 月 21 日，英国军舰 16 艘，炮 540 门，蒸汽轮 4 艘，运兵舰 1 艘，运输舰 27 艘，陆军 4000 人，由义律的堂兄懿律担任海陆军最高司令，义律为全权公使，入侵广东海口。林则徐采取积极措施，加强防卫，整顿水师，招募民勇。他相信“民心可用”，鼓励“人人持刀痛杀”英国侵略者。广州未能攻下，英国留下部分军舰封锁广州海口，大部分军舰北上。7 月初入侵厦门，因军民英勇抵抗，英军未能登陆。7 月 5 日，英军攻陷浙江定海。英军登陆后定海遭受空前的浩劫。一个参加这些战役的英国军官说：“军队登了岸，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用暴力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箧，街道上堆满了图画、椅子、桌子、用具、谷粒……一切这些都被收拾去，除了死尸以及被我们无情的大炮弄残废了的受伤者。有的丢了一只脚躺着，有的两只脚都没有，许多被可怕地割裂，被流弹射穿。只有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时候，才停止抢劫”。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一个明白无误的自供状。

定海被占领，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失地，是使道光帝从抵抗转向妥协的一个战役。投降势力乘机抬头，借此攻击林则徐“禁烟过激，轻启边衅”。8 月 6 日，英国军舰未遇到任何抵抗，直犯天津。大批军舰进入大沽口，炫耀英国的武力。8 月 15 日，懿律把巴麦尊子爵《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照会》交给直隶总督琦善的代表千总白含章。巴麦尊在信里诬蔑林则徐禁烟残害英国人，同时声称“决讨昭雪”，提出 5 项要求，其中重申了割让一岛或数岛与英国，供英人居处贸易。道光帝对英国及局势一无所知，而又非常虚骄。在一次御前会议上，他问大臣：“英吉利在何方？方圆几许？英国离中国多远？有无陆路相通？”无知是闭关自守的产物，是落后的表现。难怪他看到英国的信件后，以为惩办林则徐就可以了事，全忘了英国的侵略意图在于割地赔款和支配中国的野心。他竟然寄

谕要为英国“伸冤”，似乎惩办林则徐，就可以一了百了！

四、假谈判，真占领

8 月底，虚骄的道光皇帝谕令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国代表义律在白河口开始谈判。琦善(1790——1854)，字静庵，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深受道光倚重。天津离北京近在咫尺，所以道光帝首先谕令琦善设法让英侵略者退兵广州，以进行“和谈”。琦善在与英国代表谈判中，百般讨好，乞求英兵南下。英国侵略者这时正面临冬季，不可能有效地在北方发动攻势，加上军队中病疫流行，因此答应退至广州谈判。道光帝竟因此高兴地宣称：“片言片纸”，“胜十万之师”，虚骄之态，又再表露。10 月 3 日，道光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受到严重挫折。

琦善来到广州，还来不及接印，就派遣随员张殿元、白含章、鲍鹏去看望义律，极尽讨好之能事。12 月 4 日，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英代表就迫不及待地与琦善举行谈判。这天，义律正式提出了“议和”14 项条件，包括归还烟价、兵费、行商欠款，割地，开放口岸，北京建使馆区，两国公文平等往来，以及领事裁判权等。

12 月 7 日，义律“照会”琦善，要求按照巴麦尊《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照会》内所载条款签订和约。其中就提到：“在大清国家沿海地方，将岛屿割让与大英国家，永远主持……所割让之岛……或止一岛，或数岛，皆照大英钦奉全权公使所拟也”。在谈判中，对于通商和其他条款，琦善表示“代为恳恩”，对割地一事，他不敢答应。义律见此，又于 12 月 12 日照复琦善。义律声称什么大清皇帝不愿如此办理，英国亦不求取地方云云。但却开列了一连串要求，如开埠、规定关税章程、英人居住广州、交还宁波英军俘虏等。这些条件应允之后，就可以订约，一月内归还定海。此外，又加上一个条件，

就是“英国军队将在外洋红坎山暂屯，俟各事善定全完，然后撤回本国”。红坎山就指香港，这是义律谈判中第一次提到香港，只要求“暂屯”，并未提割让。

12 月 15 日，琦善照复义律，除答应赔偿烟价外，对增开口岸再次表示“代为奏恳圣恩”，对于割地及暂屯香港要求，琦善重申“天朝从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琦善虽然未予应允割地，但内心对英国人“一启口即言打仗”却十分恐惧。义律看透琦善的心理，于 12 月 26 日再次照复琦善，威胁说如不能“允照所议，将籍兵法办行”，以武力威胁琦善。义律步步紧逼，12 月 29 日，义律又照会琦善，更加明确地提出，“惟有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态度十分强硬。与此同时，为了迫使琦善就范，义律和伯麦命令英军进攻大角、沙角炮台。

1841 年 1 月 7 日上午 8 时许，英陆战队约 1400 人从穿鼻湾登陆，兵舰向沙角、大角炮台猛烈开炮。清军奋起反击，寡不敌众，炮台被摧毁，英军强行登陆，大角陷落。接着，英军用大炮猛攻清军营盘，守将陈连升孤立无援，率军奋勇抵抗。英军凭其船坚炮利，强行登陆。英兵舰炮毁清水师船 10 艘，抢走 2 艘。陈连升身先士卒，在孤立无援情况下，英勇奋击，不幸中弹身亡。其子陈长鹏一声大呼，奋起杀死数名英兵，敌人的血染红了战袍。最后，陈被英兵连砍数十刀，犹血战不已，惨遭刳破肚腹而阵亡。经过一天血战，沙角炮台陷落。沙角除 4 门葡萄牙大炮外，其余全是铸炮，且无炮车，不能转动。这一战役，充分反映了清政府的落后与腐败，军事设施的废弛。

义律非常狡猾，软硬兼施。在武力占领沙角、大角之后，又提出 5 项要求。这一手对琦善发生了威慑作用。直至此时，琦善迫切希望妥协，早日结束战争。1 月 11 日，琦善向义律表示，他答应代奏请皇上在外洋“寄居一所”的要求，交换英方占据的沙角。义律占领香港的意图至此更加明朗化。他照复琦善，提出以尖沙嘴和香港交

换沙角，并声称只有这两个地方才肯接受。1 月 14 日，义律再次照复，说琦善如答应“将尖沙嘴、香港各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则英国即将沙角、大角归还。尽管琦善步步退让，直至此时，他仍不敢答应割让香港。但他却说，尖沙嘴与香港，系属两处，很难奏请准允，英国只能“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琦善这一表示，虽不包含主权转移的含义，却已表示妥协。义律便把这表示加以歪曲，声称什么按照琦善“来文办理”，“一面以香港一岛接收寄居贸易之所；一面以定海及此间沙角、大角等处，统行交还贵国”。1 月 20 日，义律竟以“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名义，发表占领香港的公告：

(1) 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大清帝国对于香港商业应征收的一切正当捐税，按在黄埔贸易例缴纳。

(2) 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

(3) 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4) 广州港口贸易应在中国新年后 10 日内开放，并应在黄埔进行，直至新居留地方面安排妥当时为止。

这个公告中所谓“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云云，完全是义律一面之词。琦善于 1 月 20 日禀奏道光时，只是表示：“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船寄居”，“至于香港地方，奴才先已派员前往勘丈。俟奉旨准行，再与该夷酌定限制”。这里，琦善表示同意寄居，并无割让之意。只作为通商口岸对待，而且不是全岛，所以才需要勘丈。道光帝也同样作这样看待。他要琦善迅速查明，香港地方离省城远近，地形宽狭若何？在彼开港是否有关利害？

义律一边散布谎言，一边干脆实行武力占领。1841 年 1 月 25 日，英军占领了“大笪地”(上环水口街附近)。且看英国侵略者是怎样庆贺他们的“胜利”：“舰队司令 24 日来后，就派我们去香港，开始进行勘测工作。我们在 184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8 时 15 分登陆。我们是第一批的真实占领者，我们便在领地山上三呼万

岁，举杯祝贺女王陛下健康。26日，舰队到达；海军陆战队登陆，国旗在我们的营地上升起来。在其他将领陪同下，伯麦司令官正式举行占领该岛的典礼，各舰和陆战队同时鸣放礼炮。”这一占领使英国鸦片贩子非常高兴。马地臣立刻去香港，兴建了石头货栈，并将怡和洋行总办事处设在香港岛。香港成了鸦片走私的根据地。

义律以武力占领香港岛后，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一占领披上“条约”的外衣。1月27日，义律与琦善在莲花山举行会晤。义律拿出他拟定的条约草稿，即所谓“善定事宜”条款，让琦善过目。琦善态度暧昧，并未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伯麦便抓住琦善的妥协态度，硬说义律和琦善已“议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所谓“文据”云云，是义律一手炮制的。问题是当时琦善出于恐英心理，并未明确声明反对这一谎言，致使义律的计谋得逞。

琦善代表清政府于1月31日将拟定的草约文本给了义律，共4款。其中规定：“准令咦咭唎国人仍前来广通商，并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琦善态度仍然是暧昧的。当时，一方面是英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态度，一方面割让土地又为清政府所不容。因此，他一方面以“寄居”的含糊字样奏请道光，另一方面对义律行拖延战术，玩文字游戏。

2月11日，琦善与义律在穿鼻洋蛇头湾继续会谈。义律不同意琦善“寄居”的提法而“坚求全岛”，文字游戏哄骗不了侵略者。义律并不理琦善那一套。2月13日，义律照会琦善，要求在义律拟定的“条约草案”上加盖关防。这“条约草案”中有一条：“天朝大皇帝准将治属之广东新安县附近海滨者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主”。琦善的文字游戏玩不过义律。当琦善无法回避“割让”问题时，便采取拖延战术，向义律声明暂不能盖关防于“善定事宜”，“请再予以十天进行考虑”。这时，琦善已接到道光任命奕山赴粤主持战事。琦善见形势不妙，才向义律提出延期考虑的要求。因此，穿鼻草约始

终没有被清政府承认。义律为了迫使琦善在草约上签字,2 月 26 日,英军进攻虎门。英军蒸汽船 2 艘冲进三门。琦善虽然调兵增防,然而为时已晚。25 日,18 艘英舰入侵虎门、横档。永安炮台清军弹尽援绝。爱国名将关天培,亲自率军坚守镇远、威远炮台作战。英国军舰的大炮猛烈轰击两炮台,使清军伤亡大半。关天培手执佩刀,与英兵面对面砍杀,毫无畏惧,不幸中炮殉职。这位英雄,至死双目不闭,挺立不倒,屹立如生,吓得英兵丧魂倒地。这位英雄牺牲了! 他的死,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样,琦善与义律的谈判不了了之。所谓"穿鼻草约"便成子虚乌有。

综上所述,足以说明,清政府始终未答应割让香港,琦善也未在所谓"穿鼻草约"上签字。该草约是义律一手炮制的,香港岛,完全是英军武力侵占的。"南京条约"只是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

五、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

道光接到香港被占领的消息后,2 月 26 日谕令将琦善逮捕查办,并调兵遣将,派皇侄奕山及杨芳至广州督战。5 月 21 日,奕山侥幸出击英船,未能取胜。次日英军反攻,占领广州外城。奕山胆小如鼠,连城内衙署卫兵打喷嚏也以为敌人发射火箭,怕得直发抖。这个盲目虚骄又胆小的奕山于 5 月 27 日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

1841 年 4 月,英国首相巴麦尊见到《穿鼻草约》,也暴跳如雷。因为《草约》同意中国在岛上收税,表明"不是英王的属地",没有"把香港在绝对的主权上割让给英国",对义律极为不满。因此改派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巴麦尊给璞鼎查的训令指出,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应签订一次正式的"先得到中国皇帝批准"的、"以各自君主名义所签字的条约"。他把贪婪的眼光转向香港,他这样写道:

“据说该岛在许多方面很有条件成为我们对华贸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贸易站”，“您不得同意放弃那个岛屿”。在璞鼎查离开英国时，巴麦尊又在训令里强调：“女王陛下政府认为香港岛应予保留”。英政府扩大战争，其中一个目的，也就是企图用战争手段攫取香港。

8 月 10 日，璞鼎查率军队到达澳门。他根据英国政府的意图，于 12 日发表公报，宣布义律前此关于香港的各种安排继续有效。因为他已理解英国政府“必须占领香港岛”的意图。他特别对香港进行调查，发现“当地的劳动力和当地的原材料都非常便宜而且资源充裕”。所以，香港被社会舆论看好。《广州报》12 月一篇文章称：“现在商业团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关注香港”。这样，香港成为英国必夺的岛屿。1842 年 2 月 16 日，璞鼎查竟然发表声明，宣称香港和舟山港都是自由港。

璞鼎查率兵到达澳门后不久率舰北上，于 25 日攻占厦门和鼓浪屿。9 月，兵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鹏血战 6 昼夜阵亡。到 10 月 15 日，定海、镇海、宁波相继失陷。清朝 10 天内连失 3 城。清政府被迫再战，派另一皇侄奕经征调各省军队前赴浙江作战。奕经腐败透顶，一路游山玩水，从北京到浙江走了 4 个月。1842 年 1 月，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英军上船外逃，认为是“吉兆”，便于 1842 年 3 月间兵分 3 路，雨夜冒险突袭 3 城，结果溃不成军，从此不敢再言战。

6 月，英兵进犯长江，攻吴淞炮台。年近 70 的爱国将领陈化成在战斗中身负 7 伤，壮烈牺牲。7 月，英军犯镇江。镇江守城旗兵在副都统海龄指挥下，以抬枪、火绳枪英勇还击。最后，全城人民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演出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强敌的壮烈牺牲的一幕。恩格斯指出：“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气和锐气。这里驻防旗兵总共只有 1500 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在到处都遭到同样抵抗，他们决到不了南京。”

当英军占领镇江的时候，英国侵略者玛礼逊向璞鼎查出谋献

策说:“中国漕运咽喉,扼以要挟,必可如志。”璞鼎查改变北上攻天津的计划,转攻漕运地区的重要城市南京。并放出空气:“阻我南北运河”,到处搜集长江、黄河的地图。

玛礼逊这一计策,果然奏效。东南各省,震动非常之大。清政府更是震惊万分。投降派耆英大叫战守两难,奏请清政府调买办商人伍敦元的儿子伍崇曜到江苏议和牵线。并先派外委陈志刚去英兵船试探。玛礼逊告诉他:“我国兵船已到。且所为之事大……现在我们欲先到扬子江,后到天津。”清政府害怕“内忧外患”交困,决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8 月 8 日命令两江总督牛鉴、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与英侵略军“谈判”。

8 月 8 日,伊里布到南京。他迫不及待地派家人张喜去面见玛礼逊,乞求和谈,清政府害怕大兵压境,一意要求英退兵。玛礼逊借机要挟,提出赔兵费,割香港、厦门、宁波、上海等为通商口岸的要求,“如其不能,则惟有战而已”。非但不退兵,英侵略军还于钟山上架设大炮,人执长枪,摆出一副进攻城墙的姿态。张喜走到江边一看,大惊失色,急将伊里布求和照会送给玛礼逊。炮舰政策果然吓倒了清政府投降派。12 日,张喜亲自到英兵船上和谈,千方百计对侵略者讨好。玛礼逊再次提出要求以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广州为通商口岸,于香港设官长住等,并开列清单交给张喜。14 日,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到南京静海寺与玛礼逊“谈判”。英侵略者兵临城下,所谓“谈判”,只不过是叫清政府画押而已。16 日,黄恩彤再次去见英国代表,告以各款已经应允。玛礼逊却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就是要他回去将条约盖皇帝玉玺。黄恩彤十分为难地说:“天朝无此体制”。玛礼逊又发出威胁称:“如不见允,则不特厦门、宁波、镇海、乍浦、宝山、镇江、上海等处均不能退还,且恐所议各条,回国时无以取信于国王,必致复生衅隙”,真是一副强盗嘴脸。这时,他竟然提出了“请开烟禁”,更进一步说明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丑恶目的。

8 月 20 日，耆英、伊里布、牛鉴到英舰“皋华丽”号“会谈”。所谓“会谈”，就是侵略者一手炮制的“和约草稿”迫他们同意而已。英国代表为了炫耀其“船坚炮利”，还领着他们去参观蒸汽机和钢炮。这对耆英等投降派产生了效果。耆英向皇帝报告里写道：“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这些一窍不通的昏庸清朝官吏，除了恶狠狠骂声“奇巧可恶”外，从未想到，正是这些“奇机淫巧”，改变了世界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842 年 8 月 29 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上午，清政府官员耆英、牛鉴、伊里布来到英国兵船“皋华丽”号上，璞鼎查拿上和约文本 4 份。11 时左右，伊里布、耆英在 2 份文本上印下了那屈辱的印鉴。另 2 份将在以后等盖英国国王和清皇帝的印鉴。这样，英国用武力强占香港之后，现在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宁条约》(也称《南京条约》、《白门条约》)。条约规定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王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这样，强占中国领土香港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英国侵略者在狂喜之时，在这艘“皋华丽”号上，放炮 12 响，庆贺他们侵略中国的“胜利”。

第三章　南九龙的割占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占了我国神圣领土香港岛之后，侵略者欲壑难填，对已获得的利益并未感到满足，眼睛又盯上了南九龙这块土地，想把它从中国的版图分割出去。

南九龙，即界限街以南地区，包括昂船洲(即石匠岛)在内。面积共 11.1 平方公里。它位于广东省新安县九龙半岛的南端，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曾属官富场所辖。1370 年，明朝政府设置官富巡检司；1843 年，清朝又改为九龙巡检司，南九龙都处于上述机构的管辖之下。它隔着狭长的海峡，和香港岛相望。这里地势平坦，水深港宽，可供巨轮停泊。海港四周群山拱卫，东面的鲤鱼门，西面的急水门都可减弱风浪，使海港成为优良的避风港，而且又是香港岛的天然屏障，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设防要地。英国侵略者很早就对这块土地垂涎三尺了。

一、英国的扩占野心

早在 1841 年义律就已看中了九龙尖沙嘴一带。他曾要求琦善同时割让这两处地方给英国主治，作为寄居贸易的地方。后来虽放弃了尖沙嘴，但是占领九龙半岛的野心始终存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鼓吹游说英殖民者，应该占有九龙这块地方。璞鼎查到达香港后，便和马地臣进行了秘密商谈。马地臣竭力鼓动他既要保留香港，同时也要占领九龙。一般的英国商人也极力鼓吹占领九龙半岛，反映英商意见的报纸也大造舆论。1842 年 5 月 7 日，《广东报》说香港对面的九龙比起香港更适合建造城市。6 月 29 日，《泰晤士报》也鼓吹说香港应该保留，但是九龙更适宜私人居住。这些鼓噪都对英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后，英国殖民统治者公然提出占领南九龙的具体目标和“理由”，在一系列侵略文件中把霸占我国南九龙的野心暴露无遗。

1847 年，英国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提交了占领南九龙的建议文本。他认为占领九龙半岛是绝对必要的。理由有 3 个：(1)防止它沦入另一国之手。(2)它对日益成长的香港社会可以提供安全保证和必须的供应。(3)在台风季节，它是船只安全所必不可少的唯一避风港。因此他强调，占领九龙是一刻也不可忽略的。这是无耻

的殖民主义者的强盗逻辑！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侵略者狂热地要求割占九龙，把侵占九龙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1858 年 3 月，"加尔各答"号舰长霍尔认为割占九龙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列举种种理由：①在九龙可以为商行和仓库提供许多设施。这些设施的出售和出租会成为一项收入来源。②为了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需要扩大和增加海军基地。③香港岛已无法为来华英军提供足够的宿营地。④在台风季节，尖沙嘴会成为香港流民出没和藏身之处。他们可能利用满载易燃物品的小船向船舶发动进攻。为此，必须割占九龙。而且，船坞、给养站、海军医院和司令官邸都应该修筑在这里。⑤英国错过良机的话，其他国家就有可能在九龙或昂船洲建修船厂，停泊军舰，将大炮指向香港。

霍尔的建议提出后不久，广州英军总部的斯特罗本泽将军把西马縻各厘 1847 年提交的建议文本交给侵华全权代表额尔金。同时，他自己还表示割占这块小地方，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九龙半岛在英国手里，那对英国船只是有利的，而如果另一欧洲国家占有了它，就会危害到英国船只，而且危害香港市镇本身。此外，他还为占领九龙添加两个理由：第一、他认为九龙可以作为疗养地。香港市建在山上，被山所隔，根本得不到西南季候风。而九龙则不一样，它南向海面，在最热的日子，西南季候风就会缓缓吹来。第二、那时九龙很荒凉，人烟稀少，如果向中国索取，可能会轻易得手，中国不会十分看重它。

额尔金收到文件后，于 1858 年 4 月向英国外交大臣马尔墨斯白雷请示。6 月，马尔墨斯白雷命令额尔金，一旦出现机会，应竭力从中国政府手中割占九龙岬角和昂船洲，至少要割占九龙岬角，明确表达了割占中国领土的意向。但是，额尔金收到这一指令时，中英《天津条约》已经签定了，错过了时机。因而他在 1858 年 11 月 5 日从上海给马尔墨斯白雷写了个报告。在报告中额尔金说，他还要

从钦差大臣们那里得到某些东西，那是在天津谈判条约时由于明显的理由而没有规定的。比如说，九龙半岛的问题是一个领土问题，在那里不便考虑，但他表示说如果可能，他乐于在离开中国之前加以解决。这个报告，曾在《英国议会文书》中刊登。但是，英国政府害怕西方列强会捷足先登，尤其害怕法国会掠夺中国的土地，作为与香港的平衡，因而这个强盗小心翼翼地删除掉表达割占中国领土野心的文字。额尔金终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时机，在离开中国时，这个野心没有得逞。

香港总督包令在获知英国政府占领九龙的意图后，非常高兴。1858 年 8 月，他写信给殖民大臣利顿，说他赞同这种意见：占据这块对于中国人没有用处的土地，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商业、保健和警备方面，都是具有非常大的价值的。他毛遂自荐愿意和两广总督谈判这个问题。

1859 年 4 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卜鲁斯到达香港，他多次就夺取九龙半岛问题找香港辅政司马撒尔谈话。离开香港时，他为了便于和清王朝谈判，让马撒尔就此问题拟定一份备忘录寄给他。马撒尔的备忘录进一步提出占领的具体范围是九龙岬角和昂船洲。并声称给清政府“偿付一笔最小的款项，就是合法的补偿”。1859 年 6 月下旬，英法进攻大沽炮台遭到惨败，没能进京换约，因而关于九龙问题的谈判没有举行，备忘录没有派上用场，但这份文件显示出了侵略者的侵略本性。

大沽惨败后，英法决定再度派兵来华作战。英国政府决心要趁着这个机会夺取九龙。1859 年 10 月 22 日，英国殖民部大臣伊里奥给汉孟德的信函成为最早表明这个决心和欲望的正式文件。他在信中说：“我奉纽卡斯尔公爵之命，为了提供罗素勋爵参考，特此通知你：根据来自香港代理总督消息，住在那个半岛上的华人之不法，以及因那里的情况而引起的和平治理香港之困难，公爵曾认为有必要通知陆军大臣，请其命令驻华皇家军队司令，一有机会，即

尽早占领那个岛。现在公爵愿把他们的意见提请罗素勋爵考虑：将来任何时候调整帝国对华关系，总要把这块地方保留下来。”这个文件不仅表示了英国政府的割占决心，而且提出了非常狡猾的侵略借口——“华人之不法”，掩盖了侵略者侵略的真实原因和真实本质。

很快，英国外交部的罗素在同年 11 月 10 日便把这个文件的抄本，秘密转寄给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并加上一句话说九龙半岛的占领，只能认为是暂时的，直到中国政府把它正式割让的时候。这表明外交部不仅同意占领九龙，而且要完全夺取九龙，迫使中国政府割让。

需要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后面这两个正式文件，英国首相巴麦尊和女王维多利亚都阅读过。同时，这两个文件中提出的侵略理由，也就是后来巴夏礼对劳崇光提出的租借九龙的理由，显然是荒谬的，根本站不住脚的。1860 年 1 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在给卜鲁斯的信中就很坦白地说：“我不同意大家所设想的那样，占领九龙没有法律问题。在英中领土之间，无论如何总得有一条界线，歹徒就可偷越此线而逃。作为警卫问题，我完全不能理解：现有的水上界线，如果适当地设防，不会大大优越于一条陆上的界线？”

当然，何伯毕竟也是一个侵略者。虽有理由反对夺取九龙，但是他从骨子里头依旧是要站在英国的角度来看待九龙问题的。因而在信中他又为夺取九龙出谋划策。他说如果有必要占领九龙，可以作为将来交涉的问题，因为很可能，中国人会愿意把九龙抵偿一部分赔款。

比起何伯来，1860 年 2 月来到香港的英侵华军总指挥格兰特，更是非常迫切地要求把九龙这个滩头阵地立即占领。

这样，侵略夺取中国的九龙，已是侵略者的“共识”，从伦敦最高当局到侵略中国的海陆军头目，他们对九龙的要求完全一致，剩下的只是采取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野心的问题了。

二、英法联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家贪婪地盯住这个古老的帝国，做着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的美梦。但是，由于鸦片贸易的影响和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抵抗力，外国商品滞销。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它们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修约，遭到拒绝。英法等国决定发动新的侵华战争以达到目的，“亚罗号”事件成为英国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

1856 年 10 月 8 日，一艘绿壳的中国划艇“亚罗号”，停泊在广州黄埔港。船上窝藏的海盗被人认出了，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领 40 多个士兵上船搜查，逮捕了有嫌疑的 12 名中国水手。这是与英国毫无关系的事情，纯属中国内政。但是，侵略者认为这是扩大侵华、修改条约的一个好机会。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听到这消息后，怒气冲冲，张牙舞爪赶到船上，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干涉广东水师执行公务，要求立即释放被捕水手。同时，他还造谣捏造说广东水师的兵勇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是对英国的侮辱。紧接着，他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声称这是性质极其严重的侮辱，要求立即送回被捕的水手并公开赔礼道歉。

巴夏礼一口咬定“亚罗号”是英国船，理由是这艘船曾在香港政府注册登记过。“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方亚明，这个洋行买办为了便于进行海上鸦片走私和海盗行动，在 1855 年 9 月 27 日在香港注册，领取了为期 1 年的英国执照，并雇佣英国人谭马士·肯尼迪为船长。这只船经常往来于香港、澳门、广州、汕头等地，进行抢劫、走私活动。这时“执照”已经过期无效，侵略者也很清楚这一点。香港总督包令在给巴夏礼的信中说：“经过调查，看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它这样做的执照于 9 月 27 日满期；此后它就无权受保护。”但是，他非常无耻，竟说：“不过中国人

是不知道执照过期的。”巴夏礼另一胡说中国兵勇扯下英国国旗，事实上是当时船上根本没有悬挂英国旗，所谓兵勇扯下英国国旗，只是巴夏礼自己一人凭空捏造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巴夏礼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耍无赖。叶名琛也感到非常愤怒。在复照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亚罗号”是中国船，这次事件发生时，船上根本没有悬挂英国国旗。10 月 12 日，巴夏礼根据包令指示，再次照会叶名琛，蛮横要求由梁国定送还被捕水手，进行书面道歉和保证以后尊重英国国旗，并威胁说如不在 48 小时内答复，英国就将采取行动。为了不致事态扩大，叶名琛把 2 名海盗和 1 名证人留下，其余的 9 人送回。巴夏礼见叶名琛没有按他的要求办理，拒绝接受送回的 9 人。随后，英方抢去中国的一只大沙船。包令也在 16 日照会威胁叶名琛说，如果拖延满足要求，后果将会非常严重。叶名琛对于这些威胁，既没有重视也没有在备战上采取什么措施。21 日，巴夏礼发出了措词非常强硬的最后通牒，限 24 小时内接受所有要求，否则就发兵攻城。叶名琛这才着急起来，立刻答复送还 10 名水手，但是，巴夏礼拒绝接受。为了平息事端，叶名琛完全退让，第 2 天就送回了 12 名水手。可巴夏礼又借口送还水手的清朝官员职位不够高，没有按他要求的方式进行，更没有道歉，故意刁难，拒不接受。他命令英国海军进攻炮台及广州城，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亚罗号”事件是英国蓄意歪曲事实真相进行挑衅的借口，连后来任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全权专使的额尔金都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目前争端的起源更可鄙的了。”

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1856 年 10 月 23 日，西马縻各厘率领军舰及海军陆战队大约 2000 人进犯广州，想迫使叶名琛就范。当英军强行闯入时，广东水师提督吴元猷因没有接到叶名琛命令，不敢下令发炮还击，英舰顺利通过虎门要塞，进入珠江内河，猛攻炮台。

面对敌人入侵，叶名琛却不做战守准备。当中英双方进行炮战炮声隆隆之时，叶名琛正在校场上观看乡试人员跑马、射箭。他自认为英军只不过是吓唬吓唬而已。有人跑来向他告警，他笑着说一定没有什么事，傍晚自然就会退走。并且下令敌船入内不可以放炮还击。说完又仍旧观看射箭。敌人大炮轰击，却不能还击，这岂不是坐以待毙吗？当时广州守备吴昌寿非常忧急，曾长跪地下请求发兵，叶名琛就是不答应。昌寿气急了，站起来拿了令箭就走出想去下令宣战。叶名琛见状急忙从椅子上跳起来拔腿追去，把令箭一下子又夺了回去。由于叶名琛的不抵抗政策，前线守军也军心不齐，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外各炮台，又照会叶名琛，除了原来的要求之外，还提出进入广州城。叶名琛没有答复。28 日中午，侵略军在广州城外架起了大炮，集中轰击总督衙署，每 5 分钟到 10 分钟就发射一次，直到太阳下山为止。而这时叶名琛在干什么呢？他拿着一本《四元玉鉴》，端坐在衙署堂中。他的手下人劝他避一避，他说："我的父亲都没有要走的意思，我走什么呢？"侵略者野蛮地放火焚烧靖海门外一带的民房，火光冲天，如同白昼。大肆炮轰之后，29 日侵略军进攻广州城。清军参将凌芳率兵抵抗，不幸身亡，清军退入内城。英军攻入城内，西马糜各厘和巴夏礼大摇大摆入城，直达总督衙门。英军大肆抢掠，放火杀人，并不断向内城发炮轰击。由于英军兵力不足，不敢在城内久呆，马上又退了出来。但他们不肯罢休，不时用炮轰击广州城，烧毁村庄，劫夺船只，攻夺炮台。侵略者的暴行，引起中国军民极大的愤慨，遭到反击。中国军民利用舢板、火船等各种武器，进行袭扰敌人的游击作战，使得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坐卧不安，只得退据虎门等待援军。

叶名琛却以对英作战获胜上报咸丰帝，咸丰帝对他大加赞赏。但在谕旨中也很忧郁地说，不胜的话当然忧虑，而胜了敌人一定会来报复，这时中原未靖，沿海怎能再起风波？

1857 年春，"亚罗号"事件和英军进攻广州的消息传到伦敦，

英国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侵略军来华扩大战争。同时向法、俄、美等国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法国早就蠢蠢欲动，1856年2月，一个叫马赖的法国籍天主教神甫因潜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马赖被杀罪有应得，而法国这时就以所谓的“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声称要为保卫圣教而战，任命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前来中国和英军组成盟军合伙侵略中国。

12月，英法联军集结完毕，作好了大举进犯的准备。12月12日，侵略者向叶名琛发出照会，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限定10日内答复。如不答应，就要攻城。联军在15日就已进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而叶名琛对于这一危急形势，仍茫然无知。他下令军队，如果联军没有动静，不准挑衅。24日，侵略者发出最后通牒，限定48小时内答复一切要求，否则在28日就开炮将城打为灰烬。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在给额尔金的指令中，非常凶恶地说：“可容叶名琛选择的只有两条路，那就是无条件投降或立即进攻广州。”局势十分紧张，面对敌军威胁，叶名琛仍不作抗战准备，无动于衷。下属请求添兵设防，他执意不肯，反而说谁添兵谁给饷。有人请求派人潜入敌船打探情况，他竟怒气冲冲地说谁敢这样做就按军法论处。叶名琛十分迷信神仙的指示。他在广州城北建长春仙馆，里面供奉着吕纯阳（洞宾）、李太白两尊神仙。一有什么军务，他就求神，取决于神的指示。当时求得的乩语告诉他：过了阴历11月15日（即12月30日）就可以平安无事。因而他的部属请求备战时，他很自信地说：“不必惊慌，仙乩上说‘十五日后便无事’。”同时由汉奸张同云（任英领事馆通事）提供的假情报，他也信以为真，认为侵略者真的只是吓唬吓唬而已，不敢真的打仗。由于叶名琛的迷信和无知，广州水陆两路，都没有任何防御准备。28日，联军攻占了海珠炮台，用炮持续27小时轰击广州城，每一炮都是瞄准几分钟后再发，城内遍地大火，督署也成了一片废墟。叶名琛逃到粤华书院。侵略军登陆后，焚烧了收藏着元代铜漏和官书板片等文化珍品的

双门拱北楼。清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千总邓安邦指挥东莞勇与东固炮台的守军同敌人殊死奋战;坚守四方炮台的副都统来存善临危不惧,率兵抵抗。城墙上的守兵非常勇敢,直到最后一刻还从胸墙上拼死抵抗。最后侵略军攻破了大北门和东门,占领城内的制高点观音山和北门外各炮台。29日广州城失守。随后,被当时人们称做“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的叶名琛被敌人俘获,送往加尔各答。1859年病死在印度。侵略者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在广州城失守后的第二天,侵略者就决定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侵略者看中了投降的柏贵。联军任命了一个3人委员会,由巴夏礼为首,还有英国哈罗威上校和法国的修莱海军大佐组成,控制着柏贵。这一个政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具有反抗外来侵略传统的广东人民,并不屈服于殖民者的统治,他们组织团练,利用一切机会,英勇反抗侵略者的入侵。在城里城外,有组织或者分散地进攻袭扰侵略者,使得侵略者寝食不安,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也必须成群结队武装起来才敢外出,侵略者甚至下令士兵不准到离城1里之外的地方去,可见广东人民反抗之激烈。

三、租借南九龙

1859年柏贵病死后,劳崇光调任广东巡抚,兼任两广总督。劳崇光仍旧无法摆脱巴夏礼的控制。他在1859年7月23日中午12点到达署衙。下午2点巴夏礼就气势汹汹地来到署衙,凶肆异常,逼劳崇光按月给广州的联军发“防城兵费”,先给劳崇光一个下马威,让他尝尝厉害。

英国侵略者占领九龙的野心由来已久,对九龙早已是垂涎欲滴,想利用大沽惨败后再次增派援军的时机占领九龙。但是究竟什

么是最合适的方式，侵略者的意见还没有统一。1860 年 2 月 11 日，斯特罗本泽在给陆军部的信中说：香港总督罗便臣提出占领九龙作为增援部队的宿营地。当然，他也担心英国对九龙直接武装占领，也许就会导致中国对香港或是广州的英商采取报复，所以罗便臣的提议没有被他采纳。他通知巴夏礼说，对英国来说，进行租借可能是有益处的。巴夏礼根据这种想法对广东地方当局进行试探，也认为有实现租借的可能。驻华公使卜鲁斯则赞同对九龙进行军事占领。他在 2 月 19 日写信给斯特罗本泽，说：女王政府渴望割占九龙半岛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迫使我们派来更多的部队，香港不能接纳他们，说明暂时占领九龙是正确的。他认为占领后，较容易迫使中国方面同意割让。斯特罗本泽对卜鲁斯的指令采取拖延的态度。直到 3 月 4 日他才将副本交给巴夏礼，要求巴夏礼告诉劳崇光要占领九龙半岛一部分作为即将到华英军的宿营地，其实卜鲁斯也不反对租借，在 3 月初他就将可能实现租借的消息转告了罗便臣，他的主张是军事占领和租借双管齐下。

1860 年 3 月，英军侵华总指挥格兰特带领 1 万多名英军在九龙尖沙嘴登陆，在没有中国政府的任何许可下，就在此地驻军扎营，对九龙进行武装占领。罗便臣非常满意，认为这将为最终从中国政府手中割让对面的岬角铺平道路。但为了掩盖这种侵占别国领土的强盗行为，他假惺惺地说，暂时占领这个岬角不是敌对或侵略的措施，只是在劳崇光认可下的一种方便。对于这种刺刀取得的“方便”，格兰特本人也承认这不是十分合法的。

英国侵略者明明知道武力占领是非法的。然而，九龙半岛仍然成了英法联军的大兵营。英军还在此进行作战准备，训练骑兵，并对阿姆斯特朗炮的威力和精确度进行测试。这时的英国侵略者只有武力，哪有公理！

1860 年 3 月 16 日，巴夏礼、格兰特、罗便臣在香港对租借九龙一部分的问题进行磋商，共同策划。稍后，巴夏礼就导演了一场

和劳崇光谈判租借南九龙的闹剧。

3 月 20 日，巴夏礼一大早就忙开了。他首先要起草一份租借南九龙的文件。文件以“九龙半岛坏人聚居，秩序混乱，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为借口，提出由中国当局派遣官员和军队到那里去驱赶坏人并经常留驻一支有力部队；或是中国当局划出一条界线，把界线以内的地方割让给英国政府，如同割让香港一样。并认为在请示清朝政府之前可以用出租的方式，把它移交给英国政府。最后，他对劳崇光说：这些是本人和总督劳崇光之间达成的谅解，劳崇光所应做的只是在正式回信中表示同意这些安排，并提出应纳租金的数目。巴夏礼深知当时中国政府正忙于镇压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广东的形势正是十分严峻之时，劳崇光已是难以招架，肯定没有军队能派到九龙去。因而他毫不客气地对劳崇光说：“这块地方本来应该一次性割让给英国政府的，但考虑到广东地方当局无权割让，所以只用出租的方式作初步处理。”这再清楚不过，租借也好，割让也好，都改变不了英国侵略者凭借战争手段，强占中国领土南九龙的实质。接着巴夏礼逼着劳崇光炮制一份未经清政府批准的“租契”：劳与巴夏礼协定……九龙半岛的所在画线（这线自九龙炮台南方附近一点起，到石匠岛的最北端止）以南的全部地方，以及石匠岛，出租给巴夏礼，作为初步措施……为此每年付与中国地方当局租银 500 两。并且协定：只要英国政府准时交付租银，中国政府便不得要求归还上述土地。……1860 年 3 月 20 日即咸丰 10 年 2 月 28 日于广州。巴夏礼得意万分，认为这个半岛将来一定会完全割让给英国的。他的上司对巴夏礼的巧取豪夺取得的成功，更加高兴。罗便臣在 24 日给巴夏礼的信说要感谢他对九龙作出了十分圆满的布署，认为这是在没有割让的情况下，已处于可能的最好的地位。并说，此事得感激巴夏礼在谈判中的精明和老练。格兰特也赞叹说，这事让他感到惊奇，感到满意，巴夏礼最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中国一方，劳崇光没有向清朝中央政府报告，当然

也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对于这件事，外国人说中国地方当局竟答应出租土地供攻打北京的敌军作为宿营地，真是再古怪也没有的事了，但也从另一面反映了英国侵略者蛮横、霸道、威逼的真相。侵略者炮制的强硬租借南九龙的强盗勾当，后来竟成为英国强割南九龙的借口。

四、《北京条约》与南九龙的割占

对于南九龙，英国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租借，租借只是一种狡猾策略。侵略者正等待着新的机会，以便永久占领。这种机会，在敌人的炮火下，很快便来临了。

英法联军在攻陷广州后，1858 年 5 月又北上攻入了天津城。6 月，迫使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次年英使坚持要入京换约，却又蛮横不肯听从清政府安排的路线进京，1859 年 6 月在大沽口挑衅进攻遭到惨败后，英法两国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1860 年 2 月，英法两国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专使，带领新的英法联军来华作战。外交大臣罗素在给额尔金的训令中说殖民大臣要求在任何新的条约中，应该努力作出割让九龙半岛的规定，所以要求额尔金对于有利于获得割让的机会都不要错过。额尔金表示担心法国也会有同样的领土要求，与英国在华势力相抗衡，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罗素授权额尔金可以相机行事，女王政府是乐于获得九龙半岛的，至于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必须由额尔金去考虑。

在获得南九龙的永租权之后，英国的远东殖民官员大力鼓吹应进一步割占这块土地。罗便臣在给殖民大臣纽卡斯尔的信中说，现在已处于最好的境地，只要通过一种正式的割让，便能对该地行使管辖权。巴夏礼在给外交部汉孟德的私人信件中说，有利的领土租借可能变为彻底的领土割让。

1860 年 7 月，英国政府知道南九龙已租借给英国之后，欣喜万分，决意要获取这块土地的割让。外交大臣马上给额尔金发了一份秘密训令，要求额尔金务必努力达到这一目标。

1860 年 2 月英法联军再度侵华。4 月侵占了舟山。5 月占领了大连湾、烟台。6 月封锁渤海湾。8 月与清军激战后攻陷了塘沽、大沽、天津。9 月又进犯张家湾、八里桥，清军苦战不敌。10 月联军直逼京城。咸丰皇帝惊慌失措，早在 9 月 22 日仓惶逃往热河，留下自己的六弟奕䜣为钦差大臣议和。10 月 6 日，英法联军进犯北京西郊圆明园，将园中珍藏的我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金银财宝大肆抢劫。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侵略者在 18、19 日放火烧毁了这座辉煌瑰丽的、凝结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一代名园。大火持续了两天，火光熊熊地烧着，仿佛一张幔子，随着大风，蜿蜿蜒蜒，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仿佛是一个长期的日蚀。圆明园留下的只是一堆堆瓦砾，一处处灰冢。10 月 13 日，留京王公大臣决定把安定门交给侵略者。这样，侵略者不费一兵一卒就控制了北京城。16 日，额尔金照会奕䜣，要求在 20 日上午 10 时之前，用书面形式完全答应以下条件：给英国抚恤费 30 万两白银，22 日交付；23 日签订续增条约并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还威胁说如果不接受这些条件，英军就要夺取京城内的皇宫，并采取其他措施。法国葛罗也发了照会。和英法串通的俄国也在旁恫吓说，在当时情况下提出异议是完全不可能的，如不赶紧和英法讲和，北京城会因此而毁灭，清政府会彻底崩溃。奕䜣在英法的武力威胁和沙俄恫吓下，又加之咸丰帝连下谕旨谋和，就依照咸丰委屈将就，保全大局的旨意，被迫接受英法两国的条件。不料在 23 日要签订续增条约和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英国侵略者突然又增加 3 条要求，其中第一条便是割占南九龙，将它并归英属香港界内。奕䜣在侵略者枪口威逼下，委屈退让，在没有核查劳崇光所签的协定的情况下，被迫按照侵略者的期限于 10 月 24 日在礼部大堂签约换约。当时北京城传

言着中国人要趁机炸死额尔金，因而华莱斯奉命先到礼部大堂严格检查，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10 月 24 日，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乘着华丽的轿子，在 100 名骑兵 400 名步兵的簇拥下，耀武扬威又心怀恐惧地前往礼部大堂，沿途街道上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英国兵把守。轿子进入礼部大堂时，乐队高奏歌曲《上帝保佑女王》，额尔金非常轻蔑地瞥了一眼打拱作揖迎接的奕䜣，仅高傲、冷漠地点点头。额尔金的举动，格兰特说可能使可怜的恭亲王血管里的血液都凝固了。就这样，双方交换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签署中英《北京条约》。第二天，法国的条约也大体办理完毕。

中英《北京条约》共 9 条，中法《北京条约》共 10 条。主要内容有：①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②开放天津为商埠。③准许华工赴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做工。④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⑤交还教产给天主教堂。法国还私自增加准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地买田，建造教堂。⑥赔偿英法军费各 800 万两。

这样，英国通过《北京条约》的签订，对南九龙的强占、租借进而成为割让，并且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额尔金最终完全实现了英国长期以来割占中国南九龙的野心。

1861 年 1 月 19 日，英国方面在九龙举行了一项仪式，接收南九龙。当时有 2000 多名英国士兵参加仪式。下午 3 点，额尔金、巴夏礼、罗便臣夫妇、亚当斯等人到达会场。新安县令、大鹏协副将、九龙司巡检，还有九龙城一名军官共 4 名清朝官员也被迫参加。巴夏礼硬塞给一名清朝官员一个装着九龙泥土的纸袋子，强迫清朝官员将纸袋子交给额尔金，象征领土移交，炫耀侵占的实现。巴夏礼代表额尔金宣读声明九龙司地方一区交给英国政府统治，大清官员不得行使职权。声明宣读完毕后，响起了隆隆的礼炮声，英国王室旗帜也在会场上慢慢升起。额尔金神气地发表演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为我们取得中国大陆这块新的土地，向你们表示祝

贺，而我们能够做到的最愉快的事情，就是为古老的英格兰三呼万岁。”接着，士兵对空开枪，英国人为女王欢呼。仪式结束后，查尔斯·梅被任命为九龙民政专员正式接管了南九龙。这次交接，对于中华民族又是一次奇耻大辱。

侵略者夺得南九龙之后，并不感到满足。他的魔爪又伸向了比这块地方大了近 100 倍的、被人们称为“新界”的地方。

第四章　英国垂涎九龙全境

一、英国的扩张狂热

英国殖民侵略者以海盗行径，强行占领了香港岛和南九龙。然而，这 86.7 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远远无法满足侵略者的胃口。他们“抱怨”这块土地的面积是如此狭小，因而，侵略者们贪婪的目光又开始觊觎北九龙，伺机向北扩张。

北九龙，即所谓的“新界”。英文为 New Territories，意即新的领土，中文原无此地名。它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之东，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包括大鹏湾、深圳湾，以及周围 235 个岛屿，面积达 975.1 平方公里。它在清代隶属于广州府新安县，是重要海防要地。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加上扼守珠江口外之咽喉，形势险要，古称“官富之地”。

在南九龙“正式”被英国殖民者割占后，1861 年香港政府内部发生了对南九龙管理权的争执。军方坚决主张把它作为单纯军事基地，由军人管辖；而民政方面却认为它是他们要求得来的，要把它划给中国人居住，避免在香港岛与英人混杂而导致种种“危害”

和“不便”。香港当局对这一问题争执不已。为了调整内部纷争，英军在1864年偷偷摸摸地侵占了九龙司西北面的深水埗，私自扩充地界。这是英国对北九龙的最初蚕食。

此后，英国各界大造舆论，要求扩展香港殖民地。

1884年，香港英军萨特金少将，向英国战争部第一次提出攫取整个九龙半岛，进而扩展到北面山岭和一些海岛的建议，但被当时港督乔治·宝云拒绝。两年后，萨特金的继任者甘马伦上将再次提出同样的建议，但被帝国防务委员会所否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大激发了英国扩大对华侵略的野心。“拓地运动”的狂热鼓吹者、继任港督威廉·罗便臣，对中国战况幸灾乐祸，认为这是香港扩界的大好时机。他接连写信给英国殖民部，提出“调整和扩展本殖民地是十分必要的，‘东方直布罗陀’香港，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安全。”因为“中国本身，或是同中国或英国开战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登陆珠江北岸或鲤鱼门海峡外的大鹏湾，南下九龙半岛，这不仅对我守军不利，而且很容易从中国领土炮轰维多利亚港，截断粮食供应”。借此为占领北九龙寻找荒谬理由。

在信中，威廉·罗便臣还提出了具体的扩界方案，主张“香港边界应该推至大鹏湾，从那里伸延到后海湾，至少也得像威斯特利走向那样，从东北面鲤鱼门海峡伸展到九龙背后的山顶，包括珠江口汲水门在内，以确保女皇这块有价值的属土安全。再者，加普礁、横澜、大屿山和所有香港3英里以内的海岛均应割让给英国。否则，一旦爆发战争，本殖民地将难以防守。”同时，他还建议英国政府“在适当时候介入中日战争”，力主“在中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之前，应当施加压力”。尽管罗便臣在其任港督期间，他的扩界野心未能实现，但他的扩界主张和具体方案，第一次引起英国殖民地部的注意。

港英官方对香港扩界的要求，得到英国军界的积极响应。1895

年 4 月，随着清政府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中国再次蒙受了一场耻辱。不到 1 个月后，5 月 13 日，以柏加少将为主席的英国海陆军事联合委员会，向英国国防部和海军部提交了《关于香港殖民地边界问题的报告》。在这之前，柏加少将已提出有关香港的防卫能力问题，强调中国军队控制港口对香港统治的种种不利因素，但尚未提及拓界问题。

这份海陆军事联合委员会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扩展香港边界的要求。它从所谓的战略考虑出发，说什么为了保卫香港的安全，不仅需要完全控制香港岛和大陆之间的海面，而且必须控制南、北两面的海岸。当时南面海岸已在英国控制中，对仍由中国管辖的北面海岸，报告强调“必须夺过来”。这份报告受到英国国防大臣和海军大臣的赞成，但考虑到英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担心香港扩界会导致各国在华权益争夺的激烈化，英国政府只好顶着日益增强的扩界压力而暂时不予考虑。

与此同时，香港立法局也不甘落后，开始积极鼓吹扩展香港现有边界。香港立法局的外商遮打直接写信给港督，宣称扩界“不是为土地，而是为了行政和防卫上的目的”。

遮打在信中说：

“中国的国力现正处于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50 年之后，也许 20 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知识开发她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如果香港边界仍像现在一样，中国的舰队停泊在九龙湾，周围的山头和岛屿都为中国所有，我们往哪里躲？靠人家发慈悲……

“1860 年的争议现在又旧事重提。我们现在的要求正是当年的要求：那就是对殖民地安全所必需的东西。由于武器改进和战争形式的变化，当年足够的，现在已不够了，我们必须多要些……

“目前的大好时机稍纵即逝。不管日本今天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屈辱有多深，中华帝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她不会长期

安于现状。日本对华战争将激发起全面起义，20年后的中国再不是吴下阿蒙。想做就立刻去做，时不与我。”英国企图利用清政府战败的处境，再次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和盘托出。

在港英政府、军界和商界大造扩界舆论的推动下，一直认为时机不够成熟的英国殖民地部终于热心起来，要求政府与中国进行拓地谈判。同时，殖民地部还同海军总部、战争部一起，促请沙士伯里首相立即采取行动。

这样，夺占九龙全境的阴谋终于从舆论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英国侵略者的野心再次膨胀了。

二、划分“势力范围”狂潮中的九龙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势一蹶不振，帝国主义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抵御外侵，转而执行所谓的“以夷制夷”外交方针，在“利益均沾”的原则下，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一切利益，来“维持”列强在华的“均势”，企图以此使列强之间互相牵制。其中，英法两国争夺中国南方权益的斗争，为英国拓展香港殖民地边界直接提供了机会。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兴冲冲地张开了血盆大口，企图独霸这一巨大的战利品。根据《马关条约》，小小的日本从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好处。日本不仅获得巨额军事赔款，掠夺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尤其割占了辽东半岛，在中国大陆上取得了根据地，这使日本在远东的势力陡增。于是，早就对中国垂涎欲滴的列强纷纷叫嚷：

“不成！中国是大家的，谁也休想独自撑饱。”

正是在这样的叫嚣中，俄、德、法三国出于各自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上演了一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以中国增加3000万两赔款为代价，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刚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中走出来的日本，再也无力和三国抗衡，不得不放弃了要求中国割

让辽东半岛的野心。

随后，俄、德、法三国以“功臣”自居，强迫清政府给予租借军港、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种种特权。1897年，德国以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为借口，派遣军舰强行占领胶州湾。俄国不甘落后，随即就打着“保卫中国不受德国人侵犯”的旗号，把舰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次年，两国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和《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各国列强中第一个用大炮轰开闭关尘封的中国大门的国家。长期以来，英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稳居首位，在华享有近乎垄断的优势地位。然而，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疯狂瓜分中国，日益激烈的斗争不仅削弱了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而且危及其在华的既得利益。素以“日不落帝国”傲然自居的英国当然不甘示弱，狂叫“要在竞争时代保住垄断时代的既得利益”，并积极地投入这场瓜分中国的大战中，而且表现毫不逊色：强租威海卫和北九龙为军事根据地，北面阻挡俄国势力南下，南面阻挡法国势力北上。

法国充分利用自己参加“3国干涉还辽”的“功劳”，在1895年6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两个有利于加强其在云南、广西、广东地位的条约。1898年3月13日，法国驻华代办吕班又向总理衙门提出要在中国南部某处海岸设立“屯船”之所等4项要求。

法国的要求传出后，英国强烈反对，因为这些要求妨害了英国在中国南方各省的利益。看到法国人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英国人着急了，负责对外工作的要员贝尔福赶忙给英驻华公使窦纳东发来急电，指示说：

“你必须警告中国政府，如果割地给法国，我们将提出同样的要求。”

窦纳东奉命后，威胁总理衙门：英国虽然迫切需要扩充九龙地界，但直到目前还没有提出。说什么如果中国对不尊重其完整的国

家，许以让予权，而对那些表现“克制”的国家——英国置之不顾，“我们就必须保护我们自己，并且要求（得到）我们（应得）的份额。”这一语道破天机，英国竟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在列强瓜分中也争先恐后地抢夺。

在夹缝中挣扎的清政府深知洋人谁也得罪不起。既然已答应了俄国、德国租借海港的要求，自然也不能开罪于英国。但已疲于外强勒索的清政府，鉴于正与法国进行租借南方海口广州湾的谈判，惧怕英国以此为借口，再向中国索取领土，因而苦苦乞求英国在租借威海卫之后，要公开宣布不再向中国作领土的要求。早已心怀野心的英国人坚决不答应，英国公使窦纳东大闹总理衙门说：“威海（卫）抵俄，专为北方；若法占南海口岸，我亦须另索一处抵之。”

4 月 10 日，清政府被迫同意，将距离香港西南 210 英里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与法国，租期 99 年。英国立即作出反应。次日，窦纳东即以法国租借广州湾、危及香港安全为“理由”，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拓展香港界址，并且暗示否则将强占浙江舟山及福建一带的口岸。

清政府不敢拒绝英国的无理要求，香港拓界的一连串谈判开始了。在一系列“租地”谈判中晕头转向疲惫不堪的李鸿章，私下里对同僚发出这样哀叹：

“唉！真是一只喂不饱的饿狗。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

无可奈何的李鸿章只好同意租出九龙半岛的一个角落，表示“小小的扩展是容易办得到的”，“只要不割去一大片”，希望英方的要求“勿逾此限度”。

“我希望这一行为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误解。”李鸿章谨慎地选择词句来微妙地表达自己的隐忧，他担心其他国家会纷纷效法。

心领神会的窦纳东这时保证说：“这将是英国政府最后一次要求，我们所要的不会超过防卫所需，但要弄清楚是否包括九龙城。”

英国有什么权利要求“防卫所需”的中国领土？更可恶的是得寸进尺，提出九龙城的问题。

英国对香港拓界的胃口之大，完全超出李鸿章等的预料。窦纳东提出，“深圳湾到大鹏湾一线以南，包括两湾水域及其邻近岛屿在内的全部领土”，以及九龙城，都应在拓界范围内。这个经他们划定的租借范围，囊括了整个九龙半岛，比原来香港行政区划所辖陆地面积扩大了 10 多倍，水面比以前扩大 40 至 50 倍。清朝官员们被英国如此庞大的拓地计划震惊了，连李鸿章也没有料到英国人的胃口会如此之大，竟要将整个九龙半岛都给吞下去了。

谈判在艰难地进行着，蛮横凶悍的窦纳东毫不理会李鸿章的反对、乞求，坚决不肯作丝毫退让。他竟对李鸿章拍案怒斥道：

“勿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中国让广州湾于法，而威胁香港。若你废广州湾之约，我即撤回。”

李鸿章万般无奈中，屈服于英国压力，不得不让步了。但他坚决反对英国占领九龙城。因为中国在九龙城设有衙门，将九龙城保留在中国手中，则拓展的界址仅属租借性质的象征意义，中国对新界仍享有主权。所以，清政府最后提出 4 点保留意见：

1. 租借地内之九龙城，仍由清政府委派文武官员，仍归中国管辖；

2. 保留靠近九龙城的原有码头一区，准中国官民使用以及“他日（建）造铁路”；

3. 大鹏湾、深圳湾内，准中国“兵商各船来往、停泊”；

4. 港英当局帮助中国海关缉查鸦片走私，收取关税。

急于尽早签约的窦纳东满口答应。他心里想，只要英国的米字旗插上了九龙半岛，清朝再多的要求，亦不过一页废纸罢了。随后，窦纳东亲自拟定《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译成中文后交给清政府。

6 月 9 日，李鸿章和礼部尚书许应骙代表清政府，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东代表英方，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根据条约，英国强租了陆地面积 975.1 平方公里的北九龙，连同大鹏湾、深圳湾水域，租期 99 年。

《专条》是英国侵略者长期预谋和使用武力威胁手段的产物，也是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产物。连为英国侵华政策辩护的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这是他们利用“适当的时机来实现它长久以来的野心”。

至此，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占去了总面积 1061.8 平方公里的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尽管英国侵略者自诩重视“立约”，然而他们早在“立约”之前，就已经像贼那样偷偷摸摸地行动了。这些从暗地谋划到私自侵占，进而又到明火执仗、公然勒索，最终用武力逼签的条约，都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

三、节外生枝，得寸进尺

《专条》规定：“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划定。”同时，还规定该条约从当年 7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然而，英国侵略者决定推迟接管新界，并派香港辅政司骆克前往新界调查。

按照《专条》的粘附地图，新界北部陆界的走向明白无误地标为从沙头角海到深圳湾最短距离的一条直线。10 月 8 日，骆克新界调查报告出笼，提出了在划界中新的侵略方案，反对《专条》粘附地图标示的直线，建议修改北界，主张按“自然边界”，即以新安县北部界山为界。11 月 30 日，殖民部提出新界北界扩展的可能性，但殖民大臣张伯伦觉得这种“自然边界”离《专条》规定太远，恐难实现，因而主张“适当”扩充租借地北部陆界，“无论如何要迫使清政府同意把深圳镇包括在租界地内”。

1899 年 3 月 10 日，英国政府任命骆克为新界北界的划界专

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任命的补用道王存善进行交涉。

在谈判中，王存善坚持按《专条》粘附地图的规定，即以沙头角海至深圳湾最短距离的直线为定界的基础；沿线村庄，属于中国一方的户数占多数的村庄归中国，反之归新界。而骆克野心勃勃地要攫取深圳，提出以大山河流的自然走向来划界。英方的要求与《专条》原议相差太远，王存善请示谭钟麟后表示坚决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骆克又提出，大鹏湾、后海湾的水域租与英国，深圳河是一条潮汐河，后海湾的潮汐一直涌到深圳河内，深圳河应为后海湾的一部分，提出必须以深圳河北岸为界，把整个深圳河划入英界。同时，骆克申明并不放弃索取深圳的要求。

在英方讹诈的压力下，清政府再次妥协，又失去了包括深圳河在内的部分领土。至于将深圳及沙头角划入租借地一事，双方同意留待在北京作进一步考虑。

3 月 17 日，中英双方开始实地勘查北界，沿线树立木质界桩。19 日，王存善和骆克在香港正式签订了《新界北线定界备忘录》。它是英国无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粘附地图标示的新界北部陆界的走向，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历史见证。因为深圳河并不是《专条》粘附地图所确定的新界北部陆地界线，它位于粘附地图确定的界线以北。就连骆克也承认，英国由此“完全控制了那条在《专条》粘附地图上没有包括在英国租借地内的河流（即深圳河）”。当然，英国侵略者并未就此放弃对深圳的野心。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订，对于英国人来说，无疑是“日不落帝国”在远东的又一个辉煌胜利，英国女王为即将接管新界而兴奋得彻夜难眠。

然而，侵略者的贪婪野心永无止境。它同清政府在谈判中极其有限的“退让”，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意在先签订租借条约，而后再设法排斥中国留在新界内的一切管辖权力，进一步扩大侵略成果。所以，在欢呼“胜利”的同时，他们对《专条》中关于九

龙城和新界的中国海关等的保留条款极为不满。1898 年 7 月，香港英商总会致电英国外交部，坚决要求政府必须“坚持不受中国海关控制的绝对自由和对整个九龙展拓地的管辖权”，使香港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否则“将使局势非常不利，并导致无穷的纠纷”。

10 月 8 日，骆克在对新界的调查报告中，建议利用《专条》中“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的条款，迫使中国军队撤出九龙城，从而使城内的中国官员失去存在的正当理由。对协助中国海关防止走私的问题，骆克提出由港英政府对鸦片实行保税封存制度。英国政府在仔细考虑之后，正式通知在北京的窦纳东，指示他尽快就九龙城内中国官员们行使管辖权问题和新界中的中国海关问题达成新的协议。

窦纳东奉命后，向总理衙门展开了一场外交攻势。没料到，总理衙门对撤出九龙城中国军队的要求很快答应了，对此连窦纳东也颇感意外。但是，1899 年 2 月 15 日，窦纳东正式提出由香港政府代征管理税，九龙海关必须撤出新界时，清政府不能接受这即将造成的财政上的巨大损失，因而一再拒绝。

阴狠的英国政府为达到目的，在展开外交攻势谋取解决途径的同时，又授权新任港督卜力就地采取措施，强迫海关站必须在 4 月 1 日前撤走，“否则中国方面要承担后果”。在中国要求下，这个通牒延期两周，等候指示。

4 月 5 日，英国代理公使艾伦赛受命正式拒绝总理衙门的请求，宣称：“女皇陛下政府遗憾地表示不能同意在香港或新拓地域内继续存在任何形式的中国海关。”这一决定立即执行，但设在汲水门、长洲、佛头洲的海关税卡被允许延缓至 1899 年 10 月撤离。

1899 年 4 月 17 日，在新界人民的抵抗浪潮声中，英国正式接管新界。这一天恰恰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 4 周年的日子。升旗仪式因害怕民众反抗而提前了一天。4 月 16 日下午 2 时正，

米字旗插在了中国的南大门。为着这个耀武扬威的日子，英国人准备安排一顿丰盛的午餐，但是它被愤怒的中国居民破坏了。就在第二天，数千名手持火枪和大刀的民众包围了大埔的英军营地，用土炮轰击英军。最后因寡不敌众，被英军血腥镇压下去了。

接管新界后，港督卜力向伦敦报告，称虽然清政府已答应撤走军队，但仍有 300 名中国士兵留守在九龙城寨。随后，英方获悉九龙城寨的中国守军已 1 个月没有军粮，请求调动，殖民者的侵略胆子更大了。5 月 9 日，英国外交部建议授权香港占领九龙城寨。5 月 14 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正式下令占领九龙城寨和深圳。

当英军登陆九龙城码头时，许多群众围观抗拒。英军全副武装，准备对付来自九龙城寨的反攻。英国不顾中国官员的强烈抗议，将英国国旗在九龙城寨升起。随后，他们将清军的铁枝、弓箭、长矛、土枪、弹药、来福枪、制服等全部运往广州。次日，城寨居民被迫乘船离开。

紧接着，贪得无厌的侵略者得寸进尺，2000 名英军公然跨越界河，进一步侵占深圳。当时深圳是位于深圳河对岸的一个村镇，是当地的商业活动中心。5 月 16 日下午 5 时 45 分，全镇被英军占领。这样，英军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完全侵占了九龙城寨和深圳。

然而，侵占深圳使英国殖民者面临新的难题：新扩占的这块地盘没有天然屏障，面对愤怒的中国居民的反抗，势必要增加大量军队警察和大量花费。同时，他们担心由此导致列强和英国矛盾激化，乘机夺去比英国更大的利益。在掂掂量量之后，11 月 22 日，港督卜力不得不遵照英国殖民地部指示，下达了命令，立即撤出已占领近 6 个月、将使他们泥足深陷的深圳。

但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强硬地要霸占九龙城寨，不肯把它归还中国管理。10 月，张伯伦蛮横地表示："此事已经最后解决，任何形式的中国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九龙城恢复。"12 月 27 日，英国发布《枢密院关于九龙城寨之训令》，借口中国官员在九龙城内

各司其事，已被发现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用这种预拟的谎言，单方面宣布九龙城寨已成为“女皇陛下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

至此，英国侵略者完全毁弃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窦纳东允诺保留的全部条款。他们奉行强权即公理的逻辑，不仅中国在九龙城的管辖权被剥夺，而且中国商船可使用大鹏湾内码头及中国兵船可使用大鹏湾、深圳湾的权利等保留条款，都单方面被侵略者一概取消了。

沧桑篇



第五章　香港的殖民统治

一、早期英国的殖民统治

鸦片战争后，强占香港的港英当局开始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早期殖民统治的基本特征，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相结合。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备受奴役和欺凌，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根本无民主和人权可言。

首先，殖民主义者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规定了按照种族划分居住区域。香港建埠时，初名皇后城(Queen's Town)，后改称维多利亚城(City of Victoria)。全城依山势的不同特点，分成海岸、半山与山顶三个区域。海岸区是商业中心，这里有各种的商店、银行和邮局等等。但在商业中心内，外国人与华人的区域又有明显的区别。华人区内道路狭窄，房屋拥挤，轿子是当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尽管如此，由于华人勤奋敬业，善于经营，初期的华人商业区要比外国人的商业区更加繁荣。当时文咸街一带，是最热闹的华人社区，南北货行、叻庄、钱庄、当铺、绸缎庄、茶楼，饭馆、药行、堆栈、古董铺和庙宇等等，林林总总，色彩缤纷，使欧人叹为观止。半山区是外国人和个别"高等"华人的住宅区，这里北眺维多利亚港，别墅式的房子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碧绿苍翠的树木掩映下，显得非常幽静和恬适。至于山顶区，更是禁地，只准英国人在此建造房屋，中国人中间只有绅士何东一人得到特别允许，在这里建造过一所别墅。为了有效地推行这种种族隔离政策，港英当局还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如 1888 年制订的《保留欧人区法例》，规定在威灵顿街附近

的地区内只许建欧式房子，以防华人迁入这一区域。殖民者以“目前华人还缺乏为获得真正的进步所必需的品质，而且在未来的长时期内很可能仍缺乏这种品质。”为理由，正说明是对华人的一种歧视。这些禁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逐渐取消。

在维多利亚城时代，华人居住区人烟稠密，街区狭窄，空气恶浊，疾病横生。港英当局往往借口卫生问题，放火烧毁华人的木屋，使很多华人同胞无家可归。早在 1842 年，欧人初到时，因水土不服，死亡率很高，他们便怪罪到华人身上，就把鲗鱼涌一带的乡村房屋尽行拆毁，强迫居民迁往他处。传说当时居住在这里的有七位结拜姊妹，因无家可归愤不欲生，就在涌前蹈海自杀，这就是这一带曾取名为“七姊妹”的由来。

其次，在管理华人方面更是实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华民政务司兼抚华道是港英政府中管理华人的高级官员，对广大华人拥有直接的统治权。华民政务司通过严密的户籍登记制度，并辅以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对华人进行严厉的管制。他们负责对全港人口（主要针对华人）进行登记，并征收人头税。若查明是“良民”，就发给“编票”，准予在港居住；对没有“编票”的人，任何人都不得雇用和收留。他们还驱使地保将其所管辖地段的华人家庭详细情况上报备案。华人居民还必须在屋内悬挂木牌，写明本户情况，以备随时检查。华人家中来客，也要随时上报。1861 年以后，华人事务一律归抚华道直接管理。1888 年，港英当局正式颁布《管理华人法例》，法例明文规定：抚华道有权随时传讯任何一个华人居民；华人除婚丧大事外，不准在市区吹奏乐器和列队行走；华人未经抚华道批准，不得公演戏剧或张贴海报等；华人未经许可，不得举行或参加任何公共集会等。事实上，这类歧视华人的法令，在 1888 年以前早已存在，如 1844 年公布的《维护公安条例》中，就规定港中民户每天晚上要在门口点一盏油灯或挂一个灯笼，华人夜间出门要提一个有自己店名或姓名的灯笼，而且还要一张通行证，当时叫作

"街纸"。

此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华人都遭受到歧视。1864 年港英当局颁布了公园章程,其中规定:华人劳工、轿子和轿夫不得进入公园,狗若无人牵着也不得进入公园。在殖民当局眼中,中国劳动人民就连狗都不如。华人除了不得在欧人区居住外,甚至不得同欧人同时进入香港大会堂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早期英人所办的学校照例是不让华人儿童入学的,存有偏见的英人家长认为,他们的子弟若和华人儿童在一起,在道德行为上会受到"不良的影响"。直至 1902 年,华商何东在尖沙嘴捐资建了一所小学,声称招收学生"不分种族与信仰"。但是,港英当局还是要他把这所学校让给英人儿童专用,而另由港府拨款在油麻地建一所华童学校。早期的香港,也为华人学生开设了一些西式学校。1849 年,英国圣公会在香港开办了第一所为华人开设的学校——圣保罗书院。到 1866 年,香港已有 13 所官立学校,在校学生 623 人。香港西式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使在那里读书的华人学生初步了解到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有不少学生后来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但是,港英当局在香港办学培养中国学生的真正动机,在于维护香港的殖民统治和扩张英国在华势力和影响。香港总督德庇时在谈到香港早期的学校时,曾这样说到:"如果这些学校由新教传教士培养的本地基督教教员掌管,将会使港岛本地居民皈依基督教一事,出现最合乎情理的前景。"香港政府委派的教育委员会在 1901 年指出:"从大英帝国利益着眼,香港政府提供华人就学机会,使他们能以英语作为学习媒介,……只要华人在接受英语教育后,对大英帝国产生好感,及使英语更为广泛传播,那么,大英帝国在中国本土所得到的利益将会远远地超出这殖民地的教育经费了。"

港英殖民当局的种族歧视政策,连当年到过香港的一位英国人也毫不讳言地这样记载:"华人被当作一种有用的、低于人类的

动物看待，走在街上经常挨打。除手提灯笼并持有通行证者以外，他们在日落以后一律不准出门。”

早期香港的法例，是维护其殖民统治的工具。早在1841年1月29日，即英军侵占香港的第三天，义律便向岛上居民发出告示说：“香港岛上之本地居民及前往该岛之中国人民，均以中国之法律及习惯管辖”。其后义律又声称，在港华人适用中国法律，而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则适用英国法律。这一原则在1844年的某些法例中作了更具体的规定。所谓“中国之法律及习惯”，就是指清朝的刑罚，按照这种原则，华人犯法，除了接受英国式的刑罚外，还要兼用清朝的某些肉刑，如鞭刑、戴木枷、立木笼、游街等。所以，早期香港对触犯法律的华人普遍采用了残酷的鞭刑。德辅道尽头原有一片空地，叫作“大笪地”，也叫“十王殿”，当时港英政府曾在这里公开执行笞刑。鞭子是用煤油浸过的麻绳扎在一起作成的，俗称“九尾猫”，这种鞭子抽在犯人背上会皮开肉绽，痛苦异常。很多华人因细微的过失，就被判决公开执行笞刑，在1846年2月25日这一天，竟有54人被执行笞刑。据诺顿·凯希《香港法律和法院史》记载说，当时香港是施行笞刑最多的城市。在当时香港的监狱中，华囚随时都会惨遭鞭打，据记载说，几乎所有的华囚或多或少都要遭到鞭笞。1866年，一名华囚先后被鞭笞3次致死，当局竟称，此人是依法处以鞭刑，对他的死谁都没有责任。从1866年至1876年，是麦当奴和坚尼地先后督港时期，麦当奴首先提出所谓威慑政策，坚尼地继而奉行。这10年间，华囚更是受尽非人的待遇，他们的劳动强度加大，口粮被减少，更广泛地使用鞭刑，甚至在华囚的耳朵、面颊和颈部上强行刺字。对于欧洲人触犯法律，所受到的处罚要远比华人轻。1857年，有一名欧洲人叫默罗，他和5个华人因非法监禁240名华工而被起诉，结果，主谋者默罗仅被罚款5元了事，而5个华人各被判处监禁6个月。这就是港英当局实行所谓华人适用中国法律、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适用英国法律这一双重标准造成

的结果。

不仅如此，港英政府甚至还禁止华人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1855 年，辅政司通告在港华人说，若有人在香港进行反清活动，一经发现将立即移交中国当局处置。

到了 19 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经过在港华人数十年的艰苦创业，香港经济得到初步的发展，香港华人的经济实力随之迅速增强。1868 年，香港成立了当时全港最大的华商同业组织——南北行公所。1872 年，华商募捐创办了第一所华人慈善医院——东华医院，专门为贫病无依的华人提供医疗、救济、丧葬等服务，后来它与 1911 年成立的广华医院，1929 年成立的东华东院合称东华三院，成为香港最负盛名的华人慈善机构。1873 年，继附属于《德臣西报》的中文日报创刊后 9 年，另一份华资独办的《循环日报》面世，从此华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舆论工具。当时很多经营不善的洋商企业和房地产，纷纷被华商所收购，香港的绝大部分商业也逐渐归由华人经营，他们拥有很大的财产，是当时香港最富有的商人。到了轩尼诗督港时期，香港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 90%来自华人，在全港每季缴纳 1000 元地租的 18 个最大的业主中，17 个是华人，洋商只有一个就是渣甸洋行。港英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此时已认识到，香港华人对英国的商业利益极为重要，没有华人的合作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因此，在 1877 年至 1883 年第八任港督轩尼诗在任期间，统治华人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轩尼诗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反对种族歧视，主张给华人以合理地位，尊重华人的风俗习惯，保护华人的合法权利。过去，为协助政府维护社会治安，港英政府延聘了一些外国人名流担任太平绅士。这时轩尼诗打破华人不得参政的传统，于 1878 年 12 月任命华人律师伍廷芳为太平绅士，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开了华人参与管理社会治安的先河；1880 年 1 月，伍廷芳又被任命为立法局议员，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立法局议员。轩尼诗还允许华人在一些

欧人区购置房产，下令废除对华囚公开鞭笞和刺字等肉刑，允许华人与欧人一样自由出入大会堂。从轩尼诗起，港英政府确立了笼络华人资产阶级的方针，对一般华人的统治方式也相应有所改变。

到了 1896 年，由宝隆金山庄的古辉山等十几名商界领袖发起组织了“中华会馆”，香港从此有了一个具有较大代表性的华人团体，这标志着香港华人政治经济势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华会馆”后来扩大为“华商公局”，又更名为“华商总会”，最后改名为“香港中华总商会”。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该团体在维护香港华商的正当权益，发展香港的社会福利事业，加强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联系等方面，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辛亥革命以后，香港传统华人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一代的华人优秀分子开始出现，他们不同于他们的前辈，接受了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充满了理想和抱负，开始争取与英国人同等的地位，竭力打进一向拒绝华人参与的统治阶层。1912 年香港大学的创建，正标志着这个重大的转变。“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对香港社会风气的改革产生很大的影响。“五四”运动后，青年学生抛弃了传统的“大衿衫、腊肠裤”的旧装束，改为西式衣着。社会上还掀起一个反对蓄婢运动。青年人还提倡体育，组织足球队与外国人比赛。甚至提倡男女同池游泳，开男女平等之先声。大批宣传新文化的书籍风行香港。另一方面，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香港工人阶级队伍开始壮大。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香港工人阶级也开始组织自己的工会。到了 1921 年，香港已有工会 125 个，工人运动也进一步发展，1920 年香港 5000 机器工人罢工，1922 年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及至 1925 年“五卅”惨案后激起的省港大罢工，都充分显示了香港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尤其是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使香港同胞受到深刻的民族主义教育，民族自信心大为增强。

华人社会深刻变化的结果，在政治上直接和间接地提出了诸如华人参政，对英国人统治方式的异议，以及实行民主等一连串曾困扰香港达大半个世纪的社会问题。港英政府面对这样一个华人社会，其统治方式和态度也相继发生了变化。1923 年，香港立法局正式颁布《禁婢新例》，规定从今以后无论何人不得雇用婢女；不得雇用未满 10 岁的女仆；所有婢女须按限定时间注册。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1925 年—1930 年)还推行新工厂法例，禁止雇用童工。1926 年，港督金文泰首次任命一名华人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1929 年，又将立法局华人议员增至 3 人，非官守议员也增至 8 人。他还改变了香港大学只以英文授课的做法，赞助成立中文系。但这些变化毕竟还是很小的，香港种族之间的樊篱仍无法打破。

二、香港沦为英国鸦片贸易的集散地

香港之所以被英国强占，主因就是由鸦片问题引起的。英国占领香港后，港岛便成了对华鸦片走私贸易的基地，在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的纵容下，鸦片走私贸易急剧增长，而港英政府也以在港华人吸食鸦片为依托，把经营鸦片所得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据 1850 年殖民者的一份报告中说，1845 年—1849 年间从印度运出的鸦片约有四分之三贮存在香港，然后再由香港转运到中国沿海各地。到 1847 年底，中国每年运进鸦片一直保持在 3 万箱左右，其后逐年增加，19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多达 6 万箱左右。当时设在香港的洋行，几乎没有一家不是从事鸦片贸易或同鸦片贸易有关系。其中以怡和洋行实力最为雄厚，据统计，1845 年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快船)共 71 条，其中 19 条属于怡和行。此外，怡和行还另有 14 只鸦片趸船停泊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以及澳门等地的海口。总行在广州、厦门、上海、澳门等地还设有分支机构。飞剪船负责从印度运出鸦片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运出鸦片分送到大陆沿海各处

的趸船上，飞剪船在回程中沿岸收取金银，运回香港。为了维持这规模庞大的鸦片走私机构，怡和行每年需开支 25 至 30 万元。早在 1841 年 2 月，英军强占香港仅一个月，马地臣就开始在香港中区兴建货栈，次年又开始经营东角（现铜锣湾一带），其后在这带陆续兴建了一系列的办公楼、仓库、造船场、交易场和跑马场等；作为怡和行进行鸦片走私贸易的总指挥部，当时被殖民者誉为"东方最壮丽的商业建筑"，以致当时的东角曾被命名为马地臣角。

当时香港的贸易是以鸦片为最大宗，连港英政府也承认鸦片是他们出口的主要货物。1847 年，香港出口总值为 226130 英镑，其中鸦片占 195625 英镑，约占 86.5%。可以说，香港开埠之初是依靠鸦片走私贸易来维持其生存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同时也为筹集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的资金，恃鸦片贸易税为一项重大税源，同意开放鸦片贸易，鸦片贸易自此成为合法化。鸦片贸易合法化后的第一年（1858—1859），输入中国的鸦片竟多达 74707 箱，六十年代中期，仅广东一省鸦片年消费量约为 18000 箱，鸦片在中国的流毒越发不可收拾。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位俄国东方学家王西里（瓦西里耶夫），曾目睹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社会上吸鸦片成风的状况，他写到，过去吸鸦片的人不算太多，而且几乎限于沿海少数城市；现在吸鸦片者不仅遍及全国，而且扩展到蒙古和满洲；过去鸦片是偷偷地抽，现在款待客人用鸦片烟枪，不用茶碗。

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都造成极大的祸害。不少人由于吸鸦片，变得骨瘦如柴，面目可憎，道德沦丧，风俗败坏，民族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国家的财富、白银也因此大量地外流，而英印政府从鸦片走私贸易中却获得巨大的利益。1852 年仅由大英轮船公司运往印度的白银即值 6074845 元，合 1265592 英镑；1857—1858 年印度从输华鸦片获得利润多达 5918375 英镑。

鸦片走私贸易也使广大香港同胞深受其害。鸦片战争以后，港英当局就以鸦片贸易已在中国沿海普遍开展为借口，公然让鸦片输入香港放任居民吸食，并长期实行鸦片专卖制度。其结果造成全港烟馆林立，大批同胞长期染上抽鸦片的恶习，而港英政府则从中获得大宗的税收。据陈镳勋《香港杂记》记载，1890 年港英政府在港九龙地区所收鸦片牌照税银为 477600 元，而该年港府全部税银收入为 1995220 元，鸦片牌照税收竟占全部税收的四分之一弱。

鸦片贸易受到全世界正义人民的谴责。19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国国内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就不断发出禁绝鸦片贸易的呼声，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国会曾于 1891 年通过了谴责鸦片贸易的法例。但港英当局不愿放弃可观的烟税收入，拒绝在香港禁绝鸦片。20 世纪初年，香港的鸦片烟患有增无减，据香港辅政司的调查，1900 年全港 15 岁以上的成年居民共 262384 人，其中吸鸦片者为 25309 人，占全港成年居民的十分之一。香港一般民众对于烟毒的危害也是深恶痛绝，禁烟的呼声非常强烈，于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了一场关于禁烟的争论。主张禁烟者，从“人”与“国”的利害关系出发，坚持主张禁绝；而港英殖民者则从“税饷”和“财力”考虑，不赞成禁烟，英商更是从商业利益出发极力反对禁烟。曾于 1898 年到 1904 年担任港督的卜力爵士，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声称：“若将各烟馆封闭，则鸦片公司每年所受之损失为 40 万元。现香港商务比前显有逊色，税饷收入因之锐减，……若封闭烟馆后，照章赔偿鸦片公司损失，则政府无此财力。”第十四任（1907—1912）港督卢押强词夺理，说什么烟馆是“疲乏的苦力得以歇息并享受一点鸦片，而富有者又得以聚集友朋、商谈事务的好地方”，还硬说禁烟将导致出现更多的酗酒和其他罪行。当年，英文《南华早报》曾就禁烟问题排出 8 个问题，除广泛征求香港平民的意见外，并向冯华川与刘铸伯两位华人太平绅士作了问卷调查，结果冯与刘二人的答案均倾向于不赞成禁烟一方。由于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不主张禁

烟,于是香港禁烟问题在当年的定例局会议上被搁置下来,一直到1940年才立例禁烟。

然而,长期的鸦片流毒不可能一朝一夕即可禁绝。立例禁烟后,香港的地下烟馆依旧泛滥成灾,由于受到黑社会势力的控制,虽屡经警察侦破捣毁,终不易肃清。可耻的鸦片贸易是英国殖民统治一手造成的,鸦片贸易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早期香港经济的发展,但中国人民和香港同胞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残酷掠夺的华工贸易

除了鸦片贸易外,香港华工贸易也是港英当局对华人进行掠夺的重要手段。西方殖民者长期以来招募骗掠契约华工到东南亚、美洲、澳洲等地充当苦力,并使用极其卑鄙残暴的方法,对华工进行剥削和压迫,这在资本主义文明史上,是继贩卖黑奴之后又一罪恶的篇章。

所谓"契约华工",即为偿还雇主给苦力支付的出国费用,苦力必须为雇主工作一定年限而订立契约的中国苦力。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出现契约华工从广州、澳门出洋到东南亚、南美洲一带充当苦力,使一度衰弱了的澳门港也因进行这种华工贸易而又活跃起来。鸦片战争以后,契约华工大大发展起来,终于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出现这一高潮的原因在于,当时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澳洲的维多利亚、新西兰的奥托沟相继发现了金矿,掀起了广泛的淘金热潮;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筑,秘鲁的矿山和鸟粪层的开发,都急需输入劳力;西印度群岛、南美洲以及东南亚的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园也需要大批的劳力,如英属圭亚那、西属古巴等拉美国家在废除奴隶制后也严重缺乏劳动力。此外,饱受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的中国沿海劳苦大众,为了摆脱贫困被迫出洋谋生,充当非人生活的苦力。

鸦片战争后，华工出口口岸已从广州、澳门扩展到东南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包括广州、澳门、香港、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而当时的香港则是贩卖华工最便利的地方。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同澳门一样是清朝律令所不及的地方，香港的法律又规定任何人都有出洋的自由，加上此地英美商轮云集，航运方便，因此去美、澳两洲的华工多集中于此，这样，香港就成为当时贩卖华工的中心。

当时在香港从事贩卖华工的，以英美等国的商人最为活跃。如最初经营加利福尼亚华工运输的两家商行是和行与兴和行，后来又增加怡和，颠地等洋行。他们勾结当地掮客(俗称“客头”)深入中国沿海省份，用欺骗、赌博，甚至绑架等卑劣手段，将农民、手工业者等拐骗到香港，然后再转运往世界各地充当苦力。在 1845—1874 年间，从香港运往世界各地的华工多达数十万人，其中赴美国的最多。从香港去美国的华工多数为赊单工。赊单工是契约工的一种形式，他们的旅运费由招工代理人垫付，到达目的地后，必须订立契约，旅运费从每月工钱中加利扣还。这种本利剥削甚至比一般的高利贷还要严重，如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垫付旅运费 40 元，而取得本利竟达 100 元。赊单工在还清本利之前必须听从雇主的驱使，没有人身自由。因此，赊单工虽然被美化称为“自由移民”，实质上是一种以债务关系掩饰起来的奴役关系。英国学者坎贝尔曾经这样说过，赊单制苦力是一种“以信用方式给苦力以无形契约束缚”的“隐蔽的奴隶制度”。

自香港运送华工出洋的船只，早期一般都坐帆船，后期则有轮船。他们必须经过长达数十日乃至百余日的漫长航行才能到达目的地。为了牟取暴利，船主们拼命超载，有时将船驶到香港领海以外半途接载出国华工，以逃避检查。超载船上的华工们被挤塞在狭小的船舱里，每人的住宿空间不足 8 立方英尺，“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而且华工的粮食和淡水严重不足，船舱内

空气污浊，潮湿阴暗，生病又缺医少药。华工们受尽骇人听闻的虐待和折磨，是名副其实的"猪仔"。清同治11年(1872年)9月23日《申报》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情形曾作过详细的报道："其所谓猪仔者累累登岸，囚首垢体，鹄形鸠面，……兼其人皆疮痞扁身，脓痂汗秽，几不可近，且每人身穿紫花布衣服，其垢腻狼藉，亦竟与乞丐无异。……各自诉其被招之事及登舟后逼迫虐待各种情形，有泣下沾衣襟者，有呜咽不能成语者，细验之则人皆生疮，人皆如鬼，设非船主虐待之深，何至如此。"无怪当时猪仔船有"浮动地狱"、"海上地狱"之称。在这种情形下，华工的死亡率极高，如1856年英国船"波特兰公爵"号自香港装322名契约华工去古巴，中途病死、打死和自杀的共128名，死亡率占39%。同年英国船"约翰嘉尔文"号装298名契约华工去古巴，中途死亡135名，死亡率高达45%。航途中为了防范华工的反抗，船主多在舱口加装铁栅，船长和船员们均配备有武器，华工稍有表示不满，就会遭到殴打甚至枪杀。

"猪仔"船上的华工不堪忍受这样地狱般的旅途生活和非人的待遇，在绝望之中忿而起来反抗斗争。反抗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逃亡是最常见最普遍的反抗形式，自杀也是常见的消极反抗形式，其中最激烈最突出的斗争形式便是暴动。据不完全统计，在1850—1872年间共发生华工暴动39起。如1852年秘鲁船"罗沙·伊利亚斯"号(船长为英国人)上的华工举行暴动，杀死了船长，并在新加坡附近上陆。1855年美国船"威佛莱"号运华工到哈瓦那，华工与船员搏斗失败，被锁入舱内的华工闷死了151人。1857年英船"古尼世"号的华工突起袭击船上警卫，一度占领甲板，后因缺乏武器又被逐回舱底，华工们就在舱内拆毁床铺，纵火烧船。有的华工则用暴力威胁方式阻止启航，如1857年英国船"波特兰公爵"号从香港开往古巴，在未启航前，华工举行暴动，企图阻止启航，但终被镇压下去。华工暴动事件不胜枚举，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但都反映了华工不顾一切困难和牺牲，坚决挣脱奴役枷

锁，其意志之坚强，精神之刚烈，斗争之悲壮，振撼了天地。

华工的悲惨遭遇，引起国际上一些开明人士的关注。英国国内也不乏反对奴役制度的开明人士，他们曾激烈指责掠卖华工的罪恶行为。港英当局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并根据英国议会通过的法案，于 1854 年 5 月指派了一名“移民事务官”，以加强对“移民”的管理。1855 年 6 月，英国下院通过了《中国乘客法》，具体规定了关于运送苦力船只的乘客住宿空间、食品、医疗等条件，并由英国官员登船检查后方可启航。1857 年，港英政府颁布《移民经纪人法例》。同年，又作出了契约华工只限于运往英属殖民地的规定。然而这些法例和措施并没有取缔苦力贸易，华工的待遇也没有因此得到改善。人贩子们在重利诱使下毫无顾忌地继续胡作非为。当时香港法官司马理和惠托尔不得不承认，“作为英国人对于这种不断给人类文明抹黑的苦力贸易，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于 1867 年 6 月曾先后向港督和香港立法局提出禁止一切华人从香港出洋的建议。港督麦当奴则声称，“把香港这个唯一能在合法基础上办理移民出洋的口岸堵死是非常失策的，……对于非常需要这种苦力的英国各处殖民地来说，这样做并不公平。”而英国政府也以正在与清廷谈判一项关于招募华工去英属西印度的专约为理由，拒绝考虑这两位法官的建议。

香港的人贩子在这项血腥的苦力贸易中，获得巨额的利润。当时贩卖一名华工到美洲或西印度群岛，可获利 200 多元。据统计，1851 年—1875 年的 25 年中，私人商行因贩卖华工所获暴利达 8400 万元，年均达 340 万元。西方船主们也从苦力贸易中获得直接的利益。19 世纪五十年代，一只 850 吨的苦力船，年租金可得 85000 元，1854 年怡和洋行的一次航行即可获利 9 万元。从 19 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香港到世界各地的华工约有数十万名，每名华工船费 40—50 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血腥收入。

华工贸易也刺激了早期香港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带动了航运

业的发展，1854 年—1859 年的 5 年间，香港平均每年增加船只 487 艘，增加吨位 251350 吨，年增长率为 68%。此外，船舶的安装和修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吃饭住宿等有关工商行业无不因此取得间接的利益和发展。出洋华工还需要将血汗钱汇回家乡，当时只有香港的新式银行能办理此汇兑业务，香港的银行业也因此兴旺发达。

七十年代以后，由于香港转口贸易额的上升，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苦力贸易的重要性逐渐降低。1873 年，香港提出了《中国移民船舶法案》，规定凡与苦力贸易有关的船舶不得使用香港港口。于是，香港作为苦力贸易的中心地位基本上结束了。

四、日军占领下的香港

1941 年 12 月 8 日凌晨 4 时 40 分，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上午 8 时 30 分，日军飞机突然袭击香港启德机场等要地，从而揭开了日军进攻港岛的序幕。随后，日军越过深圳河大举南侵，由于日军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均占有优势，香港英军虽经抵抗，终不敌日军的猛烈进攻而节节败退。12 月 25 日圣诞节这天下午，港督杨慕琦宣布向日军投降。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十多天里，炮火连天，工厂被迫关闭，百业陷于停顿，食品严重馈乏，成千上万的贫民因缺乏食粮而饿死，由于棺殓困难，只好抛尸街头。当时香港的街头腐尸遍地，垃圾成堆，沟渠阻塞，污水四溢，可怕的疫疠也随之蔓延开来。这一年香港的圣诞节没有“平安夜”的歌声，圣诞老人也不曾露面，圣诞晚餐岂止无火鸡和蛋糕，甚至连饭都吃不上，这是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圣诞日，香港人民称之为“黑色圣诞日”。

日军仅用了 17 天时间，便完全攻占了香港，从此开始了对香港长达 3 年 8 个月又 25 天的战时殖民统治。香港沦陷后，日军即

在其控制下的《香港新闻》宣布:“香港的统治方式将不会与韩国及台湾类同,而会视为一个堡垒看待。”可见日军攻占香港的总战略方针,是把香港作为控制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堡垒,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日军自始至终对香港实行军事政治强化统治,其统治手段也显得特别野蛮和残暴。

为了稳定“新秩序”,日军进入香港后即在九龙半岛酒店成立军政府。军政府将整个香港地区划分为 28 个区(港岛 12 个,九龙 6 个,新界 10 个),初名区政所,后改名区役所,每区均由一名较有名望的华人担任所长,当然,这些华人所长都是俯仰由人,全无权力的傀儡。此后,举凡工商事务、医疗卫生、粮食配给、户口调查等均由区政所管理,而所有区政所则归由日军的 3 个(香港、九龙、新界)地区事务所统辖,对香港居民实行保甲式的严密控制和管理。1942 年 2 月 20 日,东京正式宣布香港为日本的占领区,遂成立总督府以代替军政府,日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首任香港总督。总督府成立后,组织了所谓“华民代表会”和“华民协议会”,其委员多数是由华人上层绅商担任。并颁布了“华民代表规程”和“香港华民各界协议会规定”。所有这些华人组织和机构均无实际权力,都在日军严密监控之下。而日本人则吹嘘这是华人自治机构,其实是通过这些组织和机构掌握华人活动情况和思想动向,诱骗华人为日军统治服务。随后,总督府又成立了“地方法律办事处”和“公平法庭”,以行使司法权。并修订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以强化治安和管理,如《占领地(香港)法例》规定,所有出入境、居留、经商的人士一律都须得到香港总督的批准。日本人完全取代了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统治。

日军政府成立后,即开始大量发行军用手票(简称军票)。当时军票对港币的比率是 1 比 2。至 1942 年 10 月,升至 1 比 4。日军还迫使汇丰银行发行 119800000 元的纸币,又名“迫签纸币”,以套取中国和澳门的物资。1943 年 6 月 30 日,日军宣布禁止使用港

币，限定港人在一定时间内将所有港币按1比4的比率向台湾银行兑换军票，军票终于取代了港币。这些强制性的金融政策，使日本人搜刮了大量的港币。不仅如此，日驻港总督还授权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对英、美、荷、比、法、中等交战国银行进行清算。日本侵略者还以一些华人银行营业困难为借口令其自行关闭，资产也被其侵吞或控制。这一时期，香港的金市、银市、汇市和股市的活动均告停顿，港币成了黑市商品，香港的金融地位遂为澳门所取代。

为了使香港成为“共荣圈”的“中继线”，1942年10月，由日商的94家企业组成了“香港贸易组合”，操纵和垄断了香港与其他日占地区的货物贸易和交通运输，在日本垄断企业插手下，贱买贵卖，以劣充优。香港的近代工业也因原料短缺、销售困难以及日方的勒索而纷纷倒闭。至于小商、小贩，日本人更是巧立名目增加税收，进行敲骨吸髓。

驻港日军就是这样通过种种强制性的政治、经济手段，明目张胆地进行掠夺，为其战时经济服务。其结果造成香港金融崩溃、物资溃乏、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把原来近代化转口港变成市场萧条的死港。

在日军统治香港期间，市民的生活极其困苦悲惨，在粮食、物资严重缺乏，生命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大部分居民是在饥饿和恐惧中度日。日军占据香港后，即封闭所有的物资仓库，不许商人提取货物，当时有13名华人代表进行请愿，日方则以斩首相威胁，压制民意。当时香港的食品奇缺，肉食品极少，连豆腐也要高价才能买到。粮食更是日本人严格控制的食品。日本占领香港后，曾将95万担的存粮运走80万担作军粮，而对香港人民实行居民粮食配给制。初期，居民每人每日定额是6两4钱，不足糊口之用。而且居民每天通常要在天未亮时便要到“米站”轮购这“6两4”。当时米站很少，每区仅一两个，所以排队轮购的人群绵延数条街。维持秩序的日军士兵还以扰乱秩序为名任意殴打排队购米的居民，妇女通

常被迫令脱光衣服示众,有的因不胜羞辱而自杀。到了 1943 年以后,日军在东南亚战场连连失利,香港受到严密封锁,物资更为短缺,粮荒日益严重,米价由是飞涨,每斤由数元涨至 200 余元。配粮限额进一步减少,普通居民甚至停止配给,因断粮而饿死者不可胜计。

日军还以保障社会安宁和秩序、搜查抗日分子为名,进行人口清查。日军占领香港几个月后,曾经进行过一次"人口总清查"。这一天,全港交通及一切市面活动全部停止,居民被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日本士兵依照户籍册挨家挨户进行核查。为防止有人藏匿,日本士兵翻箱倒柜进行搜索,见有贵重物品便趁机劫掠而去。不少孕妇、老弱病残者被折腾而死,有些居民不慎违例而当场被击毙于街头。那些怀疑为抗日分子的人,更遭残酷地毒打、刑讯,妇女还被凌辱。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次人口清查中,被杀害、逮捕、失踪的在 2000 人以上。

为了便于对华人的控制和管理,以及解决食品供应困难的问题,日军还颁布了"华人疏散方案",大规模地驱逐华人出境,并计划将香港 160 万人口减至 60 万。1942 年 1 月,日总督府颁令,所有没有工作或居留证(俗称良民证)的人都必须离境。并指定广九路为陆路步行归乡线,被驱逐的华人扶老携幼行进在风雨之中,中途因饥寒交迫而倒毙者不可胜计。到了 1943 年 3 月,由于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日军这一疏散政策更加强硬,在街头大肆捕捉市民,用船只强行运送到广东沿岸,然后丢下不管。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当局的鼓励下大量涌入香港;在两年内,香港的日本人由 230 人增至 30000 人。1942 年春,日军在湾仔专辟日本人居留地,将此处楼宇 160 余间尽行封占,限居民 3 天内迁出,数以千计的同胞因此无家可归。

日军为了开掘海南岛石碌地区的铁矿,急需大批劳工,曾在香港招募工人,起初他们开出了优厚的条件,用诱骗方法分 3 批招募

了 7000 名香港壮丁。这些被骗青年，一经报到后，即被送进临时收容所。在运往海南途中，青年们被塞进狭小拥挤的船舱里，日本士兵荷枪实弹把守舱口，有谁稍有动弹，便加以无情毒打。在三四天缓慢的航行中，就有不少青年因受虐待、折磨而死去。到了海南，他们立即被赶到工地，强迫下矿、修路和建筑机场。由于劳动强度极大，食品不足，生活条件差，加上水土不服，不到一个月时间，便死亡四分之一。在以后的日子里，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日寇投降时，活下来的人不及三分之一，而能生还香港的，更是寥寥无几。日军的暴行使数千名香港青年埋骨海南。

日本当局还在香港强力推行奴化教育，在九龙设立教员训练所，考试录取者经 6 个月的训练，即派赴各学校任教。学校均以日语为主要课程。还新设东亚学院，引诱青年入学，编纂奴化教材，实行奴化教育。1942 年春，因纸张短缺，日报导部迫令各报合并出版，全港报纸仅存 5 家。并在总督府楼下，设立了记者俱乐部，每星期召集各报记者，指导宣传方针。日官方的《香港日报》读者甚少，日方便实行硬性摊派，而中文报纸如《华侨日报》等则被勒令紧缩出版。当时的戏剧、电影等均受到严格控制，须经日方审查后方可准许演出、放映。

在日本统治期间，香港是百业萧条，唯有赌场、烟馆却兴旺发达。当时香港的赌场不少，臭名昭著的大赌场有“荣生公司”、“两利公司”等。赌场门口往往悬挂日本国旗，赌场内乌烟瘴气，娼妓混迹其中。这些赌场多由黑社会控制，且与日军相勾结，是领了日本当局的牌照。1944 年 2 月，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后，公开鼓励开赌，借以抽税充作军费，港九两地更是赌场林立，有赌城之称。香港曾于 1940 年立例禁烟，烟馆转入地下，但在日本统治时期，推进毒化政策，公开鼓励吸毒。裕祯公司是日本总督府所属贩毒机构，烟土由热河空运来港，并开设售吸所，准烟民领牌买烟。

日军野蛮与残暴的战时殖民统治，使香港蒙受巨大的灾难，

1945年日本投降时，香港人口仅有战前的一半，经历近百年经营的香港，又呈现生灵涂炭、百业凋零的衰败景象。

五、“新殖民主义”时代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香港后，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原香港政府辅政司约翰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返回市区组织临时政府。他手里没有武器，当时还是让日军士兵暂时维持秩序，等候英军到来。8月30日，海军少将夏慤率领了以排水量3万3千吨航空母舰“不屈”号为首的英国皇家海军特遣舰队驶入维多利亚港。9月1日，夏慤在香港电台正式宣布成立军政府，并接管香港全部政务。9月16日，在中国代表潘国华少将、美国代表威廉臣上校以及其他盟国代表的陪同下，夏慤少将在总督府正式接受驻港日军司令冈田梅吉少将和日本华南舰队指挥官藤田类太郎中将的投降。沦陷了3年零8个月的香港，重新又回到英国人的统治之下。1946年5月，前港督杨慕琦从沈阳附近的集中营返回香港，继续履任香港总督，正式宣布恢复香港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运动蓬勃发展，给旧殖民统治体系敲响了丧钟。在这种世界潮流影响下，加上英国守军对香港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改善英国殖民者在香港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并笼络人心以便更有利地推行英国的新殖民政策，杨慕琦返港后立即宣布在香港要发展地方自治。早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就曾宣布，一俟战争结束，它将给予殖民地更多的权力去处理自己的事务，最终达到自治。杨慕琦爵士返港后就着手制定这一计划。到了1949年，一些草拟的方案公布了，其基本内容是，建立一个新的有代表权的市政议会，其成员多为民选，而所有在港的永久居民，能掌握中文或英文者，都有选

举参政权，政府从差饷及牌照费中拨出款项给市议会，使它能财政自主，自行雇用职员，最后负责所有市政设施、教育、社会福利、市政建设及其他各种职责。同时，还建议改革立法局，将非官守议员增至 8 名，官守议员减为 7 名，打破了以往官守议员占多数的成规。这就是一度颇受重视的“杨慕琦计划”。但是，这一计划被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以一般香港市民政治文化水平低及缺乏民主意识为理由反对实行。此时，正值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准备解放全中国之时，香港前途难卜。加上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工党政府下台，朝鲜战争爆发，于是，1952 年 10 月，“杨慕琦计划”在英国下议院遭到否决，被迫流产了。此后在五十年代，港英政府致力于香港的经济建设，力图使其成为英国的摇钱树，另一方面，竭力阻止反英倾向在香港的扩展，于是通过制定涉及出版、电影、社团等一系列条例，来加强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统治。所以，这一时期再也没有考虑香港宪政改革的问题了。

直至 1966 年，中国内地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香港公众要求民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这时港督戴麟趾又重新提出地方自治问题。此时，港人的政治意识已经崛起，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对此问题也表示欢迎，他们很赞成为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管理公众事务提供机会。8 月中旬，市政局完成了一份报告书，建议成立一个“大香港市议会”，其多数议员为民选，除了保安和外交由英国政府负责外，其他如教育、消防、住房、医疗、市镇规划、市政工程、社会福利、运输等许多其他职责均由市议会负责。1967 年夏天，由于一连串的劳资冲突，酿成了当时香港舆论界所称的大规模的“左派对抗运动”，造成 51 人死亡、800 人受伤，5000 余人被捕的局面。英国政府为此又加强了在香港的集权统治，而具有放权设想的戴麟趾的“大香港市议会”，显然不符合当时英国人在香港统治的需要，于是，关于戴麟趾建议的理论探讨也就停顿下来了。1971 年 8 月，港府发表了《市政局将来组织、工作及财政白皮书》，认为转移

权力给地方当局的主张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地方人士想参与政府事务，顺理成章的办法是发展咨询机构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1964年至1974年的香港，是一个极其动荡的年代，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在政治文化方面，1964年香港发生了第一次的中文运动，显示出香港同胞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要求摆脱殖民文化的桎梏；1966年因“天星轮”加价而引起了九龙骚动；1967年声势浩大的“左派对抗运动”；七十年代初期青年学生运动和反贪污运动；以及舆论界对政府越来越多的批评等等。在经济方面，七十年代初期的港币贬值，1973年股市在狂热之后突然暴跌；加上石油禁运所带来的全面经济衰退等等。这一时期，对政府不满的民众和青年学生，因股市暴跌而破产的市民，生活贫困的工人，环境恶劣的安置区，对贪污成风的官僚政府的憎恶，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等等，这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使香港的社会显得动荡不安。

1971年11月19日，麦理浩爵士抵港接任香港总督，他认识到靠传统的殖民统治手法，已经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必须改弦更张，寻求新的统治方式。于是“官民沟通”、“咨询式民主”便成了当时官方的统治意识形态。在这种信念之下，以麦理浩为首的港英政府对统治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开始推行一套新的殖民主义统治政策和施政措施。麦理浩督港10年(1971—1982年)，他所推行的“新政”主要包括以下诸方面的内容：

十年建屋计划　1972年香港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计划”，并推行“居者有其屋”。这一时期公共住宅陆续大批兴建起来，不仅缓解了香港住房的紧缺，也成为七十年代香港建筑特色之一。但政府推行的高地价政策、自负盈亏的房屋政策，以及拆迁纠纷，给这一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

新市镇发展计划　由于香港城市在不断地膨胀，必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于是新界开始大规模地城市化，数十年来市区

与新界的关系改变了，两地差别也缩小了。

廉政专员公署成立　　香港的贪污受贿问题源远流长，是香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73 年总警司葛柏贪污受贿案曝光后，香港民众群情激愤，对政府打击贪污不力深感不满。港督麦理浩决心以肃贪倡廉作为施政的重点，1974 年 2 月成立了专事肃贪倡廉的独立机构——廉政专员公署，并取得较大成效，赢得了社会威望。

地方行政改革　　1980 年 6 月 6 日，港英政府公布了地方行政改革绿皮书，计划将港九分为 7 个大行政区和 1 个小行政区，由港英政府委任民政专员主管各区工作，区内并设区议会，议员由港府委任和民选，凡年满 21 岁，居港 3 年以上者均有选举权。这是继杨慕琦、戴麟趾之后较大的政制改革计划。尽管如此，麦理浩的地方行政改革计划仍脱离不了“咨询政治”的窠臼，因为决策权仍然集中在港英政府手中。

公务员本地化　　自 1971 年起，港英政府改变公务员招募政策，大量地聘用香港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进入各个部门担任行政职务，从而开始改变了港英政府在公务员招募中，长期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和英国人垄断政府的现象。

访问北京　　1979 年 3 月 24 日和 1980 年 10 月 19 日，港督麦理浩两度访华，主要洽谈移民、供水以及通商贸易问题。这是中国内地与香港合作的新开端，不但有利于稳定香港社会，也加强了香港工商界的信心。

新交通运输措施　　1973 年 9 月，海底隧道通车，1980 年 2 月地下铁路全线通车，1981 年 7 月火车电气化试车。

此外，1971 年推行小学免费教育，港府医院和辅助医院也增至 23 间。上述这些“新政”，表明港英当局统治香港的方式确实有了某些变化，香港的民众也确实从中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港英政府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香港人民始

终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因为体现着对华人种种歧视的法律没有变，港府主要官员和多数的议员依然是由港督委任，涉及香港事务的决策权和处置权仍然掌握在港督及体现港府意志的高级官员手中，香港金融、经济的支配力量仍为英资企业所控制，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也依然是沿袭殖民制度的那一套，即使给了华人一点所谓的“咨询”、“沟通”权利，那也要以不损害英国的统治和维护英国人的利益为前提。可见，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不管哪一任港督的施政方法怎样变化，对香港人民来讲，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民主。

第六章　中国人民反抗强占香港的长期斗争

一、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

英国强占香港的历史，也就是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为反抗强占香港而进行长期不懈斗争的历史。在这场斗争中，一大批中国的爱国志士，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史诗，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爱国正气。

最早起来同英国强占香港展开斗争的就是令人崇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英国强占香港消息传出后，林则徐大为震惊和气愤，立即与怡良、邓廷桢、梁廷枏等人商讨对策。廷枏建议立即召集绅士会议，促使抗战，反对割占香港。林则徐大力支持。于是梁廷枏、邓廷桢等立即召集众绅聚会，并向广东巡抚怡良呈《联恳严行剿办英夷呈文》，指出：“盈天之地，莫非版章所存，一凡之泥，难繁珠崖之弃”，

明确反对割让香港。呈文还表示："白叟黄童，群思敌忾，耕氓贩竖，愤切同仇"，鲜明地反映了广东人民维护香港主权的坚强意志。他们恳切要求清政府"陈师鞠旅，彰天伐之明威，禁暴锄强，顺舆情以挞伐"。人民群众反割占反投降的情绪感染了广东巡抚怡良。他称："英逆种种披猖，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表示等奕山来广州时，共同抗战，"愿与该绅士同听凯歌"。怡良还将绅士的呈文转奏道光皇帝。

当天，士绅们还到督署与琦善辩论，人数多达数十人。琦善对他们说："款夷出自上意"，"而诸君未识情形，争执如是，早晚祸及，可自为计"，并把他向皇帝奏请的投降论调重弹一遍。一位被称为"笃实君子"朱介石，出于义愤，挺身与琦善辩论至太阳斜西，才退出督署。由此可见民愤非常激烈。

怡良在群众情绪的推动下，毅然上书皇帝，揭露琦善一意孤行，不与怡良等商量，就"擅与香港"，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维护统一的意愿。

在广州三元里，燃起了照彻近代历史的反抗英国侵略的熊熊烈火。在反侵略反占领的号召下，群情激动，奋起抗击英侵略军于三元里。5 月 30 日，英兵由三元里过中栏冈抢劫。于是 80 余乡群众数万，闻锣声而至，"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兴威"。一时，遍山遍野，男女老少，将英兵困住。午时，迅雷暴雨，日夜不息。三元里四面皆田，雨后泥泞土滑，夷兵寸步难行，被打得四处败逃。第二天，因知府余保纯对群众威胁、弹压，才使侵略者解围。当时广西巡抚梁章钜承认："此次广东省城幸保无虞，实借乡民之力……现已众志成城，与英夷誓不两立……认真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充分体现了三元里人民反对侵略保护我国领土完整的斗争精神。

三元里反英斗争中显示出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大大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英斗志。这之后，参加三元里反英斗争的林福祥上书祁

埙，请求乘机出兵收复香港。他指出："此在官兵同心，绅勇欲战，且自有三元里之捷，更觉勇气百倍。"他建议"乘此可胜之时"，"由香港后路，潜师袭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建立"不世之功"。他向祁埙强调指出："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若只求旦夕之安，不计存亡之理，今日尚恃鼠首之端，他日必贻反噬之悔"，反映了中国人民收复香港的强烈愿望。

《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广东人民义愤填膺，发布《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指出："江南诸当事……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更有甚于南宋佞奸之所为者"，响亮地喊出"伸天讨而快人心"的号召。1842 年年底，香港有 3 千多人回广州，修筑炮台，计划于 12 月底袭击香港。居香港同胞也计划内应，收复香港。可是由于两广总督祁埙害怕英国再启战端，加以压制而未能按计划进行。

在香港，当地人民也以各种方式开展斗争。1841 年 5 月 29 日，英国人和汉奸数十名为调查户口，召集乡民会议，受到乡民的抵制。12 月间，英兵到新安内河进行勒索，又占据新安县南山炮台。当地人民奋起反对，把他们赶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

1844 年，香港殖民政府通过了"人头税"法案，借此向中国百姓勒索税款。香港百姓发动罢工予以抵制。10 月 30 日，3 千多名港人罢工回省，这场斗争延续了 3 个多月，迫使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暂缓实行这一法案。

由于清廷的腐败，这一连串的斗争虽然未能阻止英国强占香港，但是表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正气，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二、早期香港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

1844 年 8 月 21 日，港英当局以岛上治安混乱为借口，由立法局通过了第 16 号条例（即《人口登记条例》）。决定是年 11 月 1 日

由华民政务司主持对全港人口进行登记，并对香港所有居民征收变相人头税的登记费。这条法例的本意主要是针对中国居民的，但又装作一视同仁的态度，结果首先引起香港英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白种人与华人一样进行缴纳人头税，是对他们的侮辱，当地的英文报纸还发表评论说："在英国殖民地，一张白色面孔当然就是具有充分效力的护照"。广大香港同胞更不堪忍受这种凌辱和敲榨，决定抵制这一法例，发表《华民公启》说："旧例重收地租，已无限辛苦，新例加收身价（人头税），又何等艰难。……或时身票遗失，搜检便提担枷，讼从此繁，刑从此酷。嗟呼唐人受害，种种难堪，设不预为杜渐防微，其祸将不知于胡底也。"并号召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指出港英当局若执意实行此例，宁可卷席离港，远走他乡。

到了 10 月 31 日，即该法例生效的前一天，港英当局仍然无意收回成命，于是全港工人率先举行罢工，这一天离港回省的华人即达 3000 人。11 月 1 日，华商也举行总罢市，于是各行各业完全停顿，所有轮船、小艇停止营运，香港、广州之间的交通完全中断，食品粮食来源断绝。港英当局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急忙于 11 月 2 日发表通告，宣布该法例在修改以前暂不实施。11 月 13 日，立法局通过了 1844 年第 18 号条例（即《人口登记及调查户口条例》），规定公务员、军人、商人、专业人员以及年收入达 500 元者均可豁免登记，其他需登记者，也主要登记职业和地址，取消征收登记费。至此，罢工、罢市斗争宣告胜利结束，这是香港同胞第一次大规模地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这次斗争的胜利，对以后香港同胞反殖反帝斗争产生一定的影响。

1849 年 2 月 25 日，还发生了一起徐亚保仗义惩凶，杀死两名调戏妇女的英军军官事件。这一天下午，喝得醉醺醺的英军皇家工程兵上尉科斯达和锡兰来福枪队中尉达亚尔兽性发作，闯进了赤柱黄麻角村一民户家中，调戏了一位年轻妇女。这妇女的公婆见状上前劝阻，却被这两个军官打得头破血流，周围邻居闻讯赶来劝

阻，也同样遭到毒打。恰逢徐亚保等人经过此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英军官发生冲突，结果用长矛将这两个军官当场戳死，并将尸体抛入海中。事后，英军将这两名军官视为“英雄”，并在花园道圣约翰教堂的墙壁上为其刻嵌一块纪念碑。

徐亚保是一个海盗，经常活动于香港一带洋面，颇具侠义之风，据说打劫的对象多为鸦片烟船。两年后，徐亚保在大鹏湾被捕，因不甘受辱，在狱中自缢身死。

三、震动中外的毒面包案

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香港和广东的中国居民奋起反抗。广东爱国官绅发出告示，不准运粮食蔬菜到香港去，禁止中国人到香港去，禁止卖任何食物给外国人，要求在香港为外国人帮工和开店铺的中国人立即回乡。香港的中国居民纷纷关闭店铺，辞退工作，返回内地。新安县抗敌会会长陈桂籍委派他的弟弟、举人陈芝亭带领 2000 人进入九龙，进行抗英斗争。他们截击运输货物前往香港的船只，袭扰零散的英军，打听香港敌人的情况，鼓动香港岛上的居民参加反抗，甚至给岛上的同胞送去密函，要购买当时香港抚华道高和尔和警务处长威廉坚这两位高官的人头。岛上一些居民也响应烧毁英国人的住处，掳杀作恶多端的洋人。

由于香港同胞的激烈反抗，港岛上英军惶惶不可终日，除派船沿海来回巡逻、洋行门口重兵把守之外，夜里还要定时打炮以维持士气。

就在殖民者神经绷得紧紧的时候，1857 年 1 月 15 日，香港发生了 400 多名英国人因吃了含有大量砒霜的面包而中毒的事件，这便是震动中外的“毒面包案”。中毒的人中，连香港总督包令的夫人也在内，而案件的主谋、“凶手”，至今仍是一个谜，成为香港历史上著名的奇案之一。

当时香港有许多告示，警告那些卖粮食给外国人的商人，不许做这种生意。因而有许多店铺都关了门。但是有一家“裕盛面包店”的老板张亚霖，平时专给香港英国人办理伙食，这时便乘机扩大生意，包办了全港英国人的伙食，根本不理会香港同胞对他的多次警告。

1 月 15 日早上，该店的面包送到了订户的家中。过不多久，400 多个吃了面包的外国人都感到肚子非常痛，然后开始呕吐，被送到医院治疗。经过化验，发现在面包中含有大量的砒霜。案件发生后，香港警方立即把做面包的 51 名工人全部抓起来，但是不见张亚霖全家的踪影和一个当天没返工的面包师亚才。香港当局认定张亚霖是“畏罪潜逃”了，立即悬赏缉拿。

原来张亚霖在事发当天早上送他的父亲妻儿到澳门去了。因为港督包令夫人也中毒了，包令十分恼火，下令派战舰前往截击，一定要将张亚霖逮捕归案。而事实上，张亚霖的澳门之行，是因为他家乡贴了布告，命令在香港的人全都必须回去，否则以叛徒论处。他的祖母写信要他送家人回去，而他因为承办英国人伙食已当作叛徒被悬赏捉拿，无论如何不能回去。他准备先把家人送到澳门后再返回香港继续做他的生意。因为走得太早没有吃早饭，在船上他的家人就吃了携带的当天烘制的面包，不料随后也出现呕吐现象。他才怀疑面包有问题，可能被人下毒了。他没有逃跑，主动要求船主返回香港。香港的高级法庭始终无法查明谁下的毒，怎样下毒。而张亚霖的家人也中了毒，况且他在事发前两天还买进大量面粉，准备扩大生产，事发后也没逃跑。没有证据证明他是主谋或参加下毒，最终陪审员以 5：1 的多数票，宣布下毒的罪名不能成立，予以释放。但是侵略者并不善罢干休，包令引用《维持本港安全和平条例》，再次将该店全部人员拘捕，关在人称“香港黑穴”的狭窄肮脏的牢房里。后来因为当地华人和一部分英国人士的反对，而且考虑到香港牢房人满为患，有发生温疫的可能，才将被拘捕人员全

部驱逐出境以了此案。

这次毒面包案，因为含砒霜量太高，英国人吃完后不久就呕吐，把毒素也呕了出来，反而不死。400 多个英国人虽无一人丧命，但由此却震动了中外。恩格斯曾对这次事件评论说："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

毒面包案发生后，英国人转向一家嘟爹利商店定购食物。但是，事过不久，在 3 月 6 日晚这家商店便被烧掉了，可见当时反抗侵略者的群情多么高涨。

四、华工反英斗争

香港是我国最早采用机器生产的地区之一，从而也产生了最早的一批中国产业工人。为了反侵略、反压迫，他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英罢工斗争。

1857 年 12 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时，有许多香港华工响应家乡的号召辞职回到广州。英国领事巴夏礼强迫广东巡抚贴出告示，要求华工回到香港。但是告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858 年 3 月，佛山团练局成立，为了造成对港英的威胁，号召所有在香港、澳门等地为外国人教书、办理文案以及一切雇工服役的华人，辞退回家。这一倡议得到香港同胞热烈响应，一个月内就有 2 万多人罢工回到广州，甚至连香港总督包令雇佣的中国工人也辞职不干了。由于当时有将近香港总人口三分之一的人突然离开了香港，各行各业趋向于瘫痪状态。商店、学校有一半都关了门，粮食供应中断，地方清洁工作没人负责，垃圾堆积如山。以前靠中国人料理日常生活

的外国人，这时也不得不自己下厨房做饭吃，市场供应面临着完全停顿的局面，粮食价格猛涨，罢工风潮使得香港变成了一个“臭港”、“死港”。洋人纷纷要求香港政府解决这次罢工风潮，建议港督发表一份公告，声明如果华人继续离港，或有人企图阻截供应香港市场物资的船只，香港政府将派武装军队对有关地区进行报复，必要时就要毁灭附近各村庄。包令为此召开行政局会议，进行讨论对策，发布了中英文公告，表示“逼令”香港岛的居民离境是不容许的，如果不撤销的话，就要对有关地区和人员进行严厉惩罚。巴夏礼也派人到新安县等地去张贴告示，要中国人回港就业，但是张贴告示的汉奸马上就被人打死了。香港同胞并不惧怕敌人的威吓，坚持罢工斗争，给香港当局沉重的打击，有力支持了中国军民抗击英法联军的正义斗争。包令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现在正吃着战争的恶果”。

此后，罢工斗争不断发生。1860 年，香港实行“牌照法”。全港的轿夫、水上艇户都反对牌照，拒绝登记，这次持续 3 个多月的罢工，迫使当局让步，修正条例，罢工取得了胜利。1862 年，香港码头搬运工人反对强迫登记，又举行了罢工。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英法勾结想以香港作为法国侵略中国的基地。香港各行各业的工人，联合发动近代香港工人运动史上影响很大的政治罢工。香港当局出兵镇压，但中国工人不惜血洒街头，持续罢工，挫败了英法的阴谋，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者，连英国的《北华捷报》也惊呼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动。显示了中国工人的强大威力和斗争精神。

五、中法战争中的香港

19 世纪八十年代，法国侵略者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之后，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84 年 7 月 15 日，法国远征舰队在海

军中将孤拔的率领下，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港。8 月 23 日，法国舰队突然袭击了停泊在港内的福建水师舰船，炮击马尾船厂。法军偷袭马尾后，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慨，国内一些报纸接连发表评论，敦促清政府抗战，旅居海外的华侨也纷纷捐款回国，支持抗法斗争。香港广大爱国同胞怀着巨大的爱国热情，以各种可能的手段打击法国侵略者，以支援国内人民反侵略斗争。

中法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名义上声明中立，实际上给法国海军提供很多便利。法国军舰明目张胆地从香港出发拦截中国船只，法国的运输补给船只经常从香港向法军前线输送军火、燃料、食品补给，负伤的法国军舰可以来香港修理。这些情况激起香港同胞的极大义愤，也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立即下令加固河防，并发表文告，号召两广及海外华人把握机会，拦截法船，毁其船械，焚其弹药，探其军情，以实际行动支持反侵略斗争。当这一文告在香港 4 家华文报纸同时发表后，香港同胞反法情绪进一步高涨。1884 年 9 月 3 日，参加攻击基隆和马尾而受伤的法舰“加利桑尼尔”号驶入香港黄埔公司的船坞修理，法海军中将孤拔也随舰到港。船坞的中国工人一致拒绝为敌舰工作，还拒绝继续油漆法国邮船“瓦尔加”号，法国人不得不把“加利桑尼尔”号拖到日本去维修，又自己动手油漆“瓦尔加”号。同时，香港的艇户、码头工人、航运工人以及各行各业的中国工人都纷纷响应，拒绝为法舰加煤、装货和提供其他服务。

港英当局处处偏袒法国人，当孤拔到港时，受到隆重的鸣礼炮欢迎。港英当局还调动小火轮通宵达旦保护法舰，代理总督马殊还决定对 4 家发表张之洞文告的华文报纸以煽动谋杀罪而提出起诉。更有甚者，港英当局还对不肯受雇用的华人小艇处以罚款和吊销牌照。港英当局偏袒法国人的行径，激起香港同胞们更大的愤怒。9 月 30 日爆发了艇户的总罢工，第二天扩展到各个行业，以致

整个港口工作几乎陷于瘫痪。当时法国驻沪领事李梅由上海往西贡，途经香港时，旅店的华人服务员以及汽艇的华工等都拒绝为他服务。10 月 3 日，罢工斗争达到高潮，各个行业的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港英当局调遣大批警察前来镇压，用刺刀驱逐人群，开枪打死一名示威者，并逮捕了许多示威者。次日，还对被拘捕的示威者进行审判，有 12 人被判 1 年徒刑，2 人被判半年徒刑。10 月 9 日，立法局召开非常会议，紧急通过《维持治安法例》，借"法律"名义剥夺华人的爱国权利。

1884 年的反法罢工斗争，是香港同胞反帝爱国热情的再现，连港督宝云也承认，这次斗争是"前此 25 年发展起来的爱国精神觉醒"的结果。香港同胞的罢工斗争，直接支援了全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使法国侵略者企图把香港作为侵略战争补给基地的计划落空。

六、"新界"的抗英怒潮

英国侵略者虽然凭借武力和威胁手段强租新界，但新界民众"一旦闻租与英国管辖，咸怀义愤，不愿归英管"。早在 1898 年 8 月，奉命到"新界"实地调查的港府辅政司骆克，即遭到锦田村民的强烈抵制，紧闭村门使骆克等人无法内进。后来英方靠 75 名陆战队士兵和机枪的压力，才把村门打开。

1899 年 1 月，香港英国军官开始"接管"新界时，又遭到新界居民激烈反抗。3 月 24 日，港府总管司轩利·梅上尉选择大埔墟为警察总部，闻讯而来的乡民们手执长矛、火枪、锄头等武器，将他们团团围住，不准占用此处地皮，否则以武力自卫。轩利·梅势单力薄，不得不答应乡民们的要求。3 月 28 日，轩利·梅又到屏山寻找营建警署之处，遭到当地乡民们强烈的抗议。

随着新界民众反占领情绪的日益强烈，英国侵略者十分惊恐，

向两广总督施加压力，要求在交接租地时“派兵保护”。3 月 27 日，新安知县奉命在新界贴出“告示”，在“安抚”百姓“无须惊恐、猜疑，勿生事端”的同时，严厉地禁止百姓的抗英斗争，称“如有胆敢藉词惑众，创造事端，定必惩办，绝无宽恕”。

然而，新界民众并没有被《告示》吓倒。为了共商对策，统一抗英布署，新界人民进一步行动起来。3 月 29 日，厦村邓族父老在邓氏大宗祠集会，一致反对英人的接管。次日，新界各乡代表在元朗召开大会，商议联合武装抵抗英国侵略者接管新界。随后在 4 月 1 日的集会上，决定通告各乡约束子弟，不得为英国人工作。同时，各乡加紧做好抵抗准备，购买了大批火药。

就在 4 月 1 日这天，又发生了一桩令港督卜力十分震惊的事件。英国人为隆重庆祝拓展香港的成功，特意雇佣了许多工人在新界大埔建造了许多席棚，为 4 月 17 日的升旗仪式使用。谁知一夜之间，刚刚建造起来的席棚被乡民们一把火烧个精光，附近的大树上贴满了令侵略者触目惊心的反英标语。

日益感受到反抗怒潮的卜力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动身去广州，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求援。几天后，清朝水师船开来了，企图镇压乡民们。被激怒的乡民们搬来土炮，严阵以待。双方僵持不下，清朝水师船在同胞们的怒视下，终于开走了。

卜力试图以中国官府力量来镇压中国老百姓，然而他的阴谋却落空了。恼羞成怒之下，他决心不惜以武力接管新界。4 月 9 日，荷枪实弹的英军和清兵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大埔墟。4 月 10 日，新界各村代表在元朗区成立了“太平公局”，作为统一抗英斗争的组织，这标志着新界人民有组织的抗英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国侵略者原定 4 月 17 日正式接管新界，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但他们在饱受民众的反抗怒火之后，因害怕民众反抗、破坏而把仪式提前了一天。

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并没有因为英国侵略者的武力接管而停

止。就在英国米字旗升起的第二天，数千名手持大刀和火枪的中国民众包围了大埔的英军营地，用土炮轰击英军。英国军舰立即发动进攻，向岸上开炮，英军蜂涌登岸，朝民众展开野蛮的攻击。大埔民众英勇抗敌，在与英军激战中伤亡惨重，最后被镇压下去。

此后，一部分乡民聚集在锦田村吉庆围，继续抵制英军。吉庆围是新界的一个邓族村落，四周构筑有深沟高垒，进出有一座铁门把关，坚固异常。当时，新安县的许多村庄都修筑了围墙，拥有武器，原意在于防匪，而今却可作抗英之用。大埔之战后，英军包围了吉庆围，用炮轰击村落，但屡攻不下，最后由清兵协助才攻占了村庄，并把吉庆围的大铁门作为战利品运回伦敦，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去夸耀他们武力镇压中国老百姓的"胜利"。

随后，英军扬言要攻打东莞石龙、雁田。在此危难关头，新安民众毅然拿起武器，"与东莞各乡联络一气"。东莞石龙一带迅速组成一支 3 千多人的队伍开赴雁田前线。而雁田民众获悉后，"集议于祠堂，讨论对策"，1 千多人签名，宣誓抗英。抗英志士们筑成 20 多里长的弧形防线，自深圳至北望，壁垒森严，斗志昂扬，甚至主动夜袭敌营，迫使侵略军退回罗湖河以南，不敢再肆意扩占。

香港人民不屈不挠地反抗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中国人民，包括香港人民英勇的前仆后继的浴血斗争，使外国侵略者不能灭亡中国。先烈们的爱国精神和斗争志气永远受到后人敬仰。

七、香港人民的反帝运动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攫取更多的权益而加紧对中国侵略掠夺和相互角逐，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903 年，盘踞在东北的沙俄军军队违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规定，拒绝按期撤退，并提出 7 项无理要求。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人民无比

愤慨，上海爱国人士首先在张园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反对妥协屈服。北京、武昌等地的学生民众也都举行集会抗议，留日学生还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全国上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这时，香港的爱国绅商士民纷纷致书上海爱国会，积极捐款支援全国的拒俄运动。不少爱国士绅还与广东的爱国人士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拒绝重新签约。一时间，香港形成了一股反俄浪潮。

1904 年，限制和虐待华工的《中美会订华工条约》期满，海外华侨和国内人民一致要求废除这一苛约，但美帝国主义蛮不讲理一意孤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檀香山《新中国报》提出不用美货以为抵制的办法。1905 年 5 月 10 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会议，一致通过抵制美货，电告清政府拒签续约，同时通电汉口、天津、广州、香港等 21 处商务局，传知各商相戒不用美货，一场抵制美货的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花旗火柴公司致函上海商务总会，表示该公司“其中材料有来自美国者，今为大局起见，于 7 月初一日全厂停工，待至苛例改良签约，而后再张旗鼓，以洽与情，而免见利忘义之诮”。8 月，香港华商公局召开会议，讨论禀请港督抵制条约之事，后因华民政务司的干涉，计划受到阻扰。香港的华文报纸也积极投入这场运动，早在运动之前，《中国时报》就与美洲等地的华侨报纸遥相呼应，揭露美国虐待华工的罪行。运动一开始，香港的几家华文报纸便立即慷慨陈词进行反美宣传和鼓动。7 月 22 日，郑贯公主编的《有所谓报》刊出《抵制美约非常要告》：“本社凡于有益同胞之事，无不竭力提倡；于有损同胞之事，无不疾声警告。美人续行禁制华工之例，于吾同胞关系甚大，本社亦国民之一分子，奚肯放弃天职。特于是日起，至改约之日止，凡代刊广告，有关于美货者，概不接刊，以示自行抵制之意。”他们还大量报道国内的反美运动情况，当华侨冯夏威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前悲愤自杀时，各报纸纷纷

发表其遗书、传记等，以激励民族气节。《世界公益报》因刊载著名的反美政治讽刺画《龟抬美人图》，主笔李大醒还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商报》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报纸，他们不顾改良派一贯的态度，也大力攻击清政府的卖国行为。香港报纸的宣传和鼓动，声援了各地的反美斗争。香港的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在这场运动中，也表现不俗。当时，香港中央书院在学期结束时，发给学生人手一册字典，有学生发现此书为美国所印，马上对大家说："今我国民在抵制美货，此书来自美国，即不啻美货也"，学生们立即把书撕烂扔到地上，以致这条街当时被称为"字典街"。香港同胞在这场反美爱国运动中，有效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斗争，迫使清政府不敢与美国续签苛约。

1908 年 2 月，澳门有位姓柯的商人在日本购买一批军械，并雇日轮"二辰丸号"运抵澳门海面，被清政府缉获，日方对此提出抗议，两广总督张人骏以赔偿损失和鸣炮谢罪的办法了事。此事马上引起两广人民的强烈不满，并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香港的同胞表现得更为热心，他们组织了"振兴国货会"，大力抵制日货。香港的中文报纸纷纷发表文章。一些市民还捣毁了贩卖日货的商店，焚烧货物，甚至捉拿了一些为私利而不顾民族尊严的店主和店员，将他们割耳示众。还有一些人组织了"敢死会"，四处搜索贩卖日货的商人。西环海旁，有两个货仓堆满了日货，敢死会将其层层包围，准备先捣毁再焚烧。日本侨民吓得魂飞魄散，日领事迭向港英政府交涉，要求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警察署就派出大队人马，荷枪实弹开赴现场镇压。这次抵制日货的爱国斗争坚持了 8 个月之久，使日本商人受到重大的经济损失。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的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和北洋政府丧权卖国的行为。这场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形成了空前规模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企图借助日本的力量在远东与德国相抗衡，造成了日本在香港的势力大增。这期间，大量日本侨民涌入香港，其数量大大超过欧美人。他们在湾仔杉排一带争相开设商店，经营古玩字画、书籍文具、瓷器、漆器、药品杂货乃至理发、照相等行业。日货更是充斥香港市场。日本人还开设了专为日侨和外国人服务的医院和学校，把华人拒之门外。日本军舰也经常在南中国海游弋，停靠在鲤鱼门外。港英当局采取明显的亲日态度，对日本侨民、商店特别加以保护。当"五四"运动波及香港时，香港的爱国同胞奋起响应，迅速投入这场运动中去。香港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表现得十分活跃。教师们在讲台上慷慨激昂，陈述国耻，又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相号召，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些学生还回家清理日货，拿到中环摆花街以及荷李活道中环警署附近，当众烧毁。私立陶英学校的学生，手持福州生产的油纸伞，称为"爱国伞"，上街游行，以提倡国货。其他一些书院、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举行集会，皇仁书院等校的学生还发起成立全港学生联合会，草拟章程，投入斗争。香港社会其他各阶层同胞也纷纷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居住在湾仔一带的市民群众，蜂拥到日本商店前示威，高呼"还我青岛"、"废除不平等条约"、"保我国权"等口号。有的群众投掷石头砸毁橱窗。商人们也在华商总会集会，决议提倡国货。永安、先施、大新、真光等一些大百货公司，声称日后要多采办一些国货，并欢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检查有无"仇货"。香港的市民、家庭妇女也都拒绝使用日货，甚至把屋内陈设的日产镜画、磁器等一律撤出，拒绝使用日产中华猴唛火柴。一时间阴丹士林及爱国布等国货十分畅销。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博得内地人民的高度赞赏，当年广东《大同日报》曾这样评论：香港同胞"在外人主治之下，犹能乃心祖国，力挽狂澜，使国内之凉血物闻之，能不愧死耶？"

面对香港同胞高昂的反帝爱国情绪，港英当局极为惊慌，他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命令所有警察一律取消休假，对日侨及商店严

加保护。华民政务司还通知《循环日报》、《华字时报》等中文报纸，要求新闻报道要“慎重公平”，不准宣传反日爱国、妨碍治安，不准提“帝国主义”等词语。而日本方面也派出了“长门”、“陆奥”、“扶桑”三艘巨型战舰，停泊在鲤鱼门外，炮口直对香港。驻港日本领事还照会香港教育司，要求各汉文学校禁止使用上海会文堂出版的《初等论说文范》这一课本，理由是该课本有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内容，有碍英日邦交。港英政府立即照办，对各校和书店进行严格检查。

“五四”运动对香港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反帝反封建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社会的面貌和风气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许多爱国学生节衣缩食，在西营盘及荷李活道等地捐资创办了“策群夜义学”，免费教育贫苦儿童。和内地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在香港蓬勃兴起，荷李活道有一家专门经营新文化书籍的“萃文书坊”，虽屡遭警察查禁干涉，但生意仍十分兴旺；新书一到，读者闻风而至，抢购一空。很多青年抛弃了晚清遗留下来的“大衿衫、腊肠裤、扎裤脚”旧装束，改穿西式服装或中山装。青年们还提倡体育，组织“南华体育会”，练就一支足球队，常与外国人比赛，振奋民族精神。还在“七姊妹”地方设立泳棚，男女均可参加，开了男女平等的先声。“五四”运动后，港英当局为了继续维持其殖民统治，虽与一部分守旧商绅一起，鼓吹尊孔读经，提倡封建礼教，但历史车轮是无法逆转的。

八、汹涌澎湃的省港工潮

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香港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提高，他们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纷纷组织工会，到了 1921 年香港已有工会 125 个。二十年代以后，香港工人运动蓬勃兴起，成了这一时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斗争的主流。1920 年 4 月，香港 5

千名机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任意开除工人。随后，还陆续发生了一系列海员、船坞工人、电车工人、木工、泥水工以及家具工人的罢工。这几次罢工规模虽然不大，但预示着香港工人运动的高潮即将来临。

1922 年春，香港海员工人举行长达 8 个星期的大罢工，揭开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海员工人与其他产业工人一样，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香港海员工人在船上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分三行，即舱底行，包括烧水、打磨、斟油等；柜面行，包括水手、舵手、木工、油漆等；船尾行，包括侍役等，都是船上最繁重、最下贱的工作。而船厂、大副等高级职位，外国轮船公司规定不准华人担任。海员工人的劳动条件异常恶劣，劳动时间很长，稍不留心还要遭到监工们的拳打脚踢。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往往五六人甚至十余人挤在一间小房内，船上的伙食分为几等，海员工人只能吃最差一等，还经常吃不饱。海员工人的工资收入十分微薄，每月仅二三十元，仅及外国同等工种海员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收入如此微薄，却还要受到封建包工制的盘剥。外国轮船资本家还利用封建帮派之间的不团结，不同籍贯之间的生活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进行挑拨离间，分裂海员工人的团结，从而达到进一步控制海员的目的。海员工人的人身自由是没有保障的，当轮船经过欧美各国港口时，竟不准上岸，偶尔准许上岸，也要进行侮辱人格的所谓验肛门、通喉咙等检验。海员工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遇有生病或工伤，不但得不到治疗，反而有被开除的危险。在航行途中，船主往往以避免传染为理由，惨无人道地将患病的海员丢进海中。海员工人还时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倘若失业，生计全无，那就更惨了。香港海员有“鸭仔鬼”之称，他们辛酸地唱道：“鸭仔鬼、鸭仔鬼，落水生、离水死……”意思是海员落水（下船干活）尚有生存机会，如果离水（失业上岸）就是死路一条。

香港海员工人悲惨境遇，比其他行业工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他们的反抗斗争也是最坚决最彻底。在“五四”运动和世界革命潮流的推动下，海员工人的觉悟不断提高。1920 年经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的宣传和组织，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会筹备会”，在孙中山的赞助下，1921 年 3 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简称“海员工会”）正式成立，开始领导海员工人进行斗争。1921 年 9 月，海员工会向各轮船公司提出 3 条要求：1. 加工资；2. 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3. 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条件提出后，轮船资本家却不予理睬。11 月，海员工会再次提出要求，就在此时，外国海员增加了 15%的工资，而香港海员的要求却又遭拒绝。1922 年 1 月 12 日，当海员工会第三次提出要求而再遭拒绝后，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了。海员工会发表了罢工宣言，指出罢工斗争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工会的名誉，更关系到几万海员工人的人格和前途，因此全体海员必须同心协力，勇敢斗争，争取最后胜利。为了保证罢工顺利进行，海员工会还公布了停工规则，规定罢工后海员返回广州的旅费及食宿均由工会负责；停工后未经工会许可不得私自复工；罢工结束后，由工会负责解决复职问题。

罢工爆发后，所有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梧州、澳门等地的轮船，以及从外国港口开到香港的英、法、美、日、荷等国的轮船，全部息火停车。海员工人纷纷离港回广州，到 1 月底，陆续回到广州的海员约有 1 万人以上。广州各阶层人民热烈支持和援助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广州各工会和一些团体积极协助安置罢工海员。罢工总指挥部——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不久也在广州西濠口附近成立，并在香港设立分办事处。负责办理各项具体事务，保证罢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在海员罢工的推动下，香港海陆理货员工会、同德工会、集贤工会以及煤炭工人也举行罢工。大罢工不仅对香港，而且对英国本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英政府急电港督，令其迅速解决罢工问题。2

月1日，港英政府竟以“海员工会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为借口，派出武装警察100多人，封闭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拆去了工会的牌子，接着又搜查了集贤工会、同德工会和海陆理货员工会等，拘捕了一些工会办事人员。2月9日，中共广东支部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书》，明确指出：“本党以海员同志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全力，为之后援。”并号召海员工人提高警惕，严守秩序，团结一致，坚持到底。极大地鼓舞了罢工海员的斗争意志。港英当局在对罢工实行高压政策失败后，又施一计，随即派人到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地招募工人，当时的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领导工运的机关）获此消息后，便发动工人进行阻扰，挫败了港英当局的阴谋。港英当局只好派人出面调停，先后派了华商总会、基督教青年会、中国航业公司、东华医院以及上海银行、渣甸洋行、保险公司等外国商人的代表出面调停，由于港英当局无诚意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调停也归失败。

3月1日，香港举行全市工人同情总罢工，参加罢工的各行各业工人达10多万人。与此同时，广州、上海、天津、汕头等地的工人以及京汉、京奉、陇海、正太等铁路工人也举行集会，发表通电，声援海员罢工。海员工会还动员10多万罢工工人离港返穗。3月4日，当一批罢工工人徒步从香港回广州途经九龙沙田时，遭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亡4人（后来因伤势过重又死亡2人），伤数百人，造成了“沙田惨案”。惨案发生后，激起工人们更大的愤怒，香港局势更趋严重。港英当局无计可施，只好请求广东革命政府出面调停，最后在当时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总商会的调停下，于3月5日双方达成协议。香港当局同意海员工会提出的条件，增加工资一成半至三成，取消封闭海员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沙田惨案死者每人1000元等。

罢工胜利的喜讯传出之后，群情振奋，欢欣鼓舞。3月6日当港英当局送回海员工会牌子，并由全港教会最高之牧师——会督，

亲自将牌子挂回原处之时，数千工人群众振臂高呼，“工人万岁”、“海员工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空，与震耳的鞭炮声汇集一起，震撼着整个香港。3月8日，广东各界群众数十万人在东校场隆重集会，欢送香港罢工工人胜利返港，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大游行。这样，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胜利宣告结束，它标志着香港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号召收回租界，结果被英国巡捕抓走100多人。随后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巡捕房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英国巡捕竟然开枪屠杀，造成了死伤群众数十人的“五卅”惨案。引爆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

“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香港后，香港同胞反帝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当时香港的工会分为三派，一是以海员工会和手工业工会为主的工团总会派；二是以电车工会及部分手工业工会为主的华工总会派；三是包括机器、煤炭等20多个工会的无所属派。这几派工会平时互不联系，甚至还有对立情绪。6月上旬，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先后派邓中夏、杨殷等10多名党团员到香港和香港党团组织共同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引导香港各工会以民族大义为重，求同存异，团结对外。6月中旬，举行了全港工团联席会议，通过了“罢工宣言”和“罢工要求”，正式成立罢工统一指挥机关——香港工团联合会。香港工人同胞在罢工宣言中悲愤地说：“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罢工前夕，工团联合会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6项要求。这些要求已经超出了工人阶级本身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全港同胞共同的

利益。

港英当局对罢工工人的正当要求，根本不予考虑，反而宣布紧急戒严，并调集大批英印军警进入市区。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当天晚上，在苏兆征等人领导下，香港海员工人率先行动，电车工会在何耀全等带领下也开始罢工。接着其他各行业的工人相继而起，商人也开始罢市。6月21日皇仁书院的500余学生举行罢课，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相继罢课。广大香港同胞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心理，纷纷乘车搭船返回广州。6月23日，广州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和省港罢工工人共10万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当时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等亲自带领群众参加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驻在对岸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用机枪向游行人群扫射，当场打死52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香港原来一些还在观望的工人，也纷纷加入罢工队伍，这样，前后共有约25万人参加罢工。为了统一领导罢工行动，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于7月3日在广州成立。苏兆征任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任副委员长，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等人先后被聘为顾问。广东革命政府对省港罢工予以大力支持，宣布对香港进行封锁，不再给香港提供食物。罢工委员会还组织了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协同群众维持秩序，负责封锁香港、沙面，查禁外流粮食、食品和走私物资。接着又实行单独对英封锁政策。省港大罢工和对香港的封锁，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港英政府的财政经济遭到重大损失。在商业方面，自罢工后至12月底，香港各大中商行、商店破产关门达3千多家，繁华的中环商业区，停业者十居其五。在外贸方面，香港原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的一个进出口口岸，每年进出口货价值1356万镑，约合中国银15亿元。罢工后，平均每天损失400万元，入口税锐减一半，到港的船只和货量都大大减少。在金融业方面，由于人们大量离港，存款断绝，提款突增，造成挤提现象。罢工使各行各

业陷于瘫痪，银行的投资置业也丧失机会。从6月罢工后至10月中旬，汇丰银行股票价值由1290元跌到1140元，减少15%。其他银行也同样遭到严重损失。在地产业方面，大罢工后，香港地价一落千丈，居住区下跌三分之二，商业区下跌三分之一。新建的楼房，几乎十室九空，房租也下跌了50%左右。此外，由于封锁，香港的日常生活用品奇缺，肉类蔬菜几乎断绝，物价上涨5倍。公共卫生事业也陷于瘫痪，垃圾粪便堆积如山。香港成了“死港”、“臭港”。

港英政府对省港大罢工十分仇视，曾于7月27日，召开所谓公民大会，以大会名义致电英国政府，要求出兵广州，驱逐“过激党”。8月15日，再次召开公民大会，致电英皇和首相，力陈出兵广州才是解救香港的最佳办法。由于当时英国国内也发生罢工，英政府自顾不暇，所以回复说：“香港困苦，伦敦至深系念，惟统观全局，现时无法出兵。”只答应借款300万英镑，作为救济商业之用。在实施种种手段都无法奏效之后，港英政府只好派代表与广东革命政府进行谈判。

这时，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国民政府开始了北伐战争，为了减少帝国主义扰乱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后顾之忧，1926年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主动宣布结束罢工。这次大罢工坚持了1年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罢工，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使香港同胞受到一次深刻的民族主义教育，民族的自信心大为增强。大罢工使港英当局认识到，如果排斥占人口总数98%以上的华人，香港政局不可能稳定，经济也不可能繁荣。后来，港英当局才在统治政策上进行了一些调整。

九、港九大队的抗日斗争

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港九地区始终活跃着一支敌后抗日游击队伍，它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前夕，活跃在惠阳、东莞、宝安的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将日军沿广九线集结情况、部队番号、部署等情报通知港英当局，并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原则出发，提出与英军合作的建议。当时驻港英军司令接受这一建议，派代表与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联系，要求游击队协助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游击队还与港英当局达成协议，拟派一个团的兵力协助防守香港，由港方负责提供这个团的武器装备。由于港英政府担心中共部队进入香港，使战后问题复杂化，所以港督杨慕琦一直拖延不肯批准这个协议，致使此事不了了之。

香港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攻占九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曾鸿文等人率一批人员随日军之后进入新界。进入新界后，他们很快与当地的抗日组织取得联系，收集了英军溃败时扔掉的武器弹药以武装自己的队伍，消灭了趁英军溃退之机进行打家劫舍的土匪，打击了一些敌伪汉奸，维护了社会治安，扩大了影响。随后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号召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斗争，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站稳了脚跟，为开展港九地区游击战打下基础。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们节节胜利之际，游击队已将一把锋利的尖刀，悄悄地插入他们的心脏。

局面打开以后，进入港九的游击队合并成港九大队。1943 年 12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奉命成立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是东江纵队所属 5 个大队之一，因所处环境特殊，改称为港九独立大队。大队以下分区设立中队，所属中队人数三四十人至上百人不等，全大队人数最多时达五六百人。各中队之间，既有分工作战，又有配合行动，灵活机动。他们以新界大雾山为根据地，还开辟了一条从青山经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从西贡进入沙鱼涌的海上交通线，在港九同胞的支持下，在敌后四处出击，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不得安宁。

1943 年 11 月，港九大队在沙头角袭击了作恶多端的汉奸、伪

区长温二和大埔宪兵队翻译官林老虎，在上水打死了日军宪兵军曹、特务头目小贞。1944年春，日军出动了数千人兵力对新界、九龙等地的港九大队进行大扫荡，游击队化整为零，潜伏隐蔽，使敌人一无所获。为粉碎敌人的扫荡，游击队的刘黑仔和黄冠芳率队员潜入启德机场，炸毁了油库和飞机，迫使敌人停止扫荡。当敌扫荡主力撤走之后，游击队又四处出击，仅大澳一处就全歼敌派出所之敌，俘敌30余名。1944年4月，游击队还炸毁了九龙市中心亚皆老街的铁路桥；1944年秋，游击队袭击了青山矿场；1945年春，袭击了新田农场敌军驻地，打得日军晕头转向。

活跃在大亚湾至汕尾港一带的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大华队，于1944年8月13日袭击沙头角，击沉敌"海上挺进队"船只3艘；1945年在沙湾截击敌军，缴获敌船2艘及大量军需用品。以后又陆续缴获敌船8艘，毙敌65人，俘敌63人。

港九大队短枪队的刘黑仔是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式人物。他率领游击队员自1941年冬进入港九作战以来，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常常化装成各种人物，深入敌心脏地区，突袭敌人。1944年2月，他们营救了遇险的美国第14航空队的克尔中尉。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高级特务东条战之大佐到介咸矿山视察，刘黑仔接到情报后，率短枪队埋伏于敌人必经之路上，伏击并活捉了东条战之和随从的日本士兵。1944年，为了破坏日军打通广九线的计划，刘黑仔率8名队员扮成装煤工人，攻打了广九铁路沙田四号隧道，消灭了敌人一个哨所。还有一次，他以一颗手榴弹，消灭一个排的敌人，救出被敌人追捕的7名学生。

港九大队还干了一件抗战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就是著名的营救被困在香港的800余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离港。香港沦陷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反共倒退政策，内地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先后来到香港，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活跃。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张铁生主

编的《世界知识》、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报纸《华商报》等爱国进步刊物纷纷出版，还创办了不少的通讯社，文艺工作者演出进步话剧，演唱抗日救亡歌曲。他们在大力呼吁全国人民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以挽救民族的危亡。

1941 年 12 月，日军进攻香港，由于英军仓促败降，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来不及撤走而被围困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封锁交通、清查人口、搜捕抗日分子，这批人士处境十分危急。为了营救这批我国文化精英，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急电，指示中共南方工委，动员一切力量，组织营救工作。当时南方工委的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以及粤南省委的梁广、连贯等同志都在香港工作，在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召集广东地下党和游击队负责人开会。会上分析了形势，决定趁日军立足未定，各方面控制还不严密时，把这批营救对象转移到大后方。会上还研究了营救方案和具体安排，营救指挥部很快就在湾仔骆克道建立起来。

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这批文化名人几经转移搬家，很难与他们联系。游击队员们先是利用各种关系和线索与每个营救对象接上关系，然后分批将这批人士从港岛偷渡到九龙的秘密据点，最后在游击队的周密安排下，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避开敌伪的监视，开始分批向内地转移。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元老等从九龙西贡到东莞上洞，再由游击队护送到坪山，再从淡水乘船到惠州。其他大部分文化名人则走宝安线，日军遣送大批难民回内地的行动，也给营救工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于是，这批文化名人和护送的游击队员扮成难民，从荃湾经元朗，与难民一起通过封锁线，到达白石龙抗日根据地，然后渡过东江，转移到内地。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在转移时舍不得丢下自己珍爱的 4 大箱字画。于是，游击队员们设法将这些字画装进一副棺材中，装扮成送葬队伍，身披孝服，哭哭啼啼、吹吹打打，骗过日军的岗哨，终于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这次惊心动魄的营救活动，前后经过3个多月时间，共营救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回到大后方，使我国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免遭日军的迫害。其中有许多是国内外知名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戈宝权、张友渔、胡愈之、胡风、黎澍、胡绳、千家驹、廖沫沙、于伶、章泯等人。这批人士回到后方后，为我国的抗日民主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港九大队营救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除了营救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港九大队还发扬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营救了许多被日军囚禁的国际友人和遇险的盟军战友。日军迅速攻占香港，许多英籍军政人员来不及撤走而被俘虏，他们多被囚禁于集中营中，过着悲惨的俘虏生活。1942年1月，英军上校赖特从深水埗集中营逃脱至九龙西贡附近，他们对九龙新界一带地形不熟悉，是港九大队安排他们乘船经平洲转入内地。2月，苏格兰士兵霍斯等逃出后，被港九大队所救，留在游击队内达6个星期，他们还帮助训练游击队员们使用新式武器。赖特得救后，向英国防部建议将英军服务团(BAAG)总部设在广西桂林，主要任务是营救集中营战俘。7月，在惠州成立了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该办事处还派人与港九大队联系，协商在游击区建立英方联络站，以便进行搜集情报、营救被俘人员、运输医药入集中营等事。在港九大队与英军服务团的成功合作下，使一大批被俘的英方人员和其他国际友人逃脱日军的魔爪。当时，一些英国人就认为，与共产党合作比与国民党合作更有利。当年被营救脱险的赖特上校，战后曾任香港大学副校长。他逝世后，其儿子将他所保留的大量资料整理编成《1942—1945年抗战期间的英军服务团》一书。书中就高度赞扬了港九大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力营救国际友人的行为。

1944年，盟军在各个战场开始转入反攻，香港的日军也经常遭到盟军飞机的轰炸。2月11日，美国第14航空队中尉克尔在轰

炸启德机场时，被日机击落。当克尔跳伞时，被港九大队刘黑仔的短枪队从虎口之下营救脱险。经过精心护理，最后将他安全送到内地。克尔十分感动，曾撰文赞扬港九大队的正义行动，还称刘黑仔是他再生父母。类似克尔这样被营救的美国飞行员共有 8 名。

日本投降后，东纵港九独立大队完成了历史使命，奉命撤出香港。1945 年 9 月 28 日，港九大队发表一份撤出香港的公开宣言。宣言中充满了对香港同胞深深眷恋和对战斗过土地的深厚感情。港九各界群众依依不舍，举行盛大联欢会，欢送港九大队。后来，当地群众在乌蛟腾村为港九大队立一座纪念碑，上书“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

历史充分表明，香港人民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光荣传统，香港人民的爱国斗争，是同全中国人民百年来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斗争，才赢来了中华民族今天伟大的胜利。

第七章　独特的政制架构——香港政治制度透视

香港的政治制度是按照英国殖民地的统治架构建立起来的，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现行的政制是在早期殖民地政治制度基础上逐步演变而成的。在这种演变中，原有些不合理的政制得到了改进，形成了香港独特的地方行政制度，并在推动香港的繁荣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英皇制诰》和香港殖民统治架构的建立

1843 年 4 月 5 日，维多利亚女皇签署了《香港宪章》，并以《英

皇制诰》的名义发布，正式批准成立香港殖民地，宣布以女王委任的总督为最高军政长官。同时颁布皇家委任状，委任璞鼎查为首任香港总督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翌日，即1843年4月6日，英国战争及殖民地大臣施坦利致函璞鼎查（被称为《致璞鼎查训令》，也称《皇室训令》），命令他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指示组织香港政府，并授于港督制定香港法律的权力。1843年6月26日，璞鼎查派军舰将清廷官吏耆英从广州接到香港，举行中英《南京条约》换文仪式，完成了割占香港的手续。换约结束后，璞鼎查宣读《英皇制诰》，并宣布就任香港总督。同一天，他还正式任命了一批重要官员。所以，香港的政制架构就是按《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这两个文件的规定建立起来的。

1843年的《英皇制诰》是香港殖民地政制宪法的蓝本，它以大英帝国女王的名义，颁布了香港殖民政府组织的基本法则。其主要内容是设立香港总督职位，组建立法局制定法律条例，另组建行政局辅助总督执掌政务。一切政务得由总督全权决定，所有官员必须服从总督。同时规定，香港殖民地的最终权力归于英皇室和英国政府。

《皇室训令》是执行《英皇制诰》的细则规定，主要内容是对行政、立法两局的构成与运作，议员的任免以及港督在两局中所享有的基本权力，作了具体的规定。

这两个具有宪制性的文件贯穿着香港主权属于英国和维护英国在港各项权益的殖民主义原则。100多年来，根据这两个文件建立起来的香港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特别是香港问题的最终决定权集中于英国，港督在行政、立法两局的特别权力，以及委任议员制度等原则性问题，一直维持不变。但由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香港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也随之有所调整。

二、港督与行政局、立法局

港督是香港政府的首脑，代表英王行使香港的治理权。他名义上是由英王任命，实际上是由英国内阁决定的。1968 年以前，港督由殖民地事务部任命，之后，改由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委任，并受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的实际领导。港督的任命权来自伦敦，而不是由香港居民选举产生，所以港督的身分并不是香港民意的代表，而是英国在香港统治的代表和象征。港督的任期通常为 5 年。在任期满后还可以连任。第二十二和二十五任港督任期最长，他们在任都是 10 年零 6 个月。在 150 年的历史进程中，从第一位港督璞鼎查到现任港督彭定康，前后共有 28 位香港总督。

根据《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以及英国政府的授权，港督被授予广泛的统治权力：负责组织行政局和立法局，委任两局议员，担任两局的当然主席，香港的一切政策都由港督会同行政局制定；组织立法局制定香港的法律和法例；有权批准土地的转让；有权委任法官、太平绅士和其他政府官员，以及对某些官员的停职或开除处理；有权赦免罪犯或宣布缓刑；所有政府官员都要服从港督。此外，还兼任英国驻港三军总司令。总之，港督作为统辖香港的最高权力代表，是集行政和立法大权于一身，实际上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独裁体制，所以曾经担任过香港总督的葛量洪在其回忆录中说到：在皇家的殖民地中，总督的地位仅次于上帝。一位英国学者也曾说到："港督的法定权力达到这种程度，如果他愿意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力的话，他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小小的独裁者。"

当然，港督的权力并非不受任何限制，他的权力是地区性的，整个权力和活动要受到英国政府的监督制约。英国政府在人事任命、立法范围、政策审批、对外事务和防务问题等方面，对他的权力加以控制。如总督任命官员必须得到英国政府认可；英国政府有权

否定、删改香港法例；甚至可以代香港立法。港督应向英国政府汇报工作，重大问题必须向英国政府请示。香港对外关系也由英国政府直接负责，港督的外交权仅限于以地区身分进行贸易谈判，制定经济协作关系。此外，香港的公务员制度和社会舆论，对港督行使权力时也会有一些有限的监督作用。

大英帝国各直辖殖民地通常设有辅助总督的行政局和立法局，香港也是如此。

行政局，旧译议政局，是协助港督进行决策的最高咨询机构，它并不是行政管理机构。1844 年行政局开始进行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就香港各项重大决策向港督提供咨询意见，并负责审核交立法局的立法草案。行政局通常每周举行一次会议，会议内容是保密的，禁止旁听，会议记录要在 30 年后才会公开。港督作为当然主席主持行政局会议，其成员由三部分议员组成：当然官守议员，包括驻港英军司令，布政司、律政司和财政司；官守议员，指在港府中担任公务员的议员；非官守议员，指非政府雇员的议员。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均以委任形式产生，所以又称为委任议员。委任议员一般由港督挑选、提名、报告伦敦，经英国国务大臣批准。1896 年以前，行政局的成员全都是官守议员，一切唯港督命令是听。1896 年英国政府同意港督罗便臣的意见，指定两名英国富商为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此状况一直持续到 1926 年，才有首位华人周寿臣被委任为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周寿臣是香港豪门出身，早年留学美国，曾在中国内地做过官。此后，随着香港华人社会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华人议员才有所增加。

立法局，旧译定例局。是协助港督制订法律的最高咨询机构。立法局的职能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讨论、通过行政局提出的法律议案，制定法律；其二，控制、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其三，对政府的政策以及民间关注事务进行质询、辩论。根据《英皇制诰》规定，立法权属于港督，立法局在具体执行立法职权时，必须会同总督一

起进行。港督对法律的制定有决定性作用，立法局通过的法案，必须经总督同意才能推行。总督还有权解散立法局。可见，香港立法局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立法机关。立法局除每年 8、9 月休会外，每两周举行一次公开会议。

立法局与行政局同时成立，最初是由港督、英军司令和首席裁判司 3 人组成，与行政局实际上是一个班子，两块招牌；通过法律时，唯港督之命是从。以后，立法局议员人数有所增加。1850 年 6 月，怡和洋行股东大卫·查顿和哲美森洋行老板埃杰尔出任立法局议员，标志着香港立法局设立非官守议员的开始。早期立法局议员都是英国人，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长期被排斥在立法局之外。到了 19 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华商从 1878 年起提出了参政的要求，他们上书给港督说，香港“中国居民人数超过外国人的 10 倍，纳税的金额也远远超过外国人，因此，若不准中国人参与管理本殖民地的公共事务，这是不公平的”。港督轩尼诗审时度势，建议在非官守议员席位中增加一名华人，并推荐律师伍廷芳出任此职。于是伍廷芳于 1880 年 2 月就职，他是立法局第一个华人非官守议员，深得香港华人社会的拥护。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立法局人数大为增加，1988 年到 1991 年初增至 57 人。计有担任主席的港督，3 名当然官守议员（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港督委任的 7 名官守议员和 20 名非官守议员，还有 26 名选举产生的议员。

1985 年 9 月以前，立法局议员的组成与行政局基本相同，包括当然官守议员，委任官守议员和委任非官守议员。1985 年 9 月 26 日，香港举行首次立法局选举，由 9 个功能组别和 12 个选举团选出 24 名议员进入立法局。每个功能组别各代表一种职业或专业团体，选举团则是由区议会、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的成员组成。在正常情况下，每 3 年举行一次选举。如果立法局被解散，所有经选举产生的议员，都将另行选举产生。

此外，香港立法局还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任何由立法局通过、港督批准的香港法律，英国都有权否决，也可以代香港立法。

三、香港的行政系统和公务员制度

香港行政系统主要由布政司署和各政府部门机构组成。布政司署是港府的核心机构和指挥中枢，其首长是布政司。布政司是港督的首席政策顾问，亦是公务员首长，全权指挥和监督各部门的工作。布政司长官地位仅次于港督，当港督不在香港期间，代行港督职责，即所谓的“署理港督”。布政司署下设科，负责统筹制定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各科首长称某某司。1990年8月1日为止，布政司署内共设有14个科，由布政司和财政司分工领导。由布政司领导的科有：公务员事务科（原名铨叙科）、宪制事务科、政务总署、规划环境地政科、文康广播科、保安科、卫生福利科、运输科、教育及人力统筹科。由财政司领导的科有：财政科、金融事务科、经济科、工商科、工务科。

港英政府其他部门的机构称署或处，首长是署长或处长，目前共设有64个部门。这些部门的行政执行权力，直接管辖至整个香港的各个地区。其中除了廉政公署、核数署、行政事务申诉公署是直接向港督负责外，所有这些部门按执行政策的范围与布政司署各科相对应，部门首长向相应各科首长负责。但在一般情况下，布政司署各科不直接领导相应的这些政府部门机构，对这些部门的行政事务不负领导责任，仅负责统筹制定政府及各部门的政策，并从政策的高度对这些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加以指导和规范。

香港的公务员制度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英国占领香港后，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和保证英国的殖民利益，在公务员制度建立的初期，充分体现了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和种族歧视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制定建立公务员制度的法律依据是所谓“宪制

性文件”的《英皇制诰》、《皇室训令》和《殖民地规例》；其人选多为有殖民地工作经历和经验的英国殖民地部的官员；全体公务员必须效忠英国王室；港英政府机构中的各主要公职，长期为英人所把持，华人无法参与。此外，这一时期对香港公务员制度本身也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和协商机制，导致政府机构内部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贪污受贿成风，行政效率低下等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不得不调整对香港的统治方式。表现在公务员制度方面，就是推行本地化政策和将协商机制引入政府内部。所谓本地化政策就是尽量招聘香港本地人担任政府的各种职务。1952年，港英政府曾任命华人担任医务卫生处长之职，这是华人首次担任政府部门的首长。六十年代以后，港英政府逐步扩大本地人在公务员队伍中的比例，选拔一些华人担任行政官员和专业官员。1960年，首长级职位中，本地人所占比例仅为 9.7%，1983 年就升至 49%；1960 年政务官级职位中，本地人所占比例为 9.7%，1980 年也升为 49%。但是，港英政府推行本地化政策是有限的，主要在中下层推行。港府仍然保留由外籍人士担任政务职系和警务职系中重要高级职位的惯例，以保证对主要部门的控制。

将协商机制引入政府内部是“二战”后公务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战前香港公务员的薪俸和服务条件的政策和规定，完全由港府内部决定。经过广大公务员和公务员工会的长期斗争，1968 年，港府终于和 3 个主要公务员工会协议，宣布在改变有关公务员薪俸以及服务政策前要同工会进行协商。1982 年港府又和代表中下层公务员利益和要求的工会共同建立了第一标准薪级公务员评议会，确立了工会的咨询和协商地位。

1972 年，港英政府委托从事管理研究和咨询的“麦健时管理顾问公司”对香港政府机构和公务员制度进行全面的检讨。1973 年 5 月，麦健时公司向立法局提出一份报告书，时称《麦健时建议

书》,建议进行一系列改革。如设置专门的公务员管理机构——铨叙科,成为具有管理人员编制、员工薪俸及服务条例、招聘与任用、人员培训等功能的专门的公务员管理机构;加强公务员的业务培训。1982 年 3 月,港府成立了公务员培训中心,以统筹和指导公务员的业务培训。至此,香港的公务员制度趋于法制化和系统化。

一般说来,香港公务员制度是英国文官制度的海外延伸。英国的文官原仅指在内政和外交各行政部门中工作的人员,但因殖民统治的需要,香港公务员的范围要比英国文官宽得多,它包括政府机构内部上至总督、布政司,下至清洁工在内的所有在港公职人员,以及在行政机构以外的一些政府法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香港政府的政务官均由委任产生并常年任职,也属于公务员范畴。

香港公务员一般分为两大类,即一般性公务员和专业性公务员。一般性公务员包括文秘人员、后勤人员、行政主任和政务主任等在各政府部门从事一般性工作的人员。他们可以在政府各部门流动。专业性公务员包括警察、教师、医生、护士、建筑师、律师等有特殊技能的人员。他们一般只在本专业的部门工作,较少流动。

香港公务员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管理事务增多而不断发展。七十年代初,香港公务员还不足 3 万个职位,到了 1991 至 1992 年度,已达 202985 个职位。其中首长级公务员仅 1219 名(共 8 个职级),占 0.65%;高级管理和专业人员 2639 名,占 1.4%。本地雇员占 98.7%;海外雇员占 1.3%,但海外雇员大多身居要职,其中首长级 491 名,高级管理和专业人员 681 人。全港公务员中,女性约占 31.5%,40 岁以下的公务员占 68.7%。

公务员事务科原名铨叙科,是主管公务员各项事务的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科的首长为公务员事务司,另设有 3 名副公务员事务司。目前该科共有 400 余人。该科成立于 1973 年,是麦健时公司改革时的产物。公务员事务科的主要职责是,为港府各行政机构提供所需人才,制定薪俸政策及服务条件,以稳定公务员队伍;通过

良性的管理机制和科学的管理手段，为全体公务员的发展创造条件，并维持高水平的管理，保持公务员的士气、表现和纪律。公务员事务科的内部机构，依据该科的职责范围而分为 3 个组：委任组，薪俸及服务条例组，人事管理组。

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和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则是香港公务员的人事咨询机构。公务员叙用委员会成立于 1950 年，是独立于港府的法律咨询组织，负责就较高级别公务员的聘用和提升事宜，向港督提供意见。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委会，成立于 1979 年 1 月，其成员来自私营机构，多为社会人士。港府在制定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时，会依据该常委会所提的意见。

香港公务员制度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各种管理机制逐步趋于完善。

考任制度是公务员招聘录用的基本途径。其原则是公平竞争、量才录用、工酬相称。招聘程序是：确定职位空缺，刊登招聘广告，面试与笔试遴选，报主管部门审批，建议正式录用，其过程一般需 9 个月时间，聘用后还要有 2 至 3 年的试用期。

培训制度是提高公务员素质的主要办法。每个公务员从入聘伊始，就会获得一系列由浅入深的训练，每次训练时间多则 3 月，少则一两天。目的是使所有雇员都能应付各部门工作的需要；适应现代不断转变的环境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筹划本身事业上的发展。港府的培训机构是公务员训练处，高级公务员课程中心以及各部门的训练机构。

薪俸制度和保障制度是稳定公务员队伍的主要因素。港府订立公务员薪俸的原则，是通过与私营机构相近职务雇员的薪俸公平地比较，订立一个可接受的薪酬水平，借以吸引、挽留人员。福利是薪酬的一部分，公务员因职级不同而享有不同的福利待遇。房屋福利是最大宗的福利，其种类有：提供员工宿舍，自行租屋津贴，自置居所资助计划，贷款买楼计划，居所资助计划等。此外，各种名目

的津贴也是薪俸的组成部分。保障制度包括职业保障，健康保障以及退休保障等。

考绩、奖励和晋升制度是激励公务员努力工作的有效措施，通过严格的考察公务员的工作成效，评估其能力和表现，为奖励、晋升提供依据。港府对于工作表现良好的公务员采取一系列奖励形式：在考绩报告，服务证书中作出评语、评分以示褒奖；延长或重订合约是对合约公务员的奖励形式；发放酬金，授予奖章和勋章；晋升职务则是最有效也是最主要的奖励形式。

监督制度是确保公务员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必要手段。《公务员规例》是港府人事管理的基本规则，它规定了公务员的基本义务：遵守纪律、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公务员事务科制定的《公务员良好行为指南》是公务员行为作风的准则。违反这些规则，将受到纪律处分、罚款、降级或解雇。

港府还依靠廉政公署对行政机构公务员的贪污受贿行为进行监督和调查处理。为加强监督政府机构的行政行为，港府专门设立了行政事务申诉专员公署。申诉专员有权调查任何由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转达的市民对政府部门处理行政不当的投诉。

此外，香港公务员也可以通过工会监督政府人事管理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监督。

有些香港人说："香港公务员制度是英国殖民地传统与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混血儿。"这种说法似有一定根据。因为香港公务员制度，确是英国文官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以及香港社会特点等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它自成体系，独具特色，且富有效果。

四、肃贪倡廉的独特机构——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全称"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是一个专事肃贪倡

廉的独立机构，成立于 1974 年 2 月，是当时在任港督麦理浩推行的一项“新政”。

香港的贪污受贿问题源远流长。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走私巢穴和贮存、转运中心，港英政府的不少官员利用这种机会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可以说这是众所周知之事。香港在英国早期的殖民统治下，政治制度不民主，社会极不平等，以华人为主的香港人民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无缘参与政治和监督政府，也不了解政府各部门的运作情况，在与官府打交道时，只得花钱送礼或通过中人以打通关节。这样就为有关人员提供很多贪污受贿的机会。所以，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香港的贪污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1897 年 6 月 21 日，香港警方破获一起主犯勾结警察私开赌馆的大案，结果 100 多名警察、官员因受贿而被革职。由于这一大案轰动了全香港，香港政府才于 1898 年 2 月 28 日公布了第 3 号法例《贿赂轻刑治罪条例》。进入 20 世纪，香港官员的贪污现象仍然极为严重。到了六十年代，港府曾在警务处下设反贪污部，但警务部门恰恰是贪污受贿最为严重的部门。七十年代被揭露出来的、贪污数百万港元的洋贪官韩德，在其回忆录中毫不隐晦地说：“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警察都贪污，‘收规’是生活中的一环，就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那样自然。”所以，设在警务处的反贪机构形同虚设，收效甚微，以致民众意见纷纷，港英政府的信誉和香港的国际形象亦受到影响。麦理浩就任港督后，决心以肃贪倡廉、整顿警风作为施政重点。1971 年出台了新的《防止贿赂法案》，其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政府雇员所支配的财富或财产上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不相称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的解释，否则即属违法。1973 年，警署发现总警司葛柏（英人）的财产在 400 万港元以上，约为他 26 年薪金总和的 6 倍，要他作出解释，但葛柏却在接受调查时潜回英国。港督麦理浩委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研究该事件，并检讨当时

反贪污法例的成效问题。与此同时，香港市民对政府打击贪污不力而深感不满，于是掀起了“反贪污、抓葛柏”的群众运动。为了平息民愤，稳定社会，麦理浩听取了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意见，于1973年10月17日的立法局会议上宣布，将负责反贪的责任由警务处移交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承担。1974年2月15日，廉政公署正式成立。1975年葛柏被引渡回香港受审，判处监禁4年。1977年，廉政公署又处理了尖沙嘴警署集体受贿大案，22名警官被起诉，其中有10人被判刑。由于廉政公署对警务人员的贪污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使其名声大振，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威望。

廉政公署不受任何政府部门管辖，直属于港督，其首长廉政专员直接向港督述职，只有港督一人有权向廉政公署发号施令。而廉政公署则可以追查除港督以外的任何官员，其权力是非常大的。从第一任专员姬达开始，历任廉政专员都是港英资历很深的高级官员。在编制上，廉政公署保持其独立性，从专员到各级人员都不属行政公务员系列，不受有关公务员条例的约束。他们通常以合约的方式招聘人员，合约期为两年半，期满可续约。也有部分人员是从政府其他部门借调的，期满可回原单位。1989年廉政公署在编人员为1257人。它不仅挑选人员标准很高，而且内部纪律也非常严格。一旦发现其职员品行有问题，则立即予以惩处。1984年有一名职员因非法借钱而被撤职，另有一名因玩忽职守而被撤职，还有一名因未经许可参与经商活动而被解雇。

廉政公署下设3个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另外还有一个负责本单位行政后勤的中央行政总部。

执行处　　负责调查处理各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机构的贪污受贿案件，是廉政公署最重要和人数最多的部门。由廉政专员兼任处长。

防止贪污处　　主要任务是通过详细的审查后，提出各种建

议以堵塞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在组织和行政程序上的漏洞，以减少贪污的机会和可能性。

社区关系处　主要职责是倡廉。一方面在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中倡导廉洁风气，另一方面经常与社会不同阶层进行接触，了解贪污情况。此外，还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和教育机构，传达各种肃贪倡廉信息。

廉政公署就是这样通过调查办案、防范、宣传教育"三管齐下"的方法对付贪污问题。

廉政公署还设有**举报中心**，昼夜 24 小时接受市民举报。社区关系处在各区设有办事处，也接受市民举报贪污的投诉。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贪污问题曾一度泛滥成灾，广大市民深恶痛绝。廉政公署应运而起，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果：使政府机构比以往较为廉洁，民众对政府的印象有所改善；市民的反贪倡廉意识也比以往明显提高；私营机构对贪污问题也引起了重视。香港的反贪倡廉的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1987 年 11 月，第三届国际反贪污会议在香港召开，当时的廉政专员班乃信向大会介绍了香港肃贪倡廉成功的 6 个因素：1. 政府上层的决心；2. 反贪机构的独立性；3. 广大市民的支持；4. 反贪倡廉方法得当；5. 有强大的法律权力；6. 有足够的财力、人力资源。

香港政府为了配合反贪倡廉工作，曾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薪俸，从 1972 年到 1986 年，中下级公务员的薪水提高了 3 到 4 倍。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收到减少贪污行为的效果。

五、香港政治制度的特色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香港的政治制度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终权力受制于英国

香港政制的法律依据是《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以及获得英国政府许可的一些规范性文件，这就决定了统治权力必然受制于宗主国。换句话说，香港既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行政实体。宗主国抓住主权，但香港有较大的行政自主权。

第二、港督权力集中，少数人掌握决策权

港督作为英王在香港统治的代表，其权限渗透到港英政府的每一个角落。港府的上层领导成员，主要是由英籍人员和香港少数有势力的财团、世家以及社会上层人士所组成。正是这些少数人掌握了香港的决策大权。

第三、行政、立法两局议员主要以委任方式产生

行政局议员由官守和委任两部分组成，全部都是由港督任命，经英国批准后方可任职。立法局议员由官守、委任和民选三部分组成。就1991年9月15日产生的这一届立法局议员来看，官守议员3名，委任议员18名，功能组别推选的21名，直选的议员18名，这表明直选的还是少数。

第四、以行政系统为权力中心，又有较完善的公务员制度

香港现行政制是以行政系统为权力中心，即所谓“行政主导”。其他系统都是为行政系统的立法和决策提供咨询，这样有助于避

免“政出多门”。特别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改进，香港已建立起一套较完善的公务员制度，并相应建立了一支有效率的公务员队伍，这对完成行政系统的任务，起到了保证的作用。

第五、吸纳政治力量，取得本地支持

香港学者金耀基曾把香港政制这一特色称为“行政吸纳政治”。具体的说，就是吸收一批香港社会中被称为“精英分子”的工商巨贾、华人显贵家族成员、以及社会上层人士，委任他们到政府各部门的咨询委员会以及行政、立法两局当中去。由于这些“精英”绝大部分是华人，因而这种吸纳华人参与部分政治事务的政策，获得了本地社会的支持。

第六、有一整套庞大、系统的咨询网络来辅助决策

香港历史上长期没有政党，香港政制曾被称为“无政党影响的政制”。但在香港政制中，却有 400 多个附属于各行政机构的咨询委员会，形成了一个上下纵横、多层次、多渠道的咨询网络。遇到有反对势力时，就委任他们的代表进入咨询委员会，让他们在委员会内部发言，避免采用舆论公开形式去抨击政府。据统计，目前约有 6000 多名社会人士和政府官员服务于各咨询委员会。这些人或具备某种专业知识，或热心公共利益，而且生活在民间，了解民情，他们所表达的民众意见和利益比较符合实际，从而有助于增强政府决策和施政的针对性。香港每年出版的年鉴上，都有这样一句话：“咨询委员会是本港政府体系的特色，其目的是使政府能借此向社会有关人士征询，得到最精辟的意见，作为决策的基础。”

综上所述，香港的政治制度无疑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例如英国的控制，港督的大权独揽，对华人的排斥，广大港人享受不到

真正的民主，等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港人的斗争努力，使香港的政制改革也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成绩，形成了比较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一些特色，从而促进了八十年代以来香港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认真回顾和研究香港政制的演变和利弊，对于认识香港历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八章　人：香港发展的首要因素

一、香港人口的变化及特点

香港岛、九龙及新界地区在英国统治的一个多世纪中，其人口的构成和发展形成了自身的某些特点。由于香港岛在被割占之前只是由 20 几个小渔村组成的集镇，人口相对较少。1841 年割占之后由英国和香港当局在当地所作的人口调查和统计，第一次在《中国丛报》第 5 期(1841 年 5 月 15 日出版)公布了官方核准的有关数字。其时港岛华人总计 7450 人，其中散居于筲箕湾、黄泥埇等村落的原住民 4350 人，水上渔民 2000 人，北岸商贸市场居住者 800 人，来自九龙的水上居民 200 人，而英国人只有 250 人。10 年之后，当 1851 年港英当局推行港岛发展规划时，已有人口 3.3 万人，其中 95%以上都是华人。但是随着内地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全国，为躲避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大量人口涌入香港。1898 年英国强租新界，当地居民“人随地归”，至 1901 年港九及新界人口总数已达 39.9 万人。可见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香港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是华人。但是据官方统计，当地华人出生率为 8‰，非华裔人出生率为 18‰。可见华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和生

活，所以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英国等国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所出现的劳动力缺乏只能依赖于内地向香港的大量移民。然而随着大量成年男子作为劳动人手涌入香港，又引起香港居民中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婚姻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同时出现了性关系混乱的现象。比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地男女比例始终徘徊在170：100到150：100左右。人口结构中性比例的不平衡，造成社会不安定。同时产生了许多欧亚混血儿，这就是现代人口学家称之为带有鲜明殖民色彩的“边缘群体”。这种混血儿多是欧籍男性与华人女性的非婚生子女。特别要指出的是，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与劳动强度的明显增加，造成华人青壮年的大批非正常死亡。据统计，1881年至1890年的10年间，共出生15902人，死亡47687人，死者为生者的3倍。如果按这样人口锐减的速度类推，则10年之后，也就是到20世纪初年，香港就是一个杳无人烟的不毛之地。然而，这种情景并没有发生。因为事实上，在这10年中人口净增6.5万人，主要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香港人口波动很大。尤其在太平洋战争中香港沦陷前后，香港涌入了内地大量人口。截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战争、饥饿、疾病以及日本侵略者的摧残，香港人口由战前1941年的164万人，骤减至60万人。但战后回升迅速，至1951年估计数为200万人。这个阶段性别比仍属不正常，约为140：100。

从1952年至今是香港人口急剧增长的阶段。1981年全港人口总数达到503万，大约每年增加10万人。至1986年为550万人，1988年底为573.6万人；涨幅最大的是1971至1981这个10年期，增长幅度为27.2%，年均为2.4%。其中绝大多数为涌入香港的合法与非法的移民。比如内地十年动乱期间，就有相当多的青年为避免上山下乡，而以婚嫁或继承遗产等不同形式甚至非法偷渡入港，这给当地的工商业带来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壮劳力，然而也

带来诸多烦恼。比如直至1984年男女性别比仍居于1.073：1，1988年为1.049：1。至1996年香港人口为636万，华人始终约占人口的97%。在这个阶段中人口还有一个显著的倾向，即人口总数增加，但出生率下降。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是人口总数在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却是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即在1‰左右徘徊。由此而引起了香港逐步向现代化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同时随之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当然由于进入香港的多系青壮年，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突出。专家们认为，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基于战后成长的25—34岁育龄妇女渐趋减少，晚婚女性持续上升，以及广泛开展的计划生育宣传。

观察当代香港人口，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第一，人口分布高度密集，且不平衡

人口集中居住于仅占全港总面积16.5%的港九市区，1986年达397万。1977年，九龙旺角人口密度超出东京10倍，达每平方公里14.4万人。1981年市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8万人，新界为792人，可见分布不均衡。1974年香港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已逾4000，1984年更达5060人，属全球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其中尤以新九龙的深水埗高居榜首，达每平方公里16.5万人。针对人口高度密集且不平衡的现状，港府以建造公共屋村和在新界建立新市镇等措施，使港九市区居民渐次转徙新界，并取得一定的效果，疏散了市中心的人口。

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所占比重偏高，所承受的经济增长压力越来越大

香港总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比重十分可观。仅以1988年

为例，劳动人口为277.86万人，占总人口比率为48.9%。就业人口为274.07万，就业率为98.6%；失业人口3.79万，失业率1.4%。就业人口占当年总人口568.1万的48.24%。这个比率略低于日本，高于美、加、英、德及其他西欧工业发达国家。香港的失业率通常保持在3～4%之间，以西方经济学家的标准来衡量可算是充分就业了。再以香港经济人口所作实际贡献来看，1988年香港出口额为2176.64亿港元，转口额为2754.05亿港元，每个就业人口提供的总出口平均值(即出口加上转口)近18万港元。除了产油国，比任何工业发达国家的指标都要高出许多。加之港英当局严格控制人口的机械增长(即机械移入)，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劳动人口所承受的经济增长的压力正在逐年增加。①

第三，绝大多数是中国血统居民

在香港人口中，约有97%是中国血统居民。约占全港人口的57.2%其出生地为香港，其余的大部分由广东、福建二省迁入，少数来自上海及沿海省份。此外尚有少部分出生在各国的海外华侨定居香港。不及3%的非中国血统居民主要来自英联邦各国，并有美国、葡萄牙、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德国、日本、法国、韩国和荷兰人。七十年代涌入数万越南船民。

在香港人口中，英语作为早期官方与商界通用语言的现象已逐步转化为中英文并重。同时，官方文件也逐步改为中英文同时使用。港英当局并规定自1985年10月新一届立法局会期开始，文件必须中英文兼用。1986年4月当局提出在中学教育中一律使用中文讲授的意向，并取消英文中学。1987年出现了自1897年强租新

---

① 上述统计数字引自港澳研究所编《香港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界以来的第一部用中文颁发的条例。据估计香港居民中有25%能够讲流利的英语，最通用的语言为“广州白话”即“粤语”。近年来岛内学习普通话的热潮有增无减，以迎接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便于同内地的交流与合作。新界居民在语言使用方面与广东省相同，广州话、客家话与潮州话并举。约占70%的渔民兼领内地户籍，一般通用广州话和客家话。

第四，流动人口总数超过当地居民总数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旅游中心，吸引了来自美、英、日、澳及东南亚的大批游客。仅1988年一年就有569.28万人到港旅游，再加上大批由内地进出香港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旅游人士在内，每年进出本港的外国或内地游客，已成倍地超过本地人口总和。1994年抵港旅客总数为930万人，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人数(含内地居民及外籍居民)为190万人。所以人口的动态密度实际上已超过1万人/每平方公里。以1984年为例，本港动态人口密度与本港静态人口密度相比为116：100。如果考虑到在香港这样一个缺乏弹性的弹丸之地的生存空间，其动态人口密度堪称世界第一。这一年进出本港已达1600万人次，即动态人口密度高达300%。联系到1984年本港进出口贸易总额与本港生产总值相比指数为178%，那么动态人口密度指数已超出后者近一倍。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是十分罕见的。

第五，劳动人口缺乏的压力并未解除

经典经济学家经常指出的由于资本积累而会带来相对人口过剩现象。但这种现象在香港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十分少见。实际上从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的工商业，尤其是制造业就感到劳动力

缺乏的压力。直至八九十年代，制造业中劳力缺额超过劳力供应的趋势仍继续上升。

二、提高人才素质的过程

经济的腾飞离不开人口素质的提高。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最有效手段是改善教育条件，增加教育投入。香港的教育为人口素质的改善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回顾香港教育的发展过程，可以将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840年至1900年，这是香港教育的早期阶段。从历史上看，香港地区在宋朝即出现了第一所书院，院址设在锦田（或称岑田），也就是今天新界中部地区的力瀛书院。该书院始建于宋崇宁年间，创建者为宋神宗熙宁2年（1069）进士邓符协，经历了700多年的风风雨雨直至清嘉庆24年（1819）仍然“基址尚存”。明清时期当地主要以社学为主进行基础教育。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出现了教会的传教和办学与传统教育并存的局面。马礼逊教育协会是最早在港埠办学的基督教团体。马氏原系英国伦敦传道会牧师。1843年11月1日，马礼逊英华学校由澳门迁入香港，来港时仅11名学生，次年增为24名。虽然该校因经费拮据而于1849年关闭，但数年之中也培养出一批爱国学者。其中不乏杰出科技人才和关心祖国命运的志士仁人。如马礼逊学校毕业生容闳首先倡导向美国派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大规模直接向西方学习的发起者。

此后陆续在香港兴办教育的教会团体有英国圣公会、伦敦传道会、美国浸信会、美国公理会、罗马天主教会等。港府早期的教育政策旨在传播教义，以至于《圣经》也成了受政府资助的中文学校学生的必修课。港英教育委员会指令教师“应该解释该书传授的知识带来的巨大好处”。这种做法引起香港居民的反感。1862年英人史钊域兴办中央书院即政府学校后，即极力支持里雅各博士的主

张，反对在学校传教。甚至在他抵达港埠之初，当地一些中国居民就向他表示，如果基督教成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即使是免费教育，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与史钊域的主张不谋而合。至此港府教育政策起了根本的变化，转变为没有宗教的教育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学校绝不利用学校传教，而教会学校不论是否接受政府资助，均有传教目的。1866 年史钊域修改中央书院章程，将英文列为必修课程。由于片面重视中学英文教育，也出现了忽视其他学科教育的现象。1877 年出任港督的轩尼诗进而认为基于政治上和商业上的需要，所有政府学校均需实施英语教育。

客观上说，英国占领香港以后近 60 年内，香港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迅速。1848 年，当地仅有 3 所官立学校和少量教会学校。1873 年发展为 30 所官立学校，6 所接受政府补助的学校。1900 年则有 13 所官立学校，97 所接受政府补助的学校。教育经费在每年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大约在 3%与 4%之间。但随着英占地区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学校数量与经费投入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大批青少年失学。如 1867 年失学青少年占学龄青少年 87%；1900 年为 72%。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失学青少年多为华人子弟。总的来说港府办学目的正如 1902 年香港教育委员会年度报告所概括："从大英帝国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愿意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的中国青年提供这方面的教育。如果所用经费不多，即令他们不是本殖民地居民，也值得这样做。"当然也有诸如康德黎这样的友好人士，谆谆教育学生"为把科学和医术输入中国而奋斗。"正是通过教育传播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使得中央书院不仅培养了许多科技人才，更涌现出大批爱国者。这批爱国者在辛亥革命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就曾先后就读于中央书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孙先生的革命生涯就是从中央书院起步的。1895 年孙中山与杨衢云合作，以辅仁文社部分成员为骨干在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在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中，香港学校毕业生担任了

重要职务。如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和外交总长王宠惠均在港接受过西方教育。概括地说，这个阶段香港传统的中文教育受到很大冲击，港府的教育政策受政治及商业实用价值的支配，而较少从教育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第二阶段即 1901 年至 1945 年，这是香港教育的重大转折时期。在此阶段的第一个 10 年期，港府主要是调整教育政策，强调发展英文教育及培养少数上层华人子弟。作为政策体现的标志是 1911 年 3 月香港大学的成立。时任总督的卢旨爵士认为香港大学是"为中国而立"，为中国培训人才，并介绍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培养目标是通过英式教育来造就一批买办阶级人物，学成之后进入中国政府供职藉以扩大英国的政治影响。这种办学方针导致香港的教育制度将有限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培养少数上层华人子弟方面，并突出强调强化英文教育，使英文中学能为香港大学输送人才。这种办学方针的片面性受到 1935 年应邀赴港考察教育制度的英国教育家宾尼的深刻批评。他建议应当重视小学教育，重新确定英语教育的目的应界定在实用及职业上的价值，强调以中文为媒介的其他学科的教育。他认为，香港教育应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通过足够的华语训练以培养他们的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第二层次即通过一定的英语训练，以满足其走上社会及就业方面的需要。这种分析和设想被认为符合教育规律，也符合香港的实际。此后到 1941 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与广州的沦陷，一批内地学校迁入香港，大批学生辗转求学于港埠，使香港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41 年 12 月 8 日至 1945 年 8 月，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整个教育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政策的控制之下，因而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

第三阶段即 1946 年至今。这是香港教育重大改革和发展的时期。随着香港经济繁荣的到来，在教育事业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个阶段共分 3 步来走：第一步就是五十年代。自 1949 年

9 月各官立学校开设上、下午班上课，即实施“二部制”教学方式一直沿用至今。主要贯彻英国曼彻斯特首席教育官菲沙所提建议，其内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发展小学基础教育，尽可能以中文讲授，三年级始授英文，建立会考制度；二是扩充工业学校，发展工艺教育；三是在城乡推广成人教育。第二步是在六十年代。重点是发展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等基础性教育，并着手筹建香港第二所大学，开展工业教育。1961 年港埠中文学校学制改为“六五一四”制，即小学 6 年，中学 5 年，大学预科 1 年，大学 4 年。1963 年 10 月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以中文教育为主，吸引了众多华人子弟。但此时中文中学教学呈萎缩趋势。1969 年摩理臣山工业学院开始招生，这是适应香港实际、重视工业教育的成果。同年开始实施大学生资助和贷款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是迄今为止香港高等教育界最富有社会意义并最有成效的改革。第三步是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实施 9 年义务教育并大力发展以工业教育为中心的职业技术教育，创办香港科技大学，并为 1997 年香港回归后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作统一学制的准备。1971 年香港立法局通过《教育法案》，同年 9 月起实行小学免费教育，并授权教育司强制适龄儿童入学，如果有家长违反该项规定将被法律起诉，并判罚 500 港元及入狱 3 个月。1978 年 9 月又实行 3 年中学免费教育，同年 10 月决定扩展高中及专上教育，使完成 9 年强迫普及教育的中学生继续接受高级或中级中专的系统教育。[1]

七十年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面对社会的强烈需求，港府将人才培养政策调整为发展以工业教育为中心的职业技术教育。为此，港府陆续成立香港理工学院、香港城市理工学院等 9 所工业学院，并建成 11 个工业技术训练中心。主要开设各项工、商、贸、旅游所急需的大专文凭或证书课程，并培训技工、技术员和技

---

① 有关香港教育资料主要参考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香港波文书局。

师。这个教育体系的日臻完善保证了对经济部门人才的输送。1989年香港公开进修学院正式招生，为失去接受常规大学教育程序机会的人士提供在职学位教育。

从整体情况看，进入七十年代之后，香港教育已趋向多元化，这更好地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所提出的要求。这个教育体制由官办及民办公助、私人及社团企业出资主办三个部分组成。从提高人口整体智力结构来看，基本上由公共基础教育、工业教育与训练、专上及大学教育这三个主要系统构成。港府在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也是比较可观的。教育经费开支在七十年代一度高居政府财政开支的22%；1982年百分比有所下降，总额仍达46亿港元，人均占有教育经费124美元。这个数字虽仅相当于日本1975年人均教育经费的50%，或美国同年度的25%，但在八十年代的亚太地区还是名列前茅的。以1990年度与1980年度相比，绝对增长值为100.01亿港元，增长率为299.52%，可见港府在九十年代又加强了对教育投入的力度。

1931年香港5岁至14岁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57.5%。1990年香港学生中，幼稚园有196466人，小学生有524919人，官立中学生有37625人，资助中学生有325604人，私立中学生有69979人，共1154593人。如果加上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工业学院、成人教育、公开进修学院、演艺学院、政府认可大专、两所理工及浸会学院以及大学的在校生，则总数已达1459138人。中小学及幼稚园教师人数达45869人，其中学位教师人数13811人，非学位教师人数32058人。[①] 香港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的教育体系，这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发展经济的后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① 上述统计数字引自1989—1990香港教育署年报。

三、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动

前面已经谈及近年来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实际上本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由于香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人口再生产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再加上人才外流、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因素对香港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伴随经济增长，20 多年来香港人口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学者们根据流行的人口转变理论，将香港的这种人口转变归纳为改变的延迟模式。这种"改变的延迟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六十年代以前人口处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六十年代以后情况起了本质的变化，在低死亡率的基础上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仅以 1965 年、1980 年、1989 年为例，其出生率分别为 27.7‰、17.0‰、13.3‰；其死亡率分别为 4.8‰、4.6‰、4.9‰；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2.9‰、12.4‰、8.4‰。这样，在香港人口的年龄结构上就出现了老龄化现象。以 1966 年、1980 年、1988 年统计数字表明，人口年龄构成中，60 岁以上（含 60 岁）老人所占比例由 5.71%、9.97%急增至 12.28%。这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中算是相当快的。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从昔日的小渔村到今天的十里洋场，内地移民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有人估计历年来的内地移民总数超过 100 万人，其中多数来自广东的移民。由于这些人多为到港投亲靠友，因而没有给香港带来太多的社会问题。现在除了人口老龄化之外不可忽视的是人才外流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几乎占香港家庭总数 19%的月收入在 1 万港元以上的中产阶级，对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前景一度抱有一定的怀疑心理而造成的。如 1987 年港英政府电脑处理处，仅当年上半年就流失 14%的程序分析人员；1988 至 1989 年

度香港教师中的2.08%因移民而流失。整个八十年代香港移往海外的人口约有26万人，应当说这些移民是香港人口中素质较好的一部分。据1986年香港人口抽查，香港总人口中，获得大学学位人口占总人口的3.3%，而1987年与1988年的移民中获大学学位者分别占移民总数的18.7%和15.0%。

移民问题造成了香港专业人才的短缺并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也影响了总体消费水平和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尤其是带走了一批资金，造成了部分香港资金的流失。不过，随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越来越得到人心，各界人士对香港未来保持繁荣普遍充满信心，因此近几年又有大批外流人才回流到香港寻求发展，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此外，经过批准，内地每年还会继续有一定数量的人员会移民香港。因此香港人口的这种动态流动，预计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第九章　香港奇迹的诞生

一、香港奇迹的表现

大约在140年前，英国外交大臣彭玛斯顿勋爵曾对香港不屑一顾地说："香港只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这句话常被后人作为笑料加以引用以证明彭氏的无知与浅薄。昏庸无能的道光皇帝听手下人说起香港仅仅是一个小渔村时，就同意让英国割占。然而鸦片战争刚刚过去半个世纪，在香港岛上升起米字旗的英国臣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香港的自由贸易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1894年，由香港发往伦敦的信件中有一份是在香港的英国商人呈

交给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请愿书，内有这么一段文字："香港已取得几乎无与伦比之优越商业地位，其成就实归功于英国商贾、贸易商和商船主等人之胆识、才干与精力，女王陛下所属臣民之辛劳；彼等在香港岸际投入毕生心血与资财，花费千百万元于开道筑路、架桥建屋，宜公宜私，乃至广泛开垦，修船坞、筑波堤、造码头，以利停泊，更有甚者，从事制造而创巨值，可谓蒸蒸日上。殖民地之繁荣昌盛欲得保持，窃以为全赖我侪之不懈努力和自我牺牲，以及华人之宝贵协作与支持，而维持香港作为自由港之举则更是唯一良策也。"我们当然不赞同信中的观点，但是这些英国商人至少承认了两件事实：一是华人对香港开发所作出的贡献；二是香港只有作为自由港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历经百年沧桑，如今香港已成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香港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创造了被世界称誉的香港经济奇迹。目前，香港的"世界之最"和"全球第一"很多。例如：世界公认"经济自由"第一；权威的美国《财富》杂志评它为"最佳商业城市"之首；维多利亚港已连续 5 年保持全球第一货柜港称号；香港是全球最大成衣、手表、玩具出口地；香港转口贸易额每年达 1 千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此外，香港人均贸易值达 6.26 万美元，仅次于新加坡，居世界第二；香港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和伦敦；香港启德机场是全球最繁忙、效率最高的第三大国际机场；在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评比中，香港位居美国、新加坡和日本之后，排名第四；香港与伦敦、纽约、苏黎士并称世界四大黄金市场；香港已超过瑞士成为世界第五大外汇交易市场，每天外汇交易额平均高达 910 亿美元；香港 1996 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 24500 美元，世界排名第六；香港外汇储备全球排名第七，1996 年达 659 亿美元；香港 1996 年贸易总额达 3760 亿美元，排名仅次于七大工业化国家；香港是世界第八大股票市场，但股票总市值达 4487 亿美元左右，居美、日、英、法、德之后为

世界第六。

香港经济奇迹出现了，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高速度

在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香港创造了世界罕见的经济发展高速度。香港弹丸之地，除天然良港外，可耕地少，诸如铅、锌、高岭土等矿藏储量几乎不值一提。但拥有诸如资金、人才、信息方面的极大优势，是"二战"之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以 40 年(1947—1987)的时间，香港人均生产总值实际增加 10 倍；为了同样的成绩，英国人拼搏了整整 200 年(1750—1950)；美国花了 120 年(1840—1960)时间，人均生产总值也只提高 8 倍。换句话说，港人仅用 40 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英国人 200 年、美国人 120 年所走过的路程。香港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在七十年代的 10 年中平均每年递增 9.2%，八十年代的 10 年中平均每年递增 7.4%。进入九十年代后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二）高产值

占地面积狭小的香港创造了令人吃惊的总产值，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众所周知，香港只有 1092 平方公里和 600 万人口，但她左右国际市场的能力则令一些面积与人口数十倍于她的国家和地区望尘莫及以至感到汗颜。今日香港已成为著名的国际金融、贸易、轻工、航运、旅游、信息中心。她与 170 多个国家有外贸业务，有 8 种产品的出口值或出口量位居世界榜首。香港是中国内地的最大投资者，同时又在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分别有巨额投资。

（三）高自由度

香港是国际最开放的自由港，这块英国人眼中的“殖民地”却享受有世界上最多的贸易自由。商品、外汇、黄金、人员进出口自由，外来资本和本地资本竞争自由。这种高度的经济自由氛围吸收了大量外资，以致全世界 100 家最大银行中的 85 家在此设立有分行。

（四）高回报率

香港投资回报率之高世界罕见。由于香港市场机制发育成熟，众多国际资本在此如鱼得水；更由于背靠中国大陆，面向国际市场，法制健全，投资热点与获利机遇均衡，所以成为投资者向往的热土。在全球 141 个拥有资产 10 亿美元以上的世界级巨富中港人占有 6 个，按人口平均而论所占比例冠于全球。尤其是 1984 年 9 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以来，外国投资者不但对香港本身的投资前景看好，而且将香港看作通往中国内地的“丝绸之路”，希望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在中国内地获取发展的机会。有关报告显示，近几年不但外流海外资金纷纷返归香港，而且外国净流入香港的资金也大大增加，显示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奇迹使香港成了镶嵌在南中国海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奇迹也启发了一些小国、大国，穷国、富国。他们希望幸运之光也降临到自己头上。菲律宾希望把宿务省、泰国渴求把南方五府、俄罗斯蕴酿在哈桑地区、韩国希冀把济州岛都建成“第二个香港”。香港在他们眼中简直成了一个神奇的小岛！

当香港成为国际传媒聚焦的热点之时，人们可曾想到，何以会出现香港奇迹？香港的百年沧桑究竟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抑或

是遍地荆棘的羊肠小径?让我们拉住时光老人匆匆的步伐,让岁月重现那百年之前的路程。

二、凭借地理优势,开拓一流自由港

香港地处我国南方沿海珠江口外东侧,与深圳经济特区隔河相望,距广州约130公里,离上海约1200公里,是我国通往世界各地的南大门。由于地处亚太地区海空交通枢纽,又居于北京、印尼纵线与东京、印度横线的交汇中心,扼世界航道要冲,欧美、日本进入南中国的最重要门户,所以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香港地理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及离岛4部分组成。由于近年来的填海造地工程,所以总面积已达到1092平方公里,约为深圳市总面积的50%,或相当于北京市的大兴县或平谷县辖区面积。但香港市区建设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6.5%,即176平方公里。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是闻名世界的一级深水不冻良港——维多利亚港,水深数十米,风平浪静。港口最宽处9.6公里,最窄处1.6公里;港口水面面积6000公顷,吃水12米的远洋船舶可以自由进出。全年平均气温摄氏22.2度,气候温和。它位于珠江口上,有铁路、公路及航空与国内各地相通,运输便利。该港与美国的旧金山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港并称为国际三大良港。还有235个大小岛屿星罗棋布于香港南侧的南海中。从地理地貌上说,香港是广东南岭山脉丘陵地带的延续,山多平地少。由于香港缺乏平地,所以开埠至今,挖山填海不止。自1868年开始的较大规模的填海工程,至今已产生很大效益。以香港中区为例,百年前的皇后大道便是海岸地带,但若干年后人工填海而填出了德辅道和干诺道。1904年渣打道、干诺道、德辅道、湾仔地区已初具规模。而今干诺道已不再是临海街道了,在这条大道的临海一侧,又有一些新建道正在移山填海的过程中出现。从1851年至1985年初填海面积已达19平方公里,由于人

们不懈的努力，海洋正在不断地变成陆地。

香港地处北半球亚热带，受海洋性气候支配，冬季为西北季候风，夏季为东南季候风所控制，所以终年温暖湿润。最低的气温在2月的10℃左右，最高气温在6、7月，常在34℃左右徘徊。好在太平洋的海风还能驱走一部分热量，给酷暑之中的港人带来些许凉意。夏季也就意味着雨季，当地年平均降水量2246.4毫米，其中80%雨量集中在5月至9月之间。夏季的热带气旋也常常光临港埠，5月至10月是台风肆虐的季节。这些热带气旋来自于南太平洋面上的反气旋，偶尔正面袭击港埠并造成生命及财产的损失。这时人们常常翘首仰望被人称之为"风球"的气象信号，祈望台风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香港十分缺乏平坦的土地，海拔50米以下的土地仅占总面积的18%，陡峭的山峦高达600米至900米，怪石嶙峋，山涧湍流，幽谷纵深，峭壁悬崖，除了增添旅游者的诗情画意和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之外，就难以进行有效的工业开发了。香港缺乏淡水，境内没有流量丰富的大河流、淡水湖或地下水资源。所以长期以来淡水尤其是食用淡水是困扰港人的一个大问题。在1863年以前，香港的食用淡水完全依赖山水和井水，1863年至1960年的近百年间，香港食用淡水来源依靠建筑水塘接收雨水，遇到天旱雨量锐减之时难免造成"水荒"。最严重的年代是1963年，自当年元旦开始便严格控制居民用水，采取每天供水4小时的非常措施。"水荒"情况到6月份愈演愈烈，以致当月开始实施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的严厉节水措施。此举一直延续了半年多。这期间也实行了海水冲洗厕所的新举措，以千方百计节约淡水。真可谓是"滴水贵如油"了。这种严重缺水的情况直至1965年内地供水工程竣工，东江之水源源流入香港千家万户之后，才得到根本改善。

香港平地少，可耕地更少。农业可耕地仅占总面积的9%，包括林地、草地、灌木地、劣地和红树地、沼泽地在内的勉强可耕却十

分瘦瘠的土地占 74.5%。少量农耕地可经营蔬菜、水果、花卉。沿海可发展养殖业，长达 800 公里的海岸线是重要的渔业资源。长期以来埠内海产品除满足港人需要还可以部分加工出口。香港渔场主要集中在南中国海大陆架部分，520 海浬的广阔海域共分 10 个捕渔区，拥有丰富的渔产。

世界各国类似香港的港口锚地并非少数，类似香港的渔盐之利比比皆是。可是时至今日，她们中间的大多数还在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渔家生活。香港却能从这众多的小渔村中脱颖而出，如果走同样的发展道路，恐怕香港仍然要像 100 多年前一样与这些渔港为伍了。所幸的是，香港扬长避短，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

早在 1841 年 6 月 7 日，英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即资金、货物、人员进出口自由，除烟、酒、甲醇、汽油等少数商品外，其他货物均免征进出口税。这对被关税保护主义弄得焦头烂额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无异是一声震聋发聩的福音。虽然香港列入自由港的时间比德国汉堡港和新加坡港稍迟，但它的政策更为优惠，也更加诱人。英国占领者宣布自由港后 1 周(即 1841 年 6 月 14 日)，便在港岛北岸划出 40 块土地招标(每块土地约占 30 米海岸)，并规定中标者必须在 6 个月内兴建房屋或其他建筑物，其费用不得少于 220 英镑或 1000 银圆。投标结果，有英国、印度商人共投得土地 33 块。有些英商唯恐落他人项背，在首批公地招标之前，就向港府承批了一些海岸地带，建起他们的商贸栈行。如渣甸洋行，这个以贩卖鸦片起家的商行在铜锣湾附近(即今之百德新街)、林赛洋行在春园附近(即今之春园街)分别建立仓库。有些洋行更急不可耐地将载货的“趸船”驶靠海岸，权充“海上仓库”。

是什么原因驱使一贯保守的英国人采取自由港这种大胆的做法呢？实际上，18、19 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已经系统地提出了自由贸

易理论，英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也灌输了自由放任的精神。英国占领香港的目的就是要将香港发展成为与中国和整个东方开展贸易的桥头堡，以利于向中国和东南亚倾销其工业品，并获得当地的廉价工业原料和劳动力。这个目标如愿以偿之后，尽管换了多少任的首相，英国政府和唐宁街的主人，在百年之中始终对香港的自由港政策持肯定和推动的姿态。如上所述，在众多的自由港中，香港是最少保护色彩的，诸如汉堡等港口，在关税、规章和开放范围方面，则筑起了一道又一道樊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香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夹缝之中，以自由港的身份不但求得生存，而且在沟通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并作出了明显的贡献。历史上中国内地闭关锁国时期，香港借此良机扩大海外贸易，并吸收了内地百万以上的剩余劳力。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时，香港又以自由港的身份加强与内地在物资、技术、人才、商品等方面的交流，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总之，香港之所以能成为自由港，如果没有依托中国内地这个广袤的腹地，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长久的。就好比一条鱼，无论它的生命力如何强大，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它是无法维持生命的。

三、转口贸易的由来和发展

香港的转口贸易，最早应当追溯到明末清初那遥远的年月。当时香港岛的石排湾，即今天“香港仔”附近，开始了香港转口贸易的第一批大宗买卖。又有谁想得到，香港的命名又是由此而来呢？原来这转口的商品就是名噪一时的“莞香”。明清之际苏杭一带每逢农历 8 月 15 中秋月圆之时，民间风俗崇尚熏烧香料，以求阖家安康，生意兴隆。这种香料就产于广东大埔沙田，俗称莞香。香料经陆路运至尖沙嘴，再由小船舶至石排湾，在那里转输海船北运抵达

苏杭一带。清代学者屈大均著有《广东新语》，书中记载“莞香盛时，岁售逾数万金，苏杭一带，每岁中秋夕，以黄熟彻旦焚烧，号为熏月，莞香之积阊门者，一夕而尽，故莞人多以香起家。”香港的起名原来还有这么一段缘份。

转口贸易带来了香港经济的早期繁荣。19 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新建了大批商店，中外商贾云集。1856 年以后，香港成为华南商品的集散地，中国四分之一的进口货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货由香港周转资金并通过香港进行分配。1857 年，英国出口香港货值 72 万英镑，1860 年上升到 244 万英镑。到 1858 年，大多数从事对华贸易的外国大商号都在香港设有分号，从香港指挥调节其全部对中国及他国的贸易业务。1859 年，共有 22 个国家的 1158 艘船舶停靠香港码头。为了增强香港转口能力，港英当局加速建设城市公用设施和航海设施。1851 年建成东面自雅宝利货仓至湾仔的道路；1857 年在香港市街安装油灯；1858 年建成上环、中环、下环、太平山 4 个商场；1860 年建成太平山、东街、中街、西街、西营盘、山顶道等街道，南面扩建了至香港仔的道路。同年，港府为供水修筑堤岸、安装下水道等，共拨款 13 万英镑。新建的香港仔船坞，就其坚固与完善而言在当时东方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 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沿海和长江的许多口岸对外开放，也为香港的转口贸易拓宽了市场。由于《天津条约》专门规定英商在华经营的特权，诸如运货进入内地以及从内地运土特产品出口，除交纳进出口正税外，仅需交纳从价 2.5%的子口税，再也不必上任何捐税。尤其是九龙被英国割占之后，香港在转口贸易方面更具有明显的优势。1867 年中国从香港进口货物已经占全部进口货的五分之一，中国商人也被自由港的低税所吸引。

随着 1869 年美国纽约至旧金山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以及同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更加突出了香港转口贸易的重要地位。因

为前者将美国邮件漫长的西行航路转变成经济的东行航路，而后者则缩短了港英间行程的 25.6%，沪英间行程的 24.1%。1871 年，欧洲—香港—上海间海底电报联通，为中外商人提前购货提供方便。1887 年，九龙、拱北设关。此间香港的转口贸易直线上升。至 1900 年经香港转运进口的货物占全部中国进口货物的五分之二，比上述 1867 年的数量已经翻了一番，而且仅用了 33 年。通商口岸转运贸易也是香港转口贸易的一项大宗买卖。如 1871—1884 年，台湾、汕头生产的蔗糖并不直接运往销售地，而是经香港加工转销中国内地。商人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海上比陆上运费低廉，更因为外轮货物享有上述不平等特权，只要加征一次子口税即豁免内地一切税收厘金。又如，土染洋布经香港转口内地，因享有子口单的保障，使工料完全相同的本地土染洋布就丧失了竞争能力。可见转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中国的商品经济。

香港的转口贸易刺激了英、美、法、意、加、澳、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自大英轮船公司直航香港成功后，上述国家也先后在港开设定期航班。仅 1890 年这一年，欧洲轮船 8219 艘，9771741 吨货物通过香港转口。到 19 世纪末，香港已成为中国内河、沿海航运中心和远洋航运中心。发自香港的轮船可以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在转口贸易的早期阶段，也培植了一批专门从事转口贸易的中国商人。这些商人多数是在香港开埠之前与美国及南洋各国就有贸易往来。在这个基础上利用香港开埠之机开展对华转口贸易更是得心应手。他们将中国的土特产及药材等从中国内地收购再运至香港，然后转运到美国；同时也从美国购买一些产品如花旗西洋参等运经香港转销中国内地。专门经营这种中美商货的商号时人称之为“金山庄”。更有一批商人专门收购华中、华北、川黔一带盛产的花生、大豆、药材等商品并运抵香港，再转运南洋各国如印尼、菲律宾、马来亚、泰国。并将南洋一带的海产品、大米、白糖与木材等当地土特产品运到香港进而转销内地。这种专门的商号时人

称之为“南北行”。随着“南北行”与“金山庄”经济实力的日趋强大，逐渐摆脱了买办阶层的控制并且在 1868 年联合起来，成立了“南北行公所”，旨在解决行业内部竞争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时至今日，已有 128 年历史的南北行公所仍在调和行业内部业务方面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港人也把集中了多数南北行商号的文咸西街称为“南北行”，因为这一条古街至今还在向路人们默默地诉说着早期转口贸易的那一段历史。

1900 年至 1945 年 8 月，这是香港转口贸易的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前 15 年，是香港转口贸易至关重要的 15 年。这期间经香港进口的货物占中国全部进口值的 30%至 44%。而经香港出口的货值占中国全部出口货值的 20%至 39%，而且 1900、1901、1903 这三年均超过 40%。客观的说，香港的转口贸易几乎支撑起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强租新界及九广铁路通车后，香港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航运业更趋繁忙，修船业也相应发展起来。香港被认为是大不列颠帝国仅次于伦敦和利物浦的第三大商港，成为英国在远东经营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地区转口贸易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经济陷于瘫痪的状态。利用此契机，香港的转口贸易有了长足的进展。1921 年香港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4.32 亿港元，1924 年香港的进出口船只达 35471671 吨，比战前 1913 年的总吨位超过 50%。1931 年其贸易总额达到 12.80 亿港元。此后受资本主义危机与国际白银市场崩溃的影响，转口贸易又进入一个衰退期。1937 年卢沟桥的炮声使香港转口贸易逐年下降。但由于多达 70 至 80 万的中国内地难民迁居香港因而带来相当可观的资本，所以香港还是维持了一段繁荣时期。加之 1935 年香港取消银本位，发行的港元直接与英镑挂钩，1 英镑相当于 16 港元，所以币值比较稳定。中国因国际白银市场复苏而有大量白银经香港流入美国，这对于香港经济都有一定的良性刺激。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仅用 18 天便开进香港。太阳旗在香港飘扬了 3 年零 8 个月。这 3 年多的时间里香港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军港，转口贸易的巨大机器停止了运转。

1946 年至 1959 年，这是转口贸易复苏并转型的阶段。

1946 年受战争创伤的影响尚未恢复自由港的功能，整个转口贸易也没有达到战前水平。1947 年又给香港的转口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主要是由于如下几个因素：其一，1947 年香港重新获得"联邦特惠税"的待遇，香港产品在英联邦范围内有较强的竞争力。同时吸引一部分上海资金及技术力量投入香港企业界。其二，同年中国内战硝烟重起，内地资金接踵而至，仅上海逃港资金就达 6500 多万港元，香港的工业与贸易又注入新鲜血液。其三，国内市场对海外商品需求量显著增加。1947 年香港进出口的贸易总额已超过战前最好年景的 1931 年的贸易总额 1 倍以上。1948 年又有大幅度的上扬，达 36.6 亿港元，是 1931 年的 3 倍。同年大陆输港货物已占香港全部入口货值的 17.7%，香港对大陆的输出也占香港出口总值的 17.7%。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占领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上海和广州。聪明的香港商人抓住机遇与解放区做生意，促使当年香港的贸易总额又比上年激增 38.5%。

1950 年，出于外交与贸易上的考虑，英国政府力排众议而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新中国政府，这样香港与内地的转口贸易就更少了一层阻碍。同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投入抗美援朝。由此中国急需进口大量军用物资，其中大多数由香港转口。为了支付进口，中国的出口也急剧上升。大量橡胶制品、西药、五金、汽油和化工原料经港运入内地，中国内地的农副产品及轻工业品大量输往香港。1951 年香港的贸易总额高达 93.03 亿港元，比上年激增 24.0%。如果按一些西方人士的估

计，则高达 250 亿美元。[1]

1952 年对于香港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项针对新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其目的不外有二：一为扼杀新生的中国于襁褓之中；二为断绝新中国战略物资的输入，以期获取在朝鲜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禁运”实行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1952 年香港贸易总额骤然降至 66.78 亿港元，比 1951 年的 93.03 亿港元几乎下跌了三分之一。这种情况在整个五十年代没有得到改善。以当年价格计算，直到 1959 年尚未恢复到 1951 年的水平。这种“禁运”犹如三刃的剑，不仅损害了香港对内地的物资输出，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内地商品经香港转口到国外的贸易，实际上也损害了美、英等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尤其令人贻笑大方的是，这种打上政治偏见的制裁措施甚至殃及无辜的鸭子。在当时的“禁运”叫嚷声中，竟上演了一幕以鸭子为主角的闹剧。由于美国视中国为水火不相容，因而严禁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曾任战后香港第二届总督的葛量洪在回忆录中谈到一件极其可笑的事：“香港出口到美国也受限制，防止中国来源的货品用香港的名义进入美国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腊鸭。腊鸭是在香港制造的，然后出口到美国。但是，制造腊鸭的鸭子，是由中国运来的鸭蛋在香港孵出后得来的，那么这些鸭算是共产主义孕育下的蛋所变的鸭子，还是地道的英国鸭呢？这个问题在双方经过很多次书信来往后，才得到解决。条件是在孵蛋的时候，要有一名督察在场，他要为刚孵出的小鸭在脚上烙印，鸭子成长之后再另加记号，这样才可以把鸭子杀掉，晒干运往美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此话一点不假。本来福建沙县、江西抚州所产的腊鸭最具名气，禁运伊始，这些产自内地的腊鸭自然不得进入美国，但美国的美食家、饕餮之徒们还是认准了中国腊鸭，非此莫属。无奈之下，

---

① 详见《香港经济与未来》〔美〕比瑟著　何伟文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姑且就在香港制作吧。可是正如葛量洪所说，又怕吃了来自中国内地的“共产主义鸭子”有受到“赤化”的危险，所以才不厌其烦地由一名警官将内地鸭子与香港鸭子分开并标明印记。这种视社会主义中国为洪水猛兽的做法，想必至今仍让那些美国的美食家们懊悔不已。但窥一斑而识全豹，区区鸭子尚且如此，那些标有“中国制造”字样的内地产品，在禁运的大棒之下要想进入香港转口贸易市场更是难于上青天了。

然而，今天的港人如果以超脱的态度来看待美国一手策划的对大陆禁运一事，则更要感谢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香港经济所提供的机遇。尽管当时不乏“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去”，香港是“末日的都市”这一类叹息，但广大港人还是挺起腰杆，发展夹缝中求生的谋略，去寻找他们的主攻方向。

这个主攻方向就是大力发展香港产品的出口市场。长期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香港经济不搞出口外向型就没有出路。而要出口，只能大量出口香港本地的工业产品。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的“禁运”政策导致了香港依托内地转口贸易急剧衰减，所以只能走输出本地产品这一条新路子。当时英国政府明知这种禁运必将损害它的切身利益，然而面对日不落帝国江河日下的惨淡经营，只能违心地加入这个美国称老大的禁运行列。所以禁运犹如神话中的潘朵拉魔盒，美国人打开了它，却无法再合上了。反之，当时的历史也给香港的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工业品制造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因为解放战争时期滞留在港的上海制造业老板谋求重振旗鼓，建国前夕香港又涌入一大批上海及华南各省的技术人员和资金，同时东南亚国家对纺织品需求量大增，而西方工业化国家战后正在重新调整工业结构与布局，这 4 个内在的与外在的因素都给香港的制造业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上所述，仅 1947 年 1 年，上海流向香港的资金即达 6500 多

万港元。上海许多中产阶级以及技术人员当时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不理解而迁徙港埠。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先进技术和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的白领阶层来到香港，是促进当地产业发展的生力军。比如闻名遐迩的船王包玉刚，就是作为一个银行家于 1949 年初从上海来到香港寻求发展的。当香港人谈到四十至五十年代迁居港埠的上海人为香港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时，对上海人精明的经营头脑和香港人勇敢的拼搏精神同样赞不绝口。所以自 1952 年开始，在香港转口贸易急剧下降的同时，制造业异军突起，迅速上升。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 1959 年。其间转口贸易由过去占总出口贸易的 80%下降到 1959 年只占 30%，而香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这 8 年中年均增长率为 19.5%，由 1951 年的 5.5 亿港元上升到 1959 年的 22.82 亿港元，共计增长 315%。这就标志着香港经济结构由单一的转口贸易型转变为以制造业和出口港产工业品为主的混合经济型了。

从 1960 年至七十年代初期，转口贸易终于摆脱了衰退的阴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大道。转口贸易额，年增长率一般都保持在 10%至 30%左右。进入七十和八十年代之后，香港的转口贸易呈现了迅速递增的势头。而且有几个年份是以 50%的速度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港人、内地以及国际对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的经济普遍看好。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主要转口目的地贸易额方面作一个比较。从 1986、1987、1988 这 3 个年度看，经香港转口中国内地的贸易额分别为 409、602、949 亿港元；同时期转口美国的贸易额分别为 224、325、495 亿港元；转口日本的分别为 67、98、174 亿港元。毫无疑问，中国内地始终是香港转口贸易最大的伙伴。可见，离开了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必然要逊色许多。

据 1988 年 7 月至 10 月间香港贸易发展局对两千家有代表性的贸易公司的调查，上述公司的出口总值中 36%属港产品出口，

45.5%属转口贸易，另有18.5%属“无形”的三角贸易。这就意味着再次出现了转口贸易的高峰期。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内地对外开放，从1979年到1988年，世界各地商品经香港对内地的转口值增长了622%，而内地经香港转口出口值则增长了259.4%。加之亚太各国加强经济贸易合作，香港作为区域国际贸易中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1980至1988年间，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经港转口货值增长了516.5%，日本经港转口货值也增长了433.8%，而通过香港的台湾海峡两岸通商在1978至1988年间增长了53倍。因而1988年香港转口贸易总值超过同年港产品出口值577.41亿港元。

进入七十至八十年代以来，对外贸易尤其是转口贸易在整个香港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统计数字表明，(1)香港总出口值相当于生产总值的比例：1988年高达116%，多数在60～70%之间徘徊；(2)进口值相当于生产总值的比例：1988年高达117%，一般在75～85%之间；(3)贸易总值，最高也是1988年，相当于生产总值的230%，多数在150～160%之间浮动。应当说上述比例是相当高的，这说明香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贸。而在美国，贸易总值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左右，日本约为25%，西德约为50%，中国内地在1984年为20%，香港则远远高于上述国家。

四、走向国际金融中心之路

进入本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引人注目的是香港金融业异军突起，不仅在数量上飞跃增加，而且在结构上也发生巨大变化，香港已经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昔日的香港，是如何发生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她所走过的道路，对内地金融业又有什么借鉴之处呢？

香港金融业以银行业为主，包括证券业、金银交易、期货交易、基金服务、保险业和租赁服务等行业。1981 年，金融业在香港生产总值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当年制造业所占比重为 22.8%，而金融、保险业等比重为 23.8%。金融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谈到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追溯到 1841 年英军强占香港的那个时代。英军在九龙尖沙嘴登陆的隆隆炮声刚停，硝烟还在弥漫之际，步其后尘接踵而来的就是英资洋行大腹便便的老板们。1841 年当年就有英商的怡和洋行（原名渣甸、麦赞臣行）、宝顺洋行、端拿洋行和林赛等 27 家洋行破门而入。其中如宝顺、怡和等不少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实力雄厚的大洋行。由于银行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所以它们的来到要比英资或外资洋行慢了半拍。第一家来到香港的银行是英资的东方银行，它的到来已是英国占领香港 4 年之后的事情。1845 年改组成一家大银行，并将其总部迁往伦敦而重新命名为东方银行。改组的当年即在香港设立分行，并在广州设立代办处。这是香港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银行。此后陆续来港的有有利银行（英），阿拉伯联合服务银行（英），渣打银行（英），英国和印度合资的汇川银行及汇隆银行，巴黎贴现银行（法），利华银行（英），利昇银行（英）等。

1865 年为争夺金融业务，并减少某些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以便利益均沾，在港的英资若干家大公司联合欧、美其他在港大公司在香港和上海合资创办了家大银行，原名香港上海银行，即现在的汇丰银行。至此，在港的银行已达 11 家。第二年就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潮，这 11 家在港银行有 6 家随其总行的倒闭而关闭了，仅剩下东方、有利、渣打、汇丰和巴黎贴现银行。1896 年，法国调整经济策略，上述巴黎贴现银行退出香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取而代之。1897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的中国通商银行建立之

后，随即在港设立分行。

这一阶段港英政府与汇丰、渣打、有利三大银行在港发行货币获益匪浅。由1887年至1891年合计签发港币额为28970786元，存仓现银为13002041元。存仓现银仅为签发通用银币额45%弱，虽然在每年均铸有硬币，可以作为存仓现银，但依然获利不少。如果以百余年来计算，则更为可观。尽管在香港没有其他英占殖民地所常见的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但汇丰作为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行使中央银行某些职权。汇丰银行还通过大量向中国贷款来获取高额利息收入。如光绪20年(1894)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又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借债两笔库平银多达两亿两白银，也是以海关税、盐厘等作抵押，利息高达4.5～5%。汇丰银行的总经理自然非英国人莫属。但为便于与中国人业务往来，特设华人办房。如何东、何世荣、何世光等均曾担任过此职。汇丰银行行址设于香港皇后大道，直通至德辅道中，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堪称全港最宏伟新型建筑。当时规定华人存款年息4%，到期付息转单，并兼办活期储蓄。还设有私人专用保险箱，代顾客存贮贵重物品，可随时存放，每箱年租金为24港元。一些社会名流将金银首饰乃至手稿存入。

香港银行发展到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中国民族资本建立的银行纷纷出现。随着1912年广东银行的诞生，先后成立的有东亚银行、道亨银行、康年银行、嘉华、陈万昌银行、永安银行、永隆、恒生银行、香港实业银行、明泰银号、永亨银行、广安银行等。同时有部分在中国内地注册的银行相继在港设立分行，如中国银行、广东省银行、金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并在二十年代建立了华商银行公会，以协调华资银行业务。此外，外资银行继续来港开设分行。如美国国际银行，后合并于花旗银行；荷兰小公银行和安达银行也染指港埠。此外尚有美国万国宝通银行、法国法兰西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纷纷在港安营扎寨。地点多集中在皇后大道和德辅道。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香港的华资、外资银行总数约在40家左右。当然此时的华资银行一般来说资本少规模小。

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起的硝烟，阻断了远洋航运，以至影响到香港商务一落千丈。那时港九银号（找换店）对于港币换银毫，或以港币兑换广东省毫，均需补贴，每10元多达数毫，从而发生银行挤兑现象。兑换港币的市民在银行门前排起了长蛇阵。这也使当时香港的物价陡然上升。如"一战"前港埠米价每元20余斤，战后仅可购买16～17斤大米。柴价每元百余斤也降至80斤左右。其余如布匹、棉纱等价格也水涨船高。港币信用深受影响。

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西方大国忙于调整战后全球金融部署，香港的华资银行峰回路转，有所发展，但是好景不常，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在"二战"中，日军于1941年12月攫取了香港，使当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洗劫。金融业首当其冲，所有金融机构几乎都宣告停业或破产。1945年8月，日本战败，英国重返香港，香港金融随着经济的恢复而进入了复苏和发展的阶段。

自战后至今，是香港金融的鼎盛时期。从银行业来看，战前那些银行，其中包括外资和华资银行卷土重来，再起炉灶。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建的银行、银号。据统计，1946年至1947年，香港的银行和银号多达143家。1948年1月，香港立法局通过了香港历史上第一个银行业条例，对银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因而淘汰了相当数目的不够格银行。至1954年银行已减为94家，1964年再减至86家。战后汇丰的业务一再扩大，凡政府人员的工资，以支票形式发放，由汇丰银行支付。汇丰是香港银行公会的主席，它的董事会主席几乎都是行政局的当然议员。对于港府的金融经济政策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所以港人谑称汇丰董事长是"香港三总督之一"。无孔不入的早期汇丰还将触角伸进香港赛马会，举凡马会的财政收支等财会职务均由汇丰派员承担。每逢赛马日，汇丰银行均

派出职员多人，前往赛马会场主管售票、兑奖等项事宜。当日赛马结束，马会所得结余纸币，由银行敦请香港当局派出警车护送入汇丰银仓。甚至还有汇丰银行的大班专门在赛马会的马房饲养多匹良马以期一搏。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汇丰银行还是其他商业银行的票据交换中心，并承担大部分的现金储备保管业务。目前汇丰拥有300家在港分行和吸收60%以上的存款，由香港当局“汇丰基金”支持发行的港币与渣打银行所发行的港币，共占香港货币发行量的92%。

港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是：“香港的银行比米铺还多。”七十至八十年代以来，对于遍布在香港各个角落、超过150家注册商业银行和1400多家分行的注册资本来源和各自拥有的地位来看，专家们倾向于把它们划分为3个集团。即汇丰集团，包括汇丰、恒生银行（61%的股权为汇丰拥有）、汇丰财务公司（全资附属汇丰）；中资集团，即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为首的13家中资银行；外资集团，包括英资的渣打银行，以及美、日、法、东南亚等外（侨）资跨国银行。此外尚有部分外资渗透或独资经营的、在本地注册的华资家族银行，共计20家。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跨国资本大量进入香港，香港各家银行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据港方1984年的统计，香港银行综合资产已达到1627.76亿美元，平均不到3000人就有一家银行机构服务，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多见的。从1970年到1984年，在这15年中，香港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存款数额从149.55亿港元增加到3549.65亿港元，增长了近23倍，从年增长率来看，一般均保持在20～30%之间。从放款来看，其数额自1970年的96.70亿港元增至4210.49亿港元，年增长率多保持在30%左右。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第三阶段香港银行业的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再从接受放款的行业来看，也可以发现香港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的贷款趋势在八十年代有了很大的变化。比

如 1988 年，放款总额为 4564.87 亿港元，批发、零售业放款 597.44 亿，占 13.09%；房屋、建筑、房地产发展 588.64 亿，占 12.90%；制造业 390.10 亿，占 8.55%；运输业 233.81 亿，占 5.12%。而 10 年之前，即 1978 年的发款比例如下：当年放款总额为 563.98 亿，批发、零售业 172.14 亿，占总额 30.52%；制造业 72.96 亿，占 12.94%；建筑、房屋、房地产发展 69.24 亿，占 12.28%；运输业 62.58 亿，占 11.10%。可见在这 10 年中，制造业的放款比例下降，而建筑业的投资上升。这说明了港人对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继续保持繁荣充满了信心。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 1989 年 6 月受政治风波的影响，中银集团发生挤兑现象，这使中资集团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由于工作人员冷静对待，各银行密切协作，终于经受住了考验，很快渡过了这个难关。到 1989 年底，存款额持续回升，与 1988 年同期相比还增加了 1 成。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备功能之一，是必须有健全的外汇市场。香港的外汇市场是新兴的，七十年代以前香港并没有外汇市场。港府对外汇的管理一直是根据 1939 年颁布的《金融(防护)条例》实行管制。1973 年 1 月港府取消外汇管制，此后才有正式的外汇交易。1979 年月成交量约为 5 亿美元。1989 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当年 4 月进行的调查则达 490 亿美元。1995 年已成为世界 6 大外汇市场之一，为亚洲第二大外汇市场，拥有 11114 亿美元储备。由于国际资金汇聚香港各家银行，所以使香港银行的资产总额迅速增加，至 1989 年底已达 42474 亿港元，存款总额达 10076 亿港元，放款总额达 12718 亿港元；海外银行业存入香港银行业的资金达 24283 亿港元，香港银行业存放海外银行业的资金也达 20779 亿港元。

再看香港的股票市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拥有一个交投活跃、集资能力强的股票市场。其实早在 1886 年香港就出现了零散的股票交易，1891 年成立股票经纪协

会,1914 年改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1921 年成立第二家证券交易所,1947 年 3 月两家交易所合并,成立香港证券交易所。1969 年 12 月远东交易所开业,1971 年和 1972 年,金银证券交易所和九龙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这四家交易所成交额以远东交易所为首。1974 年港府禁止再立新所并倡导被港人称为“四会”的 4 家交易所合并。1984 年 4 月 2 日合并工作完成,新成立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注册资本达 1.2 亿港元。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香港股市相当活跃,1981 年总交投额达 1059.87 亿港元,一举成为世界十大股票市场之一。1984 年受中英谈判影响成交额大幅度下降。直到 1985 年大量外资涌入香港,加之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人心安定,年内股市急升 552 点。1989 年底,股票成交金额达 3115.86 亿港元,比 1976 年的 131.83 亿增加 22.6 倍。

香港股市的主要特点是港英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态度,容许香港股市完全按照自身的步伐前进,因而香港股市涨跌幅度极大,受世界股票市场冲击极大。如 1987 年世界股票暴跌风席卷港埠,在短短两个交易日里,恒生指数下跌近 1600 点,大盘市场犹如水银狂泄,萎缩 4 成以上。香港股市受冲击程度远在世界各大股市之上。目前香港股票发行的种类分 A、B 股、普通股和优先股,一些获利稳定、影响较大的大公司股票习惯上称为兰筹股。从 1984 年 1 月挂牌上市公司 259 家,上市值 1794 亿港元来看,华资已占 80% 的绝对优势。汇丰、长江实业、怡和、和记黄埔、太古集团(A)、置地、港灯等多种股票还在伦敦上市,显示了长实、和黄等华资集团的内在实力与进入国际股票市场一展雄姿的凌云壮志。

第十章　解开“香港现象”的奥秘

香港奇迹至今已持续了40年之久。以1992年的统计数字论，香港人口在世界排第90位，作为经济实体排第10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5万美金，进出口总额达400亿美元。至1994年，香港人均产值高达21760美元，名列全球第六，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而居第二。香港奇迹曾使多少人惊叹，多少人沉思，多少人扼腕，多少人振奋。经济学上将香港的经济成就及其在全世界所引起的轰动效应称之为“香港现象”，可谓言简意赅。“香港现象”何以产生？香港经济何以能保持波浪式高速增长达40余年之久？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现在看来，除了香港自然环境特有的优势以外，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内地与香港密切的经济联系，大大增强了香港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华人企业家和广大香港劳动阶层为香港经济的繁荣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港英当局在香港实行的自由经济政策等一系列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香港奇迹的诞生，造就了南海之滨这颗绚丽夺目的明珠。

一、没有内地的支援就没有香港的繁荣

自1841年香港开埠以来，香港经济与中国内地就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许多工业原料，绝大部分的食品，还有各行各业所缺的劳动力，都要靠内地供应。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香港开埠时开山辟路所需的石匠、手工匠等劳力，几乎全是来自内地。他们既能吃苦，工资又微薄，英国人自然乐于雇用。当时的港督德

庇时也承认,“过去 18 个月(1844 年 10 月至 1846 年 4 月)公私建设及翻修进展的速度确实惊人,但若无有技巧、价廉的中国工人可供雇用是难以实现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内地在物资、人力等方面给予了香港长期的支援。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桥梁作用,中国政府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即使在内地自身经济困难的时期,对香港所需的许多副食品的供应也没有中断或减少过。还有像淡水、电力等等,凡是香港有需要的,内地总是尽力优先设法满足。当然,在内地支援香港的漫长过程中,香港也给了内地许多帮助和支持。由此可见,香港 40 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凭借它社会的稳定和投资环境的优良,才吸引了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的资金;而促使香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恰恰又是同中国内地的广泛支持分不开的。

(一) 生命之水来自何方?

水,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城市的命脉。水,人类须臾不得离开;水,城市分秒不可缺少。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来说,视同生家性命一样重要的莫过于水。香港,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然而,有强大的祖国支撑,凝结着内地人民深情厚谊的甘泉,犹如母亲的乳汁哺育着 600 万香港同胞。

在 1863 年之前,香港食用淡水完全依赖山泉和井水。1863 年之后,港人才喝上了自来水。自来水是属于港英政府官营的公用事业,由香港水务署负责自来水的供应。初期自来水仅供应香港岛,1895 年扩展至九龙。目前,除一些边远村落外,全港基本上都能获得自来水供应。但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之前,香港水源没保障。1863 年至 1960 年的 97 年间,香港食用淡水来源依靠建筑水塘接

收雨水。旱情严重影响自然降雨时经常造成用水短缺。香港水荒最严重的 1963 年,至今港人记忆犹新。港府采取最严厉的非常制水措施才得以渡过这个难关,当时严禁用水冲洗车辆、浇花、喷灌草地,大力推广海水冲洗厕所。这些措施一直延续了半年多。祖国人民急港胞之所急,于 1964 年就建成连接香港的供水工程。从此以后,内地东江之水源源流入香港的各家各户,供水量一加再加,才给香港的水荒现象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截至目前为止,香港的水源主要来自两条渠道:一是筑塘贮水,1988 年初香港水塘存水量为 3.5 亿立方米,其中仅两大水塘,即万宜水库和船湾淡水湖的存水量便达到 2.93 亿立方米。二是东江供水,1960 年港英政府为了解决长期困扰港人的水荒问题,与广东省签订了东江水供应香港的协议。1964 年应港府要求,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动工,1965 年 3 月 1 日正式通水。开始时每年仅供水 6000 多万立方米,七十年代中为逐步满足香港生活用水与生产用水的需要,广东方面曾先后两次对供水工程进行扩建和改造。按双方协议商定,1994 年供水量应达到 6.2 亿立方米。实际上,1989 年就已经达到 6.119 亿立方米。从 1965 年 3 月 1 日至 1989 年的 25 年里,广东对香港的供水量已累计达到 47 亿立方米,占香港用水量的 60%以上。根据港方的要求,第三期供水扩建工程于 1994 年完工之后,年供水量已经达到 11 亿立方米以上。从此,香港人民吃水困难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为了丰富香港人民的菜篮子

“民以食为天”。弹丸之地的香港,几百万芸芸众生,一天要消耗数以万吨计的肉类、蔬菜、水果和粮食。为了确保香港居民的副食品供应,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自 1962 年至今,几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向香港开出“三趟快车”。三趟快车就是向港输送鲜活冷冻食

品的快运专列。数字最有说服力。截至1994年统计，来自内地20多个省市的副食品基地，共计向香港供应了活猪7229万头，活牛476.16万头，以及大量的鸡、鸭、鹅、淡水鱼、蔬菜、水果，基本上满足了港澳市场的需要。

根据1995年的最新统计，全年向香港输送活猪250万头，活牛11万头，活禽5000万公斤，活羊1万头，冻肉5万吨，蔬菜3.4万吨。其中活猪占香港市场销售量的95%，活牛和活羊占100%，蔬菜占50%。

1962年之前，由于缺乏专用车辆，加之运输周期太长，鲜活商品损失严重。输往港澳的活猪死亡率达6%～9%，活禽更高达10%～13%。更有甚者，一车武汉发出的活猪，抵港死亡率高达70%，一车武汉发出的活鸡共487只，到深圳仅剩16只。河南许昌发出的一车黄河大鲤鱼未及深圳全告夭折。有鉴于此，铁道部与外贸部决定1962年3月20日由江岸站发出第一列751次货运专列以运送港澳鲜活商品。1962年12月11日起增开了由上海新龙华站始发的753次和郑州北站始发的755次专运快车。人们习惯上将直达九龙的753、755、751次货运专列统称为“三趟快车”。内地有关部门特别制定“优质、适量、均衡、应时”八字方针以适应香港市场的需要。这主要是针对香港同胞饮食方面崇尚“生猛鲜活”，强调食品的季节性和节令性、香港仓储费用高昂等具体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由于“三趟快车”的开行，使运输时间缩短三分之二，并科学地组织货源和调度分配，做到不脱销，不积压。比如由国家外贸部指定的香港专卖商店“五丰行”，就有2000多个销售点组成的港九营销网络。五丰行经营的活猪、活牛占香港销售量98%以上，年营业额高达120亿港元。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三趟快车开通之际，正值内地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国人忍饥缩食，保证了对香港的副食品供应。“血浓于水”。当年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仍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1年里组织了供港活

猪 2.17 万头，活羊 449 头，冻肉 215 吨，鲜蛋 1066 吨……

再从“三趟快车”的运输安排来看，当时内地铁路的超负荷运行几乎达到极限承受能力。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华东、中南地区组织这样特殊列车的装车点，主要集中在京广、沪杭、浙赣三条主要干线，这无疑是给已经疲惫不堪的主干线又加上了沉重的负荷。特别是运送分秒必争的鲜活商品，需要列车日均旅速达 500 公里以上，所以铁路部门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保证特殊快车的优先审批、优先装车、优先解编挂运；保证开行率、挂运率和正点率；做到定运行线、定列车编组、定停站、定上水股道。这必然使铁路部门在经济上蒙受很大损失，仅以京广线南段为例，每年损失均在 5000 万元以上。但为了香港同胞们生活的安定，广大内地铁路员工乐此不疲。新龙华站的职工细心到这种程度，每当 753 次快车装运活畜活禽时，严令其余机车不得接近 753 外贸专用线，以避免机车的连挂、鸣号、灯光照射造成禽畜受惊和受损。上海食品进出口公司的基地，每年输港活猪 20 万头，他们致力于改良品种，培育的新品种具有体型适中、丰满结实、五花肉明显、皮表薄适合烧烤等优点，深受香港同胞的欢迎。

国家有关部门十分关心香港人民的身体健康，内地海关、商检等机构历年来对进入香港的食品都严格进行全面检查。包括对肉类、奶制品，尤其是新鲜蔬菜的农药含量检验，以防范“污染菜”流入香港。1996 年 2 月底深圳文锦渡检查站新食物检验大楼建成并投入运作之后，大大扩展食物检查的层面，检查菜车的数目上升 4 倍，设在大楼内的化验室当天即可化验出蔬菜是否含有过量农药。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和新装备，菜车检查数目从每日 55 辆增加到 220 辆，占全部经过的菜车的 95%。在新大楼未落成运作之前，过去检查站抽取的蔬菜样本只能作一些简单的农药反应测试。如果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确证分析，则需将样本送往香港政府化验所再行测试，大约要花费 48 小时。由于周期较长，就难以保证有污染的

菜被及时发现。而新落成的大楼实验室就能自行就蔬菜进行详细的各项理化测验,并在当日就能取得结果。若发现有问题的蔬菜,除及时堵截外,其农场及出口商将被列入名单,该农场或出口商的菜车再经过文锦渡时就会被及时扣留盘查。这一系列严密措施保证了香港居民能吃上“放心菜”。可以这样说,文锦渡新食物检验大楼已经成了香港居民“菜篮子”的忠实卫士。

(三)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唇齿相依”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长期以来与香港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已经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珠江三角洲作为香港发展的腹地,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小三角”,即包括 17 个市县在内的地域:佛山市、江门市、中山市、东莞市、南海市、顺德市、番禺市、三水市、新会市、台山市、开平市、高明县、鹤山县、恩平县、斗门县、增城县和原来的宝安县。其二是“大三角”,即泛指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包括 28 个市县,除上述市县外,尚有清远市、肇庆市、惠州市、花都市、高要县、广宁县、四会县、从化县、惠阳县、惠东县和博罗县。无论是大三角还是小三角,都尽占与香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大优势。从历史上看,珠江三角洲自明清以来就成为东南沿海最富庶地区之一。广州、佛山、江门、顺德、东莞发展尤为迅速,主要表现在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上。进入近现代以来,人们常停留在口边的“省、港、澳”一句话,形象地概括了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血肉联系。就后者而言,拥有大量素质较高且工资较低的熟练工人,更能提供大量廉价的土地资源,这都是香港的发展和繁荣所迫切需要而又相对缺乏的。香港由于工资、地价和房租不断看涨引起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持续上扬,这种情况不利于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然而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却拥有相当的优势。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上述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

向珠江三角洲转移以寻求合作伙伴。至1991年底在粤注册的“三资”企业有1.6万家,“三来一补”企业有2万多家;至1992年底,前者增至2.6万家,后者增长幅度更大,从业人员有300万人,在粤加工产值已占香港工业产值三分之一左右,其中电子、塑胶等行业达80%以上,香港制造业的厂商约有70%至80%将生产线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依托内地实行战略转移的香港制造业的产品在国际上更富于竞争力。即使在西方经济转入低速发展和缺乏后劲的情况下,1979年至1991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年平均为7.2%,1992年仍为5%。若没有珠江三角洲的大力支持,香港的继续繁荣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当然这种支持也是相互的,珠江三角洲在这12年中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半,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顺德、南海、中山和东莞等一批市县已提前进入小康。

珠江三角洲已成为香港剩余资金的首选投资对象,成为香港金融业关注的热点。如前面所述,香港1973年取消外汇管制,并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然而由于本地市场相对狭小,过剩资金增长迅速,所以香港金融业具有为剩余资金寻找出路的强烈愿望。据1989年《香港年鉴》统计,1989年初,香港有挂牌银行、接受存款公司、办事处、人寿保险和一般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及为香港认可的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共计1342家。截至到1990年2月底,香港银行业总存款为10489.97亿港元,总贷款达13500.77亿港元,而在香港使用的贷款为6709.75亿港元,仅占贷款总额的49.7%。如何为贷款余额寻找出路,这是香港实业家翘首以待的大事。事实证明,最佳的选择是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据统计,1979至1989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从1979年的0.91亿美元,到1989年累计达103.2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香港。仅珠江三角洲加工装配一项,就吸纳了香港投资18亿美元。在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厂商进行投资的资金主要仰赖银

行的信用。如东莞汉兴针织厂就是由南洋商业银行向港商贷款0.16亿港元兴建的。港方在内地较大投资项目多采取银团贷款形式，如汇丰银行、中国银行牵头贷款50亿港元兴建的广深珠高速公路即为典型例子。除此之外，香港实业家还透过股票市场筹措资金转而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具体方式：一为通过股票市场集资；二为通过发行各种债券筹资，均取得十分良好的效果。同时内地也在香港进行投资，建立境外企业。这样内地资金与港澳资金相辅相承，相得益彰。香港在向珠江三角洲等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投资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巩固了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促进了香港金融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二、从“不干预”到“积极不干预”

香港奇迹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也是人们所常说的可遇而不可求。然而，当我们了解了内地对香港的大力支援之后，很自然地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香港经济腾飞的历史进程中，港府采取了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长期以来，香港政府奉行的是“自由经济”政策，其核心就是不干预方针。根据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人们从私利出发进行有效的交易，从而市场就具有了节省成本、追求效益的功能；这种功能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不必依靠外来力量的干预，就能操纵社会经济达到最理想状态。亚当·斯密还强调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应建立公平的行政体系及法律秩序，提供私人企业无法获利的公共工程及服务。应当说，自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港府便一直奉行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不加干预。然而港府的这种经济政策在“二战”前的100年间并没有使香港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原因是当时资本主义本身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阶段，国际经济活动也没有达到那样庞大的规模和

深度。英国对香港的掠夺还是以劳力、金钱和财物的直接掠夺为主，所以港英当局利用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发展经济的意识也不够清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英国和香港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由直接残酷掠夺转变为间接文明掠夺，大量投资成为一种潮流，港府有关利用自由经济政策发展当地经济的主观意识也有了加强，从而不断完善其体系，强化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自由经济政策开始发挥效力的时代。这个时期相继出任港府财政司的克拉克与郭伯伟，在这个香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就十分强调"不干预主义"原则。郭伯伟认为："政府不应告诉任何商人或企业家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更不应该去告诉他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香港是典型的开放性经济，……因此，依赖 19 世纪'无形的手'比把笨拙的官僚主义手指插入其敏感的机制更好些"[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十年代以前，港府所奉行的自由经济政策，在广泛的领域里几乎是近于前述亚当·斯密的古典的"自由放任"的政策，以消极保守的不干预，任经济自由发展，而缺乏从积极方面再加以推动，使其更快地进步。

七十年代香港经济与世界经济环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时期的财政司夏鼎基将经济政策从"不干预主义"调整为"积极不干预主义"，并一直延用至今。夏鼎基曾这样解释："积极不干预主义是指一种看法，认为一个政府如果试图计划分配私营部门不用的资源，和强行打击市场力量的运作，对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率，特别是一个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关系，通常是徒劳无功和有害的，无论短期的后果是如何令人难受。""但这并不是说，要使市场力量有效及公平地发挥作用的限制因素及基本规律就没有必要，恰恰相反。例如说，由于市场不完善而引致垄断的情况出现时，干预主

---

① 转引自杨森：《香港经济的成长及政策》，第 89 页。

义就成为必须了。再者，如果市场增长过速以致常规无法加以抑制，或者为了公众利益着想而须加以监管时(典型的例子是金融市场)，就可能要通过法律形式设立限制和遵循基本规律的架构。又或者，如果毫无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行动，在总体经济和总体金融方面已产生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需要干预。”[①] 夏鼎基的主导思想是“极少干预”而非“自由放任”或“完全不干预”。所以他的措施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1977 年他在立法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积极不干预主义”。他认为，自由放任并不能充分解释香港经济的运作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态度。实际上这种精神在 1971 年夏鼎基上任伊始就开始贯彻了，但正式命题并形成体系则是 6 年之后，此前世界上尚无其他国家和地区提出这样的政策。

具体的说，这种“积极不干预政策”可以体现在 3 个方面。第一是完全不干预，即表现在贸易自由、企业自由、资金进出自由、汇兑自由、雇用自由与就业自由、通讯自由、出入境自由。第二是政府完全干预，如涉及土地供应、拍卖等一律由港府安排。第三是二者交替使用，如对货币金融方面，对外不干预，对内干预。像港币流通自由，信贷不受限制，而港币发行则受外汇基金条例管理，政府指定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发行港币。概括起来说，港府在注意极少干预、保证经济活动有完全、广泛自由的同时，又要密切注视对整体经济运作有重大不利影响的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必要干预以期解决。在保证经济活动自由及必要干预方面，港府有一整套法规，一切照章行事，使经济活动及积极干预都有法律保证，而不能超越法律。

这种特殊的政府对经济活动不加干预的政策对于香港这种特殊的经济地区有相当的积极作用。因为香港缺乏资源，原料靠进口，产品靠外销，因而以市场调节来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是最有效

① 转引自《广角镜》月刊 1985 年 9 月 16 日总 150 期。

的途径。这也是历届港府官员达成的共识。虽然 1958 年英国正式给予香港财政独立自主权，但港府仍遵循不干预的传统，实行自给自足及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以避免举债而影响英国的利益。

港府“积极不干预政策”具有鲜明的特色。从财政上看，量入为出是其出发点。自五十年代以来历任财政司均十分重视财政结算的重要性。并认为香港经济易受外界影响，不容易控制，因而政府财政预算不能超前，而应当留有余地，尽可能保持盈余，以应付不时之需。同时，加强对金融危机的干预力度。由于银行同业间的连锁关系越来越密切，“问题银行”的出现，常常导致金融危机。港府改变以往仅仅通过发钞银行出面挽救行将出现危机的金融体系的消极做法，对“问题银行”采取了接管的方式，前后动用外汇基金约 40 亿港元，接管了无力偿还债务的恒隆银行等 5～6 家银行及金融机构。1987 年 10 月的全球性“股灾”殃及香港，港英政府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动用 20 亿港元的外汇基金注资恒生指数期算公司，力挽香港股市。

在自由经济原则的支配下，港府对经济的促进采用的是间接辅助手段。如在社会服务与教育方面港府加强财政开支的力度，一般均占 30%左右；另外在基本建设和保安方面，一般也占 29%～30%。目的是为提高港人的文化水平和劳动素质，并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训。尤其在基本建设方面成绩十分突出，凡工商业所需的楼宇、道路、通讯，由港府统一规划和开发，做到错落有致，安排得当，设施配套。比较典型的就是在香港地铁的修建、经营中也是贯彻了积极不干预的原则。正因为如此，也为世界各大城市地铁的营运树立了一个赢利的典范。据了解，目前世界各国地铁公司多系亏损大户，负债经营，而香港地铁由于运用了港府与市民多方面监管措施，更主要的是在不受行政干预的环境下自主运行的原则，所以获得了成功。

香港地铁自 1979 年底逐段运营以来，截至 1994 年的 15 年

间，前 9 年亏损，后 6 年赢利，仅 1994 年赢利总额超过 10 亿港元，这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具体来说，获利秘诀在哪里？

首先，从所有制来看，香港地铁属于“官有民营”性质。表面上香港地下铁路公司是港英政府全资拥有的公用事业企业，实际上不由政府直接经营，而是根据 1975 年通过的“集体运输铁路公司条例”，由港府委任有关人员组成董事局，按照“商业原则”进行修建、经营、维修和日常管理。就物质基础而言，由于先进的设施保障了庞大客流量的畅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规模效益。以流通量计，香港目前平均每天有 220 万人次，星期天更超过 230 万人次，1994 年中秋节载客量达 290 万人次的高峰。1984 年前，全年载客量为 4.6 亿人次，1994 年为 8.04 亿人次，10 年间增长 75%，年均增长 7.5%。香港地铁规模中等，总长度为 43.2 公里，低于亚洲地区的东京、汉城、新加坡地铁，与伦敦的 392 公里地铁长度更不能同日而语。但以每公里地铁载客量计，则香港超过 5 万人次，东京是 3.7 万人次，汉城是 2.7 万人次，新加坡 0.91 万人次，伦敦则只有 0.64 万人次。可见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弹丸之地，香港地铁不愧为效率最高的地铁。香港地铁共有 38 个车站，装有 436 个电动扶梯；在最繁忙的中环车站每小时进出乘客超过 6.7 万人次。为加大疏通量，香港地铁车站每站平均有 5.8 个出入口，客流量最大的中环站有 14 个出入口。并因地制宜，多将出入口设在人流密集的商场、写字楼或住宅区内。为提高效率，全部采用自动售票系统，系统的核心设备是具有验票功能的 1000 多部出入闸机，验票与放行高度自动化。各车站大厅均设有自动售票机、辅币找赎机。自动售票系统由电脑操作，可以随时提供各种数据以利于运营决策。

其次，在基建筹资及建成运营中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政府不加干预。地铁建设费用共 260 亿港元，港府投资部分不到三分之一，主要资金来源通过债券、财团贷款、浮息票据等进行融资，一般由港府担保。地铁公司经营收入主要是车费，其次是物业租金和

物业管理费及车站广告、站内零售小商店等。地铁票价随每年通涨率调整，但涨幅略低于通涨指标，即实行“无实质增长的长期车费政策”。以1994年为例，香港地铁公司经营总收入为53.31亿港元，其中车费收入为43.15亿港元，占总收入的84%，与上年相比增长率为12.8%；物业租金和物业管理收入4.63亿港元，增长率为12%，占总收入的9%；车站广告、站内小商店等商业设施租金收入3.53亿港元，占总收入的7%。

香港地铁经营成功的关键在于成本控制。其中最主要就是控制人工和租金。地铁公司的租金开支量尚少，而工资成本颇高。1993年员工薪金10.8亿港元，1994年增至12.7亿港元，分别占当年经营性支出的54%和56%。因而公司将提高员工素质和控制员工数目作为经营管理主要内容。公司充分利用地铁沿线各站新形成的繁华地段房地产增值迅速这一优势，将发展地铁与发展房地产业结合起来。因此带来的丰厚利润解决了工程款的部分来源。其地皮一般为车站上盖，先向政府取得发展车站上盖空间的权利而后寻求合作伙伴，并以发展商的投资缴付土地费，旨在建造大型住宅、写字楼和商场，建成后出售或出租，并进行物业管理。由地铁公司与发展商共享所得利润。至今已先后完成19个物业项目，出售物业所获利润已达40亿港元。香港地铁成功之路，显示了港府“积极不干预政策”在香港自由经济发展之中的特殊功能。

三、搭起两岸间接贸易的金桥

海峡两岸的间接贸易是指大陆和台湾通过香港进行的转口贸易。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两岸三通迟迟未能实现。香港在两岸贸易之间架起了不可或缺的金桥，同时也在这种特殊的转口贸易中充实和提高了自己，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1949年后两岸隔绝来往，经香港的两岸间接贸易主要是大陆

输往台湾的当地人民所必需的中药材等土特产品。1979 年后情况有了改变。据港府所公布的统计数字，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额，1979 年为 3.85 亿港元，1985 年激增至 86 亿港元(约合 11.4 亿美元)，1986 年 1～7 月，海峡两岸经港贸易总值达 54.7 亿港元，其中台湾经港转口内地的商品总值为 48.2 亿港元，内地经港转口台湾的商品总值为 6.5 亿港元。以 1986 年全年计，中国内地经港转口台湾省的商品达 11.25 亿港元，1987 年达 22.54 亿港元，①比上年增长 100.33%。这个数字超过 1987 年中国内地经港转口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数字。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贸易增长幅度更大。尤其是台湾经港输入内地的商品成倍增加，1986 年为 63.28 亿港元，1987 年为 95.67 亿港元，1988 年为 174.89 亿港元。而 1988 年大陆经港输台商品数额为 37.34 亿港元，当年两岸经港转口贸易额已达 212.23 亿港元。

以发展的眼光看，通过香港的海峡两岸间接贸易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大陆经港对台的单方面贸易。其表现为 1970 至 1973 这 4 年间台湾经港对大陆转口输出值为零，从 1974 年至 1978 年才有微不足道的商品经港输入大陆内地，分别为 5 万、7 万、1 万、15 万、24 万港元。而大陆经港对台转口输出的贸易额自 1970 年至 1979 年逐年增长，有的年份增长幅度还比较大。如 1977 年为 1.43 亿港元，1978 年增至 2.19 亿港元，增幅为 53.33%。这一阶段，大陆对台转口输出以中药材为主，由台湾中信局统一采购。台湾对大陆转口商品主要是胶合板、合成纤维等。

第二阶段，从 1979 年到 1984 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台湾经港对大陆的转口额大幅度增加。由于台湾改变了对大陆贸易政

---

① 统计数字详见《香港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策，容许大陆产品经第三国或地区转口输入台湾，而香港则是目前最适当的地区，因而经港转口贸易不断兴盛。1979 年台湾经港转口大陆贸易额为 1.07 亿港元，1980 年为 12.05 亿港元，1981 年为 21.82 亿港元，占同年两地经港转口贸易总额的 83.70%，也是这个阶段所占比重最大的一个年份。1982 年为 12.64 亿港元，1983 年为 12.27 亿港元，1984 年为 27.40 亿港元。这 5 年中台湾经港对大陆贸易额以年均增长率 59%的速度激增。而大陆对台贸易额年增长率为 20%，从 1979 年的 2.79 亿港元增加到 1984 年的 9.99 亿港元。这一阶段大陆对台主要输出中药材、蔬菜、冷藏鱼类；台湾对大陆主要输出合成纤维、电视机、自行车、摩托车、手表、电子计算器、冷热风机、阳伞等日用消费品。

第三阶段，为 1985 年至今。1985 年中国政府对大陆转口贸易加强管理，主要是在第二阶段中台湾不法商人利用大陆对台湾产品的优惠待遇以假货、次货输往大陆，中国有关方面采取措施以遏制这种不法行为。但当年台湾对大陆转口贸易额仍达 77 亿港元，年增长率为 130%，1986 年略降为 63.28 亿港元，1987 年回升至 95.67 亿港元，1988 年更达到 174.89 亿港元。这个阶段台湾的输出商品主要为工具机和中间原料，日用消费品有所下降。而台湾输入香港的农产品增长很快。我们仅以台湾输港的蔬菜为例，自然条件不如广东沿海一带的台湾，在蔬菜出口的数量与数值上取得很大的成绩。特别是蕃茄，在 1986 年台湾输港蔬菜中占货量的 59%，货值的 34.7%，而成为香港最大的蕃茄供应地。而大陆的蕃茄仅占货量的 6.7%，货值的 3.8%。台湾蔬菜超过大陆的还有卷心大白菜(黄芽白)、花菜与西生菜。另外，在单价方面台湾以其质优而超过大陆约 25%。

两岸贸易从隐蔽的状态转变为公开的或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转变中，香港发挥了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和两岸也都从转口贸易中得到各自的利益。台湾派驻香港的机构中，有相当大

的部分都与大陆有经济往来。大陆也成了台湾省的第五贸易伙伴，台湾省则成为中国大陆的第六贸易伙伴。事实上截至1987年底为止，大陆经港输台的商品仅占台湾入口总值的0.8%，台湾输大陆的货物仅占台湾出口总值的2.3%，可见香港这座沟通两岸的经济贸易金桥尚且大有潜力可挖，大有用武之地。

四、勤劳智慧的华人创造香港的繁荣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香港的经济奇迹当然是包括众多优秀华人企业家在内的香港人民长期殚精竭虑创造出来的。在这众多佼佼者中，我们举出如下各有特色的几个例子，以体现香港华人实业家的拳拳爱国之心与辉煌的经营业绩。在香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40多年中，他们为香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独具突破性特色的霍英东

香港实业家成功之路可谓各有千秋，而霍英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突破性。从革新香港房地产经营方式，到承造世界上首次设计的围海淡水湖工程；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的合法席位，到兴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及培养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从大胆尝试创办由中国人管理的现代化的白天鹅宾馆，到力促实施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宏伟规划，他一步一个脚印，为香港的繁荣，为中国的富强做出了令人赞叹的业绩。

霍英东出生于一个濒临绝境、备受欺凌的水上“疍民”家庭，成长于战争和动荡交织的年代。青少年时期，曲折、贫穷的生活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闯过无数个难以逾越的难关，铸就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他以勤勉著称，数十年来未享受一次假期，前半生为事业奋斗，后半生为国家努力。霍英东原籍广东番禺县，

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个船民之家。按族谱辈份排列属于“和茂盛发达，耀好应时兴”中的“好”字辈，结婚时取名好钊。当他呱呱坠地时已家道中落，以至全家竟无一双鞋可穿，终日以赤脚大仙自诩。水上人家命运乖蹇，两个年幼的哥哥因台风翻船而夭折，40多岁的父亲一病不起，逝去时英东才7岁。他与妈妈、9岁的姐姐和5岁的妹妹是水渠街贫民窟中最困苦的人家。目不识丁的母亲却严于家教，6岁那年就将他送至私塾先生门下，拜师仪式上以棋子饼和一把葱供拜孔圣人，意喻读书会开窍。在帆船同业义学就读时以作文第一名而入敦梅小学，并转读皇仁书院。然而高额学费几乎使这个家庭一筹莫展。每天上学母亲只能给一毫钱，来回电车费要扣除6分，中午只能赶至为食街吃4分钱一碗的糯米饭。为了省钱他常常疾步30分钟上学。课后为健身踢上几十分钟足球再赶回家帮忙记账和分送发票。紧张、艰苦的生活炼就了他的坚强意志。他的高中学业因日寇占领香港而中辍。为生活所迫，他做过轮船铲煤工，太古船坞打铁工，风枪工，机场苦力，学过开汽车，糖厂化验工，仓库磅米工，终因体力不支而告吹。1942年他在母亲与其他13人于湾仔鹅颈街所开“有如”杂货店中干活，手脚不停地忙进货，头脑不停地忙算账，有如计算机那样逐样讲价计价汇总，还要抽空招待其他顾客，霍先生回忆这段生活时认为确是“经营生意的好训练”。战后他选择了一条冒险之路。年仅25岁的他与他人合资前往东沙岛采集海人草，费尽周折才到达目的地。渔工在这鲨鱼出没的海域出生入死，在40℃高温下连续作业。在东沙岛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苦熬了半年，卖海人草的收入仅够各项开支，一文钱也没有赚到。东沙之行两手空空，但极大地锻炼了他的毅力和意志。

五十年代初霍英东决定经营香港房地产业。针对当时房地产商不符合香港实际的做法，他将房地产工业化，兴建住宅、写字楼、商场综合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预售“楼花”，提倡分期付款。这

些新办法克服了以往由银行贷款资金周转期长，如买地、规划、建楼、以至付租，建房都要付出高额利息的弊病。霍英东创造的预售楼花方法，香港地产商纷纷群起效尤，在全港卷起“炒楼花”的旋风。从 1955 年到 1965 年的 10 年间，香港房地产业异军突起。霍英东率先建起港埠第一座最高的 17 层大楼后，被实业界公推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而且还是该会永久名誉会长。他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标是基本实现了。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业连带推动了建筑业、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旅游、商业、饮食业，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兴盛。而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兴旺又反过来给房地产业以动力。整个香港繁荣起来了。

霍英东随之投资海底淘沙、填海造地，又承包海湾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继而远徙汶莱、槟城，也都胜券在握。由于霍英东用独特的方式办事，消除中间环节，直接管理到底，节省了大笔外国公司所必备的管理费，工程又是承包形式，因而能克服重重困难，获得盈利。

霍英东还以他的报国之心扶持中国的体育事业，在体育界留下许多佳话。他不仅为振兴我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倾注了心血。他捐出 1 亿港元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还特意让他的两个儿子霍震霆、霍震寰作为基金会的成员，就是要让霍家子弟世世代代以爱国、尊师、助教为己任。

广州白天鹅宾馆是霍英东坚持“三自”的产物，即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管理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他强调，白天鹅的钱他一文不取，还要长期支持，不断注入资本。开业 8 年来，营业收入 9.2 亿多元，交纳税金 0.42 亿多元，连同利润 3 亿多元，年均开房率达 76.26%，共接待客人 315 万多人次。近 10 年来霍英东对祖国和家乡分别资助了 110 多个建设项目，其支出金额截至 1991 年 3 月止，总共 13.27 亿港元。

（二）李嘉诚从塑胶花到地产业的奋斗之路

据1996年《福布斯》杂志刊载全球华人亿万富翁376位，其中祖籍广东潮州的香港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集团主席李嘉诚位居第五位。李嘉诚身兼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董事长，该财团在香港十大集团排行榜中荣登榜首。据香港《信报》1988年1月5日的统计，1987年香港十大集团控制的上市股票总市值2438亿港元，占上市公司总市值4196亿港元的58％。而李嘉诚集团则为592亿港元，占总市值14.11％。近年美国出版的《财富》杂志统计其资产25亿美元（约200亿港元），排名第26位，成为全球华人首富。而又有多少人知道，李嘉诚就是从貌不起眼的塑胶花推销员做起，直至成为香港地产大王，登上事业顶峰呢？

李嘉诚于1928年出生在广东潮州北门街面线巷的书香门第家庭里。其先祖系中原人氏，后迁居福建莆田。明末清初年间又辗转流徙至潮州海阳定居，传至李嘉诚恰届10代。其祖父、伯父、父亲均执教于潮汕，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潮汕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其父随着难民潮涌入香港，因肺病于1943年病逝于拿打素医院。父亲临终遗言“失意不能灰心，得意不能忘形”使李嘉诚刻骨铭心。年仅15岁的他告别校门，挑起生活的重担。经过泡茶扫地的学徒生涯后，又在一家五金制造厂及塑胶裤带公司任推销员。年仅20岁就晋升为塑胶厂业务经理、总经理。

在创业的道路上，命运之神曾3次向他招手，而他每次都紧紧抓住机遇。第一次是由经营塑胶玩具转向塑胶花。敏锐的洞察力提醒他注意港人及世界发达国家的消费取向，意识到塑胶花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1957年初，他获悉意大利厂商已制成塑胶花，便亲赴当地考察，搜集塑胶花的制模、调色、配枝叶等步骤和技术关键，又买回当时最抢手的绣球花品种在香港作样品研究。随之把握

时机，注入资金，扩大规模，把长江塑胶厂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从生产塑胶玩具转向为塑胶花，他网罗全港最优秀的塑胶技术人员，生产的塑胶花质地优良，外观漂亮，品种繁多，连意大利厂家也望尘莫及。至 1958 年他的资产已突破 100 万港元。随着 1959 年香港从转口贸易向工业迈进的历史性转变，塑胶花给他带来了数千万港元的收益。

胜利并没有令他陶醉。独具慧眼的他又抓住了第二个机遇，果断地投资房地产业。1958 年李嘉诚就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 12 层高的工厂大厦。1960 年又在柴湾购地兴建另一座工厂大厦。两楼面积共达 12 万平方米。1966 年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北京出现“火烧英国代办处”严重事件，香港谣言蜂起，人心浮动，地产有价无市。一些目光短浅者纷纷以极低价格抛售工厂、商店、酒楼、住宅。在这关键时刻，李嘉诚坚信否极泰来，乱极必治。他反他人之道而行之，倾其所有购入许多地产。1975 年便拥有楼宇面积 510 万平方英尺，次年增至 635 万平方英尺。中国打破闭关自守，向全世界敞开国门之后，各国投资者涌入香港，1979 至 1980 年香港地产狂热到了顶峰，地价暴涨几达 20 倍。幸运之子李嘉诚拥有楼宇面积增加到 1500 万平方英尺，超过了当时拥有 1300 万平方英尺的英资置地公司，成了除港府以外香港最大的地产界巨富。

第三次是抓住股票上市的机遇。他意识到借助股票市场可以向社会筹集更多的资金，加速公司资金的周转，遂于 1972 年 10 月改名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申请股票上市，法定股本 2 亿港元，实收资本 8400 万港元，分为 4200 万股，由渣打和汇丰两家银行包销。当年即获申请表格为 59017 份，超额 65.4 倍，可见市场普遍看好。1973 年长江实业获取纯利 4370 万港元，比上市时的预测 1250 万港元超出约 250%，并陆续在伦敦、温哥华挂牌上市。1974～1975 年两次发行新股集资 1.8 亿港元。时值世界经济严重衰退，香港地产市场萧条；李嘉诚高瞻远瞩，大量收购新楼宇地皮，

为香港经济的复苏作准备。同时斥巨资在北角半山著名风景区赛西湖畔建高级住宅区，2年内竣工，获利6000多万港元。太古山谷一号地盘获利1450万港元后，又与新鸿基、亨隆、周大福等集团联手，在湾仔海傍的高士打道英美原址新建伊利沙白大厦及洛克大厦，售后总获利1亿港元；以长江实业35%的份额计获利3500万港元。到1976年长江实业集团已发行1.13亿股，资产净值5.3亿港元，比1972年增加3.4倍。截至1987年12月，长江实业共发行股票21.98亿股，成为香港10大主要上市公司之一。他以雄厚的实力，科学的估算参加香港中区地铁中环站和金钟站的投标也屡屡得手。1978年后，他向老牌的英资怡和下属台柱九龙仓与青洲英坭有限公司挑战并获其控股权。1979年9月25日收购和记黄埔22.4%的股份，共6.39亿港元。由于和记黄埔是一家声名显赫的老牌英资集团，而长江实业当时市值仅7亿多港元，所以"蛇吞象"之说一时脍炙人口。这标志着香港现代经济史上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英资集团垄断香港经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1981年1月李嘉诚出任和记黄埔集团董事局主席，拥有超过40%"和黄"股权。1986年9月，他斥资6亿港元收购在伦敦上市的多元化英国公司——皮尔逊有限公司普通股4.9%权益，这是和黄进军海外的重大举措。12月又以27亿港元买下加拿大赫斯基石油有限公司43%权益。和记黄埔成为今日香港的桂冠集团。他表示今后在外国投资1元，就要在香港投资3元。和黄属下的百佳超市和屈臣氏集团每年从中国内地入口货物达10亿港元，购买食品达3亿港元。还与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发射、操作和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地区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其成本总计1.2亿美元，三家公司各占三分之一股权，为从日本到地中海各国的25亿人口提供电讯服务。

八十至九十年代，李嘉诚以过人的胆识连续在香港进行了包括近期和远期的庞大投资行动，数目达数百亿港元，为稳定和繁荣

香港表现出了一种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责任感。

尤其感人的是在八十年代捐资6亿港元兴建汕头大学以造福桑梓。他的建校宗旨是“要高规格，不要低标准”。他表示：“我的事业可以破产，我的一切可以失败，但是为四化培养人才，汕大一定要办。”汕头大学占地面积1500亩，总体规划总建筑面积达26万平方米。第一期工程的实验楼、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集会堂等24个项目已于1986年6月竣工。第二期、第三期工程正在抓紧进行。早年失学的痛楚他已渐渐淡化，不轻易向人提起。今天，他要以自己十倍的努力来回报祖国，要让更多的潮汕子弟，要让更多的华夏儿女圆了他们的大学梦。

（三）包玉刚从“旱鸭子”到世界船王的历程

1918年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包村。其父包兆龙是一位性格豁达乐观，健谈且富有幽默感的富实商人。他育有三子：玉书、玉刚、玉星和四女：爱菊、美菊、素菊、丽泰。包兆龙在汉口经营鞋业，后到上海金陵东路开银楼。抗战后又与人合股开办国丰造纸厂。包玉刚小学毕业后离开宁波乡下，随其父到汉口和上海继续接受教育。从22岁起包玉刚进入了银行界。玉书、玉星也先后就职于银行。1948年下半年，包兆龙一家从上海安亭路20号迁出，作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膝下已有4个千金的包玉刚随父来到了香港。在香港包玉刚发现银行业基本为英国资本所控制，已无法重操旧业，于是他改行从事进出口贸易。1950年10月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包玉刚利用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为内地组织进口钢材、棉花、药材等重要物资。我国第一次发行公债时，他又率先认购10万港元，体现了海外游子的赤诚报国之心。

五十年代中期，包氏家族为今后经营方向开展多次讨论。包玉刚竭力说服要经营房地产业的父亲去开拓航运业。他认为香港有

极好的港口，船是动产，而且航运业涉及到金融、经济、政治甚至工程技术，范围广，回旋余地大。但几乎全家人都反对这个连船头船尾都分不清的“旱鸭子”包玉刚所提的主张。他们担心航运业的兴衰受多种因素支配，稍有不慎即可能倾家荡产。包玉刚坚定不移地说服了家人。他决心集资购买旧船。为此他广泛调查研究，参观船厂，访问租户、船舶代理商和其他机构以权衡利弊，选择最佳方案。1955 年，他集资 77 万美元，买了一艘烧煤的旧船，排水量达 8700 吨。这是英国于 1927 年建造的，原名“仁川”号。包玉刚以希腊语第一个字母“阿尔法”开头，将这条开拓性的船只命名为“金色的阿尔法”即“金安”号。1955 年 7 月 30 日环球航运集团的第一船满载着包氏家族的厚望终于启航了。然而香港航运界的老手们对于包玉刚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因为他改当时流行的厚利“散租”为自己独创的薄利“长租”经营方式。事实证明包玉刚的方式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时值苏伊士运河因 1956 年埃以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陡涨，租船生意兴隆。包玉刚稳坐钓鱼台，与日本船舶公司续订新约，提高租金。当年年底所赚利润就为他买回 7 艘新船。1957 年下半年，曾经嘲笑过他的船东们却愁云满脸，活像吃了一只苍蝇。因为航运价跌至最低点，散租船已难于盈利，而租不出去的船却要付出大笔的保养、保险、利息及船员工资等费用。包玉刚以 3 年、5 年乃至 10 年的租期长租给用户的船舶，却免除了诸多烦恼。所以他在这航运不景气的年头照样坐收渔利。人们佩服这个未届不惑之年却有前瞻精神的新船东。

在生意清淡的 1957 年，包玉刚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地向资产超过 50 亿美元的英资汇丰银行申请贷款，此举除了业务上的需要，潜在的目的是希冀藉此扩大环球航运的影响。在交往过程中，与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结为挚友。1962 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未及 2 年汇丰便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并拥有三分之一的股份，汇丰银行向包氏集团投资的账面

金额也超过 5000 万美元。1955 年曾被汇丰拒之门外的包玉刚，1968 年居然被汇丰主动聘任董事，此前尚无一个华人或亚裔人士出任过此职。当汇丰银行将聘书送到包玉刚的手中时，包玉刚百感交集，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世态炎凉。要想在商海中遨游，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心理上的强者。有了汇丰的鼎力相助，环球的业务更宽广了。1970 年汇丰以 45%的股份与包玉刚合资成立“环球航运投资有限公司”，包玉刚也荣升汇丰银行副董事长。1978 年包玉刚已拥有“W”标记的巨轮 170 多艘，总吨位达 2000 万吨，超过希腊的奥纳西斯、斯塔佛洛斯和尼亚科斯而跃居世界船王之首。1980 年 7 月 22 日维也纳《信使报》称之为“真正的船王”。1981 年，包玉刚爵士的船队拥有超级巨轮 210 艘，总吨位 2100 万吨，早已超过美、苏国家所属船队总吨位，居世界航运企业之首。1989 年香港《资本杂志》将他列为香港第 3 名富豪，称之为“世界首位华人船王，估计目前财富约 115 亿港元”。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在百慕大、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里约热内卢等地设立了十几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所属船只分别在利比里亚、巴拿马、英国、香港注册，也实现了他在 1955 年就立下的“船务是世界性业务”的诺言。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包氏在他俯瞰香港港口、铺着白色地毯的办公室里，每天从上午 9 点到下午 9 点，一年 51 星期，以高度效率结合东方的情感主义处理繁忙的业务”。这就是设在香港会德丰大厦第 24 层的环球航运集团总部，繁荣美丽紧张的香港尽收眼底。包玉刚就在这里驾驭着世界第一流的船队。

七十年代末由于国际航运业的萎缩，包玉刚开始在港投资地产业。1980 年 6 月 23 日，为收购英资怡和集团属下的九龙仓股权，在短短的 2 个小时内，他调动 21 亿港元，以高于英资置地公司的价格收购了 19%的九龙仓股权，完全控制了该公司。1985 年 2 月 16 日又一掷 25 亿港元，击败南洋财团巨富邱德拔的挑战，依然牢牢掌握着九龙仓。1986 年，包玉刚又成功地收购了英资渣打银

行 14.5%的股权，成为这个著名国际银行最大的个人股东。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如果说这位世界船王有什么嗜好的话，那就是早泳、跳绳和打高尔夫球。岁岁年年，他情有独钟。一日之计首要之事就是早泳。由于他经常来往于东京、伦敦、纽约之间，除了每天游泳之外，还在行李箱中必备有跳绳。即使是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也要每天坚持跳绳 400 下。至于高尔夫球则是他对付日本商人的一件法宝。日商崇尚在艺妓馆中谈生意，洁身自好的他则以打高尔夫球来婉拒之。日商通常对这个球艺平平的对手要让出 18 杆。1991 年他以 78 岁高龄溘然长逝。

第十一章　香港文化纵横谈

一、香港文化的根在中国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总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仿佛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没有滋润过她。又有一些人认为，经济腾飞的代价必然是文化上的滞后，似乎这已经成为不变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论调渐渐失去了听众。事实证明，香港文化正以它无限的生命力展示在珠江口上，经济发达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因为它的根在古老的中国。

考察香港的文化，不能脱离香港人口的构成及其变迁。香港从被割占时仅有居民近 2 万人，发展到今天有 600 多万人口，这期间经历过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内地解放战争以及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等多次来自内地的移民高潮。由于人口构成中华人约占 97%，这些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自然同古老的中华文化

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特别是香港文化，至今仍具有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岭南文化的许多特征。

据古代文献记载，香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4年，即秦始皇33年，在那场名垂青史、统一中国的血与火的洗礼中，香港已经纳入了南海郡番禺县的版图。直至香港被强行割占前，尽管在行政区划方面有些细微的变动，但就文化区域而言，与岭南文化，这支以广东、广西、海南等为主体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地区性文化是融为一体的。虽然由于近代殖民者的入侵而造成香港与广东的分离，但香港在历史的长河中，同上海、广州等中国一批沿海城市相似，都是近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无论就地缘、血缘、亲缘或就文缘和俗缘而言，香港与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香港文化虽然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但它的根系，仍然是深深地植入中国传统文化这棵参天古树之中，并源源不断地汲取着丰富的营养。所以香港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某些西方文化的特点，只是流而非源，只是枝而非干。实际上，在超越一个多世纪的碰撞和拼接，融合和交流，吸收和扬弃之中，中西文化的结合使这颗东方明珠更加熠熠生辉，并形成别具一格的地方特色。

由于香港文化产生于上述特殊的背景，因而它既保持有从属于中华文化这个母体文化的性质，但又产生了许多不同于母体文化的特征。

这些特征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就内容而言，它的广泛性和涵盖性是十分突出的。世界上各种文化流派和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土壤和空间。从城市建筑，民情风俗，宗教信仰到影视传播、饮食游乐等均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就空间而言，形成了文化的多层次框架结构。如香港开埠之初英国人的高级山间别墅所带来的浓郁西欧风格，与山下华

人破旧的寮棚贫民窟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又如时至今日那些摩天大楼状如刺破青天的“石屎森林”与山坡上低矮铁皮木屋仍是这种特定文化框架的时空延续。

第三，在形式上，香港的各种文化景观、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形式，充分体现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多重性。在这里不乏世界一流的文艺设施，也有众多的艺术人才，然而低级粗俗的文化场所也时常提醒港人的文化危机感。终日在激烈的竞争中拼搏，港人十分需要以旅游和娱乐来松弛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所以香港文化含有显著的西方赛马、赌彩、东方抽签、拜神的风格。如同港人开玩笑时所说的，统治香港的有总督、马会、汇丰和股市。马会经常是港人脍炙人口的话题。

第四，香港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文化网络。高度发达的通讯传媒手段与频繁的人员交流往来，香港与世界各地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借鉴和吸纳了形形色色的东西方文化。

第五，香港文化价值的最大特征在于它的商业性。由于香港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金钱已经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在这里，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东西都商品化了。香港文化将世界各地层次不同、良莠参差的文化集于一身，因而也就更加富有多元性。香港文化已经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大观园。据统计，1983 年在香港注册发行的有 70 家报纸、455 家杂志、150 多家出版社，报纸发行量达 157 万份，平均每千人拥有 380 份，阅读率居亚洲第二。中英文广播电台 10 个，每周广播 700 小时。1981 年港产电影 130 部，上映影片 390 部，观众达 6500 万人次。另据官方年报《香港1990》统计，香港有日报 63 份，期刊 598 份。其中中文报 47 家，英文报 2 家即《南华早报》和《虎报》。国际通迅社、报刊和广播公司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的达百家。香港书籍发行量很大。官方 1989 年当年的出版数字，注册登记的新书有 7100 多种，其中外文多于中文，外文 4500 多种，中文 2500 多种，平均每天有近 20 种新书问市。据

非官方的统计，加上从内地、台湾以及其他国家来的书，每天上市新书可增加到60种，九十年代后更超过百种。印刷机构有近4000家，出版社200家，书店售书点1000个，报摊3000个，其中兼卖期刊、书籍的2000个，可见一个城市的文化含量。那么，当你步入香港，最直观、最令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二、兼采东西方特色的香港建筑文化

香港开埠前是由20多个村落组成的小集镇，人口只有7500多人。经鸦片战争被英国强占后，渐渐地通过填海造地，发展近代产业和配套的市政建设，陆续在铜锣湾一带矗立起一座座欧美风格的建筑物，辅之以宽阔的马路、山顶公路、以及后来修建的机场、地铁等，在建筑上充分体现了西方建筑艺术的风格。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的繁荣促使香港以城市园艺的特色而著称于世。在许多大型建筑物空地、公共屋村之间，多有内涵多样、形态奇特的写实与抽象相结合的几何图案雕塑点缀在如茵的绿草上。沙田、荃湾、屯门等新市镇内遍布生活设施齐备的住宅楼，远近闻名的有太古城、富豪阁、德福花园等。多样化设计的楼宇款式别致，富丽堂皇，高达50～60层的楼宇与白云相映，蔚为大观。在众多的楼群中，最高、最突出、也最富有时代感的，是坐落在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这是出自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的大手笔，高度约307.5米，是当今亚洲最高的建筑之一，比在它一旁的汇丰银行大厦高出了许多。其设计特点是大厦架子外露，顶上为高耸的靠着一侧的大三角，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凌云壮志。与中国银行大厦遥相呼应的则是大屿山离岛上的天坛青铜大佛，坐落在大屿山木鱼峰宝莲寺附近。大佛是释加牟尼跏趺盘坐在莲座上，身高23.18米，加上莲座为26.4米，再加上座基，总高度是33.95米。总重量为108吨，面部重50吨，还有2.04公

斤黄金，铸件282块。由航天部南京晨光机器厂铸造，3年而成。

三、源自内地的多种多样的岁时习俗

如果说香港的建筑文化已经过多地融入了西方文化的因素，那么作为历史文化沉淀的岁时习俗，则体现了香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深层品质。尤其是香港背靠内地，面向华人众多的东南亚这种特殊的历史与地理的环境，所以保留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岁时习俗，以至于某些岁时习俗在内地已经荡然无存了，可是在香港，还如同活化石一般在向过往的人们倾诉着中国历史上那沉重而丰富多彩的一页。

如上所述，香港岁时节令及其习俗受岭南文化哺育已久，尤其是广州与之毗邻，所以颇类似于广州地区的岁时习俗。但由于香港地区又有众多闽南福佬、客家、潮汕、疍民等，所以显得比广州岁时习俗更为多元化，更加丰富多彩。概括起来，香港流传至今的岁时节令多达几十种，其中按阴历月份可以分列如下：

正月，有14个节庆，是节庆最多的一个月份，如春节、孙正真人诞、人日、白衣观音诞、玉皇大帝诞、元宵节（或称上元节）、钟林出会、天穿节、门官诞、路头神诞、天尊诞、招财童子诞、生菜会、司命帝君上天日；

二月，有7个节庆，如土地诞、祭灶日、文昌诞、洪圣诞（或称波罗诞）、花朝节、观音诞、真武诞；

三月，有10个节庆，如疍民“买力”日、清明节、北帝诞、上巳节、起愿节、何仙姑诞、医灵诞、将军诞、王后诞、土地公生日。

四月，有5个节庆，如浴佛节、鱼花节、金花诞、华陀诞、芒种节；

五月，有3个节庆，如端午节、龙母正诞、关帝诞；

六月，有9个节庆，如天贶节、军坡节、死鬼过桥节、龙母娘娘

诞、鲁班节、观世音诞、财神诞、二朗星君诞、围香日；

七月，有 9 个节庆，如康天帅诞、乞巧节、盂兰节、田了节、中元节、地官诞、城隍诞、郑仙诞、地藏王诞。

八月，有 5 个节庆，如司命灶君诞、中秋节、龙母润诞、山歌节、日娘诞；

九月，有 4 个节庆，如重阳节、火神诞、观音诞、华光大帝诞；

十月，有 4 个节庆，如下元节、五谷母生日、财帛星君诞、盘古王母诞；

十一月，有两个节庆，如冼夫人诞、冬至节。

十二月，有 4 个节庆，如腊日（腊八节）、送灶节、除夕、紫姑神（厕神）诞。[①]

这些岁时节庆主要体现了香港文化立足岭南文化，对内地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并且向东南亚辐射的特点。

首先，除了遍及全国城乡的春节、元宵、端午、中秋、清明、祭灶、除夕、冬至等传统节日外，其余节日主要祭祀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名人、地方英雄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早期开发岭南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因而将之奉为神仙予以纪念。然而有一个突出的地方特点，即较少内地那种浓厚的儒学色彩。可见香港岁时习俗文化尤其钟情于道教人物，如玉皇大帝诞、孙正真人诞、天尊诞、北帝诞、将军诞、天后诞、地官诞、城隍诞等。这反映了我国南方民俗长期受道教文化熏陶，在民间信仰和节庆方面也留下了许多痕迹。

其次，上述岁时节庆祭祀对象相当部分是女性人物。如冼夫人、天后、龙母、何仙姑、金花娘娘、日娘、盘古王母、五谷母、紫姑等。这反映了古代我国南方妇女是主要劳动力，因而在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有相当的影响。

再次，与毗邻的福建在岁时节庆方面颇多相似之处。如将军

① 有关资料参见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

诞、何仙姑诞、天后诞、冼夫人诞等，尤其是天后（妈祖）、何仙姑等民间信仰中的人物，原本就起源于福建的莆田和武平等地，后又传播至香港地区。

以下简单介绍香港地区的民间传统节日。[①]

1. **春节**：香港各界人士除夕前忙于备年货，家家户户贴春联，喜庆气氛随处可见。有部分人家素食，不扫地，不倒垃圾，据说避免将一年财运扫走。除夕之夜阖家守岁，新年来临，爆竹齐鸣，笑语欢声。大年初一相互拜年，近年时兴"电话拜年"，省去一些繁文缛节，也体现了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但少了一点人情味。互赠茶果，赏给小孩红包。食必有鱼和发菜，寓意年年"有余"和"发财"。春节还盛行龙、狮、麒麟、鱼、凤等吉祥物之舞，在广场或挨家逐户表演，多与游神和其他歌舞相辅相承，以渲染节日气氛。但近年来一些游艺、竞技、体育等项目有取代游神之势。

2. **元宵节**：如粤人李调元《粤东笔记》所说，"广州灯夕士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室灯供神，夜则祈灯取彩头"。此习俗相沿至今，元宵之夜，香港各住宅区华灯齐放，以祈新年风调雨顺，发财添丁。

3. **清明节**：此习俗源自越人尚鬼敬祖传统，至今已成为港人全民性文化心态。每逢清明节，数以万计的港人扶老携幼前往墓地祭拜，俗称"拜山"。更多的港人因根在内地，则不远千里乃至万里赶回故乡祭拜祖先。新闻媒体披露，1986 年清明前后，每天经深圳海关入境人数在 3 万以上，最多者超过 10 万，并在逐年递增。说明香港同胞情系祖国，魂牵梦萦均在故乡，以及眷念故土，叶落归根的情怀。扫墓主要有踏青、插柳、上坟、挂卜纸、修墓、焚烧冥纸、上供祭典等程序，完整保留了内地祭祖的全过程。

4. **端午节**：每年 4 月初八日，香港各街区即着手筹备龙舟比赛。从 5 月初一至初五，香港同全国各地一样，是划龙舟、赛龙船时

---

① 详见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

间。香港龙舟，制作技术精湛，装饰富丽堂皇，龙舟成为一种表现香港传统手工艺水平的佳作。沿袭内地古老习俗，端午节必吃粽子，饮艾酒，挂菖蒲以驱瘴避邪。

5. **盂兰节**：农历 7 月 15 日是盂兰节，又称鬼节。盂兰一词源自《盂兰盆经》，说的是目莲救母之事。因原系佛教节日，自佛教传入岭南之后一直沿续到今。盂兰节在香港十分隆重，多持续数日，举行盂兰盆万人聚会，超度和施舍所谓“无主游魂”。考其原因，可能与香港的早期开发以及移民为主的背景有关。一般香港居民住家有节日前后晚上烧衣习俗，包括烧元宝、冥钱、香烛、纸扎等物。并在冥衣上写上祖先的名字，同时备办三牲以祭祀先祖。

6. **中秋节**：“家和万事兴”，自古以来中国人一贯重视家庭的稳定，注重家庭成员团结和睦，所以中秋节喻意阖家团圆，美满幸福。这在香港也是重要的节日。清人范瑞昂《粤中见闻》说：“8 月 15 中秋节，为大饼以像月，剥芋，食瓜，饮桂酒，……中秋之夕，儿童多燃柚灯，踏歌于道。”而今香港仍沿习此俗，仅有细微变更。多是举家来到空旷的草坪广场，以小红蜡烛围成一圈，家庭成员边赏月，边分享佳馔美酒，其乐融融，乃香港一大人文景观，并已形成独特的风景线。这种节庆活动延续到 8 月 16 日。清人陈子厚《岭南杂事抄》序言说：“粤中好事者于 8 月 16 日，某亲朋治酒肴赏月，谓之追月。”“追月”之习俗至今在港仍颇流行。

此外，诸如**波罗诞**、**真武诞**、**龙母诞**、**冼夫人诞**、**何仙姑诞**、**天后诞**、**军坡节**等在港埠均有很大影响。因为香港作为移民社会，来自佛山、高州、福建、海南的移民将原居住地的岁时习俗带到香港，使之成为民间信仰习俗荟萃之地。这些节庆规模大，牵涉面广，既有其广泛联络乡情，寻根探源，团结社区民众，倡导互助精神的健康一面，也难免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愚昧性和落后性的东西，如宣扬鬼神和报应之说，奢靡浪费等等。

除了上述民间传统节日外，香港还有很多道教节日，如各种神

仙诞辰日子都被定为节日，有些节日还有热闹的庙会集市和各种风俗游艺活动。每逢节诞日以及每月初一、十五，在香港的道教场所这种活动十分引人注目。九龙黄大仙祠为全港最大宗教庙宇，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善男信女云集庙中，笼罩在一片虔诚的香火云雾中。该祠历史实际不长，1915 年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的道教普庆祖坛梁仁庵道长将黄大仙像移来香港，会同道侣开坛，于 1921 年在新蒲岗竹园附近设立坛场，初名赤松仙馆，1925 年更名赤松黄大仙祠。1956 年才向港府注册，正式开放，任人游览参拜。港人参拜黄大仙者甚众，诸如筲箕湾谭公庙、元清阁等均供奉黄大仙。如果说香港的岁时习俗全盘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反过来说，对中国文化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则是香港的电影业。

四、千姿百态的香港电影

1895 年电影问世，3 年后香港就出现了商业性电影。1909 年美国人布拉斯基在香港拍了两部短片《瓦盆伸冤》和《偷烧鸡》。华人电影的开山之作是华美影片公司的《庄子试妻》。黎民伟摄制又反串女主角，其妻严姗姗饰配角。这是华人妇女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严姗姗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懿德师范，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队。人们很难将银幕上活泼可爱的淑女与实际生活中叱咤风云的女革命家相联系。美国电影商布拉斯基将该片携回北美放映，这也是第一部在海外放映的中国影片。

二十年代初，黎民伟先后在港埠成立新世界戏院和民新影片公司。1924 年为记录中国传统的京剧文化，专程到北京为大师梅兰芳拍摄《西施》中的羽舞，《霸王别姬》中的剑舞，《上亢夫人》中的拂尘舞，《木兰从军》中的走边和《黛玉葬花》片断，并剪辑成一部受人欢迎的短片。黎氏还摄制成有关香港风光、龙舟赛、足球赛、警察会操等新闻片。特别是他摄制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孙中山先生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黄花岗》、《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等已成海内绝版、弥足珍贵的广东革命政府新闻资料片。1925年沙基惨案后民新公司北迁上海。三十年代香港电影复兴后虽然质量远逊于上海产影片，但在数量上始终占优势。五十年代以后影片年产量一般保持在100部左右。近年来香港一个城市的影片年产量可以与大陆国产影片年产量相媲美。自本世纪初至七八十年代近80年间，中国共生产14000多部影片，而港产片约有7000部，足见其产量之高。

在香港电影史上留下悲壮篇章的是抗战影片。

1937年邝山笑、林坤山等发起成立的华南电影界赈灾会拉开了香港抗战影片的序幕。其中粤语片《最后关头》、《前进曲》、《回祖国去》、《儿女英雄》、《火中的上海》、《边防血泪》、《中国青年》、《焦土抗战》、《血肉长城》、《大义灭亲》、《傀儡美人》、《战云情泪》、《民族罪人》等共15部影片对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有很好的宣传作用。同时期的《广州抗战记》、《八路军攻平型关》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片。蔡楚生、司徒慧敏在港拍摄的《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国语片《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夏衍编剧)、《前程万里》均为抗战片极品之作。尤其是永华公司的《国魂》(吴祖光编剧)、《清宫秘史》(朱石麟导演)，前者讲述文天祥抗元、后者讲述光绪变法图强的事迹，都以饱满的热情宣扬了爱国主义。此时抗战主题片还有吴祖光执导、陶金、白杨主演的《火葬》、《山河泪》等，均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还要指出的是，林黛主演的《金莲花》、《貂蝉》、《千娇百媚》、《不了情》曾获得四届亚洲影后殊荣，12年中她共主演了50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千古绝唱。

六十年代香港新长城公司等陆续推出《绝代佳人》、《三看御妹刘金定》、《王老虎抢亲》、《芙蓉仙子》等卖座率很高的娱乐片或木

偶片。对于丰富内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凤凰公司也有《一年之计》、《垃圾千金》、《屈原》等佳作问世。

“文革”之后长城、凤凰、新联等制片公司组成银都机构，以连获五届中国武术全能冠军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首开纪录，一片唱红，首轮就卖了1500万港元。之后趁热打铁又拍成《南北少林》、《少林小子》，在香港、在内地、以至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少林热。武打功夫片风靡全球，“中国功夫”令人叫绝。

1959年邵逸夫加盟香港电影业。他早年在东南亚艰苦创业，苦心经营，由一台手摇式放映机创下拥有100多家影剧院的集团公司。来港后的扛鼎之作是在大陆《七仙女》启发下拍摄的黄梅戏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年来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一搬上银幕马上在港九取得轰动效应，而且波及台湾。台湾同胞在岛内得以一睹阔别多年的大陆戏曲片，受到台北市民热烈欢迎。由于台北影院爆满，观众如痴如狂，因而曾被报界称之为“狂人城”。

当台湾观众还沉醉在梁祝的爱情中时，香港阳刚动作片悄然升温。代表作有张彻的《独劈刀》、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大醉侠》。张彻也是香港影界怪才，他与别人合导的第一部片子是《阿里山风雨》，他一生只写了一首歌词却在影片中一炮走红。无论大江南北，还是黄河上下，无论海峡两岸，还是天隔一方，一曲《高山青》，撩开阿里山的云雾，把神秘的高山族介绍给中国大陆，介绍给世界。歌曲的感染力是如此之深，以至人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这只能是地道的台湾民谣。又有几个人知道《高山青》原来出自于香港影片呢？

嗣后邹文怀的嘉禾公司刚刚开张，刘亮华慧眼识珠，与李小龙在旧金山签约，第一部拍《唐山大兄》即收入高达300万港元。李小龙幼习咏春拳，又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系学成毕业，并创截拳道，人称“李三脚”。自《精武门》后，又自编、自演、自导《猛龙过江》，还合拍《龙争虎斗》。1974年《死亡游戏》行将停机之时，突然死在一位女星的闺房里，留下千古悬案。由他的“拳脚片”又引发

“上海滩片”、“枪战片”，令影迷目不暇接，大饱眼福。此后张彻复出，又有《金燕子》、《报仇》、《十三太保》、《马永贞》、《刺马》、《洪拳小子》、《少林五祖》等问世。《蜀山剑侠传》系徐克执导，因见长于动作加现代特技而为观众倾倒，也为动作片闯出一条新路。

时至今日，香港影片以其独具魅力在世界影坛中取得了重要的地位。高投入、高卖座、高片酬已经成为香港影片的重要特征。如制作费用动辄以千万港元计，卖座最高在4000万港元以上，演员片酬最高可达300～400万港元，周星驰已创片酬800万港元的破天荒纪录。当然对于香港电影界的繁荣，人们有各自的说法。然而这些说法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认同，即香港影片在广泛吸收西方影片制作的某些优点时，主要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如德国著名的电影史学家格雷戈尔就认为：“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大部分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式样（专家认为香港电影是从中国电影早期流派中派生出来的）；而七十年代的电影则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模仿美国和意大利的模式。然而，有的评论家把香港电影的情节雷同单纯视为优点；他们称道这些影片的‘视觉语言的表现力’。……香港电影与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电影生产极其相似，导演只能在严格规定的、一定类型的电影范围内发挥他们创作个性。”[1]

综观香港电影业所走过的道路，给国人与世界人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香港电影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宣扬了中国人民勤劳、朴实、善良、机敏、勇敢的个性。为了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香港电影界诸多制片、导演、演员、编剧等风雨同舟，互相切磋，为姹紫嫣红的影视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① 格雷戈尔《世界电影史（1960年以来）》，转引自柳苏《香港文化纵览》。

回　归　篇



第十二章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诞生

一、香港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中叶起,英帝国主义先后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并一直实行殖民统治至今。

清政府被推翻以后,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上述三个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被日本占领。1943年开罗会议上,中、美、英三国首脑认真讨论过香港归还中国问题。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中英在由谁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由于美国的偏袒,最终作出了有利于英国的调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明确指出:“对于过去中国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并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决定把香港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暂时搁置,留待时期成熟时加以解决。基于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措施,使香港成为中国当时几乎唯一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通道,这对打破西方的禁运和封锁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2年3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港澳问题致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重申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并指出港澳问题不属于一般殖民地范畴的特殊性:“香港和澳门的问题是属于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香港和澳门是

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被英国和葡萄牙所占据。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根本不属于一般‘殖民地’的范畴之内，因此，它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时以适当的方式加以解决。”

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于同年 6 月 15 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 年 11 月 8 日，第 27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该特委会的报告。显而易见，香港问题是中国主权内政问题，它不同于一般的殖民地独立。对此，联合国已予以确认。

二、“一国两制”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为了解决海峡两岸人为的分裂，就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和探索。1957 年 7 月，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57 年 4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对外国朋友说：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 年 10 月，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两个文告中，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重申了我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并进一步阐明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设想。1960 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又进一步制定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针，主要精神是：在台湾与大陆实现和平统一以后，除外交必

须统一于中央人民政府外，其他一些问题可待时机成熟后尊重台湾当局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中国政府把上述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传送给台湾当局。

历史表明，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的设想和探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以及对以后"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是有很大启迪和历史延续性的。

必须指出，香港、澳门问题同台湾问题性质不同，台湾问题是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则是恢复行使我国的主权问题。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我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我国新时期三大任务，这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深远影响。全会公报特别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可以看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确立，才使"一国两制"构想得以产生。"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

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任务之后，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解决和平统一祖国时，将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并希望海峡两岸尽快实现"三通"(即通邮、通航、通商)。

1979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在同美国参、众两院议员

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已在字里行间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的设想。

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也称"叶九条")。他明确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以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即"三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这九条，实际上是上述邓小平"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设想的延伸和具体化。

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表示，准备用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收回香港后，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随后中国制定了对港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这十二条基本方针对香港的回归和 1997 年后的香港政策，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解决香港问题的重大原则就此确定下来。它不仅是和英方谈判的根据，而且是 1997 年后实现"一国两制"的根据。

1982 年 1 月 11 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先生的谈话中，第一次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正式概括为"一国两制"。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邓小平还特意指出，"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关于"一国两制"的概念，正是从这时开始正式使用。

1982 年 12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第 31 条，其中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宪法关于特

别行政区的规定，为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后，也为我国恢复行使香港、澳门主权后，分别在台湾、香港和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并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确立了宪法的依据。

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对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的建立进一步指出："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1984 年 5 月 15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正式向全体代表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并获得大会的确认和通过。这表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且具有法律效力。

同年 6 月 22 日、23 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时，强调了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必要性。邓小平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怎么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也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

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邓小平还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稳定和繁荣，也不能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50年不变。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高屋建瓴，是解决香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方案，它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产物，也是新中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及要求

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其基本内容是：

（一）**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由于“一国两制”是一国前提下的两制，所以只能是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一国”的含义具体还包括：一个国家、一套宪法、一个最高权力机关以及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套宪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个中央政府，即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代表，这是原则性的，是不能动摇的。统一后，香港、澳门和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没有的、而自己所特有的一些权利。按邓小平的话说，台湾可以更宽，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但是，不能把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能搞脱离中央政府的完全自治，更不允许搞“两个中国”或变相的“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

（二）在一国的前提下，两种制度并存。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特别行政区搞它原来的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和平共存。

（三）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回归后，对台湾问题立足于“和平解决”。但是，我们不承诺不采取非和平手段解决方式，这主要针对一旦出现外国势力企图分裂台湾，或台湾公然宣布“独立”，实际上还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平统一的解决方式。

（四）设置特别行政区。以宪法和法律作保障，设置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区”作为一个国家内具有高度自治、既是地方政府而又不同于一般地方政府的政权形式，将保持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这些政策长期不变。

“一国两制”在香港问题上体现的基本政策是：

（1）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

（2）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不改变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并充分保证这个地方的稳定和繁荣。

（3）在香港设置特别行政区，并依据《基本法》进行治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即实行“港人治港”。

（4）照顾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

（5）在我国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后，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50年后也不需要变。

50年不变的根据是什么呢？邓小平说：我和香港朋友谈到1997年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还要继续多久，我说，如果继续15年太短了，索性讲到50年吧！50年以后再说。50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50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

邓小平还说：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香港几个不

变，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自由港的地位不变。相应的，台湾的政策也是几个不变。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搞小动作。不但1997年时不变，我们讲50年不变。50年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变，邓小平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是我个人的话，是人大通过的方针，是法，怎么会变？问题是政策对不对。对，谁也变不了。不对，当然应当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搞开放政策，把经济搞活，首先在农村见了效，谁能改变这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如果要变，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水平就下降，就会失去百分之八十的人心。"

前50年是不能变，那么，50年后呢？邓小平认为：50年后是不需要变。邓小平的理由是："后50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互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再说，"到了50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

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的中外代表时重申了上述的立场。他说："我们讲50年实际是一种形象语言，实际上50年后也不会变。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本身已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香港即使超过一万美元，那也接近了。因此，我们讲50年不变，50年后也不变，是不需要变，不是信口开河。"

邓小平在，不会变，邓小平之后会不会变呢？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这些政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人民都拥护，谁也变不了，谁要是想变，就会被打倒。"我不在了，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变不变总该有个法律依据吧！为此，邓小平特别指出："香港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有了这个法律依据，可以证明50年不变的承诺不是信口开河，是要记录在案的。"这对未来的接班人也是个

制约，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古老大国的风度，中国政府和党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怎么好说变就变？”

邓小平的意思很明了，“前50年是不能变，50年后是不需要变”。

四、“一国两制”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伟大意义

1984年9月2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代表英国政府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她赞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最有天才的创造，邓小平回答说：“这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构想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而这个构想也只有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才能提出。”

邓小平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一国两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基本国策。它的提出是把香港前途同我国长期发展战略和祖国的统一大业联系起来考虑的。”它的伟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成为可能，它圆了中国人民收回香港和澳门的梦，洗雪了民族百多年来的耻辱。香港、澳门的和平回归，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并推进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使祖国尽快实现统一大业。1990年2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同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率领的《中国统一联盟》大陆访问团会见时表示，希望能用“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他说：“海峡两岸同是一个根，我们没有理由分裂和对立，没有理由不实现统一。两岸同胞应该不计前嫌，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多为中华民族着想。”江总书记还指出：

“对于两岸统一问题，我们有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一国两制’。从政治上讲，我们可以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四十年了，这是大陆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台湾是资本主义制度，你就搞你的资本主义好了。海峡两岸实现统一有很好的基础，其一，我们是统一的中华民族，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其二，两岸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不同的制度。”

1990 年 3 月 20 日，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第三次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九十年代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进一步充实完善有关对台政策。”

1995 年 1 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再一次明确提出，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解决台湾问题。

（二）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同香港直接联系的国家和地区达 160 多个。中英两国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签字以来，外来投资迅速增加，对外贸易总额大幅度增长。这充分说明了不仅港人有信心，而且国际社会也对香港充满信心。用“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有利于稳定香港人心，使香港社会不发生或少发生政治、经济震荡，起到了维护香港稳定与繁荣的作用。连英国驻香港前总督尤德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具有远见的，它为香港向新阶段发展制定了蓝图。”

（三）有利于祖国的“四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内地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香港经济保持繁荣的十分重要因素，而香港作为内地通往世界的桥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总体格局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我国目前每年的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的收入，从香港取得的份额占了四分之一，香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巨大的补充作用。随着香港回归的到来，

内地与香港之间这种相互促进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四）**有利于解决国际争端，有利于稳定世界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已50多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矛盾和争端，“一国两制”的构想对解决当前一些重大国际争端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邓小平说：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国际上的争端总是要找个出路，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能的。否则，一些争端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用战争来解决。如果要稳定，不用战争，只能采取我们所讲的这一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待，局势可以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邓小平还指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这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方法可以延伸到国际问题。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的地方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方式。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政嗣对邓小平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非常赞赏，他深有感触地说：中英香港协议是“一国两制”的伟大实验，将对台湾和大陆统一以及南北朝鲜实现统一产生良好的影响。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用谈判的方式、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也表示赞同，她称赞说：“果断的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对抗则必将导致灾难；亲善和友谊能够克服误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做法（意指‘一国两制’）得到解决。”

第十三章　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的伟大胜利

一、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解放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统一祖国被列为中国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也日趋成熟。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99年将于1997年期满，为了刺探中国的立场和态度，英国官员接二连三地到中国“访问”。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率先访问北京。邓小平在会晤麦理浩时，明确向他表示：中国届时一定要收回香港主权。麦理浩一无所获，空手而回。不久，英国就开始制造麻烦。1980年，英国提出新国籍法，划分英国本土和属土公民，英国别有用心地突然提出新国籍法使香港产生一连串恐慌浪潮。港督急急忙忙赶回伦敦向英国外交大臣卡灵顿告急，卡灵顿立即禀告首相撒切尔夫人：“英国必须尽快解决新界租约问题，如此才能挽回投资者信心。”解决香港问题已迫在眉睫，英国急急忙忙地派外交大臣卡灵顿、掌玺大臣艾金斯、前首相希思到中国来摸底。邓小平在接见他们时多次表示：无论将来香港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经济现状会保持不变，投资者大可放心。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英国口是心非。就在邓小平与卡灵顿谈话之后，作为香港金融机构的“龙头”——汇丰银行大规模集资套现，名曰准备收购“老家”银行，实则挟资外逃。这使敏

感人更添隐忧，香港投资者心中打着小鼓，举棋不定。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对英国十分不利，撒切尔夫人再也坐不住了，决定亲自出马到中国来探个虚实。撒切尔夫人的北京之行，揭开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实际上这也是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的首次交锋。

1982 年 9 月 22 日，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载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她的丈夫丹尼斯和一大批政府官员外加 16 名记者飞抵北京。

宽广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英国的国旗迎风飘扬。下午 4 时，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始，少先队员向撒切尔夫人和撒切尔先生献了鲜花，军乐队高奏两国国歌，雄壮又威严。撒切尔夫人在中国领导人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她笑容满面地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摄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撒切尔夫人将以第一位访华的英国首相载入史册。各地的报纸纷纷以头版消息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

英国占领香港百余年来，其中至少有两次，是准备要扯皮的。一次是“二战”后，另一次是五十年代初，结果都相安无事地过去了。这一回，撒切尔夫人是有备而来。在英国现代史上，撒切尔夫人是继邱吉尔后英国政界的“铁腕”人物，人称“铁娘子”，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向以强硬和变通著称。1982 年英国和阿根廷曾就马尔维纳斯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开了一仗，结果以英国大获全胜而告终。“铁娘子”这次是挟着英阿马岛战役胜利的余威来华讨论香港问题，早在她来华前，英国已广造舆论：“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二、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

中英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共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双方政府领导

人会谈，第二次会谈是在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之间进行。在第一次会谈开始之前，中国政府领导人主动走到记者中间，向百余名中外记者宣布：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这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表示要收回香港。在随后进行的两国政府领导人会谈中，中国领导人正式告诉英国首相：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97年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此前提下将制定一套适合香港的特殊政策，以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香港有的报纸认为："香港未来前途至此已完全明朗化。"对中英双方政府领导人的这次会谈，新闻界作了如下报道：双方今天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讨论香港问题，会谈是有益……

9月24日，撒切尔夫人将与邓小平会谈，这是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最重要的内容。

据报道：9月24日这一天，撒切尔夫人于会谈前半小时就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她被告知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邓颖超叙谈片刻，然后再前往隔邻的福建厅与邓小平会谈。奇怪的是，当她从新疆厅那一头走向福建厅，走了一半还不见邓小平的身影。福建厅大门紧闭，与刚才邓颖超老早就在门外伫立恭候的情况适成相反。记者们注意到，女首相此时虽然脚下款款，但面带难色，心存疑虑。怎么还不见主人出来迎接？

主人心里有数，他没有早早恭候女首相，也不会过分冷落远方的客人。就在她惶惑地走到离大门约20来步时，门忽然一声洞开，邓小平笑着走出来，上前五六步与客人握手问好。

终于见到了中国第一号人物，撒切尔夫人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不料，邓小平却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这本来是句大实话，但其弦外之音呢？撒切尔夫人作何感想？

不知她是否有机会听到后来当过美国总统的布什说过的一句话："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卫星转播了会谈现场的实况。从现场直播中可以看到，撒切尔夫人正襟危坐，胸有成竹。她打出早已准备好的第一张牌，强调历史上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

众所周知，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三个条约是帝国主义过去在炮舰政策下强加于中国的，是侵略中国的产物。

问题既然已经摊开，就必须回答。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到时一定要收回。到时中国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邓小平还借古喻今开导说：如果到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英国政府同我们合作妥善解决了香港问题，对英国也是有利的。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结束殖民统治，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邓小平再次坚定地表示：主权是不容讨论的，在收回主权的前提下，我们愿意同英国讨论如何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撒切尔夫人心里十分明白，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中国要收回香港，谁都不能有异议。要收回，通知一声就行。甚至连通知也用不着，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撒切尔夫人还清楚记得过去历史的一幕：当初，葡萄牙占据印度的果阿、达曼和第乌，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既不承认印度主权，又拒绝谈判解决，声称"果阿等地是葡萄牙完整的一部分"，印度被迫强行出兵进入果阿等地，以武力收回了领土主权。历史的教训明摆在眼前。如果企图再对中国实行"炮舰外交"，那无异于以卵击石。

"主权牌"输了。撒切尔夫人见风使舵立即把话锋一转，提醒

说：如果香港问题处理不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她傲慢地表示，维持香港的繁荣，需要英国人留下来。她提出的理由是：怪鹅生的只能是怪蛋，不管是金的还是银的。香港式独特形态的繁荣是不能改变的，而要使这种繁荣得到维持，英国人治理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所谓香港前途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以英国治理为前提。否则会对中国"四化"建设不利。

邓小平立即接过话题针锋相对地指出：即使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对中国的"四化"建设又会有多大影响？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的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中国有信心，不认为收回香港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即便有，中国人也会勇敢地去面对。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希望和平收回，谈判收回，如谈不成，中国也要收回。虽然没有讲用什么手段收回，但其意已在不言中。

外电评述这次会谈：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

在中英会谈中，邓小平再次显示出他"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新闻媒介更对邓小平作了这样的追述：

——众所周知，邓早年在法国接受科学思维方法，并研究资本主义。他参加过闻名于世的北伐革命，后辅佐著名军事家刘伯承率千军万马，屡建战功，而且担任过拥有11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2年枪林弹雨的洗礼，25年党务国务的锤炼，在10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他7年赋闲，两下三上，久经风霜。更何况，他脚踏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身后有10亿人民。他否定的是被武力强加给软弱无力的清政府的而且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不平等条约。他当然坚定不移。"

这次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整整延长了50分钟。会

谈时间延长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心里有种种疑虑并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撒切尔夫人出来了。当她缓步走下人民大会堂门外长长的台阶时,人们发现她脸色凝重并有些心神不宁。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撒切尔夫人,突然一脚踩空,险些跪倒在地,幸亏那是最后的一两级台阶,已经差不多到平地了,否则会摔成什么样子真不可设想。但这一跤显然跌得不轻,连手袋也摔得老远,幸亏英驻华大使柯利达和港督尤德及时上前搀扶。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摔的这一跤立刻被电传反映到国外报刊上,迅速传遍全球。新闻媒介对这一跤作了种种猜测和评论:

——看来,她有点紧张。她没有料到中国态度那么坚定,在主权问题上连一点调和余地也没有,而且限定了时间,她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尽管她表面上态度强硬,多方辩解,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面前已经没有作用了。回去如何向议会交代?撒切尔夫人显然心神不定,因紧张而摔倒了。

——看来,"铁娘子"在中国的邓小平面前碰了钉子。

——看来,这大概是中国的列祖列宗显灵了,要"铁娘子"下跪,代她的负罪的祖先们向中国人请罪吧!

据报道,当天下午,当撒切尔夫人向中外记者宣读声明时,声音一度变得嘶哑,但仍坚持一口气念完声明,这就是她这次万里迢迢来到北京的唯一收获。全文只有 83 个汉字。

——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实际上只说两句话:第一,双方都希望香港能繁荣和稳定;第二,以后通过外交途径继续谈判。

中国新华社在发布这段联合声明时,还附上一段中国方面的

强硬声明：

> “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撒切尔夫人不愧是“铁娘子”，虽然白天摔了一跤，但是在当晚辞别的答谢宴会上，她若无其事并兴致勃勃地高吟中国的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她在北京高唱“友谊”的余音未落，到香港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开始老调重弹：“英国的立场是根据三个条约……我们遵守我们的条约，如果有人不喜欢这些条约，解决的办法是有关双方进行讨论，经双方同意而生效，但不能毁约。如有一方不同意这些条约，想废除条约，则任何新的条约也没有信心执行……”

撒切尔夫人继续抛售“三个条约有效论”，在香港引起强烈的反响。

据报道，当天下午，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学生代表愤怒地举起了“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的横幅，聚集在记者招待会的场外，以示抗议。此外，他们还递交了抗议书。抗议书指出：“我们不能接受英国首相的‘修改’条约的建议，这样就等同于承认这些条约，无疑令我们的民族尊严再次受损。”

英文《虎报》社论中说：“紧紧基于过去年代发黄了的条约的英国立场，显得顽固、甚至是不合时宜的。”

香港《星报》评论指出：“中国重申对香港的主权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是英国坚持条约，因为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又是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不光彩的鸦片战争之结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反应。美国人桑克顿在 1984 年 10 月 8 日《时代周刊》的《香港协议》一文中作了如下评论：1979 年 3 月前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晤期间，提出讨论香港问题。邓小平保证，香港居民对他们的未来“尽可以放心”。

这种令人鼓舞的开端几乎被撒切尔夫人的冷酷无情破坏殆尽。她在 1982 年 9 月访问了北京与香港。这次“铁女人”被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对阿根廷所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完全进入了她那个“日不落大不列颠”的境界。……她公开表态，英国将“忠于”19 世纪签订的有关香港的条约，也就是北京一直认为是“不平等和无效的那些条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新华社评论员相继作出强烈反应，再次重申对香港问题的严正立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涉及香港地区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均是“炮舰政策”的产物，中国人民不能接受……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阶段会谈就此结束。总的来看，在这一阶段会谈中，英方仍顽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但是中英双方已初步达成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识。

三、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

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之后，两国外交部一直为谈判程序进行交涉。英国坚持要把主权问题列入谈判内容，中国则坚持主权不容谈判，只谈判如何移交主权和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双方僵持、胶着了半年多。

1983 年 3 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作出了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保证。撒切尔夫人的这封信表明英国终于退却了，不得不放弃“三个条约有效论”的立场。同年 4 月，英国外交部对中国表示愿意重开谈判，但要求中国方面不应有任何先决条件，英国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这表明，英国方面从原来的立场有所松动。英国为何放弃“三个条约有效论”呢？据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虽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但并没有主动

提出提前毁约收回的要求。问题是英方首先提出来的。说到底，三个不平等条约是大英帝国不光彩的侵略历史，在国际道义上站不住脚。第二，中国不是阿根廷，英国不可能也无力用"马岛"战争方式，赖在香港不走。英国已经知道中国收回香港的"底牌"是采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不仅可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还可以利用这一方针，争取更多的利益。第三，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让香港回归中国，避免中国采取其他方式，英国可以体面撤退。对此，中方也作出积极响应。中国总理在这一年 4 月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6 月，邓小平提出"让英国人下台阶"的指示，并确定中英谈判的两条重要策略：第一，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 1997 年后如何管治的问题，1997 年后的管治解决了，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邓小平的这一"锦囊妙计"，也是中方谈判的一条主要策略。第二，谈判的日期要设限，订 1984 年 9 月为最后期限，不能由英国人任意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国知道，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由于邓小平在谈判原则性上不让步，在谈判程序上可适当灵活的谈判策略，英国只好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1983 年 7 月，中英两国第二阶段的谈判开始，一直到 1984 年 12 月中英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其间经历了几百个日日夜夜，共进行了二十二轮马拉松式的艰巨谈判。在长达两年多的谈判时间里，中英双方进行了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从第二阶段的谈判来看，英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三论"，即有关香港地区的"三个条约有效论"、以"主权换治权论"和"三脚凳论"，并打出"三张牌"，即"信心牌"、"民意牌"和"经济牌"，妄图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让步。从第二阶段的中英谈判来看，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体现了殖民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重性；在谈判前期，殖民主义因素相当突出；到了后期，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1984 年 4 月访华后才有所改变，现实主义因素开始占了上风。

（一）“以主权换治权”可以休矣

中英第二阶段谈判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即主权问题。英方认为，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主张“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像过去一样管治香港”，并把这种言论加以“现代包装”，美其名曰“公司经营法”，即中国收回主权后，当公司的董事长，聘请英国为总经理。英国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稳定香港的人心，才可以使“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指资金不会分散、外流）。这实际上是英国在玩弄“以主权换治权”，其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抽象承认而具体否定。在“主权换治权”的幌子下，英国又派生出所谓的“过渡论”，其借口是：英国撤出香港，把治权转移到港人手中以实现“港人治港”，需要过渡，距离 1997 年只有 14 年，时间不够，至少需要三四十年时间来过渡，香港才会稳定。这个过渡期，可以在中国主权名义下，由英国继续管治。说穿了，英国想在 1997 年后仍维持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英国玩弄的这种把戏，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拒绝。中国政府重申：主权治权不可分，没有治权就谈不上主权，1997 年后主权治权一起收。

由于英方坚持“以主权换治权”，谋求 1997 年后在香港继续行使管治权，而中方则坚持主治权不可分、1997 年整体收回，先谈 1997 年后香港如何管治问题，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谈不拢，关系较紧张。从第三轮开始，公报上就没有“有益的、建设性”的表示谈判气氛良好的字眼。

（二）“三脚凳”理论行不通

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英国还提出“三脚凳”的谬论，即把理应由中英双方解决的香港问题，说成是中英港三方的问题，“就像一

个有三只脚的凳子"。邓小平曾经讲过，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要做到中国、英国和香港三个方面都能接受，英方别有用心地片面抓住这一点，多次提出要让港英政府参加中英两国间的谈判，其理由是英国委任的香港官员是代表香港人参加谈判，"英国对香港人民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港人把英方的这种做法称为玩弄"三脚凳"把戏。大家知道，英方这种做法是对历史的歪曲，是站不住脚的。香港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只有中国政府才能代表他们。港府不过是英国属下的一个地方殖民政府，它和香港中国居民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殖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资格代表香港中国居民同中国政府谈判。港府作为英属的一个地方殖民政府，只有执行两国协议的责任，断无同两个主权国家平起平坐、插足两国政府间谈判的权力。

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港府的英国官员不行，那么让非英国人的港府官员或其他港民代表参加中英谈判，为什么也不行呢？

问题很清楚，创造这种"三脚凳"对谁有利？英国统治经营香港百余年，港督是英国任命的，港府自然对英国唯命是从。这样，英国从港府港民中肯定不难找出这样的人，他们以港人自居，实则听命于英国并完全服从英方的意旨，如果让他们作为"第三者"参加中英会谈，不仅会加重英国的筹码，让英方随意借"民意牌"与中国讨价还价，而且还会形成 2∶1 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局面。香港回归后，中国会尊重香港同胞意愿，那是中国政府应做的事，无需英国政府代劳。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过去所谓"三脚凳"，我们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两脚，没有三脚。

这里还有一段关于"三脚凳"的小插曲。

在中英第二阶段谈判开始时，记者们获悉英国代表团名单中有尤德，并且排名第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就问他："你是代表英国还是代表谁？"在记者一再追问下，尤德回答说："我以总督身份代表

香港市民参加会谈”。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尤德的讲话予以反驳，声明尤德只能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谈判。这是中英谈判活动中，中方第一次公开进行反对英国“三脚凳”谈判策略的斗争。

其实这种“三脚凳”的手法，早在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使用过，只不过演得比较“巧妙”，比较“含蓄”。1982年9月25日，撒切尔夫人访问上海，主持了上海江南造船厂为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建造的第二艘27000吨散装货轮命名交航典礼，她把这艘船命名为“世谊号”。在致词中她说：“这艘船是中国、英国和香港之间亲密关系的一个象征。有什么能比一位英国首相在中国最著名的港口为一艘香港轮船主持下水典礼更恰当地表现这种关系呢？”撒切尔夫人借题发挥，“巧妙地”把中国、英国和香港并列在一起，玩“三脚凳”游戏。中国悄然以对，新华通讯社在播发的新闻稿中把此“妙句”来个“重点删节”，这种抗议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三）“经济牌”和“九月风暴”

1983年9月8日，台风正面袭击香港，整个港岛乌云密布，风雨交加。而这时中英谈判也跟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毫无明朗迹象。由于第二阶段第三轮会谈公报中没有出现以往例行的“有益的”、“建设性的”表示谈判气氛良好的字眼，香港社会的恐慌心理加剧了，股市、地产市场一直下滑，港币不断贬值。港英政府对局面的恶化视而不见，不但不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反而火上加油使局势更加动荡。他们放出风声：“港币贬值主因是政治前景”，言下之意是，由于中国要收回香港，才造成港币贬值。英国开始打“经济牌”向中国施加压力，以增加英国的谈判筹码。舆论认为，英国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想通过打“经济牌”来得到。

同年9月23日，中英第二阶段会谈在北京结束，因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谈判陷入僵局。消息传出，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港币身价一路狂跌，金价暴涨，市面上出现疯狂抛售港币、挤兑美元的狂潮，港币与美元的兑换率从8.1比1急跌到9.7比1，港币一路狂跌又引起抢购的浪潮。由于老百姓担心口袋里的钱因物价上涨一天可能要打几次折扣，所以超级市场内人山人海，货架上的粮油食品等被扫荡一空。有人说："香港已脆弱得像一颗玻璃球，一掉下手就可能破碎，一切美丽化为乌有！"

当时正在香港访问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严词指出："香港当局应对港元汇价下跌负责。"另一位学者钱俊瑞也指出："导致这次港元暴跌的导火线，却是港英当局所谓'不干预'的反常态度。"

这种混乱局面不仅使香港人民深受其害，而且也波及到在港的英国财团利益。世界舆论也纷纷谴责港英当局这种极不负责的不干预做法。10月中旬，港英当局被迫采取挽救港币的措施：港币实行连系汇率，把美元兑换港币的汇率固定在1比7.8的官价上，并取消百分之十的港币存款利息税。港币从此开始稳定。一场影响整个香港金融市场的风暴渐趋平息，恒生指数回升，金融和商品市场也很快恢复平静。

（四）谈判开始纳入邓小平设计的轨道

香港的"九月风暴"过后，中英谈判的局面仍未明朗。1983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指出，英国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中国要的是完整主权，治权是主权的具体体现，没有治权，算什么主权？治权可以交给港人，并要希思回去转告撒切尔夫人，英国必须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时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邓小平表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

为了会谈成功，中国愿意采取相应灵活的措施。

1983年10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在加拿大两次强调邓小平设限的立场，并宣布中英谈判如在1984年9月不能达成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对香港问题的政策。英国政府总算了解了中国的决心。1983年10月，英国首相来信指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永久性安排。在随后开始的第二阶段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放弃了“主权换治权”，接受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政策，同意从1997年后如何管治香港入手进行实质性的会谈。

至此，中英谈判的主要障碍被排除了。但是，英国把“以主权换治权”的策略改变为“对香港继续保持联系”，不仅在1997年后要保持经济上的联系，还要尽可能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保持联系，这些在以后的谈判过程中及制订基本法的过程中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从1983年12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开始纳入邓小平设计的轨道。香港有的新闻媒介把此后“中英谈判”说成是英国人“谈”，中国人“判”，这当然言过其实，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时谈判的总趋势。

1984年1月，中英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的第八轮。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分别由中国副外长周南和英国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担任。从第八轮开始，中英谈判从总体上看较顺利地进行。以往的会谈最多一个月才举行一次，从1984年3月起，步伐开始加快，增加到每月二轮、三轮。

1984年4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访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同他会晤，有力地推动了谈判进程，使中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使香港人民从迷雾中看清了自己未来的前途。

杰弗里·豪访华后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期

望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在香港管治是不切实际的”。这说明，英国已决定在1997年后把主权和治权一起交还给中国。从这里还可以看出，谈判前期英国顽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以主权换治权”论，殖民主义因素相当突出，而从这时开始，英国领导人现实主义开始占主导地位。

1984年5月15日，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式向全体代表提出并获得会议的通过。这表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且具有法律效力。它受到香港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香港的前景一片光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前途也更加明朗化。

中英之间谈判的大风大浪虽已暂告平息，但小风小浪仍时隐时现。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在香港驻军。

（五）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在中英双方会谈中，英方表示，希望1997年后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认为这会不利于香港人心的稳定。可是，英方的这一要求同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大家知道，一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物和事件均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当然，其中也包括驻军权。

1984年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时明确指出：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邓小平接着说：英国外相跟我谈的时候，他也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明确得很的。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吗？

英国外相既然已承认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估计在这个问题上已无戏可唱。但英方还想利用香港的舆论向中国施加压力。归纳起来英方利用新闻媒介和其他渠道所造的舆论主要有以下几条：1.1997年香港是和平回归，驻了军，好像是武力入城，不利于

安定民心。2. 香港多年来有自己的武装，叫“香港团队”，到时把英国军队请走，不就行了嘛。3. 香港离内陆这么近，不必在香港本土，只要在邻近香港的深圳或其他地区驻军，如果香港发生了什么事，随时出兵都来得及。

针对香港刮来的种种舆论风，邓小平作了明确回答，他说：“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邓小平认为，驻军人数不必太多，大概三五千人就够了。

1997 年 7 月 1 日，为了国家防务的需要，为了保证香港稳定和繁荣，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象征。中国的有关法律及《基本法》第四条都对驻军的职责范围及应遵守的法律等作了专门规定。主要内容有：

（1）驻港军队只是负责防御和防止动乱工作，驻军不会干涉香港内部事务，也不管香港社会治安，治安由香港特区警察负责。

（2）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3）驻军非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出动，只有在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或者发生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应特区政府的要求，军队才会出来协助特别行政区，但仍以特别行政区为主，驻军处于协助地位。

（4）驻军人员除遵守全国性法律外，还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六）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

1984 年 5 月 9 日中英第十四轮会谈开始，以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为首的香港行政、立法两局的非官守议员 9 人组团赴英，意欲表达所谓“香港人的意愿”。他们无视中国政府一再

宣布的有关香港的方针和政策，发表了不合时宜的声明。这种做法引起香港人民的不满，香港专上学联向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提交意见书，以示抗议。

从伦敦回来不久，钟士元、邓莲如和利国伟 3 个非官守议员又于 6 月匆匆忙忙组团赴京。6 月 22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接见钟士元等 3 人。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我欢迎你们以个人身分到北京来走走。听说你们有不少意见，我们愿意听取。"

当钟士元表示他们是作为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访问北京时，邓小平说："但是我要讲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管这些方针、立场有多少人了解，我们相信这是符合 500 万香港人利益的。"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听到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不承认这些意见是代表全部香港人利益的。"邓小平提醒他们，"中英会谈我们会同英国解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针对有些人还在打所谓的"信心牌"和"民意牌"，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要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了中国的形象。凡是炎黄子孙，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其立场是什么，起码都对中华民族有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智力不比外国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问题，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邓小平最后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不要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使广大香港人民对中国政府的立场、方针

和政策更加了解，增强了对“港人治港”的信心。

（七）成立中英联络小组问题的解决

中英第二阶段的谈判，可谓一波三折。关于设立中英联络小组的争执几乎使中英第二阶段的会谈走入迷谷。

设立中英联络小组的提议是邓小平提出的。邓小平对来访的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在过渡时期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

中方的目的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这段过渡期内，双方通过这个专门设立的小组进行联络和磋商，商讨《联合声明》的实施及1997年政权交接的有关事宜。英方顾虑这个小组成立后，在过渡期会形成中英共管香港的局面，甚至担心它会变成第二权力中心，架空港英政府或者成为一个取代或凌驾港英政府的权力机构。因此，英方抵触情绪较大，并在香港广造各种舆论，跟中国相抗衡，迫使中国收回此建议。

实际上，这个联络小组既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权力执行机构，它既不参加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对其起监督作用，只是双方在碰到疑难或重大问题时，商讨解决办法的联络机构。遗憾的是英方没有能理解中国的这种本意和立场，致使后几轮的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打消英方的顾虑，中国提出，这个小组可以设在香港而在香港、北京、伦敦轮流开会。英方后来虽然同意谈判，但一拖3个月就过去了，到7月份仍无明显进展，离邓小平“设限”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了，中英双方仍僵持不下，形势逼人，出路何在？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7月27日至31日，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飞抵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中方随后提出一个更加灵活的建议，把联络小组开始工作的时间设定到1997年以后，以打消英

方“共管”的疑虑。也就是说，如果英国担心 1997 年前的过渡时期内联络小组会干预香港事务，那么 1997 年后不是同样也会成为一个制约中国的权力中心？由此，英方的顾虑被打消，很快中英双方就达成协议：联络小组在《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自 1988 年 7 月 1 日起以香港为主要驻地，一直工作到 2000 年 1 月 1 日为止。

中英联络小组问题谈判成功，再一次证明中国政府在同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在原则问题上，如收回香港主权、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在香港驻军以及建立中英联络小组等问题上同英国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但在相对次要的、非原则性的一些问题上，如“给英国人下台阶”、联络小组驻港时间及工作时限、以及签署协议的日期等，采取较灵活宽松的态度，不但让英国面子上过得去，而且也照顾到英方的一些利益和要求。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使双方满意。

四、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

1984 年 7 月 31 日，中英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在机场为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送行时，当着记者的面，吟咏了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杰弗里·豪随后在香港接着周南的话：“中英双方在达成有关文件的形成和内容的一致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中英谈判顺利且很快就要达成协议。眼看中英谈判成功在望，3 月份曾把总公司突然迁到百慕大的怡和洋行老板急忙赶到北京，再三声明：怡和迁册百慕大纯属商业行为，希望予以谅解。表示：怡和同中国已经“合作”了 100 年，还愿意再合作 100 年，200 年。“怡和”的回头应证了邓小平曾对撒切尔夫人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我们对香港的政策对头，即使有些人走了，也会回来的。”

笼罩天际的乌云渐渐散去，明媚的阳光即将光芒四射，香港的

前途充满希望、一片光明。

新华社在报道第十九轮会谈时，重新使用“有益的、建设性的”字眼。1984 年 9 月 5 日，中英第二阶段第 22 轮会谈开始。两国代表团团长在会晤时大谈秋收，周南团长说：“现在已是秋天了，我记得大使先生是春天前来的，那么已经经历了 3 个季节了——春天、夏天和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示意，中英协议已经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一年多来，中英之间经过 22 轮风风雨雨的艰难谈判，最终获得圆满成功。中英两国将于 1984 年 9 月 26 日，在北京草签中英《联合声明》。

9 月 26 日这一天，中国通过人造卫星向全世界实况转播了这一历史性场面。10 点整，草签仪式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开始，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英国代表团团长伊文斯分别代表本国政府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联合声明》含有 3 个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2)《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3)《关于土地契约》。

双方的工作人员为了谈判的成功，在 22 轮的谈判中，在 700 多个日日夜夜里，付出多少辛劳的汗水，又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在中英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在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中英双方终于草签了《联合声明》。

1984 年 12 月 18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陪同下，再次来到北京。天安门前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十里长安街彩旗飘扬，喜迎佳宾。

12 月 19 日，撒切尔夫人第二次在北京会见邓小平。她见到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伟大的一天”。邓小平说：“香港问题

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友好一片光明。这是中、英两国的领导人对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出的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益的事。”

邓小平还向撒切尔夫人进一步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说:“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提出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我们拿事实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满怀信心地告诉撒切尔夫人:“再过 13 年,再过 50 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能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们,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民:中国是信守自己诺言的,也相信自己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是行得通的。”

撒切尔夫人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她称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天才的结晶”,是“中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的关键”。她说:“中英两国之间的友谊和维护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前途的共同愿望,终于取得成功。”她保证说:“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在英国负责管理香港的剩余时间内,我们一定会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这是我们首要的目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全部实行双方达成的协议。”

国家主席李先念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李先念对撒切尔夫人说,您是来完成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的。中国领导人高度赞扬撒切尔夫人在解决香港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政治家风度和远见卓识,以及为圆满解决香港问题所作出的贡献。

撒切尔夫人颇为感慨地回忆起两年前邓小平“设限”(指 1984 年 9 月)完成中英谈判的决策,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对这种说法我

有些怀疑。现在，事实证明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协议极为重视，这是一个很好的协议，将给香港人民带来巨大的信心。”

5 点 30 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仪式正式开始。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灯火辉煌、喜气洋洋。邓小平、李先念等在京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几乎都出席了签字仪式。

现场采访的记者多达一二百人。有的记者对签字现场作了如下描述：

> ——只见大厅中央那幅“松柏长青”的屏风下，放置着一张铺有墨绿色绒布的长桌，桌中央插着中英两国国旗。最耐人寻味的正是这幅“松柏长青”，画面上有七八只和平鸽，或者绕枝头，或在半空飞翔。看来，选择这个厅作为签字地点，事前显然花了一番心思：百多年前在炮火淫威下失去香港，百多年后在和平友好气氛中收复失土，这是人类历史上何其伟大的一个进步！

由香港各界人士组成的观礼团被安排在签字的绿绒长桌的斜对面，让香港同胞能目睹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的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中国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了现场的实况。

在频频闪亮的摄影的银光中，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在热烈的掌声中，双方互换文本并握手致贺。在随后的致词中，中国政府领导人说：“《联合声明》的达成，是我们两国共同努力的成果。”英国首相说：“《联合声明》在香港的生活史上，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解决了两国间一个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使中英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它洗雪了中国百年的民族耻辱，使中国在实现统一大业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它向世界表明，中英两国用“一国两制”和平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不但

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而且开创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局面。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在紧张和对抗不幸地笼罩着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时候，对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取得成功，将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次极为突出的范例。"

英国议会议员、下院英中关系小组主席罗伯特·艾德礼对此评论说："中国为了解决香港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不寻常政策，我认为，这个事实说明中国政府是成熟的、富有想象力和稳定的巨大标志。"他强调指出："美国人应当吸取教训，在台湾的人也应当吸取教训。世界在变，我们也要考虑作出改变，通过协定和平地改变，以利于维护世界的稳定。"

外国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指出："中英《联合声明》是北京同台湾达成类似协议的前奏，是北京使台湾同大陆统一的战略中的关键一步。"

金日成在谈到朝鲜南北统一问题时说："朝鲜南北双方可以学习香港的方式，各自维持现行的经济制度不变，实行和平统一。"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在香港也产生极大的震动。一位曾经对中英会谈有过种种看法的香港非官守议员代表全体非官守议员发表声明，表示相信《联合声明》的签署，将会使香港人对香港前途重获信心，并能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香港各大报也纷纷发表文章庆贺《联合声明》的签署。在港的中外实业人士举行了各种庆祝会和座谈会，对香港未来的前途充满信心。

《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香港市场稳定，股票上升，地产业出现回升迹象，外资投资香港者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85 年香港共有 18450 家新公司注册，比 1984 年增加 5031 家。民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对中英协议签订后的香港未来充满信心。

生机勃勃的香港准备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十四章　过渡时期的合作与斗争

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1985年5月换文生效，香港开始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中英两国在贯彻执行《联合声明》和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由于英国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不少矛盾与斗争，有些矛盾甚至相当尖锐，严重地影响了香港的平稳过渡。中国对英国错误地违背《联合声明》的各种行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总的来看，前期(到1989年6月)合作大于分歧，后期(1989年6月后)矛盾分歧大于合作。

一、前期良好的合作

1985年5月，根据《联合声明》的精神，成立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联络小组在此期间召开了几次会议和多次专家会议，讨论了多项议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86年4月23日，在中英两国通力合作下，香港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单独缔约一方，成为总协定的第91个成员。双方商定，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保持在总协定中缔约方的地位。1987年3月，联络小组又达成共识：1997年后使香港以独立会员身份继续参加海关合作理事会；1997年后香港采取适当的方式继续参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英双方积极合作，努力维护和加强香港在上述这3个重要的国际经贸组织的地位，这对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继续发挥自由港和独立关税的优势，至关重要。

联络小组还就香港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关系交换了备忘录。此外，联络小组还就香港在万国邮政联盟、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等达成协议。联络小组还商妥了过渡期和回归后香港旅行证件和身份证这类较复杂和敏感问题的解决办法。联络小组还就建立香港船舶登记处、公务员退休计划、香港民用航空协定等一些过渡时期安排问题达成协议。

中英土地委员会认真审议了历史遗留下的事关港人和各方利益的土地问题并达成共识，并对其在过渡期及回归后的具体运作达成协议。这样，在双方协力配合下，中英土地委员会就有关土地出售的批地计划、土地开放成本、土地交易分配、土地契约续期等一系列疑难且又复杂的土地问题达成协议。它不仅解决了历史遗留下的土地问题，而且照顾广大港民的切身利益，又使港府在卖地中得到可观收入，做到皆大欢喜。土地问题解决后，香港土地市场活跃，人心安定，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

事实证明，只要中英双方真心诚意地按照《联合声明》的有关条款和精神，本着互谅互让、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务实态度，齐心协力、积极合作，就能商讨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能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就能使香港平稳过渡。反之，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制造麻烦或者在背后搞小动作，就会适得其反，就会引起矛盾和争执，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就会受到破坏。

二、英方蓄意挑起代议政制改革的风波

邓小平同志深谋远虑，对过渡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斗争早已有所预见。1982 年邓小平第一次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时就曾指出：他担心过渡时期出现人为的混乱，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是英国人。在 1997 年前的过渡时期内，最值得担心

的是:英资带头把资金撤走,使香港出现经济危机,成为一座空港;储备金用尽,使港币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地位发生动摇;把土地批租收入耗尽,造成将来特区政府财政困难;港英政府在过渡期另搞一套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使将来政权移交出现种种困难,等等。

邓小平的预见和担心被无情的事实所验证。中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终于出现,英方人为地制造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麻烦和困难,挑起各种争端,中国只好面对现实、冷静以待、坚决斗争。在过渡期间,中英之间围绕政制改革等一些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和斗争,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

人们不会忘记,在 1982 至 1984 年中英谈判期间,英方再三强调要保持香港的现行政制,港英当局也多次声称“现行政制是香港繁荣之所系”。余音未落,英国来个 180 度大转弯,在过渡期内,特别在后过渡期几年里迫不及待地推出所谓的“还政于民”的“代议政制”,并加快直选的步伐,实行政制大“变革”。

英国此举居心何在?很清楚,英国是不愿意放弃其殖民统治时期在香港已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利用“政制改革”,在过渡期内“拼凑”一个俯首听命于英国并受其影响和控制的香港政府,用这种既成的“框架”通过直通车到 1997 年香港回归,造成先是过渡期几年大变,再延续到 1997 年后 50 年不变。至此英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那么港英当局又是如何实施这种意图的呢?

中英两国于 1984 年 9 月草签《联合声明》,港英却在两个月前的 7 月份推出代议政制改革的《绿皮书》,随后又于 11 月,在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前,抢先又推出了代议政制改革的《白皮书》。无论是《绿皮书》还是《白皮书》,港英的目标都很明确:“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说到底,就是港英要在香港建立一个“还政于民”的代议政制。在 1997 年香港回归前,对港府的架构进行根本性的变更。将前港府的权力移交给香港人“选出来”

的议员代表，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长官向立法局负责，并非向中央政府负责。这便是港英的如意算盘。

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港英政府的模式和性质，就可以更容易看清港英实行代议政制改革的真实面貌及其用意。

香港实行的是殖民政府架构，港督由英皇委任。由于港督拥有最高统治权，所以港府实际上是港督专权的政府。在总督下设有行政、立法两局，作为总督的最高咨询机构，议员全部委任，到1985年才有少数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议员。但是，港府的立法局并非真正的立法机构，不像英国本土那样是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机构。

无论是《绿皮书》还是《白皮书》，都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英国这样一种企图：把英国在其他殖民地非殖民化的一套照搬到香港并强制实施。照英国以往的做法，在它退出一个殖民地之前，总是要搞所谓的“政治改革”一类活动，如安排一段实行自治的过渡期，民选立法机构，扩大立法机构的权力，成立“议会”，产生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同时，逐步实行公务员本地化，到条件成熟时，英国总督撤走，给人一种“还政于民”的假象。实际上，英国撤走后，“人去楼不空”，即使殖民地宣告独立，但英国仍保持某种程度的存在，仍保持对它的影响和控制。

但是，这里有个本质的区别。香港和英国的其他殖民地不一样，它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2年10月联合国第二十七届大会通过决议，批准非殖民地化特委会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所以香港只有回归祖国的问题，没有民族自决的问题，更不存在独立或变相独立的问题。英国要把它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是“还政于中”，而不是他们所谓的“还政于民”。

香港的政制架构，主要是按照《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这两个属于英皇室特权的文件规定而建立的。150年来，根据这两个文件建立的政治制度至今未变。换句话说，英国在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从来没有什么民主而言。如果按照港英当局设计的所

谓“还政于民”的代议制改革搞下去，过渡期的香港势必出现“大变”甚至“大乱”的局面。其原因是香港原来的政制，虽然行政、立法两局都是港督管辖下的咨询机构，但是以行政局为主。行政局作为决策性机构，立法局起制衡作用。政改方案是要把行政局同立法局的关系颠倒过来，作了根本性的变化，使立法局变成决策机构，成为整个政权结构的权力中心，行政局则降为执行机构。这样，不仅使原有的政制优势丧失，而且与原政制紧密相连的一整套法律、条例都须重订或推翻。这势必导致香港社会的整体平衡受到破坏，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在世界历史上也不乏其例。从菲律宾、南朝鲜，以及英国前殖民地印度及非洲的一些国家来看，由于实行过快的“民主政制”改革，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适应，社会上几乎都出现动乱。

1997 年香港回归在望，中国即将收回香港。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建立，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广大人民 100 多年来所渴望的让中国人自己当家作主、恢复民主权利的这种梦想就要实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并在广泛征询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基础上制定的。香港的稳定，是香港人民当家作主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外部环境。如果出现动乱或不稳定的因素，一切都只能是空谈。所以，《基本法》规划了一整套具有法律效力的循序渐进发展民主政制的方针政策，以顺利实现香港人民的民主愿望和要求。过渡时期的政制发展必须与《基本法》相衔接，才能确保政权顺利移交和平稳过渡，才能确保 1997 年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尽快实现“港人治港”。

令人遗憾的是，港英反其道行之，不仅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中所作的承诺，而且改变原来的策略，采取“偷步”“抢先”办法，在《联合声明》签署前抢先推出代议制改革方案，在《基本法》公布前抢先快步推行直接选举。以此为突破口，造成“代议政制”的既成事实，迫使中方接受。其荒谬程度，就像人们所常说的：不是船靠岸，

而要岸靠船。

港英推行代议制改革，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的行动。

早在 1979 年，前港督麦理浩访问中国，中国政府表示要收回香港主权后，港英就开始策划政制改革。1980 年 6 月，港英政府发表《香港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1981 年 1 月又发表白皮书。从 1982 年 3 月开始，将全港分为 18 个区（后增至 19 个区），每个区都设置区议会，并首次将选举机制引入区议会。

推行《地方行政模式》计划，设立有民选议席的区议会，实际上是英国为撤离香港而加紧推行的代议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英国为香港所设计的“代议政制”整个模式来看，它的架构分三层：上层是港督直辖的立法局；中层是分别管理港九市区和新界地区的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基层是区议会。

1984 年 7 月和 11 月，港府发表了代议政制改革的《绿皮书》的《白皮书》，准备进一步改革香港的政制。从 1985 年起，大大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5 年 6 月，港督批准了立法局通过的颇有争议的《立法局（权力及特权）条例》，使立法局拥有传讯任何人作证和自行制定补充《英皇制诰》及《皇室训令》法例的权力，也就是说赋予立法局新的、更大的权力。同年 9 月，立法局举行首次选举，通过间接选举选出民选议员 24 名，占总议席 56 名的 42%。随后，港府还准备于 1988 年进行立法局直接选举，后因港人和中方的反对未能实现。

1989 年北京“六四”风波后，港英当局为了迎合国际上一些敌视中国的政治势力需要，加快了直选的步伐。到 1991 年，通过分区直选，选出 18 名直选立法局议员，加上间接选举的议员 21 名，民选议员占总议席 60 名的 65%。1992 年彭定康继任港督后，更是肆无忌惮地大改政制，超速增加直选议席，想以“直通车”到 1997 年后的香港，将香港的“行政主导”变为“立法主导”。众所周知，“立法

中心、议会至上"的模式，是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限制封建特权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存在的价值和推行的时代早已过去。现时西方各国各大都市的政制，无不体现行政中心的特色，即使在议会发源地的英国也不例外。香港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业、金融以及其他城市活动瞬息万变，需要保留一个行政效率高、运作平稳的行政中心的政制。

港英之所以这么处心积虑地推行代议政制改革，除了想扶持一个亲英的政府以便 1997 年后能继续控制影响香港外，还想借所谓的"民意"，形成一道"政治隔离层"，以"抵抗中共干预香港事务"。港府一些要员的谈话，已经和盘托出英国想说还没说出的话。前布政司夏鼎基曾说过："代议制改革是要用立根于当地社会(指香港)的政制，来减低主权国(指中国)不时干预的危险"。经常反映英方意图的一位行政、立法局议员说得也很明白："中国与香港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因此，最好'长期隔离'才能确保香港繁荣。"另一位立法局议员说得更露骨："1997 年后，我们需要一个向中国说'不'的政府。"

在港府 1984 年 7 月公布代议政制改革《绿皮书》时，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英国方面搞的，中国不承担义务"。中国外交部还向英国提出交涉，要求代议制改革要与未来香港特区《基本法》衔接，不要影响 1997 年的顺利过渡。1985 年 10 月 19 日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在北京会见港府官员时说："在过渡时期香港政制的改革应考虑同基本法相衔接"，希望在过渡时期"香港不出现急剧的变化，港英方面必须真正负起责任来"，并郑重表示："以后交接的事，我们是要过问的。"港英对此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也正式讨论了"代议政制"问题，在 1985 年 11 月 30 日双方会谈结束时发表公报，公报中特别提到："在讨论中，双方同意香港政制的改革和基本法衔接是个重要问题。"遗憾

的是，英方不仅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而是越走越远，越滑越深。

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过渡时期香港的政制发展必须与《基本法》衔接，以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

三、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居英权方案”

1989年底，英国政府突然宣布赋予5万个家庭约22.5万香港居民“完全英国公民地位”，并宣称这些人在香港“享有英国的领事保护权”。1990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单方面改变了部分香港中国公民的国籍，并且提出：“将保留相当数额以便在临近1997年的‘稍后的年代中’给那些可能在香港进入关键岗位的人以机会。”

关于香港中国同胞的国籍问题，无论是根据国际法还是中国国籍法的规定，都只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1984年12月19日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国籍备忘录中特别注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都是中国人。备忘录中还提到：“考虑到香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允许原被称为‘英国属土公民’的香港中国公民，使用英国政府签发的旅行证件去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但不得因其持有上述英国旅行证件而享受英国的领事保护的权利。”换句话说，上述人虽持有英国签发的旅行证件，但不是英国公民，既不能享受英国的领事保护权，又不赋予在英国的居留权。

其实关于香港的“英国属土公民”的旅行证件问题，中英之间早已商妥了解决的办法。这是牵涉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居民的国籍、身分的敏感问题。香港是个自由港，又是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这种国际地位，使香港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由于他们的人种和肤色各异，由此香港获得“世界人种

博物馆”的美称。香港的这种特殊的国际地位再加上各种历史原因，使香港居民中除中国人外，还有大量拿外国护照的“外籍港人”，其中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的“英籍港人”约325万。这些“外籍港人”大部分是华裔商人。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但中国政府根据香港的特殊情况，采取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以及照顾港人意愿的灵活态度，同英方充分协商并达成协议，写进了中英《联合声明》(国籍备忘录)，中英《联合声明》换文生效后，英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香港(英国国籍)令》，把“英国属土公民”改为“英国国民(海外)”，简称BNO。

英国单方面改变港人国籍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已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国籍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势必在香港引起治权的混乱和麻烦。此外，英方把香港高级政府层英籍化作为渗透英国影响的一种策略，以利于培植亲英势力，以达到分化香港人的目的，为1997年后的“港人治港”设置障碍，制造麻烦。

对于英国单方面违背有关协议的条款的这种错误做法，中国《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于1990年2月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对有关条文进行修改，对1997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官员的任职资格增加“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限制。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港人治港”，以避免出现改头换面的“英人治港”的局面。

四、新机场建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1984年3月16日看望港澳地区政协委员时说：“要警惕殖民主义者在政治上制造混乱的同时，以‘时代的包装’、‘现代化的手段’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把香港的经济搞乱、掏空，给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留下庞大的财政包袱。”

李瑞环同志这一提醒不仅十分及时，而且切中要害，香港新机

场建设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89 年 10 月，港英提出一个名为《港口和机场发展策略》的“玫瑰园”计划。该工程耗资巨大，将跨越 1997 年至 2006 年竣工。依此计划，不仅要建设一现代化的香港国际机场和港口，而且还要搞一些配套的工程，诸如排污工程计划、道路网络改造、铺设铁路衔接等一揽子跨越 1997 年的大型基建项目。该计划按当时估算需耗资 1270 亿港币，而港英政府手中的财政储备充其量不过 500 亿港元。

从香港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来看，本来新建机场是件很在理的事，原因在于，闻名遐迩的香港国际机场——启德机场的吞吐能力已经饱和甚至超载。据资料分析，香港作为世界十大空运中心之一，进出机场的航班十分频繁，每周有 1000 多班定期客货机在启德机场起降，来往香港和世界各地，即平均每天约有 150 架次飞机起降。

在新机场建设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香港需要一个新机场，但新机场的建设必须符合“低成本、高效益”的原则。但是，港英一改过去量入为出的旧章，放弃了长期以来实行的收支平衡的方针，转而到处举债搞赤字预算。如果按这样搞下去，势必掏空港府的腰包，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会加重香港人民的负担，而且还会给未来的特区政府留下沉重的包袱。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使香港人民深感忧虑，中国政府曾以不同方式向港英提出忠告。江泽民总书记早在 1990 年就提出：“你港英政府不能搞‘你请客，我会钞’的这一手，现在大笔大笔地花钱，而把沉重的负担留给将来的特区政府，加重港人的负担。”对港英的理财方针，江总书记提出应坚持“量入为出”的方针。

由于“玫瑰园”计划安排跨越 1997 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代表未来的香港特区作信贷担保，投资者就不可能冒风险投巨资到香港来。港英政府四处借债碰壁后，不得不寻求中方的支持。中国政

府为香港同胞目前和长远利益着想，也为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利益着想，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同英方展开一系列会谈，以求该问题能获得圆满解决。在中方的努力下，1991 年 9 月 3 日，中国总理李鹏同英国首相梅杰在北京签署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港英政府在 1997 年前要最大限度完成机场核心工程项目；跨越 1997 年的举债不能超过 50 亿港元，如超过需双方商定。此外，还要给特区政府预留 250 亿港元的储备。

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将有利于保障香港后过渡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也有利于 1997 年的顺利交接。可惜备忘录的墨汁未干，港英又抛出一个新财务安排方案，将机场造价大幅度提高。

港英为什么出尔反尔、一意孤行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1989 年北京“六四”风波后，国际上一些反华仇共势力趁机兴风作浪，英国国内一些反动政客也跟着摇旗呐喊，遥相呼应，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也出现根本性变化。第二，英国想在撤离香港前留下“政治丰碑”的同时，对 1997 后香港的经济能继续施加影响。第三，利用新机场建设等项工程把香港历年来的所有财政储备统统花光，把香港经济掏空，扔下一个烂摊子，让特区政府去收拾。第四，港英把大部分工程顾问合约和主要工程合约批给标价高的英资财团，用这种“现代包装”的手法，将港府手中的香港人民的血汗钱，尽可能多地装到英国商人的口袋里，以使“肥水不流他人田”。

由于英方一再制造麻烦，使本来早就可以解决的新机场建设问题，直拖到 1994 年 11 月 4 日中英双方才达成协议，签署了《香港新机场及机场铁路总体财务安排会谈纪要》。

旷日持久的香港新机场问题的谈判已暂告结束，但我们对港英以“现代包装”的形式打出的“经济牌”决不能掉以轻心。正如香港有识之士所指出的：“英方特别是港督彭定康，已走上了与中国

对抗之路，要警惕他们今后会有更多对抗和乱世的招数出手……”

五、彭定康再次挑起政改风波

1984 年中英达成协议后，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醒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中英协议，“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但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

从 1989 年下半年开始，港英接二连三地推出了《居英权方案》、《人权法案条例》、《新机场建设问题》、《终审法院问题》以及《政制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港英还提出许多无理要求，露骨地企图干预中国内政。从要求讨论“直通车”的中方确认标准，要求介入全国人大设立的特区筹委会和产生首届行政长官的“推选委员会”的组成事宜，到越俎代庖，为特区立法会议员拟订誓词和要求用宣誓代替确认和取消确认议员的追溯力，以架空特区筹委会的权力，不一而足。特别是英方排斥中方在 1994—1995 年选举安排问题上的合作，顽固坚持“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违反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中英两国政府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政改”，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的反响，中英之间围绕政改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出现了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不愉快的局面，这种局面是英方蓄意挑起的。

1992 年 4 月 24 日，英国保守党主席克里斯托弗·帕滕接任前港督卫奕信，出任第二十八任也是最后一任港督，他中文取名彭定康。1992 年 10 月 7 日。他上任不到 3 个月，在香港立法局会上作了《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的施政报告，表示要对香港政制来一番急变，而这一重大变动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区《基本法》大相径庭。

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三项规定：香港“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第五项规定：“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基本法》规定，香港政治体制的发展应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行事。然而彭定康却打着“加快香港民主步伐”的旗号，对现行政治制度大变、骤变。其政制方面的变动主要包括两大方面：(1)行政局和立法局分家。(2)立法局在 1995 年分别以地区、功能组、选举委员会进行直接选举。

前已叙述，香港实行“委任议局”模式。行政局和立法局又实行双重委任制，即行政局有的议员委任为立法局议员，立法局有的议员又委任为行政局议员。两局的关系是行政主导，立法局对行政局负责。这一政治机制与香港特区《基本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没有多大矛盾。彭定康“政改”的第一个重大“手术”是把两局分开，取消两局双重委任，把行政主导、立法局对行政局负责的政制来个根本颠倒。彭定康这种做法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想借“政改”之名，极力在香港推行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扩大立法局的权力，改变现有的行政主导体制，造成“立法主导行政”的局面。但是，香港只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实体。如果按照彭定康这一套做下去，行政机关将受制于立法机关，香港就会处于政治上争论不休、行政难以行使权力、立法局掌握实权的局面。英国则可以通过这个精心培植的起主导作用的“立法班子”，轻而易举地插手香港事务，以达到 1997 年后遥控和延续对香港控制的企图。如果 1997 年后出现这种局面，立法局还可以驾驭未来的特区首长、特区政府，导致“行政主导”名存实亡。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在 1997 年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就会被架空。所以，彭定康挑起这场政制之争，根本不是什么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行政局和立法局分家的问题，其实质是关系到 1997 年后中国能否对香港真正行使主权和治权的重大原则问题。

彭定康“政改”的第二个“大手术”是立法局在 1995 年分别以

地区、功能组、选举委员会进行直接选举。

如上所述，香港立法局议员在1985年以前全部是委任的。1985年后，立法局才有间接选举和功能组别(即按不同社会功能划分的法定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席，这些议席被称为“功能组别”)选举产生的议员，1991年更有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通过《基本法》时，还同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决定写道：“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由60人组成，其中分区直接选举产生议员20人，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议员10人，功能团体选举产生议员30人。”决定同时指出：“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本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上述规定，其议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者，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确认，即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会员。”

彭定康为了达到“直通车”的目的，准备在1995年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选举中大搞手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把功能团体选举这种间接选举方式改为按行业划分的变相直选，把那些拥护基本法、愿意和中方合作的、有代表性的人排斥于局外。(2)把功能团体的选民人数增加到近90万，使选民人数比原来实行间接选举时的9万猛增9倍，这种做法不但跟《基本法》所规定的“循序渐进”的原则相背离，而且英方千方百计使那些跟港英有各种各样关系的、容易受操纵的、并能代表港英利益的团体或派别参加直选，以选出港英满意的“合适人选”，入主立法局。(3)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变相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员的方式，使直选或变相直选的议员数达40名，占立法局总议席60名的三分之二。

彭定康接下去打的如意算盘是：把上述1995年香港用“民主方式”选出的全体立法局议员坐“直通车”，成为1997年后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彭定康这种“三违反”的政改方案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

1992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降下帷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这次大会上得以最终确定。中国不仅有能力保持香港在 1997 年以后的繁荣稳定，而且正在大步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经济中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彭定康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我港澳办主任鲁平在新闻发布会上严正指出：“彭定康所发明的那一套，撇开了《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英过去达成的谅解。我们希望彭定康回到与中方合作的轨道上来。”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认为目前双方分歧的实质不是什么加快不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合作还是要对抗。我们不希望见到对抗，因为这对香港不利，但对方一定要对抗，我们只能奉陪。”

1993 年 3 月 12 日，彭定康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公布了香港“民主改革方案”。按常规，这是将该计划提交立法局审议的第一步。

中国被震怒了。

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这是英方蓄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又一严重步骤。”

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指出：“英方扬言它这样做是为了港人的利益，这完全是骗人的假话。众所周知，真正代表港人利益的是中国政府。”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英方这种背信弃义行为极为愤慨，严厉指出：“英方又为合作制造了人为的障碍，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只能由英国政府完全负责。”

彭定康眼看“民意牌”、“民主牌”不灵了，想打“国际牌”以取得

国际上的支持，压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让步。他去美国、访欧洲、飞澳洲，四处奔走，乞讨援助，最后两手空空而回。

世人逐渐看清了彭定康的真实面目。英国国内的舆论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1993 年 12 月 20 日，英国《太阳报》以《玩世不恭厚颜无耻的骗子莫过彭定康》为标题发表评论，指责彭定康在香港“虚伪地鼓吹民主，破坏英中关系，结果使一些英国大公司在争取中国合同时出现困难。彭定康所作所为，是为他个人争光。”社论尖锐指出：“英国统治香港 150 多年，从来不曾有过民主的选举，在要将香港统治权交出去的不到四年时间去与中国对抗，这简直太愚蠢了。”社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彭定康的赌徒心态：“为了彭定康个人野心而牺牲香港，代价未免太大了。”

英国国会中国事务小组主席艾德礼更是直言不讳，他说：“彭定康在香港所作所为，根本未征求过立法局和港人的意见，何‘民意’之有？打‘民意牌’塑造‘亲民’形象，只不过是政客的一贯作风。”

国际社会对彭定康这种极不负责的倒行逆施也表示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欧洲时报》于 1993 年 3 月 2 日发表社论指出：“因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引发的中英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 1997 年香港平稳过渡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英国殖民者从‘日不落国’到日落西山，每离开一个殖民地，总要制造一些事端，留下一些祸患。”该社论认为，“说穿了，彭定康等人的所作所为，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祖宗的利益’，为了延续在香港的影响，为了埋伏为英服务的‘手脚’……彭定康等人的殖民嘴脸越来越被更多的人识破，他们破坏中英合作，给香港制造麻烦，不利中国，也不符合港人利益，对英国整体来说也无好处。”

该社论最后提醒彭定康说：“1997 年，当米字旗在香港黯然降下，就象征着英国殖民统治最后的终结。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洗雪净

尽，将是多么光明的明天。当‘拜拜’的时候，企图制造种种麻烦阻碍香港 1997 年的顺利回归都是徒劳的。”

前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三次在《澳大利亚报》上撰文，批评彭定康在英殖民统治行将结束之际，如此坚决地要在香港建立“民主”，只能解释为“恶作剧和制造混乱”，是“一种放肆”。他强烈要求澳政府敦促英国“停止并收回彭定康那种鲁莽的、误入歧途的政策”。

香港社会对此也作出很大反响。据香港《明报》1994 年 1 月底委托独立市场公司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要求撤换港督彭定康的市民明显增加。香港《南华日报》1994 年 1 月 23 日更报道，在香港的最有势力的政党之一“香港自由党”宣布：“撤销对彭定康方案的支持”。

中国政府十分珍惜中英之间过去形成的友好合作关系，希望英方能改弦更张，悬崖勒马。中国一方面同彭定康的“三违反”政改方案作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以大局为重，以港人利益为重，采取积极态度促进英方尽快回到谈判桌上，以便消除分歧、恢复合作。在中国的努力下，中英双方商定，两国政府代表于 1993 年 4 月 22 日在北京开始就 1994—1995 年选举安排问题举行会谈。遗憾的是，英国始终没有回到“三符合”的轨道上来。在谈判过程中，英方除了一直坚持所谓的“彭定康方案”外，不断翻新花样，制造各种麻烦和障碍，致使会谈进程缓慢，几乎陷入僵局。

中方早就声明，在中英谈判达成协议前，如英方将所谓的“政改方案”提交香港立法局讨论，就意味着谈判的中断，其责任不在中方。英方置中国耐心的劝告于不顾，一意孤行，于 1993 年 12 月 10 日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有关香港选举的部分立法草案刊登《宪报》，并于 12 月 15 日提交立法局。于是英方一手造成了这种谈判破裂的局面。这样，历时 7 个多月、长达 17 次之多的中英关于香港 1994—1995 年选举问题的会谈被迫中止了。

1994年2月24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顶着北风行》。其意十分明显，港英决心在香港问题上同中国对抗到底。彭定康为什么一意孤行要同中国对抗到底呢？答案还可以从英国以往不光彩的殖民主义历史中去寻找。

温故而知新。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英国殖民主义者每一次撤出殖民地时，都要采取一些假民主手法，以制造矛盾和对立，并使政权落入亲英代理人手中，以便继续维持其在该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让我们先来看看英国是怎样撤出印度的。印度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被称为“英王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二战”后，在世界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浪潮打击下，英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日趋土崩瓦解。在面临印度独立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英国于撤退前15个月，开始在印度实行急剧的“民主宪制改革”，其做法跟彭定康所为如出一辙，也是打着所谓“政制改革”、“民主选举”的旗号扶植亲英代理人，以便英国撤离后，“人走楼不空”。

1947年8月原英属印度以宗教划分的原则分割成两部分，即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巴独立前后，英国制造各种矛盾，挑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盟的宗教争端，埋下许多祸根，以实现其险恶的“分而治之”政策。其中尤以模糊不清的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撒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激烈争吵的种子。随后印、巴为克什米尔归属等问题发生了3次战争，至今，克什米尔问题仍悬而未决，印、巴为此争吵不休、干戈不断，英国坐收渔翁之利。

再来看看英国从非洲殖民地撤退前的情况。在英属非洲殖民地中，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不存在白人移民，如西非殖民地。另一种情况是白人移民占优势，如南罗得西亚（即津巴布韦）。英国则各取所需，采用不同的策略进行分化、瓦解，培植亲英力量。对几乎没有白人移民的殖民地，英国主要从非洲人的民族主义内部扶植亲英力量，施以小恩小惠以分化瓦解这些组织，最后

达到“分而治之”。对白人移民占优势的殖民地，英国则打着“种族合作”的旗号，着重扶持白人傀儡，拼凑白人移民占主导的“白人政权”。这些国家后来虽然独立了，但英国仍保持着跟他们的各种关系，特别是英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权益，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可见，彭定康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殖民主义者惯用的手法。

1994 年 2 月 24 日凌晨，港英立法局经过 9 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通过了彭定康提交的 1994—1995 年选举安排的部分立法草案。这表明港英决心朝与中国对抗的方向走下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港英立法局通过彭定康部分政改方案一事发表严正声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终止。中国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根据这一规定，作为英国管治香港政治架构的组成部分，即港英最后一届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即所谓“代议政制”的三级架构），必将随英国管治期结束而终结。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架构将依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由于英方的一意孤行，中国只好“另起炉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统一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的这一天就要到来，祖国统一大业将迈出可喜的一步。随着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实现，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将更加璀璨。

第十五章 《基本法》的颁布

一、《基本法》的起草与颁布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开始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在中英合作执行《联合声明》的同时，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成为过渡时期最重要的工作。

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第一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中国政府这一正式的宣布和承诺，表示中国要用法律形式将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固定下来，以保障国家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法律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1985 年 4 月 10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同年 6 月 18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名单。起草委员会由 59 人组成，其中内地委员 36 人，香港委员 23 人。起草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性是比较广泛的，香港委员尤其如此，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1985 年 7 月 1 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

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历时 4 年零 8 个月，在这 1700 多个日

日夜夜里，起草委员会共举行全体会议 9 次，主任委员会议 25 次，主任委员扩大会议 2 次，总体工作小组会议 3 次，专题小组会议 73 次。在香港，还成立了《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为起草委员会广泛征求香港居民的意见。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十分重视港人参加起草《基本法》，草委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向各委员颁发聘书，仪式隆重，气氛融洽。这种做法前所未有，以往人大常委会成立各种委员会，从未举行过委员长颁发聘书仪式。

《基本法》起草的过程实际上是各方面合作、协商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

为了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看法，使《基本法》更趋完善，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采取两次广泛征求意见的征询活动。第一次是 1988 年 4 月，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此后用了 5 个月时间在香港和内地各有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第二次是 1989 年 2 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其附件和其他有关文件，此后在长达 8 个月的时间里，更加广泛地征求意见。在这两次广泛征求意见中，草委会两次正式组团到香港征求方方面面的各种意见。为使原始意见能保持原来面貌，所征求的意见不进行筛选，也不进行综合整理，而是逐项逐条记录，如实反映。个别条款甚至几上几下，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反复研究，反复修改。人们对此评论说："《基本法》一字千金，连标点符号都不例外"。

据统计，草案中的 160 条，有 115 处作了修改。另据报道，起草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对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基本法》草案及其附件和有关文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逐条逐件地进行表决，除第十九条外，全部条文、附件和有关文件都以全体委员三分之二多数获得通过。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对准备提交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的《基本法》草案中24个修正案，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逐案进行表决，全部通过24条修正提案，其中包括通过第十九条修正案。所有修正案，全部赞成的占四分之一，最低票是41票，也超过法定票数。每一次会议，都允许记者采访报道，具有很高的透明度。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在香港同胞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港人的意见在4年零8个月的起草过程中得到充分反映，绝大部分获得重视，特别是在草委会中，这些意见得到反复研究和讨论。1985年12月成立的由180名香港各届人士组成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仅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的咨询报告就多达138万字之巨。由此可见，这部法律文件，无论在内地还是在香港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反映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如果没有这么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民主协商精神，如果没有这种互相尊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齐心协力精神，要想对每一条文和每一修正案都以无记名方式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委员的通过，是根本不可能的。

1990年2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其3个附件和其他有关文件，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3个附件和4个有关文件，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同日，国家主席杨尚昆发布第二十六号主席令，将此法予以公布。

《基本法》是未来香港特区的根本大法。它将我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对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中英《联合声明》中我国所作的承诺和保证用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它为“一国两

制”在香港的具体实施绘制了蓝图并予以法律的保证，也为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对于《基本法》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文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二、指导《基本法》顺利起草的几点原则意见

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并作了重要讲话，就《基本法》的起草问题发表了几点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对以后《基本法》的顺利起草，具有非同一般的指导作用和重要意义。邓小平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基本法》不宜太细。宜粗不宜细，原则一点。邓小平说：“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所以“《基本法》不宜太细”，应留下因时而变的余地。邓小平认为，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变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这样的变，有什么不好？港人应当欢迎才对。

第二，香港的制度不宜全盘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邓小平说：“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邓小平还指出：“ 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议会选举，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搞议会选举，但是我们中国大陆就不这样搞，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

第三，不赞成立即实行普选，即使搞普选，主张逐步过渡，一步一步来。邓小平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邓小平认为，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说要循序渐进，这个看法比较实际。

第四，对特别行政区，中央要管一点。邓小平指出："还有一个问题，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这种想法是不实际的。中央确实不会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中央不需要干预。但是，如果香港发生了危害到国家利益的事，或者出现损害香港自己的根本利益的事情，那时，北京能不过问吗？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邓小平还指出："如果变成行动，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第五，要认真从实际出发来制订基本法。邓小平说："《基本法》是一个重要的文件，要认真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它能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一国两制'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邓小平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上述讲话，不仅非常及时，而且对以后《基本法》的顺利起草，起了指路明灯的作用。

三、《基本法》为香港的未来勾画出蓝图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将回归祖国。《基本法》作为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典，它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描绘出一幅雄伟、壮丽的蓝图。这幅蓝图的主要特征是：

（一）没有殖民主义的香港。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殖民主义制度将被废除。《基本法》作为香港特区的最高法典，取代英国对香港进行长期殖民统治的根本法——《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届时，英国的米字旗将黯然降下，中国的五星红旗将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新的区旗、区徽将取代旧的"港旗"、"港徽"。

由港人推选、中央任命的新行政长官将取代由英皇委派的港督。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取代驻港英军。

防务权和外交权将从伦敦转回北京。

香港特区的主要官员将由香港的中国人担任。

英资财团在港的"特权"将告结束。

司法的终审权从伦敦枢密院转到香港特区的终审法院。

（二）中央直辖的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下建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即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 年不变。有人形象地把这种"不变"具体地概括为"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此外，香港特区的自由港地位、国际金融、外贸中心等对外经济关系也都保持不变。

（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方面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另一方面又享有除外交、军事以外的高度自治权。"港人治港"主要表现为：1. 中央不从内地派官员来管治香港特区。2. 管治香港的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3. 它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4. 立法会由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中央政府只保留任命权。"高度自治"表现为香

港特区享有十分广泛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

第十六章　迎接香港回归

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委会)。

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预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预委会的准备工作

从1993年7月2日预委会成立起，一直到1996年1月26日正式成立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预委会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预委会"以'一国两制'的总方针为指导，以香港的《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为依据，以确保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及保持香港长期的稳定繁荣为目标，团结和依靠广大的香港同胞，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做好各项工作。"预委会的委员们正是遵循这些原则积极开展工作。

预委会下设政务、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及保安五个专题小组，各专题小组在制订规划时，紧紧把握两个重要原则：一是紧紧抓住与1997年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有关的问题作为工作规划的主题和基本内容；二是把香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或关系到香港同胞切身利益的问题同本小组的工作规划联系起来考虑。

政务小组的委员们，对香港的现行政治体制与基本法的衔接，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产生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初步确定了11项研究项目。委员们一致认为，中英之间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守不守信义的问题；是要不要保持香港平稳过渡，政权顺利交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从而维护广大香港居民长远利益的问题。对于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及其性质，政务小组认为，新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和区域组织等，绝不是将港英原有的政治架构"照单验收"，而是依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组建的、体现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体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架构。对于1997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委员们认为，未来香港政治体制要以行政为主，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要互相制衡，又要互相配合。这是《基本法》中已明确规定的，它是法律的条文，是不容任何人篡改的。

经济专题小组确定了8项研究项目，设有新机场问题、两地大型基建协调问题、金融财政问题和退休保障问题等课题小组。

法律专题小组以《基本法》为主要依据，对浩如烟海的香港原有法律进行全面研究。社会及保安专题小组研究的重点是入境、治安、纪律部队和社会服务4个方面的问题。文化专题小组主要讨论了宣传基本法和教科书的问题。

无论是内地的还是香港的预委会的委员，都不辞劳苦，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为香港的顺利回归洒下了辛劳的汗水，为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筹委会的成立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5年1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的议案。1996年1月26日，筹委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初步完成，由准备阶段进入迎接政权交接阶段。

筹委会由150人组成，其中香港委员94名，内地委员56名，钱其琛任主任委员。筹委会从成立之时就设立了推选委员会小组，第一任行政长官小组，临时立法会小组，法律小组，经济小组和庆祝活动小组，在北京设立了秘书处，同时在北京和香港设立了办事处。筹委会成立一年多来，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就筹组香港特区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展工作。

1996年5月24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珠海会见筹委会第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要群策群力，做好筹委工作，使筹组特区政府工作更圆满。"

（一）组建推委会

筹委会成立后所进行的首要工作，就是筹组由400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下简称推委会）。依照全国人大有关的决议，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必须由这个推选委员会推举产生，然后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指出，"组建推选委员会是整个筹建特别行政区工作的'龙头'。"推委会如何产生，备受港人关注。筹委会对制订推委会产生办法非常重视，十分慎重。1996年4月，筹委会就推委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在香港开展了广泛的咨询活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和筹委会委员先后在香港举行了16场咨询会议，香港各界反应热烈，共有336个团体，1071人次出席，涵盖了工商、金融、劳工、基层、宗教、原政界等各个界别，还收到100多份书面意见，为筹委会进行筹组特区政府的工作和涉及香港平稳过渡的有关重大事项提供一系列方案和建议。

由于推委会负有推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和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双重重任，香港各界对推委会委员的产生十分重视。8 月 9 日筹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从 8 月 15 日开始至 9 月 14 日，香港社会进入推委会委员的报名、提名时间，这是香港同胞迈出民主参政，“港人治港”的第一步。由于推委会委员采用公开和志愿报名参选的办法，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欢迎。报名十分踊跃，参选人数多达 5789 人。1996 年 11 月 2 日，筹委会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候选人名单中选出 340 名推委会委员，他们与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一起，组成了 400 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

（二）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按照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由推委会以协商或协商后提名选举的方式产生。筹委会研究后认为，协商后提名选举更易为广大港人所接受。筹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采纳了提名选举的方式。在香港公开报名参加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选举的有 31 人。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进行资格审查后，确定其中的 8 人为第一任行政长官参选人。1996 年 11 月 15 日，推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香港举行，由推委会委员进行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初选。结果，董建华、杨铁梁、吴光正 3 人成为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

1996 年 12 月 11 日，推委会在香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新闻媒介发表了《历史在这一刻聚焦》的现场追踪报道。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二楼宽阔的会议厅里，记者手中的摄像机对准了主席台上计票的3块白板，白板后面高悬着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董建华！”“杨铁梁！”“吴光正！”唱票人清脆的声音在不停地回荡……55岁的推委会委员徐展堂坐在台下，凝视着眼前庄严的情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个时刻，真真正正意味着香港民主新时代的开始。我想，历史会记住这一刻，后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会把目光聚焦在这一刻。”

这是600万香港民众瞩目的时刻。点票现场的情况，通过电视信号、电台电波，传送到港岛、九龙、新界的每一个角落。不少家庭里，人们端坐电视机前，收看选举直播节目；公园里，漫步的老人把收音机贴在耳边，收听选举直播节目；商场里的售货员小姐将陈列的十几台电视机调到了直播节目的频道，络绎不绝的顾客纷纷驻足而观。陈乃强委员，这位曾在港府工作了34年的前地政工务司不禁感慨万千：“这薄薄的一张选票，其实很重啊！”

点票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释觉光委员用“异常顺利”4个字，称赞整个行政长官推举工作；在湾仔鹅颈桥下摆小摊的罗太用“满意”两个字评价今天的选举。在这万众关注的一刻，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无疑是最好的赞美。

点票工作逐渐进入最后阶段。11时55分，董建华获得了第201位推委会委员的支持，选票超过半数。会场内掌声如潮响起，300多位中外记者打开无线电话、手提电脑，迅速将这一信息传向世界各地。

12时15分，点票工作全部结束，董建华共获得320票。12时25分，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郑重宣布，根据推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结果，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将由明天召开的筹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将这

一结果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场再次响起。收看、收听直播节目的市民也激动地欢呼、鼓掌。

正如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所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过程贯穿了民主的精神，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无论是候选人的提名，还是答问会议，最后的投票选举，投票后的开票、唱票和计票，整个过程均对新闻媒体开放，并通过电视用中文、英文、粤语现场直播。现场有数百名记者进行采访报道。香港社会和国际舆论对这次选举的透明度一致予以好评。

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意义重大，由港人自己选择最高行政长官，在香港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28 任香港总督全由英国钦定，从未咨询过港人的意见，香港政治中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这次，由港人选出、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是一百多年来香港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行政长官，这表明香港正迈向民主参政的新纪元，同时这也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体现。

董建华，祖籍浙江定海。其父董浩云毕生从事航运事业，是世界七大航运巨子之一，曾创下了第一个让中国航运事业走向世界的辉煌纪录。他曾谢绝英、美邀请他入籍，始终保持中国人的身分。

董建华为长子，1937 年出生于上海。1949 年 12 岁时随家庭移居香港，曾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1960 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理学士，之后到美国通用电力公司工作，1968 年回香港协助父亲经营船舶公司。

从 1979 年开始，董建华出任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1982 年其父董浩云病逝，董建华担负起董氏家族企业的重担，1996 年 10 月 18 日辞去东方海外职务。

董建华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

员，现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事务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董建华当选后表示，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去为香港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香港媒体对董建华当选反应热烈。香港《快报》12 月 12 日发表题为《贺董建华当选特首，盼东方之珠更加灿烂》的评论，评论特别强调："他毕竟是头一个由中国人选举产生的、由中国人担任的香港行政首长，他有责任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把香港管好，东方之珠比以前更加灿烂夺目"。

香港《东方时报》12 月 12 日以《大家支持舵手，香港之舟启航》为题发表评论说，"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香港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董建华以 320 票的高票数当选，多项民意测验领先，说明他是众望所归的人物……从英皇委任港督，到由 400 名香港人组成的推委会选出的首长，无论如何比历任总督更有公众的认可力。"

香港《新报》也指出，"他强势的根基是得到广大市民支持、舆论支持……"

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长官，在国际社会也引起巨大反响。英美法官方均表示欢迎董建华当选。

英国外交部在简短的声明中说，首相和外交大臣"完全相信他将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位值得信赖的第一任行政长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格林·戴维斯指出，"董建华是第一任不是由英国任命而是经选举产生的香港行政长官"。

法国外长德沙雷特在写给董建华的信中特别强调，"我向您保证，在您不久将要担负的这一历史使命中，法国将给予您以全力支持"。

香港舆论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在民主、公平、公开原则下进

行的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推举工作，开辟了一条符合香港实际的发展民主的道路，为未来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2 月 16 日，国务院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 207 号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就职。

12 月 18 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会见了董建华，祝贺他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江泽民指出：“这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真正体现，也意味着香港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李鹏总理也会见了董建华，并代表国务院向他颁发任命书。在随后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董建华不仅组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会议，而且，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的主要官员。这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的筹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三）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

由于港英当局一意孤行推行所谓的“政改方案”，末代港督彭定康又一手拆毁了香港立法会“直通车”的路轨，中方被迫“另起炉灶”。鉴于港英立法局必须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随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而终止，为了在香港回归之际，特区立法会还来不及选举产生的时间里避免出现法律空缺，筹委会推委会建议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起一个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工作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为止，其过渡年限不超过一年，时间不超过 1998 年 6 月 30 日。

对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的必要性，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强调指出：“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时，有

许多事项需要由立法机关来负责或参与，这是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特别行政区的有效运作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成立一个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临时立法会，作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前的一项临时性安排，是体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的最合适的办法。”

筹委会临时立法会小组在 1996 年 3 月 20 日首次会议上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认为成立临时立法会于法有据，小组向筹委会提交了设立临时立法会的建议。筹委会于 3 月 23 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并规定其主要任务是：为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正常运作制定必不可少的法律和参与必要的人事安排。

1996 年 12 月 21 日，推委会在深圳选举产生了临时立法会的 60 名议员。其中既有工商界人士，也有不少来自劳工、基层的代表。报名参选的 34 名现任港英立法局议员中有 33 人当选。也就是说，现任港英立法局的大部分议员已当选为临时立法会的议员。1997 年 1 月 25 日，临时立法会议员又以互选方式选举范徐丽泰为临时立法会主席。由此可见，临时立法会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性，得到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认可。

港英当局对此却百般抵毁。港督彭定康大肆攻击临时立法会，香港有些所谓“民主派”也随声附和。但广大香港人民都对成立临时立法会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的态度。

香港《东方时报》明确指出，“临时立法会的出现，是彭定康破坏中英合作的结果，这是铁一般的事实。里夫金德（英外相）和彭定康现在还攻击、抹黑临立会，只是显示他们不尊重事实、漠视现实的错误态度。”

香港《天天日报》在评论中也指出，“政权交接，国家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英国想把自己一套强加于主权国中国身上，是不可能成功的。”

香港《大公报》的社论认为,“选举产生临立会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功,一是在整个产生过程充分发扬了民主,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二是有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公信力的推委会,能对候选人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作出审慎正确的选择;三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港人支持。推委们投票选举,是代表港人意愿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样的选举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也强调指出:“在香港过渡时期成立临时立法会是必要和合法的。”

(四)经济法律及港人身分认定问题

1. 平稳过渡和财政预算

由于香港 1997—1998 年度财政预算案跨越 1997 年,且执行的时间大部分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以后,是一项关系到平稳过渡的重大事项,为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成立了专家组,由中英双方共同编制该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此外,中英双方于 1996 年 11 月 13 日就香港 600 亿美元外汇储备移交达成协议,明确宣布,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接管香港的外汇储备 600 亿美元。这就是向世界表明,权力移交,不会给香港的金融和外汇基金造成任何问题。中方再次重申: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决不向香港要一分钱。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英双方就香港外汇储备达成协议,是确保香港财政稳定的第一道防线;金融的稳定,对于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保证香港经济、社会的稳定都至关重要。

2. 大型基建及长远发展的有关问题

大型基建对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保持其连续性，有助于香港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由于大型基建项目投资巨大，影响深远，而且关系到未来特区责任承担和长远利益，因此，中方要求英方将多个跨越 1997 年的重大项目，诸如兴建新机场第二条跑道、耗资上千亿港元的西北铁路计划等，列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磋商的范围，防止港英当局盲目大笔花钱而给以后的特别行政区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3. 对原有的法律审查和认同的问题

筹委会法律小组完成了对所有香港现行成文法律共 640 多项条例和 1100 多项附属立法进行审查和研究。法律小组的委员们认为：绝大多数香港原有法律可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但在适用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的地位和《基本法》的规定作出解释。委员们还指出，香港现行的法律中有些条例与《基本法》相抵触而不能被采用为香港特区的法律：一是体现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的法律已全部不适用；二是在一些条例或附属立法中有部分条款抵触基本法。钱其琛主任委员阐述了处理上述有异议的原有法律条款的意见："应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处理。除极少数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法例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外，对于其他绝大多数的法律，可通过一些解释和适用原则或名称、词句替换原则解决问题，从而使这些法律均可采用为特别行政区法律。这样做完全符合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的原则。"

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认为，《基本法》已对香港未来的民主发展作出明确的规定，香港的人权在《基本法》内已经得到充分的保障。

港英当局近年来大幅修改香港原有法律，企图架空《基本法》，这对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未来的运作都没什么好处。《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小宪法，一切按《基本法》办事，香港的未来发展就有保障。

1996 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就英方单方面修改香港《刑事罪行条例》发表声明，指出英方实质上侵犯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违反《基本法》的规定，对此越俎代庖行为，中方绝对不能接受。12 月 12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通过决议，在港英当局强行通过对《刑事罪行条例》的修改后，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适当的时候宣布，港英当局对《刑事罪行条例》第Ⅰ、Ⅱ部的修订，因与《基本法》第 23 条的规定相抵触，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无效，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4. 香港居民的身分认定

要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香港居民身分的认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港人在国籍问题上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以及“回流”移民的居留权等问题需要尽快作出明确界定和安排，为此，筹委会根据《基本法》和中国国籍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我国政府对香港居民国籍问题的一贯政策，结合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提出了灵活宽松的处理方案。比如，建议将香港同胞所持有的外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可以继续使用去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等等。根据筹委会的建议，1996 年 5 月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这些处理，对稳定港人的民心，对香港的平稳过渡及顺利回归，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满怀豪情迎接香港回归

一个巨型的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倒计时钟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正门,倒计时钟长 19.97 米,宽 7.1 米,寓示中国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深圳罗湖桥头也树起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巨型倒计时钟。这一南一北的两个倒计时钟,标志着中国收回香港的日子愈来愈近了。

为了体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硬币上的英女王像已被盛开的紫荆花图案取代;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通用邮票已不再发售,代之通用的是一套以美丽的香港风景为画面的通用邮票;邮筒上的英女王像或英皇室标志已经消失,新邮筒唯一的图案是表示邮政的“P”字;马会删去了“英皇御准”的字眼,恢复了早年的“香港赛马会”的名字;所有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皇家”字眼都将统统删掉,紫荆花将开遍整个香港;电视上,“九七备忘录”、基本法推介活动等节目层出不穷;订购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单位越来越多……

夜幕降临,九龙好时中心外墙上,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为主体的回归灯饰眩目耀眼;港岛友邦大厦正面,写有“一帆风顺”字样的“1997 风帆”灯饰在夜色中显得分外明亮……

根据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首批 40 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先遣人员于 1997 年 4 月 21 日进入香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部队首次踏上祖国这片神圣领土;接着第二批 66 名和第三批 90 名先遣人员也陆续进入香港。

驻港部队先遣人员抵达驻港英军威尔斯亲王军营后,受到驻港英军司令邓守仁及驻港英军的欢迎。根据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达成的共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人员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驻香港部队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正式接管香港的防务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先遣人员表示，一定会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认真履行神圣职责，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及香港法律，以实际行动展示我军威武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一定为国旗、军旗增添光彩，向党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踏入 1997 年，香港市民的政治及经济信心指标承接 1996 年底的升势，大幅向上攀升。据香港市场研究社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的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市民的政治信心指标上升达 95 点高位；经济信心指标大幅上升至 93 点，是 3 年以来的最高点。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基金会相信，香港在移交中国后会获得成功。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已就中英两国政府于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前后共同举办一个香港交接仪式的有关安排进行了讨论，双方已就以下各主要事项达成共识：

（一）总体原则

（1）两国政府将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前后在香港共同举行一个庄严、得体的仪式。

（2）仪式将按照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规定，充分体现英国政府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神圣的主题。仪式还将包括防务责任的交接。

（二）具体安排

根据上述原则，双方认为应作以下具体安排：

（1）仪式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第二期大会堂前厅举行。

（2）仪式由中英两国高层代表主持，两国的军方仪仗队及军乐团也将在场。仪式包括军方仪仗队的正式敬礼仪式，双方高层代表致辞。之后，即届午夜时，起奏英国国歌，在乐声中降下英国国旗及香港旗。午夜一过，即起奏中国国歌，在乐声中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仪式结束后，将按适当的礼仪安排英方的代表正式离场。

（3）中国、英国和香港的嘉宾以及海外嘉宾，包括中英双方邀请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层代表将到场观礼。

（4）欢迎中国内地、英国和香港本地及其他国际传媒的代表出席及自由报道这次仪式，并将为其提供适当设施，包括一个新闻及广播中心。届时，将按国际惯例，沿用香港在大型活动中通常使用的传媒身分鉴定和联合采访的程序。

（5）香港警方负责该仪式的安全事宜，中英双方将进一步就此进行磋商。

据香港报道，将邀请4000名嘉宾参加政权移交仪式。英国宣布，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将代表英女王出席香港政权移交仪式及有关活动。截至目前，香港警方共接到181项在6月至7月期间举行的公众活动通知，其中包括41项嘉年华会，21项演唱会或表演会，2项烟花，11项花车游行，52项文化活动，9个展览，9个大型晚宴，6项体育活动等。

香港回归祖国，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为了隆重庆祝，香港上千名人士组成了“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简称庆委会），积极筹划迎接香港回归的大型民间庆祝活动。

据新闻媒介报道，万众瞩目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及回归日前后的大型活动，已大体勾划出轮廓。

6月30日21点，维多利亚港燃起辞旧迎新烟花；同时，在香

港跑马场，“香港回归大汇演”拉开帷幕；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内，“万家欢乐庆回归”的大型游园也将进行。23点30分，4000名来自各国和香港各界的观礼嘉宾将就坐在香港会议展览新翼5楼的大会堂内。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开始后，中英两国的高层代表将分别发表一份简短的讲话。午夜来临，英国国旗和港英旗帜降下；零时，中国国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仪仗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7月1日凌晨1点，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酒会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7楼隆重举行。各国来宾、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贺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黎明时分，在香港落马洲口岸，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正式进驻香港，居民将以欢庆的锣鼓和舞狮龙迎接解放军进驻。

7月1日上午10时，在红磡体育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大典正式开始，同时在香港各地，还将举行各种群众性庆祝活动。

到目前为止，已有来自世界各国800多个新闻机构的8300多名记者及新闻从业人员，报名参加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以及相关的采访报道。据悉，内地将有逾1500名记者赴港进行采访活动。为此，一个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传媒中心正筹备成立。届时，香港回归祖国的盛况，将以最快的速度传至世界每一个角落。

为了争睹回归庆典，香港所有饭店的3.46万个房间将全部爆满。鉴于客房将会大量紧缺，新加坡的一家航游公司计划把该公司的一艘客轮停靠在香港的码头，用作一个流动的旅馆。

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香港人民正和全中国人民一道，满怀胜利的豪情，迎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封页设计:黄　炜

百年风雨话香港
林庆元　李景端　主编

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通达印刷厂(地址:六合冶山镇)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215 千
版次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664-X/I·377
定　　价　10.50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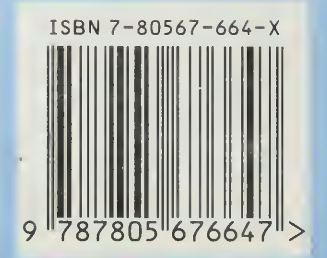








百年风雨话香港



ISBN 7—80567—664—X

I·377 定价:10.50元